

编号 432682
14
军队政治资料室

美国社会主义史



[美] 希 尔 奎 特 著



美国社会主义史

〔美〕希尔奎特著

朱立人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年·北京

Morris Hillquit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Funk & Wagnalls Company
New York and London
1906

根据美国丰克—华格诺耳斯图书公司
1906年第四版英文版译出

内部读物

美国社会主义史

[美] 希尔奎特著
朱立人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人民路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印张 200千字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17·149 定价：0.78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摩里斯·希尔奎特(1869—1933)早年从事美国工人运动,当过犹太职工联合会的书记,参加过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参加过反对该党领导德利昂宗派主义的斗争。1900年美国社会党成立时,他是该党的领导成员之一,此后又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希尔奎特奉行机会主义路线,竭力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他采取考茨基“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是在“中间路线”的幌子下掩盖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对于伟大的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希尔奎特同叛徒考茨基一样,疯狂地反对,恶毒地咒骂,并在美国社会党内大搞宗派活动,实行高压政策,开除大批左派党员。这完全暴露出他是美国工人阶级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本书共分一、二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欧文、傅立叶和其他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实验。第二部分叙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1903年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所谓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等的思想及其实验,不可能作出阶级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没有正确说明其历史地位和作用。在介绍美国早期的工人运动时,作者大事吹捧拉

萨尔、巴枯宁等无产阶级的敌人和美化其他的机会主义者，并强调单纯的经济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但作者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因此，本书对于许多史实，特别是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和社会党初成立时的情况，介绍得比较详尽。这对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和研究美国早期工人运动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现予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供研究参考。

目 录

序言	9
总论 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它的特点和起源——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形成对比	11
第一部分 早期的社会主义	
绪论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验	15
作为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的共产主义实验——美国是社会公社的主要活动地区——美国公社的数目、力量和类别	15
第一章 宗派公社	20
一、震教徒会社 该教派的起源和成长——社会组织和等级——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震教徒的共产主义	20
二、谱和会社 “分离主义者”和乔治·拉普——谱和派的迁移——“德·利昂伯爵”——该会社的现状和积累的财富	23
三、左雅尔公社 该教派迁居美国——约瑟夫·博伊梅勒——左雅尔公社的起源——法人组织——起诉——解散	25
四、阿马纳公社 “真神托公会”——克里斯提安·梅茨和巴巴拉·海恩曼——在纽约布法罗的第一个移民区——迁往衣阿华州——七个阿马纳村庄——事务的管理——习惯和生活方式	28
五、贝瑟尔公社和奥罗拉公社 凯尔博士的冒险经历——共产主义者的生活和工业——松弛的组织形式——解散	31

六、奥奈达公社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和“至善论”—— 奥奈达移民区的建立——高度的文化水准——宗教理 论——“复合婚姻”——学校和书报——“互相批评”的例 子——改为联合股份公司	33
第二章 欧文主义时期		38
一、罗伯特·欧文	欧文的一生——人的性格形成的理 论——社会改造的理论——社会实验——在英国和美国的 宣传工作——“公平劳动交换银行”——“各阶级和各民族 联合会”——欧文逝世——罗伯特·戴尔·欧文——伊万 斯两兄弟——纽约的第一个工人政党	38
二、新和谐公社	移民区的地点和出世——公社的创立 者——杂七杂八的移民群众——连续的七个“体制”——公 社分裂——事业失败	47
三、黄泉公社	辛辛那提的斯威敦堡教徒——罗博士—— 移民的热情——实验的短短经历	53
四、纳肖巴公社	弗朗西斯·赖特的一生——移民区的目 的和管理——放弃实验	54
五、其他的欧文主义实验	哈佛斯特劳公社和“理性教 堂”——考克斯萨基公社和关于体制的辩论——倒霉的肯 达尔公社	56
第三章 傅立叶主义时期		59
一、沙利·傅立叶	他的生平和理论——教育——著作—— 普遍和谐、情欲、吸引力、小组和谢利叶——法郎吉——少 年团——利润分配——宇宙进化论——傅立叶逝世	59
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	艾伯特·布里斯班——《人的社 会命运》——霍勒斯·格里利——《纽约论坛报》和傅立叶 主义——帕克·戈德温的著作——《法郎吉》——《先 驱》——乔治·里普利，查尔斯·达纳、约翰·德怀特和 威廉·钱宁——演说旅行——傅立叶主义会和代表 大会	68

三、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	在美国的傅立叶主义实验的性质——它们失败的原因——格里利、布里斯班、里普利、达纳和德怀特等人以后的经历	76
四、北美法郎吉	这个移民区的起源——工业——“公平的”利润分配——法郎吉的衰落——碾粉厂的大火灾——解散	81
五、布鲁克农庄	“超绝俱乐部”——《日规》——原则宣言和组织章程——学校和学者——劳动和娱乐——改信傅立叶主义——布鲁克农庄的名气——法伦斯泰尔的大火灾——瓦解	84
六、威斯康星法郎吉即塞雷斯科法郎吉	沃伦·蔡斯——一个傅立叶主义的镇市——物质繁荣——一家一户的家务——自愿解散	90
七、一批宾夕法尼亚的法郎吉	夕法尼亚协作社——和平联合移民区——社会改革社团——勒雷斯维尔法郎吉	92
八、一批纽约的法郎吉	四个共同来历的法郎吉——美国工业联合会	94
九、一批俄亥俄的法郎吉	特朗布耳法郎吉、俄亥俄法郎吉、克拉芒特法郎吉、总体法郎吉和哥伦比亚法郎吉	95
十、其他的傅立叶主义实验		96
第四章 伊加利亚派公社		98
一、伊加利亚的由来	埃田·卡贝——《伊加利亚游记》——共产主义移民区的计划——“伊加利亚”运动——在得克萨斯州获得土地——“先锋队”起程	98
二、得克萨斯公社	“先锋队”的登陆——一个土地经纪人的欺骗——伊加利亚主义者的死亡和疾病——返回到新奥尔良——卡贝和他的信徒的来到	102
三、诺伏公社	诺伏区和它的摩门教创立者——繁荣时	

期——移民区的管理——争论——卡贝被开除和逝世	106
四、契耳坦哈姆公社 保守派和激进派	108
五、衣阿华公社 诺伏公社的衰落——迁往衣阿华——开拓生活的艰苦——老年派和进步派——激烈的争论——特许状失效——“伊加利亚公社”——“伊加利亚·斯佩兰扎”——“新伊加利亚公社”	110
观察和结论 宗派公社的繁荣和非宗教公社的失败——共产主义制度对性格形成的影响——进取心和独创性——勤勉和道德,卫生和长寿,教育和文化	114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

绪论 美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123
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连接物——两个运动的性质和起源的区别——美国社会和工业的变化——工厂制度的兴起——劳资斗争——美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经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美国现代社会主义史的分期	123
第一章 南北战争以前时期	129
一、运动的发端 德国侨民——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日耳曼尼亚”	129
二、威廉·魏特林和工人总同盟 威廉·魏特林——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魏特林的哲学——第一次赴美国——1848年革命——第二次赴美国——《工人共和国》——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德国工人在美国国土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总同盟——在衣阿华州的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约瑟夫·魏德迈耶——《革命》——《社会共和国》	130
三、体育协会 协会的起源——“精神体育”——社会主义体育协会——体育协会在美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38

四、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会员——俱乐部的组织章程和活 动	139
五、南北战争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体育协会德籍会员组 成的志愿团——魏德迈耶、威利赫和联邦军队中的其他德 国社会主义者	140
第二章 组织时期	142
一、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成立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回 顾——第一国际成立的直接原因——纲领——活动方 式——代表大会——卡尔·马克思和米哈伊尔·巴枯 宁——“民主社会主义国际同盟”——总委员会迁到纽 约	142
二、第一国际和“全国劳工同盟”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工会 运动——全国劳工同盟的成立——威廉·西耳维斯，他在工 人运动中的一生和事迹——他和欧洲第一国际的联系—— 第一国际和全国劳工同盟——同盟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者——多威博士——全国劳工同盟的衰落	149
三、第一国际在美国 纽约及附近地区社会党和德籍工人 总协会——第一国际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的“支 部”——中央委员会的成立——组织的迅速发展——吵闹 不休的“第十二支部”——北美联合会的成立——弗利德里 克·左尔格——1873年的工业危机——汤普金斯广场的示 威游行——失业者游行——伊利诺斯劳工党和北美社会民 主主义工人党——美国第一国际队伍的分裂——第一国际 的死亡	160
四、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的发 展——全国劳工同盟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组织 的统一条约——美国工人党——改名北美社会主义工人 党	171
第三章 社会主义工人党时期	176

一、社会主义工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使运动“美国化”的努力——与工会的关系——政治斗争和政治联盟——党的缓慢发展——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内部倾轧——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就	176
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历		182
(一)早期的胜利和失败	1877年铁路罢工——和民兵的战斗——铁路财产的破坏——圣路易被夺取——社会主义宣传——党的发展——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和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举行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纽约人民新闻》的创立——德国政治流亡者的来到——在纽约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	182
(二)同无政府主义进行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比较——无政府主义在欧洲和美国——“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约翰·莫斯特——1883年匹兹堡代表大会——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匹兹堡宣言”——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扩大——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菲利普·范·帕顿的失踪——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谈判——1883年巴尔的摩代表大会——莫斯特和格罗特考之间的辩论——社会主义者更生的活动	191
(三)芝加哥戏剧性事件	1884至1886年的工业萧条——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分子和八小时工作制运动——麦考密克罢工——秣市群众大会——炸弹案——群众对无政府主义的愤怒——斯皮斯、施瓦布、菲尔登、帕森斯、费希尔、恩格尔、林格和尼比被捕和被审讯——罪犯的传略——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判决和执行	203
(四)重建时期	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活——李卜克内西和艾威林夫妇的宣传鼓动旅行——1887年布法罗代表大	

会——国际工人协会——该组织的历史、目的和力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派别和分裂——在芝加哥举行的敌对的代表大会——稳步发展——1896年纽约代表大会——该党发展的顶盛时代	211
三、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政治活动	218
(一) 独立的政治活动 关于政治活动的原来看法——早期政治运动——在芝加哥的初次胜利——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第一次提名总统候选人	218
(二) 绿背纸币党 运动的起源——该党的成立——发展和衰落——社会主义者参加绿背纸币党1880年代表大会——政治上的悲观——和其他劳工政党的联盟	223
(三) 亨利·乔治运动 亨利·乔治的生平——《进步与贫困》——单一税论——统一工党——1886年纽约市长竞选运动——社会主义和单一税论的比较——社会主义者参加乔治运动——1887年锡臚丘茲代表大会	229
(四) 又一次的独立政治活动 进步工党——1888年社会主义者提出候选人名单——国民党——纽约州竞选运动——1892年和1896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总统候选人——该党得票数目的增加	237
四、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	240
(一) 地方组织 工会同情社会主义——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和中央劳工联盟——其他城市工会的中央组织——德国人联合工会——希伯来人联合工会	240
(二) 劳动骑士团 骑士团的起源和发展——作用和仪式——原则宣言——社会主义者参加骑士团	245
(三) 美国劳工联合会 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和工会联合会——它的成立和经历——联合会和劳动骑士团的对立——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劳工联合会——它的斗争和发展——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历年年会上的提案	249

(四)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联盟的创立——它的目的、方法和经历——联盟的衰落	256
第四章 今日社会主义	260
一、形成今日社会主义的力量 工业集中——强大的劳工组织——霍姆斯特德、克达伦、布法罗和田纳西的罢工——普尔曼罢工——民兵和禁令——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国家主义运动——人民党——俄马哈代表大会和纲领——社会主义情绪的发展	260
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瓦解 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要求——党的领导对工会的敌对态度和改良运动——党内的摩擦——敌对派别——最后分裂——1899年罗彻斯特代表大会	274
三、社会党 新的社会主义分子——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党——1898年芝加哥代表大会——移民计划——社会民主党——党的发展——1900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罗彻斯特派的合并谈判——谈判失败——对立的政党——1900年总统竞选运动——1901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代表大会——终于合并——社会党	280
四、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状况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衰落——社会党的成长发展——登记的党员人数——竞选的胜利——党的报刊——工会的同情——运动的状况和前途	289
附录 I: 社会党纲领	296
附录 II: 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299
译名对照表	301

序 言

当约翰·汉弗莱·诺伊斯出版他的《美国社会主义史》(1870年)一书时,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在我国几乎尚未为人知晓。诺伊斯描述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些早期共产主义学派的社会实验。这些实验中的大多数此后便消失了,那些还残存着的实验简直不能被看做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现今的社会主义是和诺伊斯时代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的一个运动。许许多多孤立的公社——它们有着五花八门的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让位于一个有组织的和划一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

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长已成为一切社会问题研究者关心的对象。近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写了许多,但对于它的历史注意得非常不够。1890年,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出版了一本论述美国现代社会主义^①的学术著作,其中搜集了1850至1890年时期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一年以后,科格内蒂·代·马提斯出版了一本书名相似的著作^②。著者论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和它的比较现代的方面,然而没有对这个问题提供什么新的知识。现在也不能把这一著作看做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一部

① 《美国现代社会主义》。

② 《美国社会主义》。

完备的历史，况且这两本书都是用外国文写的，因此大多数美国读者都无法阅读。在用英语写作的著者中，伊利教授是试图完成一本美国社会主义简明历史^①的唯一著者，但伊利先生的书是十七年前写的，并且他书中的主题只是对这个问题顺便提了一笔。

对于明确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在还是一门必不可少的知识。它起源的情况和它成长的方式，为了解它的当前状况和意义以及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唯一可靠的线索。

在本书的写作准备方面，我曾尽力弥补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的缺陷。现在我把它公诸于世，希望它对于更好地了解一个正在迅速成为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重要因素的运动能多少有点贡献。

^① 《美国劳工运动》，1886年出版。

总 论

编年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乃是十九世纪的特征。现代大工厂制度淘汰了以前世纪的小生产。铁路、电报机和轮船冲破了一切地理障碍，把整个文明世界联合成为一个大的国际市场。同时，大机器、汽力和电力使劳动生产率成百倍地增加，并且创造了数量惊人的财富。

但是这个转变过程跟着产生了种种新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相当少的人享受这个过程的一切利益，一方面大多数的居民从丰收中得到的往往不过是苦难和穷困。

新的完美的机器的发明使许多熟练工匠降为普通工人，并且使更多的人永远地或者至少在长期而沉闷的“再调整”过程中失去了工作和工资。

无计划的生产方式和工业巨头彼此之间不顾死活的竞争，交替地产生疯狂活动和紧张劳动的季节，以及在一再循环的工业萧条时期达到惊人程度的强迫赋闲的季节。

有产阶级的奢侈、豪华和风雅同工人阶级的贫穷、苦难和无知遥遥相对，社会的差别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显眼。

现代文明的这些弊病引起了上世纪最热心的社会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他们提出了许许多多补救的方法和理论。其中最激进的理论——它看出竞争工业和雇佣劳动是一

切弊病的根源，主张在生产合作方式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整个经济制度——叫做社会主义。

如同大多数的其他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那样，社会主义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然后才达到现代的局面。

在它的最初阶段，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政治运动，还不如说是人道主义运动。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分析新的生产制度，也没有深入研究它的历史意义或趋势。在他们看来，这个制度的弊病是任意违背“自然法”、正义和理性的“永恒原则”的结果；并且在他们看来，这个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社会统治力量的笨拙的和存心不良的创制品。

他们恪守自己的关于社会制度系由人们有意的行为所创造或破坏这一理论，常常想出带有几分幻想的、认为可以摆脱现代文明弊端的社会组织计划，并且劝导全体人类加以采纳。

这个计划通常由草拟人用描述一个虚构的国家的办法来加以阐明，这个国家有着合乎他自己对正义和理性的看法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政府形式；而大家喜欢用的描述的形式则是小说。象这样叙述的幸福国家就是乌托邦（希腊语叫虚无乡），从此便把草拟人叫做“空想社会主义者”。

这些理论往往在实践上引导到把创立共产主义社会当作一种社会实验。这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逻辑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知道他们的社会组织计划不能在一个比较有限的范围内（恰如在全国规模内）令人满意地行得通的缘故，他们痴心希望，他们能用事实来证明他们的制度在一个小型社会内是行得通的并且是有好处的，借以逐步把全世界改变为他们的制度。

空想社会主义是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心主义哲学完全一致的,所以在这种哲学还保留统治地位的时候,就始终有空想社会主义流行着。

可是,在上世纪中叶,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臆测让路于研究,并且实证主义侵入一切科学领域,无情地破坏了旧的唯心主义,根本推翻了从前的观点和方法。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奥秘和错综复杂的情况渐渐地显露出来,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名家开始感到他们的理论和体系需要作彻底的修正。

这个伟大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的努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完成的。马克思对社会学的贡献犹之乎后来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他把社会学从模糊的空论领域提出来,把它置于比较可靠的分析基础上,或者借用桑巴特教授^①的话说,他把现实主义纳入了社会学。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的运动称为现代的或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空想的社会主义。

现代的社会主义从这样的理论出发: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是人们自由和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一定历史发展过程的正当结果,并且不论什么时候,这种结构的下层基础就是社会赖以组织起来的经济基础。

从这些前提推断,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社会形式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将不会改变,除非经济发展使这一社会形式发生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人类社会的未来决不可以在

^① 维尔纳·桑巴特:《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8年出版。

任何社会哲学家的巧妙的计划或发明中去寻找，而必须在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去寻找。

因此，现代的社会主义在一切实质方面不同于这个运动的早期空想时期。它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建立在人们的善良愿望或智慧的基础上，而是把它建立在现代的工业社会化趋势的基础上。它并不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完美的社会结构计划，而是提倡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循序进步的理论。它并不是要全体人类同意自己的主张，而是主要限于面向工人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最关心即将来临的社会变革。它不是在小规模社会团体中进行实验，而是致力于把工人阶级从工业和政治上组织起来，以便使这个阶级在变革时机成熟时能掌管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事务。

这个运动的两个局面在美国社会主义史中已充分表现出来，我们将分别加以论述，本书的第一部分将专门叙述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验，第二部分将专门叙述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

第一部分 早期的社会主义

绪论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验

我们在总论中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往往导致共产主义移民地的实验,在这里我们可以补充说,随着计划同这种实验或多或少地密切结合起来,这些理论在美国也或多或少地流行开来。于是,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查理·圣西门的体系——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国内和国际工业在科学基础上组织起来,并且它是一种不同意小规模实验的世界性的社会哲学——没有在美国得到反响。罗伯特·欧文的哲学在美国获得重要的立足点,虽然它没有象在它的诞生国家英国那样得势或对社会思想发挥同样程度的影响。在这个哲学中,公社不是一个要素,而是起着共产主义制度的预备学校、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实例示范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的体系——它主要以小规模社会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国家比在法国发挥更大的力量,同时纯实验性质的伊加利亚运动虽然起源于法国,可是却独在美国得到了实地应用。

使我国成为一切国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实验场所的原因很多。

社会实验者通常希望他们的移民区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

有高度文明秩序的完满的社会。为此，他们需要不受现代生活腐败影响的地方的大片便宜土地，而在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这样的土地在美国是很多的。

除此之外，这个年青的成长着的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前途，它的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对这些新制度的先驱者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十九世纪在我国建立的共产主义和半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数目基本上是出于推测。

诺伊斯^①在他 1869 年的著作中叙述了除去“震教徒会社”之外的约六十个公社。1875 年，诺德霍夫^②详细叙述了由五十八个分居的“家族”或村社组成的十八个“震教徒会社”和其他十二个主要是宗教的公社，然而这些公社包括诺伊斯提到的其中三个；三年后，海因兹先生^③记载了十六个新的公社，其中一部分是当时存在的，一部分正在形成中。肖先生^④1884 年断言，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无意地发现 1870 年以后组织的至少有五十个公社，肯特牧师^⑤在他 1901 年的著作中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建立的二十五个新的公社和协会。

① 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美国社会主义史》。

② 查尔斯·诺德霍夫：《美国共产主义会社》。

③ 威廉·海因兹：《美国的公社》。当芝加哥的查尔斯·克尔出版公司出版海因兹先生的著作修增第二版时，本书第一部分的大部分就已写成。新版本包括初版没有提到的关于欧文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实验的叙述；它追述了极其重要的宗教公社和伊加利亚公社的历史直到现今；对以前几个著者描述的公社补充了二十多个；因而总的来说该书现今是叙述美国公社的最详细而完备的著作。

④ 艾伯特·肖：《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史的一章》。

⑤ 亚力山大·肯特牧师：《美国的合作公社》，载《劳工部公报》，1901 年 7 月第 35 期。

根据我们对这些著者的片断叙述的估计，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上世纪美国各地存在好几百个公社，并且先后参加实验的人数有几十万人。

这许多公社的历史因它们的起源和特殊目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这里我们只叙述那些成为总的运动一部分的公社，这个总的运动直接地或间接地和各个空想社会主义学派有关系。我们不妨把这些公社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宗派公社

这一类包括震教徒会社、至善论者公社和德国侨民创立的几个公社。它们的主要目的始终是想自由无阻地行使它们特殊的宗教信仰。它们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次要的特色，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它们宗教制度的一部分，而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作为保持它们教派完整和使它们的成员不受外界异教徒影响的手段。

它们没有全面的改造社会的理论；它们没有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它们建立它们的移民区不是作为对它们的邻人的实例示范，而是作为它们自己的隐居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中它们通常被称为宗教公社，然而我们不能认为这个名称表达了它们的目的和性质。把它们和其他公社区别开来的，并不是它们是宗教性的这一事实，因为其他各类中的许多公社也是宗教性的，而是它们的宗教信仰和习惯具有独特的宗派性质这一事实。

这些公社从时间上说是最早的，从数目上说是最多的，并且其中许多至今还残存着。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它们只

起着次要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本书中只限于扼要地叙述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典型的。

二、欧文主义公社

这类公社或者是欧文直接建立的，或者是受了他的鼓动影响而建立的。他们是推进全面的社会理论和作为宣传工具而在我国组织的第一批公社。这类公社中只有十二个没有被遗忘，虽然很可能还有更多的公社存在过。这些公社实验的时期是从 1825 到 1830 年。

三、傅立叶主义公社

这类公社是沙利·傅立叶的美国信徒创立的。它们在自己的组织计划中努力尽可能密切地接近在傅立叶的体系中称为“法郎吉”的工业公社的理想。它们当中的大多数自称法郎吉。

傅立叶主义是在美国获得全国性运动崇高地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这个运动持续了十年左右（从 1840 到 1850 年），并且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四十起以上的社会实验。

四、伊加利亚公社

伊加利亚移民区是从法国人埃田·卡贝的一个计划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实验，我们虽然在五个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名称下见到它们，但是必须把它们看做是一个公社。

最初的“伊加利亚”公社于 1848 年成立，它的许多分社（由于不断分裂和迁移而形成的）继续存在了约半世纪之久。

伊加利亚运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展得相当蓬勃，但是从这个时期以后就几乎无足轻重了。这个实验虽然是在美国国土上进行的，但是几乎完全限于法国人，对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简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第一章 宗派公社

一、震教徒会社

“震教徒会社”是美国宗派公社中现存的最老的一个。第一个震教徒移民区是 1776 年在纽约州沃特弗利特建立的。运动创始人即会社最早的“领袖”是“修女院长”安·李。她是一个不识字的英国妇女，为了逃避国内的宗教迫害，和一些信徒于 1774 年来到我国。

安·李于 1784 年逝世，继承她的是詹姆斯·惠特克、约瑟夫·米查姆和露西·赖特。在这三个人的主持之下，会社的社员和财产大大增加，并且扩展成为若干公社。最使运动增强起来的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一再流行的传染病，特别是 1800 年在肯塔基州爆发并延续了好几年的空前的宗教骚动。

震教徒会社似乎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就已经达到全盛时期，当时它们的社员总数超过五千人。1874 年，诺德霍夫报道我国的震教徒总人数为二千四百十五人；据人口调查报告书说，1890 年这个数字减少到一千七百二十八人。现在残存的不超过一千人。

震教徒可以分为三类或者三等：

一、见习修道士——他们是正式称做“一千年至福会”或“信徒联合会”的震教徒教会的陪餐者，然而他们住在会社之

外,处理自己的俗事。

二、初级修道士——他们是新入教者。他们住在会社里面,暂时放弃他们的个人财产,然而他们随时可以返俗,并收回他们的财产。

三、高级修道士或教士阶层——这一等的人已经绝对抛弃他们的财产,终生献身于震教徒教会的事业。

震教徒会社的组织单位是“家族”。这个单位的男女成员生活在一起,人数从寥寥几个到一百多个。他们维持一个共同的户口,除了务农,通常还经营几项工业。

家族的宗教事务由“长老”掌管,世俗事务由“执事”掌管。

几个家族——通常四个——组成一个“会社”。

中央管理权授予由两个年长会友和两个年长修女组成的叫做“牧师团”或“主教团”的执行委员会;牧师团的首领叫“领导长老”或“首脑”。牧师团任命执事,并连带任命他们的各个工业部门的“管理者”或职工长。

领导长老任命牧师团的空缺,并指定他自己的继任人。会社各官员——宗教官员或世俗官员——受顶头上司的指挥,妇女和男子同样有代表参加一切管理组织。

他们独特的教义的主要教旨是:上帝是男女二性体,耶稣代表男性,安·李代表女性。模仿上帝的形象而创造的男子最初也是二性体。当亚当要一个伴侣时,两性就分离了,上帝应允了这个要求,把夏娃从他的身体上分割出来。这是男子犯的第一个罪。因此,震教徒把结婚看做是属于低等动物的事,严格维持独身生活。

他们把人类的宗教史分为四个周期,每个周期都有各自

的天堂和地狱。第一个周期的时期从亚当到诺亚，第二个周期从犹太人到耶稣的降临，第三个周期持续到安·李的时代。第四个周期或“至上宗规天国”现正在形成中，并将包括一切震教徒会社。

他们声言和天界神交，他们从那里收到的启示通常是靠他们身体的猛烈扭捩来传达的。正是这个特点使他们先获得“战慄教徒”和后来获得“震教徒”的称呼。

震教徒过着非常有秩序和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约九点休息，五点起床。六点进早餐，十二点进午餐，六点吃晚饭。他们的食物简单然而充分。他们爱吃蔬菜和水果，有许多人完全不食肉类。他们在一个大食堂进餐，男女分桌就座。

他们的宿舍、食堂和工场非常清洁，处处秩序井然。

他们的文娱活动几乎没有，秩序颇为安静：轻视器乐，读书限于有用有益的题目。常常在会议室唱赞美歌和交谈，近来据说他们已经开始搞一些闲适的户外运动如远足、槌球和网球。

震教徒的共产主义是他们宗教制度的一部分，但是它实际上只扩展到家族为止。就整个来说，震教徒会社没有公有财产，一个家族可能拥有大量财富，而另一个家族可能相当贫穷。

目前震教徒分为十五个会社，散处北美合众国九个州。估计他们的总财产有几百万美元，单单他们占有的土地就达十万英亩以上。

二、谐和会社

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很独特的村庄，约有一百幢住宅。这个村庄为几个有清教徒习惯的老年人共有，他们对居民的生活方式实行相当严格的监督。

这个地方名叫经济移民区，村里几个独掌大权的是从前一个拥挤繁盛的公社的最后残存者。

这个公社正式名叫“谐和会社”，通称“拉普派公社”，它有着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饱经沧桑的历史。

它的创始人乔治·拉普是符腾堡一个叫做“分离主义者”的教派的领袖。这个教派的独特宗教信仰引起了牧师们和政府的迫害，1804年拉普带着约六百名坚定的信徒离开德国，经过巴尔的摩和费拉德尔菲亚来到乡村。这批移民的主体是农民和工匠，但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其中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赖克特的具有相当的艺术爱好和优异的行政才能。他是乔治·拉普的养子。

他们成立的第一个公社是宾夕法尼亚州莱康明县的“谐和公社”，几年内他们兴建了好些住宅、一个教堂、一座校舍、几个工场和作坊，并且开垦了几百英亩土地。

尽管他们颇为兴旺，他们却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移民区的地址选择得不好。1814年，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和上面的一切东西卖掉，得了十万美元，迁往印第安纳州波塞县，在那里他们买了一块三万英亩的土地。

他们新的家园很快被改善和建立起来，成为周围乡村的重要商业中心。他们的财富和力量逐渐增加，并收容了来自

德国的大批新成员，结果据说 1824 年他们公社约有一千人。

这一年他们再次迁移。蔓延到他们移民区的疟疾使他们花一段时间去寻找买主，当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叫罗伯特·欧文的人的时候，他们把他们在经济移民区仍旧保有的财产买了下来，并且立刻拿到手里。

在萨克斯-魏玛公爵于 1826 年访问参观他们的新村落的报告中，记述了那里迅速发展的情况。他满口赞美这个村落清洁整齐、住宅美观、工场和工厂安排得体，以及移民们明显地享受的幸福生活。

他们的和平生活历程只受到一次严重的扰乱。1831 年，一个叫“马克西米利安·德·利昂伯爵”的人在一群随从簇拥下盛装来到经济移民区。他假装和移民的宗教见解一致，宣称他愿加入他们的队伍。

这些天真的人非常热情地欢迎他，不经任何调查就容许他加入他们的会社。“德·利昂伯爵”——真名叫伯恩哈特·米勒，是一个普通的冒险家——不久就开始破坏“谐和派”的宗教信仰，鼓吹世俗的诱惑和欢乐。他靠圆滑和献媚的手法获得许多社员的支持，当分裂成为不可避免并统计两派信徒人数的时候，发觉有五百人依旧忠于“拉普神父”，另一方面有二百五十人声明拥护“德·利昂伯爵”。少数派收回他们在公共财产中总共达十万零五千美元的份额，在德·利昂率领下迁往菲利普斯堡，他们想在那里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公社。但是他们的领袖丢弃了他们，窃取他们的款项逃到雷德河边上 的亚历山大里亚城（1833 年他在那里患霍乱病逝世），于是分离者只得散伙了。

在这同时，经济派很快恢复了他们的繁荣。南北战争爆发时他们约有五十万美元现款，为了更加安全，他们把这笔钱埋在他们的院子里，直到战争结束。

谐和派在他们事业开端的时候并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是到了1807年，在强烈的“宗教复活”声浪中，男女一致决定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从此以后，“谐和公社里不再有人结婚，不再生儿育女”。

除了他们的独身生活，谐和派决不是禁欲主义者：他们津津有味地进美餐喝啤酒，在他们历史上的早期时代，社员人数较多和比较年轻时，他们过着愉快欢乐的生活。

和震教徒的共产主义一样，他们的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制度的一部分，只限于他们自己的公社和教会的成员。当他们自己的人口多而事业少的时候，他们没有雇佣劳工，但是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和产业的发展，工资劳动者往往超过他们的人数，达到十与一的比例，并且现在事实上乃是拥有土地、油井、各铁路公司股票、银行业和采矿业的资本家的有限合伙。

三、左雅尔公社

和经济移民区一样，“左雅尔公社”是由来自符腾堡的分离主义移民建立起来的。

该派的创始人对他们本国政府进行了好几年的顽强斗争，政府仇恨他们是由于他们的标新立异的宗教教义，然而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服兵役，拒绝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上学。他们被罚款并被投入监狱，被从一个村子撵到另一

个村子，终于决心指望从那殷勤好客的美国海岸找一个避难所，借以逃避他们偏狭的祖国的迫害。一些有钱的英国战慄教徒的慷慨援助，使他们筹集到了旅费，于是公社第一批约二百人在他们推选的领袖约瑟夫·博伊梅勒尔率领下，在1817年抵达费拉德尔菲亚。

他们刚到达，就在俄亥俄州塔斯卡拉沃斯县买了几千英亩土地，开始进行开垦大部分土地的工作，并为公社社员建筑一些大木房，社员中许多人则曾留下为左邻右舍的农民劳动。他们把自己这样建立起来的村落叫做左雅尔公社。

不过花了少量现款买进的这块土地，是用约瑟夫·博伊梅勒尔的名义购买的，条件是分配每个社员一片地，由他们个人耕作和偿还债务。

他们没有成立共产主义公社的意思。但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年老体弱的社员，这些人感到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支付他们的农场地价，因此很快可以看出，许多人将被迫离散，这个事业将要失败，除非它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上。

1819年4月，在对这种情况作了彻底讨论之后，他们决定建立一个动产和人力的公社，从那时起他们就兴旺起来。他们建立了一个铁匠铺、一个木匠铺和一个细木工铺，饲养了家畜，并从为邻近农民做的活计中挣得了一点钱。

1827年通过他们田地修筑一条运河，这项工程是他们的绝好运气。他们得到承包这项工程一部分的合同，包价共二万一千美元，并且获得了销售他们许多产品的市场。在很短时期之内他们赎回了他们抵押的财产，又买了一些土地。

毫无疑问，左雅尔派初期的成功，大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

领袖约瑟夫·博伊梅勒尔的英明管理。博伊梅勒尔——晚年他名叫比梅勒——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然而具有伟大天赋才能的人。他不但是公社的宗教领袖，也是公社的世俗领袖。他全面监督它的事务，参加它同外界的一切交往，在星期日向左雅尔公社社员发表关于宗教和其他一切想得到的题目的讲话。其中许多讲话在他逝世之后集印成册。它们分为八开本三大卷，受到他的门徒的极大珍重。

左雅尔派最初禁止结婚，但是在过了十年或十二年的单身生活以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男子单独生活是没有好处的，因此废除了禁令。

据说，关于婚姻问题的这种情感变化是由于下面的事实产生的：约瑟夫·比梅勒在老年时和公社指派侍候他的一个漂亮的少女发生了恋爱。即使如此，事实是左雅尔公社的这位领袖是最早利用这种新的特权的人之一。

1832年，这个公社根据俄亥俄州的法律成为法人组织，取名“左雅尔分离主义者公社”。

根据他们的组织章程，公社事务的管理权授与三个保管委员，保管委员任命他们各项事业的管理人和分派每个社员某种工作，经常考虑社员的爱好和才能。

他们有一个常设的五人仲裁委员会，公社内的一切纠纷都提交它处理，并且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男女社员在每年的村会议上都有投票权。

他们在组成法人组织之后不久就达到鼎盛时代，当时他们的社员超过五百人。据诺德霍夫说，1874年他们仍约有三百名社员，并有价值一百万美元以上的财产。

在公社贫穷和竭力争取生存的整个时期，社员之间非常融洽，但是当它获得大量财富的时候，诱惑渐渐强烈起来，心怀不满的社员时刻尽力促使公社解体和瓜分财产。于是在1851年和第二次在1862年，从前的社员向俄亥俄州的法院提出瓜分的诉讼，但是法院却支持公社而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可是，要求解散公社的运动继续着，并且在1895年由于莱维·比梅勒——年高德劭的左雅尔公社创始人的后裔，他自己是公社中有势力的社员——的支持而强大起来。辩论继续了三年之久，有时变得非常激烈和厉害，最后在1898年的村年会上，终于通过了解散公社的提议。

大家一致同意推选三个社员担任委员来平分财产，结果每个社员获得约一千五百美元。

四、阿马纳公社

从人数来说，阿马纳公社是残存着的共产主义公社中最大的公社。这个公社是名叫“真神托公会”这个教派建立的，据说后者于十八世纪初叶创始于德国。他们的宗教的主要教义是：上帝仍然时时感召某些人，因此这些人就成为他的意志的直接工具。

1820到1840年间，许多信徒聚集在德国阿门堡的这个公会的主要“工具”克里斯提安·梅茨和巴巴拉·海恩曼的周围。他们在附近的工厂就了业，他们的物质生活看来很有保障，可是当局方面的变本加厉的迫害使他们不能再呆在阿门堡了。

就在这个时候，梅茨连续得到了两个启示，一个是指示他

率领全体会众离开德国，另一个是说美国是神托论者未来的家乡。

将近 1842 年年底，梅茨在会众的其他四个人的陪同下于是到了纽约，买了布法罗附近的约五千英亩土地。在以后两年内，来自德国的六百多个会友参加了进来，他们在梅茨购置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建立了埃本-埃策尔公社。

和左雅尔派一样，在他们最初移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打算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惯于工厂劳动，而不喜欢农业生活。为了留住这些成员，就有必要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工场和工厂，而这项工程只有靠他们共同的努力和财力才能完成。

他们的一位社员说：“这一次，我们是听了神托的命令把我们的一切资财集中起来过公社生活的，我们很快了解到，我们不可能靠别的计划过日子或团结起来。”^①

他们的社员迅速增加，不久他们发觉他们的土地已不敷他们日益发展的公社的需要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听神托的命令迁居西部”，是不足为奇的。

1855 年，他们在衣阿华州达文波特附近购置了约二万英亩土地，在那里建立了阿马纳公社，这个公社现在仍旧存在并发展着，它的人口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多。目前公社有七个单独的村庄，居民总数约为一千八百人。^②

① 引诺德霍夫：《美国共产主义会社》。

② 理查德·伊利在《哈波斯月刊》1902 年 10 月号上发表的《阿马纳——宗教共产主义的研究》。

这些村庄的名字叫阿马纳、东阿马纳、中阿马纳、近山阿马纳、西阿马纳、南阿马纳和霍姆斯达德。它们相隔一英里半，各有自己单独的学校、商店、酒店、工场和工厂。每个村庄管理自己的事务和记自己的账目，但是每年要把账目送给阿马纳总部验证。村庄的职工长和长老每天碰头商量，计划次日的工作，根据季节的需要分配社员到各个工作部门。公社的中央管理权授与每年由全体男社员投票选出的十三个保管委员。保管委员推举一位主席。

一家住一座单独住宅。但是他们有公共食堂。通常每个村庄有几个公共食堂。男女分桌进餐，“防止胡说八道和轻薄行为”。

公社所有的社员都有津贴，以便购买衣服；成年男子根据他的地位和职业所需衣服多寡每年领四十至一百美元；每个成年女子的补贴一年二十五至三十美元，孩子五至十美元。

村庄商店备有阿马纳公社社员应用的一切货品，社员可以随意选择，把物品价格记在账上，直到津贴花完为止。如果社员还有仍未用完的津贴，便转到他下年的账户下。

在他们的学校，他们同样注意初等教育普通学科和体力劳动训练。七至十四岁的儿童全年上学；十四至二十岁的只上冬学。他们的衣食很朴素然而充分，每天进五顿饱餐。他们在工作中非常自由自在，在收获季节他们雇许多雇工。

他们不禁止结婚，但他们也不予以鼓励，据记载他们甚至有一次把他们伟大神圣的“工具”巴巴拉·海恩曼赶出公社，“因为她对青年男子太另眼相看了”。

只有得到保管委员的同意和新郎满二十四岁才许结婚。

他们的婚礼完全缺乏欢乐，有点象他们的丧礼。

五、 贝瑟尔公社和奥罗拉公社

密苏里州谢尔比县的贝瑟尔村和俄勒冈州波特兰附近的奥罗拉村是姊妹公社，两者的存在都应归功于凯尔博士。凯尔的一生变化多端。他于1812年生在普鲁士，在侨居美国以前一直经营女用衣帽业。在纽约逗留一个短时期后移居匹兹堡，在那里他开业行医，实行“催眠治疗”，吹嘘持有用人血写成的处方奇书。三十岁时他突然转变：他信起教来，烧掉了自己的书籍，加入监理会，可是不久他便退出，成立了自己的教派。

他聚集了大批天真的门徒，其中多半是德国人和“十七、十八世纪时移入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南部人和瑞士人”，在1844年，退出“经济移民区”并被背信弃义的“德·利昂伯爵”抛弃的一些人也来投靠他。

正是在那个时候，凯尔和他的门徒想出了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的主意，为此在密苏里州谢尔比县买了约二千五百英亩土地。这是贝瑟尔公社的开始。移民们似乎没有什么资产，但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勤劳耐苦的精神。几年之后，他们大部分的土地都耕种了；他们建立了一个毛织厂、碾粉厂、锯木厂、几个工场、一个教堂和一个杂货铺。他们除了已有的财产又添了一千五百多英亩土地，政府为他们设了一个邮政局，十年内他们的移民区发展成为约有六百五十人的市镇。

但是，凯尔的不倦的精神驱使他做新的实验。他在1855

年率领约八十个移民从贝瑟尔前往太平洋海岸寻找便宜而肥沃的土地。次年他在俄勒冈州创办了奥罗拉公社。这个新移民区的成员一部分是从外界招募来的，一部分是从贝瑟尔移入而增加的，人数很快达到四百人左右。他们在俄勒冈州各县获得了一万八千多英亩土地，同样建立了在贝瑟尔经营的一切工业部门，此外还大规模地从事水果的种植和干制。

两个公社的管理形式和生活方式差不多一模一样。凯尔担任两个公社的主席，由一个保管委员会襄助每个移民区的管理工作。在 1872 年以前，贝瑟尔和奥罗拉的全部财产都是凯尔博士个人名下的，但在这年他分配了土地，给每个成年社员一张一块土地的地契。但是，这个瓜分不过是形式而已，各村落的经营管理和以前一样，仍然完全是共产主义性质的。

它们的社员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职业并可随意改变。他们没有正式的工作时数，也没有任何现场监督，他们的职工长和管理人是在自然选拔过程中产生的。

他们不但容许结婚而且鼓励结婚，并且维持严格的家庭生活。

各家都有单独的住宅，并得到足够全家需要的若干头猪和母牛。面粉和其他食品由公社按需供给，杂货铺的衣服和物品则应社员请求发给。他们对社外人的交易实行记账，但是公社和社员间的买卖却没有纪录。

他们过着非常安居乐业的生活，公社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任何危险的或惊人的事件。它们只接受了寥寥无几的外来人，但是总设法把它们自己的社员安置得很好。偶尔也有个别社员表示想退出，对这样的事情它们就给他一份应得的财

产或现金,让他离去。

在所有的宗教公社中,贝瑟尔和奥罗拉的组织形式是最松弛的;他们聚集在一起主要是靠他们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因此在他逝世后不久就各奔东西了。凯尔博士于1877年逝世,贝瑟尔公社和奥罗拉公社分别于1880年和1881年解散。

六、奥奈达公社

美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本人就是最著名的共产主义会社之一的创始人。奥奈达公社是约翰·汉弗莱·诺伊斯的造物。

诺伊斯于1811年生于佛蒙特州布拉特尔博罗地方。他毕业于达特默思学院,从事法学研究工作,但不久便改学神学,在安多弗大学和耶鲁大学进修。在神学研究中他发展了一套后来称为至善论的宗教学说。

1834年,他回到佛蒙特州帕特尼他双亲的住所,并逐渐聚集了一小批信徒。他的最早的永久信徒是他的母亲、两个姊妹和一个兄弟;然后是他自己的妻子和他兄弟的妻子以及他姊妹的丈夫;再后是一些其他的人,到1847年他约有四十个信徒。

运动起初是纯宗教性的,至善论者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宗教学说的演进,加之阅读《先驱报》和其他傅立叶主义的刊物,渐渐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1848年他们在纽约州奥奈达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

在实验的头几年,他们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难,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成就不大。诺伊斯和他的信徒(其中大多数似乎

是有资产的人)投资企业,到1857年1月1日共计十万零七千多美元,这天编制的第一份公社财产清单表明,总资产额为六万七千美元多一点,净损失约四万美元。

但是在那个时期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在有效和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创办了他们的工业。他们制造钢质捕兽器、旅行袋和小皮包,蜜饯水果,并从事制丝业。不管他们承做什么,他们总是谨慎周到,因此他们的货品在市场上不久就博得很高的声誉。

他们1857年的财产清单第一次有了小额的纯利,但是在此后的十年,他们的利润总数超过十八万美元。

在这同时,他们买了更多的土地,吸收了新的社员,1874年他们约有九百英亩土地,并约有社员三百人。

他们原来有好几个公社,但到1857年,他们把全体社员集中到奥奈达和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

奥奈达公社是唯一重要的纯美国人的宗派公社。大多数社员是新英格兰的农民和工匠,但是他们当中也有许多自由职业者——医师、律师、牧师、教师等——并且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比普通人高得多。

他们的事务由二十一个常设委员会管理,他们的各工业部门有四十八个负责人。但是,尽管制度显得错综复杂,他们的管理是完全民主的,并且做得很好。

至善论者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宗教理论、对于婚姻的看法、文学和“互相批评”制度。

他们认为:基督在耶路撒冷毁灭时期第二次降临,那时天界有过第一次复活和审判;接着上帝在天国开始施行决定性

的神政，这种神政在物质世界表现出来的日子现在已经临近；地球上的一个教堂正升起去迎接即将来临的天国神政；这两个教堂之间的联络手段是神托或神交，而神交导致极度的圣洁——完全超脱了罪恶——因此他们叫至善论者。

下面是诺德霍夫援引一个至善论者关于至善论的解说：

“因为戒酒主义绝对禁饮含酒精的饮料，反奴隶制主义主张立即废除人的束缚，所以至善主义主张立即与罪恶完全断绝联系。”

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不仅及于财产，而且也及于个人，他们坚决反对一夫一妻婚姻制，正象他们反对财产个人所有制一样。

他们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相结合。在公社范围之内，全体男子被认为是全体女子的丈夫，彼此混杂同居。然而，社员没有接受他们不喜爱的人的殷勤厚待的义务。

他们企图在科学基础上生男育女，宁愿使青年和老年两性配偶。他们把这个制度叫做“复合婚姻”制。

他们对淫荡的指责非常气愤，强制要求在获得“恋爱自由”的许可之前要“心地圣洁”。

孩子由自己的母亲照料直到断奶交给大托儿所的专职保育员照料时为止，外界参观者证实他们是一群面容健康的、欢乐的儿童。

他们保持一个优良的学校制度，把他们的许多青年送入学院，让他们接受公社内所需要的专门职业的训练。

为了宣传他们的思想，他们出版一些书籍和期刊，其中最

流行的是《奥奈达通报》。它是周刊，装订式样美观，出版时在各栏前面刊印着如下特别的语句：

“本通报发给所有申请者，不管他们付钱与否。它的成本和价值每卷最低二美元。需要者和应有者可分为三类，即：一、无力付二美元者；二、仅能付二美元者；三、能付二美元以上者。第一类读者应当免费；第二类读者应付成本费；第三类读者应付比成本费为多的钱以弥补第一类的不足之数。这是共产主义的法则。”

据说，“互相批评”是诺伊斯在大学时代发明的，并且从奥奈达公社存在之日起就成为它最重要的制度。它代替了审判和处罚，至善论者不仅把它看作是矫正一切道德败坏的有效武器，而且把它看作是医治一些身体失调的手段。

有时不经当事人的请求就进行批评，但较多的时候是应他自己要求的。有时全社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有时由最了解他的人中选出的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对他进行批评。

老实说，这个程序就是委员会的各成员对受批评者当面斥责——往往是严厉的斥责——据认为这种“互相批评”本身在揭露并从而矫正当事人的隐恶方面就应当产生有益的效果。

曾经有幸参加一次这种批评会的诺德霍夫，对它作了有趣的叙述，现在我们将大意转述如下。

一个星期日下午，一个青年——我们姑且叫他查尔斯——出场受批评。包括诺伊斯先生在內的十五人批评委员会聚集在一个房间里，诺伊斯先生宣布程序开始，问查尔斯是不是要发言。查尔斯说：近来他一直被一些疑问所苦恼，他的信仰正在动摇，他正在同内心的邪气作顽强的斗争。于是在座

的男男女女立刻相继大声发言。一个男子说，查尔斯被他的好运气腐蚀了，他有点自高自大；另一个补充说，查尔斯不遵守社交礼节，最近他听到他骂牛排太硬，他正养成说黑话的恶习。接着妇女参加批评，一个妇女说，查尔斯骄傲自大，另一个补充说，他“待人不一视同仁”，他太露骨地喜爱某些个人，当众呼她们的小名，第三个批评他在饭桌上的举止。随着批评的进行，指责愈来愈多。据称，查尔斯表现了轻视宗教和不诚实的苗头，大家希望他会渐渐认识到他的作风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这个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批评会上，查尔斯坐着一言不发，但是由于责难愈来愈多，他的面色苍白，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很明显，同志们的批评对这个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些直率的讲话看来没有引起社员的任何恶感。奥奈达公社的历史上根本没有出现过任何性质的不和；始终洋溢着充分的和谐，只有一个社员被他们开除过。

公社兴盛地存在了三十多年，但是公众舆论在邻近牧师们的鼓动下终于表示反对“复合婚姻”制，以致至善论者认为废除这个特色是合宜的。

这是作为共产主义会社的奥奈达公社瓦解的信号。诺伊斯本人偕同少数忠实信徒迁往加拿大，他于1886年在那里逝世，公社其余社员于1880年组成一个联合股份公司，名为“奥奈达公社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目前约有一百万美元财产。前公社的工业被全部保存下来。社员在公司财产中的利益以他们所持的股票来表示。公共图书馆、阅览室、洗衣店和草场是他们保留下来的仅有的合作社特色。

第二章 欧文主义时期

一、罗伯特·欧文

罗伯特·欧文的社会实验和学说在美国早期社会主义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扼要地叙述一下他的生平和学说对适当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是需要的。

罗伯特·欧文在1771年5月14日生于苏格兰的纽唐村。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父母有些名望，但很穷困。

他断断续续地受过公立学校教育，幼年十一岁时就跟一个伦敦商人类徒。那时，这个少年就已经相当出色地显露了后来使他成为两个大陆重要人物的那些才干：非凡的组织才能，孜孜不倦的刻苦精神，深刻分析的智慧，另外还有宽厚的同情心，卓越的人性判断力，勇敢，以及始终如一的彬彬有礼的态度。

他的事业是非常成功的。几年之内，他从一个伦敦商人的百货店的助手，升到曼彻斯特一家重要商行的相当负责的职位。

十九岁那年，他被一个名叫德林克沃特的人请去管理他在曼彻斯特的纺纱厂，这个工厂雇了约五百名工人，他后来不再继续受聘的做法很足以说明他的特性。

德林克沃特先生在短期试用之后同意用书面聘雇欧文三年，并同意在期满后让他作他的实业的合伙人。

然而在这同时，一个有钱有势的商人向这位曼彻斯特工厂主提出很有利的合伙条件。欧文明显的不同意是这个计划的唯一障碍，德林克沃特先生决心要不顾一切地消除这个障碍。他请欧文到他的办公室，向这位年轻的厂长说明了情况，问要什么条件才可以解聘，并提出给他在新的董事会下一个位置，薪金听便。欧文事先早预料到谈话的目的，来的时候带了他的书面合同，这时立刻把合同烧掉，泰然地注视着这个宝贝文件化成灰烬，他说：他不想跟不要他的人合伙，他决不继续留在德林克沃特先生那里工作。

在这插曲之后不久，他从那由于他的努力而大大兴隆起来的查尔顿·特威斯特公司获得了股份。

可是，在全心全意致力于他的商业时，欧文并没有忽视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并且在我们现在所叙述的这个时期，他已经具有后来指导他的一切行动、事实上决定了他的整个一生的信念：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性格不是由他自己形成的而是为他形成的。

他推论说：“人由于他出生后所处的环境而成为粗野的、非常凶悍的人，同类相食的人，或高度文明和仁慈的人。”这个推论的必然结论是：培养人们的性格和习惯的唯一方法是改善他们生活的环境。

他在对待由他管理的五百名曼彻斯特工人中开始作了实际应用这个理论的试验，但是，这个实验还没有显示出积极效果，他便和德林克沃特突然断绝了关系，因此实验也就中断了。

现在欧文想望有一个较大的活动领域，1800年初他在苏

格兰的新拉纳克村找到了这样的天地。

新拉纳克工厂是戴维·戴尔先生和著名的发明家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在克莱德河的瀑布边上于1784年创办的。

1799年，这个村子的纺织工人及其家属约有二千五百人，并且它完全是戴尔先生独资经营的。村子呈现了当时制造业村落的独特面貌。职工中约有五百人是从爱丁堡慈善机关招募来的儿童，他们在为此而建筑起来的简陋的大棚子里膳宿。他们往往六岁就被送进工厂，他们的劳动时间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七点，不用说，其中幸存的那些儿童在体格上长得矮小，智力上和道德上有缺陷。劳动是那样艰苦，而工资却是如此微薄，结果只有最下层的成年工人在工厂就业。这个村子很不清洁，居民耽迷于蛮横无理、酩酊大醉、偷窃和色欲过度，并且欠了村中小高利贷者、酒店老板和商店老板许多债。

这就是欧文和几个商业同伙用六万镑向戴尔先生买进的工厂、村子和一切东西时的新拉纳克的状况。

作为驻厂经理欧文，有权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改革，他立刻着手改造村子的巨大工作。他的初步行动之一就是把村子里的经常以高价卖给工人次品的店主赶走，成立了优秀的商店，一切商品照原价零售。将酒吧间和酒馆迁到村外，把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舒适的住宅代替了旧的茅屋。

他决定不再收容贫穷的儿童，废止戴尔先生订立的教区契约。

他为职工的孩子设立了模范幼儿园，供给全体新拉纳克居民受教育的设备。

他恪守自己的理论，废除一切惩罚读职工人的制度，力图

用亲切的忠告改正他们的缺点，更进一层的是，他自动减少他们的工时并增加他们的工资。

举凡这些改革的步骤都碰到困难；工厂各部门的监督人把他看作是危险的怪人，尽一切方法阻挠他的计划，更糟糕的是工人毫不赞助他的改革：多年的残酷剥削曾使他们疑虑重重，他们怀疑在欧文的各项新措施的后面隐藏着某种敌意。

1806年，由于美国对原料输出实行禁运，危机开始袭击英国棉织工业。联合王国的棉织厂全部停工，因而几千名失业的工人面临着饥饿。

欧文保留他的全部职工，虽然以后四个月没有开工，他仍发给他们全薪，总数约七千镑。

这个慷慨举动终于使纺织工人对欧文的诚意深信不疑。从此以后，他们对他们的雇主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并且在他的一切改革措施方面同他进行了热诚的合作。

但是产生了另一个障碍。只要欧文推行的改革没有减少企业利润的危险，他的合伙人就不会干预他，但是当他提出一些涉及到建筑和维持一个花费很大的学校和托儿所的新的改革时，他们就表示反对，明白声明他们是同他合伙经营实业而不是办慈善事业的。

由于这些意见不合，欧文不得不两度更换合伙人，1813年他处于被公司大多数股东完全撵出新拉纳克董事会的危险境地。

但是，这位足智多谋的慈善家兼工厂主是能对付这件事情的。他准备了一本关于新拉纳克工厂、他的有关该工厂的人道主义计划、他和他的合伙人争论的说明书。他将该说明

书印行了少量册数供好心的资本家私下传阅，在短时间内便有七个有钱的人包括著名的法律学家杰里米·边沁，表示愿意给新拉纳克工厂投入大笔资金，条件是他们的投资超过百分之五以上的全部利润均将用于慈善事业。

欧文用这样筹集的资金买下了他的合伙人的股份，现在他就能完全放手贯彻实行他的得意的改革计划了。新拉纳克在三十年中面貌完全改观。这个从前破烂的、居民堕落的村子变成了一个健康、快活和幸福男女的模范聚居地，变成了年年都有几千名前来参观的访客赞美的目标。

欧文的成就的名气传播到一切文明国家。敬慕他的人中有君主、亲王、政治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并且有一个时期他是欧洲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但是欧文没有满足于他所取得的成绩。新拉纳克的辉煌成绩加深了他对于人是生活环境的产物这一理论的信念，他现在从这个理论得出最后的和合乎逻辑的推论：同等程度的道德和幸福必须先有一切物质生活条件的平等。欧文从仅仅是一个慈善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

这种观点的改变带来了想要扩大他的活动范围的要求。新拉纳克对他已经变得太狭窄了；他切望为整个工人阶级造福，在其晚年尽力以一切方式宣传他的主张。

他早期就看出工厂立法的重要性，草拟了许多救济和保护工厂职工的方案，由于他的努力，其中某些方案被议会通过了。

1817年，欧文被“贫穷工人和劳动者救济协会委员会”邀请，陈述他对日益贫穷的原因的看法并提出救济办法。他在

给委员会的报告中发挥了这样的看法：在自由竞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改良的机器的采用使好几千工人失业，从而产生为糊口而进行的奋不顾身的竞争，这种竞争更加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任何临时办法都不能消除由于工业发展而带来的这个悲惨的然而却是必然的附产物。

欧文提议在互相合作的基础上成立工业公社作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公社的成员从五百到一千五百人，他们将自己生产一切生活必需品。社员要住宽大的住宅，周围设有花园，男子大规模经营工业，妇女则操家务和照料儿童的教育。

委员会认为这个计划过激而拒绝了，但是欧文毫不气馁，继续在公众集会上和私下鼓动方面进行他的宣传。

他不愧为真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吁有钱有势的人拿出慈善精神，甚至把他的计划递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和1818年的亚琛君主会议。当然，他不会获得比在委员会手里更好的结果。

这时欧文决定着手用自己的资产进行实验，并且热切地期待有利的机会。当他1824年获悉印第安纳州的拉普派移民区出售时，他立刻下了决心，他买了这个移民区和上面的一切东西，并渡洋赴美亲自指挥实验。

欧文和他的信徒在美国建立的公社的变化多端的时运将在下面各节分别叙述。

这些实验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注意，以至欧文在这个国家活动的另一个方面——他个人的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反而常常完全为人所忽视。但是这个宣传仍旧对他许多同时代

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第一次到美国就拿出了他建议中的公社的精心设计图，在美国许多大城市就他得意的题目发表演说，并且发见在最有知识的市民阶层中有许多听众。

在华盛顿，他在众议院会厅向总统、当选总统、美国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和许多参议员众议员发表了好几次演说。

在“新谐和公社”失败之后，欧文又到美国去了三次，每次都专门作了社会主义宣传。1845年，他号召在纽约举行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但是大会结果变成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1846年他在奥尔巴尼向纽约州制宪会议阐述他的关于人的性格形成的理论。

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同样成立了若干欧文主义公社，成绩和在英国的差不多。

但是他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并没有使这位不屈不挠的改革家气馁，他于1832年热情洋溢地从事一项新的事业，即“公平劳动交换银行”。欧文宣称，“一种商品所包含的人的劳动平均数量决定着这种商品的价值，因此，如果生产者按照这个标准估计一切商品价值并进行交换，资本家在工业或商业中将毫无地位，换句话说，工人将保有他的全部劳动成果。”

为了实行这个想法，按照下面的计划在伦敦成立了“公平劳动交换银行”：一项有用物品的每一个生产者可以把同样物品带到和这个银行有联系的“劝业场”去，换取银行发行的、所代表的劳动时数和他的物品包含的劳动时数相等的劳动券。劳动券持有者可以用这些劳动券购买劝业场拥有的、同样按生产所消耗的劳动量计值的其他物品。

这个计划的缺点是，这种银行专作商品交换，并未打算调节商品的生产。带到劝业场的无论什么东西不管实际需求如何都被收下来。结果在很短时期之后便造成一切有用物品的绝迹现象，而劝业场则堆满了不需要的货物。

“公平劳动交换银行”停业了，创办人损失了一笔财产。

这时欧文年逾六旬，但他仍继续为工人阶级利益活动了多年。

在他的影响之下，组织了“各阶级和各民族联合会”，该会曾在英国政界发挥巨大的影响，它的成员从1839年以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他还担任过英国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①主席。

欧文于1858年11月17日逝世，享高龄八十七岁。很少人象他那样一生经历了许多事件和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的失败很多，但是他的成就更多；他是第一个采用幼儿园制度的人；他是工厂立法的始祖，是最早提倡合作社团的人之一，他预见到了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理论和特点。

欧文遗下四个儿子，他们全成为美国公民。他们都在他们所选择的职业中成名。罗伯特·戴尔·欧文曾是他父亲的理论在我国的主要代表。他和弗朗西斯·赖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共同办了名叫《自由探究者》杂志，并在纽约办了“科学之家”，在这里举办关于社会改革的一切题目的讲演。追随罗伯特·戴尔·欧文和弗朗西斯·赖特的还有乔治·亨利·伊万斯和弗雷德里克·伊万斯两兄弟，他们是两个英国青年，于

^① 1839年10月。——译者

1820年到纽约的。他们接连出版了《工人拥护者》、《前哨日报》和《新兴美国》等刊物，其中的《新兴美国》一度颇负盛名。《新兴美国》在页首刊登了十二项要求，其中第九项“男女各方面平权”和第十项“废除蓄奴制和工资奴隶制”现在看来特别有趣。据说这些要求获得美国各地不下六百家报纸的支持，并且终于导致纽约州工人党的成立。工人党于1830年在锡拉丘兹举行州代表大会，提名伊齐基尔·威廉斯为州长候选人。威廉斯在纽约州获得的选票不到三千张，但由于工人党和独立党人在纽约市实行联合，它终于有四个候选人赛拉斯·史迪威、吉迪恩·塔克、埃比尼泽·福特和乔治·柯蒂斯当选州议员。工人党是我国直接归因于欧文主义影响的工人运动中的最终表现。它独立存在了一个很短时期，不久便为“民主党独立党人”运动所合并。

罗伯特·戴尔·欧文晚年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政治。他两度当选国会议员，起草了在华盛顿设立史密森学会的法案。作为印第安纳州制宪会议的议员，他对公正的女权条款的制定和该州义务教育制的采用起了主要作用。他担任我国驻那不勒斯代办六年，在其最活跃的时代是全国政界最能干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据说他给林肯总统的信是促使这位总统颁布废除蓄奴制宣言的一个有力因素。象他的父亲一样，他晚年改信唯灵论。他于1877年逝世。

乔治·亨利·伊万斯继续积极参加社会改革，直到1870年逝世，弗雷德里克·伊万斯于1831年加入震教徒会社，成了黎巴嫩山公社的领导人，在那里人家都管他叫老弗雷德里克。

二、新谐和公社

美国国土上的第一个欧文主义实验区是在印第安纳州沃巴希河畔的一块土地上。它约有三万英亩土地，在1814年拉普派在此建立他们的家园之前全是荒地。该宗派共产主义者的无比勤奋和优良风尚几年内就把这块荒地变为繁荣的移民区。

1825年，“谐和公社”（拉普派自称他们的公社为“谐和”）是一个正规设计的村落，街道彼此垂直交错，有一个公共广场、几座巨大的砖建筑物，以及许多住宅、工场和工厂。欧文花十五万美元把它全部买了下来。

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实验是在更顺利的情况下着手的：欧文主义移民找到了现成的家园，约三千英亩耕地、十九个分离着的农场，以及若干漂亮的果园和葡萄园，全都管理得很好。每一个公社头几年初创时期通常遭受的艰难困苦已被他们的前辈胜利地克服掉，并且产业没有负债。

参加欧文事业的有费拉德尔菲亚的威廉·麦克卢尔一个非常有钱的科学家和慈善家。麦克卢尔先生是当时最杰出的美国地质学家，被称为“美国地质学之父”；他也是费拉德尔菲亚自然科学院的主要创办人，任院长约二十五年之久。除了科学研究之外，麦克卢尔还对教育问题特别有兴趣。他是美国第一个介绍裴斯塔洛济^①学说的人，而且是最早提倡实业教育的人之一。麦克卢尔先生决定负责管理“新谐和公社”的学校和学习机构，他带来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① 瑞士教育学家(1746—1827年)。——译者

科学家中有当时最伟大的美国动物学家托马斯·塞；著名的鱼类学家和有才能的画家查尔斯·亚历山大·莱斯纽尔；后来任纳什维尔大学地质学教授的杰勒德·特鲁斯特博士。教育专家中有尼夫教授，他曾是裴斯塔洛济在瑞士办的学校里的同事；玛丽·佛罗塔戈特夫人和菲克巴耳·达律斯木，他们也是裴斯塔洛济学校的教员^①。弗朗西斯·赖特对创立“新谐和公社”也很热心，罗伯特·欧文所有四个儿子也都是这样。

因此，难怪欧文认为公社的未来是光明的和有希望的了。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他的主义的真理和共产主义的幸福不久将会在这个新移民区表现出来，“从公社传到公社，从国家传到国家，从洲传到洲，最后遍及全球，对人们的子孙后代放出光芒，撒布芬香和富足、智慧和幸福”。当他把这个移民区改名时，他怀着特有的热忱和大度邀请“各国勤奋的和好心肠的人”前来“新谐和公社”。

他们——各国好心肠的或坏心肠的人——成群结队地前来了；实际上，在短短的头六个星期内就有不下八百人响应欧文的号召，并且不久又有一百人参加。这是历来汇合起来创设合办事业的最庞杂、最不调和的一群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有些是出于纯洁高尚的动机，是抱着贡献自己的力量促使这个共产主义事业成功的目的参加运动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欧文的理想根本不了解或不表同情，他们把他的事业看做是一个有钱的怪人的事业，并且只要它存在一天，他们就力图

^① 关于欧文社会实验的有趣方面的细节，请参阅印第安纳州马里恩的乔治·布朗宁·洛克伍德：《新谐和公社》，1902年出版。

利用他的慷慨。那些男男女女属于各种阶级和职业，具有各种习惯和观念，他们是专家、工匠、工人、游民和冒险家。

没有审查他们的资格，没有询问他们的动机，从开头就实行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接纳成员的做法，给公社打上了最后使它瓦解的同床异梦和束手无策的烙印。

“新谐和公社”在作为公社而存在的两年中有过不下七种不同的管理形式或“体制”。

在纯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着手创办这个移民区，并不是欧文的本意。他说，“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不可能不作某些准备就转而适应合理的制度。”因此，他的第一个制度规定，移民要在“预备委员会”的监督下受三年见习训练，只有在评定见习期间服务成绩良好之后才接纳他们做正式社员。

不管怎样，三年的时期对“新谐和者”似乎显得太长了，因为我们发见他们在1826年1月采取了一个新的体制，根据这个体制移民区在完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规定全体大会为主要权力机关，六人委员会为它的执行机关。

但是，新的组织计划不知怎样没有发生作用，因此社员一致要求欧文负起公社的独裁统治。在这个新的管理形式——它存在以来的第三个形式——之下，这个移民区看来有了成功的希望。对普遍的紊乱采取了某些整顿办法；懒汉绝迹了，工场和农场呈现出一片罕有的勤奋景象。

但是在1826年4月，对有规则有系统的工作感到厌倦的某些社员要求把那些村庄分成若干独立的公社。欧文本来不会同意这个要求，但是由于以后讨论的结果，他给公社提出了

第四个体制。这个制度把社员分为三类——“暂准社员”、“见习社员”和“试用社员”，并规定由挑选出来的二十五个社员组织一个“核心”，他们有接纳新申请者的绝对权利。

欧文保留否决任何新成员的权力，并且此后只要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社员认为公社不能自治，他就要继续担任公社唯一的领导人一年。

但是，要求公社分裂的呼声没有被压住，到5月底欧文听从大家的要求，同意“新谐和公社”社员分开组成四个单独的公社，各有一个独立的管理机关。

这是“新谐和公社”的第五个体制，但只过了三个月移民们就采取了第六个体制，取消一切职员，任命三人委员会取而代之，赋予独裁权力。

“新谐和公社”所有移民区的成员在1826年9月17日举行的联席大会上通过了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体制。根据这个体制，全部管理权操在欧文和他每年指定的其他四个人手里。

但是，它的管理形式的频频变更并没有把“新谐和公社”从内部不和与分裂中挽救出来。欧文传记作者萨金特^①写道：“宗教是最早不和的话题，这种坏现象似乎由于巡回传教师的访问而加剧了，然而他们的干扰被一种特有的方式制止住了。据说，当时容许甚至请求社员对宗教和各种学说进行自由讨论；因此，凡是宣称抱有公开传道目的而前来的一切牧师都在酒馆受到免费招待；但附有这样不寻常的条件，即在讲道结束时任何听众可以随便提出问题。主讲的人并不喜欢这

^① 威廉·卢卡斯·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及其社会哲学》。

种盘问,以至好几个月没有一个传教师访问‘新谐和公社’。”

但是很明显,巡回传教师的绝迹并没有根治这个坏现象。

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以及连带的关于最合适的管理形式的讨论,继续扰乱移民的安宁,并且有时呈现了惊人的局面。

每次新的宗教争论的爆发和每次体制的改变都随之有一些不满的社员退出公社,并有两群社员脱离母体组织,在“新谐和公社”地区内成立独立的移民区。

其中之一的“麦克卢里亚”是以威廉·麦克卢尔的名字命名的。这个移民区居住了“新谐和公社”最保守的和正统派的社员中的一百五十人左右,它首先关心青年的教育,但对农业和工业的注意则是不够的。

另一公社名叫“菲巴·佩文”,据推测这个名称由于一些不可思议的理由,是表示这个地方的纬度和经度的。“菲巴·佩文”主要的移民是英国农民,据说他们颇有技能,但多少有点嗜嗜威士忌酒。

这两个公社和“新谐和公社”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象我们所知道的,它们又和它共同通过了第七个体制。

从公社的成分复杂和普遍缺乏计划这一点来看,它的寿命不过昙花一现,那是不足为奇的。

起初的时候,一切都很光明可爱。这个实验的第一个编史家麦克唐纳描述说:“儿童受免费教育,商店供给移民一切必需品,相当好的药房免费配给药品,^①”但是这位历史家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笔费用是从移民的收入中扣除,还是看来更加可能的是由欧文自掏腰包的。

^① 引自诺伊斯:《美国社会主义史》。

公社成立后不久，欧文便赴英国，把这个新事业交给他的年轻儿子威廉管理，当他于1826年上半年回美国时，他仍旧看出“新谐和公社”的状况非常良好。在这年7月4日，即美国独立宣言五十周年纪念，他向他的信徒们发表了演说，这篇演说由于雄辩和豪放而从此著闻于世，我们从中援引下面一段：

“现在我向你们和全世界宣布，世界各地的人到此刻为止一直是最可怕的罪恶的三位一体的奴隶，这些罪恶会联合起来会对全体人类施加精神和肉体的祸害。我指的是私有财产或个人财产、荒谬的不合理的宗教制度、建立在个人财产和这些不合理的宗教制度中的某些不合理制度基础上的婚姻。”

他的全部演说的语调仍然充满希望；他仍旧期望他的公社成为消灭他所厌恶的三位一体的罪恶的有力因素。

但是，我们发见他几个月后第一次表现了有点怀疑和沉思默想的情绪。他在自己的《公报》上说：“十八个月的经验向我们证明，公共财产公社的永久社员的必要资格是：一、诚实；二、节制；三、勤奋；四、用心；五、清洁；六、求知欲；七、确信人的性格是为他而形成的，而不是由他形成的。”

这个发现问世太晚了。聚集在“新谐和公社”的成分不纯的人群已在四分五裂。

社员一个个退出公社，欧文无法阻挡这个潮流。

一些个人汇集起来组成小的公社，欧文把“新谐和公社”郊区的一块块土地分给他们。土地是以出租的形式给他们的，定期一万年，名义上的年租金是一英亩五角，条件是：一旦发现土地的使用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的，租借关系就立刻

终止。这些公社的寿命都是短暂的。在村落之内，特有的共产主义被完全抛弃了。私营商店和工场代替了公社企业，酒店又神气十足地开了起来，小的竞争和斤斤计较的买卖支配了欧文曾经希望使之成为人们全体子孙后代亲如手足的起点的那个地方。

三、黄泉公社

1824年年底左右，欧文到了辛辛那提，在那里呆了很短的时期，讲解和展览他的关于模范公社的计划。他说服了許多人改信他的主张，其中主要的人有“新耶路撒冷教”或斯威敦堡教会的牧师丹尼尔·罗。

这个教会的成员都是有文化、高尚和富裕的人，其中许多人被欧文对公社幸福生活的热情介绍打动了心，以致他们决心要做一番实验。

约有七十五户或一百户为此而组织起来，并且经过慎重的商量和挑选之后，他们在辛辛那提以北约七十五英里的黄泉买了一块田地。

财产由全公社社员委托的购买者保有；要设立推行合理教学法的学校，举行公开讲演会，学习舞蹈和音乐。

公社的一个社员记载道：“头几个星期大家热心地参加这个新的体系。服务成了当时的风气。从前很少或根本没有用双手劳动过的人们，至少用一种可以嘉许的热情，虽然并不总是按照学识，专心从事农业和机械技术。牧师指导耕作；叫猪去吃食，而不是叫罪人忏悔。商人丢了码尺，拿起了耙和草叉。大家似乎为公共福利而高兴地劳动着。妇女中间甚至表

现了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过去很少了解她们自己的厨房内情的太太们，走进公共食堂的厨房，从事烹调；过去在生活上事事由人侍候的优雅的青年妇女，轮流在开饭时侍候别人。”

象布鲁克农庄一样，黄泉公社的社员主要是“上等人”——他们当中只有极少的农民或工人。他们从事这项运动不是出于经济或物质的考虑，而是出于精神和知识的动机。他们把自己的冒险事业看做多少具有长期旅行的性质，并且这种魅力持续了恰恰约半年之久。到这时期終了时，这些贵族气派的共产主义者变得严肃起来。牧师们很快发觉罪人比猪容易管理得多和有趣得多。商人发觉草叉所提供的好处没有码尺一半多，优雅的太太小姐们对围着鄙俗的锅台转来转去感到腻人。他们陆续回到他们的故乡和职业部门，黄泉在他们的记忆中变成了一场美丽的然而消逝了的幻梦。

四、纳肖巴公社

欧文主义时期最别出心裁的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公社是弗朗西斯·赖特 1825 年秋季创立的纳肖巴公社。

这个移民区拥有田纳西州孟菲斯约十三英里以外的沃尔夫河两岸的二千英亩土地。

弗朗西斯·赖特是欧文运动中最著闻的人物之一。她生于苏格兰，早年因办慈善事业、具有坚强的智力以及对当时一切进步运动表示同情而闻名。她周游了美国，特别是美国南部，她在那里研究过黑人状况。她还访问参观过拉普公社、震教徒公社和其他宗派公社，对它们的社会理论和生活方式获得深刻的印象。她在早期废除奴隶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是

最早和最有力的提倡女权的人之一。

她建立纳肖巴公社的主要目的是教育黑奴，让他们了解到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应同白人处于平等地位。为此，她买了若干黑人家庭，并且说服了一些农场主把他们的几个奴隶借给她实验。她以这些奴隶和一些各行各业的白人着手创办了这个公社。

她的计划是设立供白人和黑人的儿童共同受教育的模范学校，把黑人安置在这个移民区劳动，把他们劳动收入的一半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把其余一半用来设立换取他们的自由的基金。

预定公社的管理权要操在和创立者合办这个事业的一些慈善家的手里。头几个月的实验是令人十分满意的，并且在弗朗西斯·赖特有才智的和有力的监督下所获得的成绩看来是颇为令人鼓舞的。但是正当最需要她亲自临阵的时候，赖特女士却患病了，不得不远涉重洋到欧洲去恢复健康。

1826年12月，她把土地连同奴隶和个人财产出让给拉斐德将军、威廉·麦克卢尔、罗伯特·欧文、罗伯特·戴尔·欧文、科尔登·惠特比、詹宁斯、弗劳尔、理查森和卡米拉·赖特，“由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事和继承者保有，永久受托为黑色种族谋利益。”在这些受托人的管理下，公社存在了一年多。赖特女士负担的这项卓绝任务证明是她的继承者力所不及的，这时已从欧洲返回的赖特女士无法阻止逐渐瓦解的过程。1828年3月，纳肖巴公社的受托人宣布，他们已经暂缓实行在劳动合作的基础上组织公社的计划，并且他们只要求替它命名为“预备社会公社”。

三个月后，放弃了全部实验。奴隶获得自由，并迁往海地。
纳肖巴实验并不是弗朗西斯·赖特的活动的结束。

她在《新谐和公报》和《自由探究者》上继续为共产主义、
废除奴隶和女权的运动进行宣传。

有一个时期，她在北美合众国所有主要城市就她的得意
题目发表的雄辩的公开演说，也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她于 1852 年 12 月 14 日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逝世，享年
五十七岁。

五、其他的欧文主义实验

在其余的欧文主义公社中，有一个公社因其时运多变和
社员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而值得特别提一下。

这个公社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名称在欧文主义时期的
历史上出现三次，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在纽约州哈佛斯特
劳创办而在俄亥俄州肯达耳结束的事业。

哈佛斯特劳公社

这个公社是由一个叫法伊的纽约律师、其他几个有文化
有财产的纽约人和费城人于 1826 年成立的。

他们在离纽约约三十英里的哈得逊河畔的哈佛斯特劳占
了一百二十英亩土地。他们的社员人数不久就增加到八十
人，其中有许多人通晓各行各业，还有一些专门人材。这个移
民区的物质状况始终是兴旺的。

公社的特色是设立了理性教堂，社员星期日去那里做礼
拜，并且在那里还举行了关于伦理学、哲学和科学的演讲。这

些集会代替了一切宗教仪式。

公社的经历很短促，据说它的失败原因是管理马虎。

哈佛斯特劳公社解散后，大多数社员参加了考克斯萨基公社。

考克斯萨基公社

这个实验和佛哈斯特劳公社的实验非常相似。考克斯萨基的地产也在纽约州，离哈得逊河约七英里。它存在了不到一年，我们所能知道的是，社员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建议中的体制。

我们又在肯达尔公社发现这个公社的许多社员。

肯达尔公社

这个公社位于俄亥俄州坎顿附近。它是1826年快年终时成立的。它开始的时候很有前途。

社员约有一百五十人，包括农民、工匠以及必然会有的“经过挑选的人”。他们经营了一个毛织厂，建筑了若干住所，并且忙着建筑一座一百七十英尺宽三十三英尺长的公共大礼堂。

他们洋溢着谐和协调的精神，他们得意地宣告：无可否认，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获得了成功。

这个公社的一个社员约翰·汉农^①信中的下面一段话对它的突然结束作了解释：

“只要社员健康，有偿清他们地价的希望，我们的公社就

^① 引自诺伊斯：《美国社会主义史》。

谐和地、兴隆地发展起来。但是我们患了夏热病，有七户家长死亡，其中有几个人是我们最重要的和最有帮助的社员。同时，卖给我们土地的财主催我们付钱；因为我们没有组成法人组织，我们无法出卖一部分土地和给予有效的地契。这样我们就被迫停止活动和宣布解散，损失了我们已经付出的大约七千美元的款项。但是，我们结成了正在持续下去的友谊，失败并没有一刻削弱我对共产主义价值的信仰。”

诺伊斯还提到四个欧文主义公社，两个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在纽约州。但是看来它们是无足轻重的，并且寿命短促，因此它们的历史默默无闻。

第三章 傅立叶主义时期

一、沙利·傅立叶：他的生平和理论

沙利·傅立叶于 1772 年 2 月 7 日生于法国贝桑松。

他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观察研究，他喜爱的科目是地理、天文、化学和物理。

他作为富商的儿子，注定自己也要从事商业生涯。但是这个少年根本不喜欢商业。商业的欺诈是同他的正直本性格格不入的；正如他所说的，他虽学会了一些“高尚的撒谎术，或者说是推销手腕”，但学得不很高明，虽然他在少年时代换了好几个位置，但是雇主对他的评语总是千篇一律——“一个诚实的青年，但不能胜任商业”。傅立叶十八岁时为了他的雇主开始遍游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趁此机会研究这些国家的气候、它们主要城市的建筑式样，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工业、社会状况、生活方式和居民的性格。

1781 年，老傅立叶逝世，留下约二十万法郎财产，沙利·傅立叶得了五分之一，只是在这位沉默寡言的哲学家逝世后，他的朋友才知道在 1793 年里昂被围时期他已经丧失了这笔遗产。

1812 年，傅立叶得了他母亲的一小笔遗产，每年从中可以拿到九百法郎的收入。他有了这笔小小的生活费外加作为场外经纪人的临时收入，便放弃了他的商业，而致全力于社会

问题的研究。

他第一篇出名的著作是 1803 年在《里昂公报》上发表的题为《大陆三国同盟和三十年内的持久和平》的短论。在这篇文章中，傅立叶发挥了这样的看法，即为了持久和平，必需建立一个全欧帝国。他认为，应被看作和这样的帝国有关系的四个欧洲国家是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然而后者将在一次战役中就被消灭。然后三国同盟与持久和平才成为可能，但是如果三个帝国意见不一，那么奥地利就会立刻被并吞，而统治全境的争夺战就会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展开，胜利的希望将属于后者。据说这篇文章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他告诫出版者以后不要刊登类似的意见。

1808 年，他出版了题为《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的第一部巨著，接着在 1822 年出版了《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或关于普遍和谐的理论》；1829 年出版了《新的工业世界》；1835 年和 1836 年出版了两卷《假工业及其消毒剂——自然的和引人的工业》。

在这些著作中，第一部概述他的社会体系，其余几部则是专门论证它的若干论点和几个部分的。

傅立叶的社会体系是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作家所能提出的最巧妙和最精细的计划，如果不了解这个体系的主要特点，就不可能评价它在两个大陆产生的那个运动。

傅立叶是社会和谐的提倡家。

和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对现制度的批评不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或穷人的痛苦出发的，而是从现代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浪费，以及讨厌的劳动条件出发的。他

的着眼点不是人的感情，而是他们的物质利益。他的战斗口号不是“正义”而是“秩序”，人类的普遍繁荣和幸福不过是他的体系的普遍和谐的附产物，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傅立叶论证说，上帝按照一致和谐的计划创造了宇宙，因此一切现存事物之间、有机物和无机物之间、人和上帝之间、人和地球之间、地球和宇宙之间存在着和谐的联系。上帝赋予人以某些本能和情欲，希望自由而充分地发挥这些本能和情欲，而不是压抑它们。因此，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当的和有用的，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是给它的成员以充分机会来使情欲得到满足。

傅立叶于是进而分析人的情欲，断定它们有转载自艾伯特·布里斯班《社会命运》一书中的如下表所示的十二种：

五种感觉情欲	<table border="0"> <tr> <td>视</td> <td>觉</td> <td rowspan="5"> <table border="0"> <tr> <td>趋向</td> <td rowspan="5"> <table border="0"> <tr> <td>风雅、财富和</td> <td rowspan="5">集体的趋向。</td> </tr> <tr> <td>物质和谐</td> </tr> </table> </td> </tr> <tr> <td>听</td> <td>觉</td> </tr> <tr> <td>嗅</td> <td>觉</td> </tr> <tr> <td>味</td> <td>觉</td> </tr> <tr> <td>触</td> <td>觉</td> </tr> </table> </td> </tr> </table>	视	觉	<table border="0"> <tr> <td>趋向</td> <td rowspan="5"> <table border="0"> <tr> <td>风雅、财富和</td> <td rowspan="5">集体的趋向。</td> </tr> <tr> <td>物质和谐</td> </tr> </table> </td> </tr> <tr> <td>听</td> <td>觉</td> </tr> <tr> <td>嗅</td> <td>觉</td> </tr> <tr> <td>味</td> <td>觉</td> </tr> <tr> <td>触</td> <td>觉</td> </tr> </table>	趋向	<table border="0"> <tr> <td>风雅、财富和</td> <td rowspan="5">集体的趋向。</td> </tr> <tr> <td>物质和谐</td> </tr> </table>	风雅、财富和	集体的趋向。	物质和谐	听	觉	嗅	觉	味	觉	触	觉	
视	觉	<table border="0"> <tr> <td>趋向</td> <td rowspan="5"> <table border="0"> <tr> <td>风雅、财富和</td> <td rowspan="5">集体的趋向。</td> </tr> <tr> <td>物质和谐</td> </tr> </table> </td> </tr> <tr> <td>听</td> <td>觉</td> </tr> <tr> <td>嗅</td> <td>觉</td> </tr> <tr> <td>味</td> <td>觉</td> </tr> <tr> <td>触</td> <td>觉</td> </tr> </table>	趋向		<table border="0"> <tr> <td>风雅、财富和</td> <td rowspan="5">集体的趋向。</td> </tr> <tr> <td>物质和谐</td> </tr> </table>		风雅、财富和		集体的趋向。	物质和谐	听	觉	嗅	觉	味	觉	触	觉
趋向	<table border="0"> <tr> <td>风雅、财富和</td> <td rowspan="5">集体的趋向。</td> </tr> <tr> <td>物质和谐</td> </tr> </table>		风雅、财富和				集体的趋向。			物质和谐								
风雅、财富和			集体的趋向。															
物质和谐																		
听				觉														
嗅		觉																
味	觉																	
触	觉																	
四种依恋情欲	<table border="0"> <tr> <td>友</td> <td>谊</td> <td rowspan="4"> <table border="0"> <tr> <td>小组和情欲和</td> <td rowspan="4"> <table border="0"> <tr> <td>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td> </tr> <tr> <td>趋向。①</td> </tr> </table> </td> </tr> <tr> <td>功 名 心</td> <td>谐</td> </tr> <tr> <td>家 庭 情 感</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r> </table> </td> </tr> </table>	友	谊	<table border="0"> <tr> <td>小组和情欲和</td> <td rowspan="4"> <table border="0"> <tr> <td>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td> </tr> <tr> <td>趋向。①</td> </tr> </table> </td> </tr> <tr> <td>功 名 心</td> <td>谐</td> </tr> <tr> <td>家 庭 情 感</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r> </table>	小组和情欲和	<table border="0"> <tr> <td>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td> </tr> <tr> <td>趋向。①</td> </tr> </table>	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	趋向。①	功 名 心	谐	家 庭 情 感							
友	谊	<table border="0"> <tr> <td>小组和情欲和</td> <td rowspan="4"> <table border="0"> <tr> <td>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td> </tr> <tr> <td>趋向。①</td> </tr> </table> </td> </tr> <tr> <td>功 名 心</td> <td>谐</td> </tr> <tr> <td>家 庭 情 感</td> <td></td> </tr> <tr> <td></td> <td></td> </tr> </table>	小组和情欲和		<table border="0"> <tr> <td>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td> </tr> <tr> <td>趋向。①</td> </tr> </table>		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	趋向。①	功 名 心	谐	家 庭 情 感							
小组和情欲和	<table border="0"> <tr> <td>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td> </tr> <tr> <td>趋向。①</td> </tr> </table>		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				趋向。①											
统一性——全世界统一的																		
趋向。①																		
功 名 心		谐																
家 庭 情 感																		
三种分配或指导情欲	<table border="0"> <tr> <td>竞 赛</td> <td rowspan="3"> <table border="0"> <tr> <td>“谢利叶”和群</td> <td rowspan="3"> </td> </tr> <tr> <td>爱 变 迁</td> </tr> <tr> <td>组 合</td> </tr> </table> </td> </tr> <tr> <td></td> <td>众的协调</td> </tr> </table>	竞 赛	<table border="0"> <tr> <td>“谢利叶”和群</td> <td rowspan="3"> </td> </tr> <tr> <td>爱 变 迁</td> </tr> <tr> <td>组 合</td> </tr> </table>	“谢利叶”和群		爱 变 迁	组 合		众的协调									
竞 赛	<table border="0"> <tr> <td>“谢利叶”和群</td> <td rowspan="3"> </td> </tr> <tr> <td>爱 变 迁</td> </tr> <tr> <td>组 合</td> </tr> </table>	“谢利叶”和群				爱 变 迁	组 合											
“谢利叶”和群																		
爱 变 迁																		
组 合																		
	众的协调																	

这十二种中的头五种如果适当运用，就会达到风雅、高尚和一切美术的修养，并达到身体健康和快乐。

① 艾伯特·布里斯班：《人的社会命运或工业协作社和改组》，1840年出版。

第二组的四种“情欲”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与和谐的社会关系，因此又叫社会情欲。

第三组的三种情欲是傅立叶自己创造的，因此需要作一些解释。第十种情欲即竞赛精神——傅立叶称做神秘情欲——是党派、倾轧或竞争的精神。如果象在小组生产优良产品的竞争中那样运用正当的话，它是工业长足进步和发明的源泉。第十一种情欲即爱变迁情欲，傅立叶主义的术语叫轻浮情欲，是要求各业变化多样的情欲。用于工业，它就会消灭现行工作方法的单调，使之变得有趣和有吸引力。第十二种情欲即组合情欲，是不同组的两种情欲结合所产生的热情精神，例如跟知心朋友一道听优美的音乐，这就会满足听觉和友谊感。用于工业，它就意味着意气相投的人们联合起来做有趣的和有吸引力的工作。

这些情欲的自由活动导致“小组”和“谢利叶”的成立。

小组是“三个、七个、十二个或更多的人汇集的一群人，为了任何目的，事业目的或者娱乐目的，自由地和自发地联合起来的。但是按照严格的看法，我们理解到，小组乃是志趣相同而联合起来从事某门工业、科学或艺术的一群人”^①。

一个完整的小组应至少有七人，因此它可以成立三个分组，中心分组三人，两翼分组各二人。每个小组的两翼分组代表两个志趣和倾向相反的极端，而中心分组则保持平衡，因此人数应该多些。

若干小组——至少五个——联合成一个谢利叶。谢利叶是按照小组由个人组成的同样原则而由小组组成的。

^① 布里斯班的前引书。

例如，一个牧畜谢利叶按照它所饲养的家畜种类分为同样多的小组，每个小组又按照小组饲养的一切家畜品种分为同样多的分组。

必须指出，谢利叶和小组不是由工头或监督人任意组成的，而是由成员自由选择组成的，还必须指出，它们决不是固定不变的组织，而是每个成员可以随意从一个小组转入另一个小组，从一个谢利叶转入另一个谢利叶。

傅立叶从这个工作方式中看到的主要好处是职业的选择和多样性，从事每种职业的时期短；可以选择志同道合的工人；各个小组和谢利叶之间进行分工和竞争。

除了这些自然的好处，傅立叶还补充了一些人为的吸引力，如与工业有关的一切外部事物的高雅和美观；荣誉，如等级、头衔和勋章；以及音乐、制服和徽章的刺激。

为了提供足以让人人通过小组和谢利叶有益地发挥他的各种各样嗜好的广阔领域，若干个人（最好是一千八百至二千人）必须组合起来。

这个组合叫法郎吉，是傅立叶体系的社会单位；它是他的理论的基石，并且他极其详尽地叙述了它的作用。法郎吉的地域约占三平方英里，它的主要建筑物是一座大厦。这座大厦由两排长约二千二百英尺和高三层的一连串建筑物组成；象小组和谢利叶一样，它由一个中心和两翼组成。中心供安静的业务之用；它包括食堂、会议室、图书馆等；两翼之中的一翼供一切熙熙攘攘的工场之用，另一翼则包括供宾客用的设有房间和交谊室的旅馆。仓库、谷仓和马房设在大厦的对面，两者之间的空地是举行检阅和典礼的大广场。环绕整个建筑

物内部的是宽大的走廊，好像是法郎吉的街道。这是一条别致的廊道，从这里阶梯通到建筑物的各部分。傅立叶热情地说，“大厦的居民能在严冬往来于工场、马房、劝业场、舞厅之间而不知道下雨还是刮风、天暖还是天冷。”

大厦后面是法郎吉的花园和田地，计划时当然注意到土壤性质和美感。

法郎吉没有象仆役、军队、金融界掮客、游民之类的寄生者。妇女摆脱了单调的和使人变得愚蠢的家务，在一些特别适合于她们的部门从事有益的劳动。

人人劳动，事事按合作计划去做，因此法郎吉在节约上作出很大成绩并拥有巨大的财富。我们假设一个法郎吉有四百家，如果各户单独生活，就得都有一个单独的厨房。这就要占去四百个主妇几乎全部的时间，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烹调将会是很糟糕的；在法郎吉中，全部烹调由一个大厨房承担，用三四个炉灶准备各种价钱的各种伙食；十个熟练的厨师做全部工作，而伙食则比原来的要好得无法比拟。同样的方法不但应用于农业和工业，而且应用于其他一切家务。不是让一百个送牛奶的人把一百天的时间浪费在城里，而是由一两个人用造得很好的马车去做他们的工作；不是必须经营一百个小农场，而是以熟练的和科学的方法耕作一大片田地；设立一个具有干燥、通风和地点适中等一切便利条件的大谷仓，来代替数百个不便的小谷仓，等等。

儿童教育是法郎吉极其关心的问题。所有儿童都在公共托儿所和学校受同等的教育。法郎吉遵照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有用的这一理论，认为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发觉儿童的一切喜

爱和性格、发展它们和利用它们。

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按性格和爱好把他们分类。乳儿分为三类：安静的或脾气好的乳儿；不安静的或吵闹的乳儿；扰嚷的或不听话的乳儿；各类乳儿有单独的房间。托儿所很大，房间美观，看护工作由热爱这个工作的妇女担任。如果愿意，母亲也可以亲自看护她们自己的孩子。

儿童按年龄分为七类，每类儿童的教育和学习的项目根据在特定年龄表现的爱好来决定。

孩子三岁时开始教给容易的和有吸引力的劳动项目，象厨房的辅助工作，这样法郎吉就可以利用儿童通常浪费在游玩和顽皮上的精力，同时孩子也可以在幼年时就养成爱好勤劳的习惯。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以及体育和智育发展到较高程度时，就扩大他们的有益活动的范围。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少年团”组织。

少年团由十至十二岁的儿童组成，他们担任一切不清洁的和讨厌的工作，诸如打扫污水槽和阴沟、管理粪肥等等。

如傅立叶所说的，他指定这样年龄的儿童做这种工作的理由是，他们非常喜欢污秽和泥垢；象别的情欲一样，赋予他们这种情欲是为了发挥它的有益的作用，而少年团组织能最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少年团在“工业整体”事业中居于“上帝的民兵队”地位；他们在检阅中领先，接受最高的敬礼。

可是，尽管这样，法郎吉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一个法郎吉的八分之七的社员是农民和工匠，其余的社员则为资本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法郎吉的财产用股份来代表，但没有

必要让每一个社员都有股票，也不必要求做了股东才能当社员。法郎吉和所有社员都有账目来往，它按理事会确定的等级，但也适当注意其效力和服务性质，把他们的劳务记在他们的名下。年终结账，利润分配如下：

十二分之五归劳动。

十二分之四归资本。

十二分之三归技能或才能。

因为法郎吉没有固定阶级，这种利润分配不会造成妒忌或敌对。同一个社员可以在法郎吉持有一股或几股，在一个或几个小组工作，在一个或几个工业部门发挥专门技能，从而分享所有这三类的利润。另一方面，资本家或者从他的投资的纯红利方面得到满足，或者除此之外还获得他把劳动或才能用于任何有益工作而可能赚得的收入，同时穷人也从事劳动，收入多寡则按照他对闲逸或享乐的爱好的程度而定。

法郎吉既有朴实的居室，又有豪华的公寓；它既供给便餐，又供给精美的食物；它对衣着或娱乐不加限制，所有社员都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和爱好过某种方式的生活。

大体来说，这就是傅立叶体系积极的方面。它的创造者期望他的体系逐渐代替当前的制度。第一个法郎吉建立起来，其他的就会迅速地相继建立，直到整个地球为它们布满为止，并且傅立叶以他平日数学的准确性算出全地球将恰恰有二百万个法郎吉。

在这里，傅立叶象他以前和以后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完全着迷于他自己的社会理论的美妙和希望，并且用一种富于想象力的上层建筑来表彰他的体系。他断言，法郎吉

体系将最终把全体人类联合成为一个有同一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一种世界语的团体。君士坦丁堡将是全球的首都、最高元首——全世界的首长——的驻扎地。最高元首将靠三个奥古斯特、十二个凯撒里纳、四十八个女皇、一百四十四四个哈里发、五百七十六个苏丹等协助管理全球，虽然什么地方都看不到这一大群帝王起任何有益的作用。

但是，傅立叶体系最异想天开的部分是他的宇宙进化论。他宣称，各行星如同人一样有它的青年、发展、衰退和死亡时期。行星的平均寿命为八万年，它的幼年时期为五千年，向上发展时期和衰退时期各为三万五千年，老迈时期为五千年。在这个时期内，人类经历三十二个时期。我们现在处于第五个时期即文明时期。第八个时期即和谐时期将产生普遍幸福。北极光轮那时将创造并将革新地球的自然面貌；全世界的气候将是一样的，野兽将告绝迹，新的有益于人的生物将代替它们；海洋的水将带有柠檬水味，世界将成为一个大乐园。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傅立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明白地宣布，“法郎吉里根本不能存在财产的共有”，他屡次重申多种多样的财产和享乐是普遍和谐不可缺少的东西。傅立叶常常轻蔑地谈到他同时代的欧文，说他不了解协作的原则。他的体系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折衷方案，一种调和计划。

傅立叶自认为他的体系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并且把他的“社会引力的发现”比作牛顿的自然引力的发现。用倍倍尔在其关于傅立叶的生平和学说的光辉著作中的恰如其分的比譬说，他以先知者的固执、信心和热情坚持他的体系的一切细

节①。

这个发现之所以没有较早地问世，仅仅是由于，不但以前的一切文明，而且以前的一切科学，都是沿着虚假的方向前进的。

傅立叶对他的计划终于要实现的信心从未动摇；他把他的模范法郎吉计划递给许多帝王和银行家，并且从来没有因他们的怀疑和嘲笑而垂头丧气。在他最晚的一部著作中，他为成立一个试验性的法郎吉所需要的资金而发出呼吁。在他逝世前的十年中，他始终不渝地按时于正午回家，指望慈善的百万富翁慨然莅临来响应他的呼吁。

傅立叶并没有活着看见他的学说盛行的那个短暂时期。他于1837年10月10日在巴黎逝世，当时他的周围还有很少一批的热心门徒。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墓志铭：

“沙利·傅立叶之墓。谢利叶分配和谐。引力与天命有关。”

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

傅立叶主义是艾伯特·布里斯班介绍到美国的。

布里斯班生于1809年，是纽约州巴达维亚一个富裕地主的独生子。他受过充分的和多方面的教育，刚达成年就游历过欧洲和亚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他在巴黎跟从库散、在柏林跟从黑格尔攻读哲学，并在这两个首都结识了政界和文学界的许多著名人士。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沙利·傅立叶，他的生平和他的学说》，斯图加特1890年出版。

柏林贵族知识界的上层对于形成他的性格和见解方面似乎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个上层社会聚首的地方是大名鼎鼎的法恩哈根·冯·恩斯夫人的客厅。

布里斯班有着锐利的分析能力和宽厚的同情心，早年就被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学说所吸引。

他最初支持圣西门派，把他许多的时间和资产用于宣传它的主义。但是这位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着边际的，因而不久就使他感到不能满足，当运动在昂芳坦和巴扎尔的互相敌对的领导下而陷于分裂时，布里斯班断绝了和它的关系。

在此不久之后，他得到了傅立叶新出版的一册《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

该书对这位青年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他读了又读，而且愈读愈增加他对这本著作的赞赏。

布里斯班在自传^①中说：“现在，我第一次碰到了我以前没有遇见的思想——使人类的体力劳动高贵和变得有吸引力的思想；在这以前，劳动被看做是神对人的惩罚。平凡的、卑下的苦役——人民大众可悲的命运——似乎要以它的枯燥无味、使人麻痹和令人迟钝的影响把人压服；把吸引力带进这种苦役，使劳动变得高尚并赋予尊贵，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

1832年，布里斯班前往巴黎，在那里呆了两年，一部分时间在傅立叶的亲自指导下，研究那位大师的体系中的比较错

^① 其妻雷德利亚·布里斯班编：《艾伯特·布里斯班——精神传》，波士顿1893年出版。

综复杂的部分，并积极参加当时刚开始发展的傅立叶主义运动。布里斯班一回到美国就秘密地宣传他的社会主张，直到1840年为止，那年他出版了他的《人的社会命运》。这部著作是对傅立叶的体系的简要解释。它约有一半篇幅摘录傅立叶的著作，而另外一半篇幅则是著者为适合美国情况而专作的注释和解说。该书体裁通俗，解释透彻，获得了巨大的自然的成功。对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切阶级的人都阅读它，可以说它为傅立叶主义运动在我国奠定了基础。

它对后来成为傅立叶主义最雄辩的和最有影响的宣传家的霍勒斯·格里利改信傅立叶主义事业，也起了推动作用。关于这个有趣的插话，布里斯班作了如下生动的叙述：

“我约请帕克·本杰明浏览一下《人的社会命运》的校样，他是一位有广博经验的老练的新闻记者。

“有一天在共同商量这个问题并谈到该书可能对公众发生影响的时候，他突然大声说：‘有那么个霍勒斯·格里利，他信仰这种无稽之谈，真是够傻的。’我问，‘谁是格里利？’‘哦，他是二楼上编辑《纽约人报》的那个青年。’

“我夹着我的书往格里利那里去。

“当我走进他的房间时，我问，‘你是格里利先生吗？’‘是的。’‘我这里有本书，希望你读一读。’‘我想我现在不可能，’他回答说，‘我忙得很。’我劝告说，‘我希望你读一读，要是你想读，我把它留下。’‘好吧，’他说，‘我今天夜里要到波士顿去，我将带着它；也许我会挤出时间。’

“格里利带了这本书并且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已是工业协作社的热情信仰者。”

傅立叶主义事业在我国的这个新收获的重要性很快表现了出来；在上述的这个插曲两年之后，当格里利在同一时期创办的《论坛报》成为有名气的和有影响的首都报纸时，它的编辑为布里斯班的学说开辟了专栏。该报每天销售二万多份，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大的数量。

这个安排是相当别出心裁的。

1842年一个春天的早晨，《论坛报》在第一版的一栏上面刊载着引人注目的标题：

“协作社；即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的原则。

“本栏已被协作社的提倡者购买，他们的目的是把他们的原则公诸于世。它的编辑工作与《论坛报》完全不同。”

这个安排使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因为一方面布里斯班为宣传他的学说每天都获得许多听众，一方面《论坛报》扩大了对社会问题有兴趣的读者的圈子。布里斯班编辑该栏直到1844年夏季他再次赴欧洲时为止，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阐释傅立叶主义的理论文章、关于组织协作社最好方法的实际心得、向读者的热诚呼吁、论证和会议记事等，每天都充满了划给布里斯班的专栏。

帕顿^①叙述说：“最初，它们似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反对的更少。它们被当作（就我青年时代能想起的来说）可以忽略过去的文章，并且我认为，《论坛报》的大多数城市读者照例是一瞥而过，并且把这看作理所当然的。可是，社论偶尔也提一提这个问题，而凡属这种提示都是带有必读的性质的。傅立叶主义渐渐成了当时的论题之一。某些编辑渐渐发现傅立

^① 帕顿：《霍勒斯·格里利传》，波士顿 1869 年出版。

叶主义是非基督教的。疯狗的狂吠渐渐飞扬起来。在这同时，布里斯班先生的文章正在对人们产生影响。”

霍勒斯·格里利对傅立叶主义事业的贡献不限于提供他的报纸的一角之地这种消极举动。他随时随地遇有机会便就协作社问题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他积极地率先参加傅立叶主义者的理事会和代表大会，并试图通过创办法郎吉来实现他们的理论。

霍勒斯·格里利和亨利·雷蒙德在《论坛报》和《纽约信使与问询报》专栏就傅立叶主义进行的著名讨论是永久耐人寻味的。辩论是在双方意气风发和竭尽所能的情况下进行的，后来单独出版了小册子。

在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布里斯班和格里利的是《晚邮报》的副主笔帕克·戈德温 and 该报总编辑的女婿诗人威廉·卡伦·布赖恩特。他 1843 年出版的小册子《建设的与和平的民主主义》成为傅立叶主义著作武库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这本小册子不过五十多页，但是文彩奕奕、论证有力和见解正确，它超过我国任何为傅立叶主义辩护的著作。帕克·戈德温是美国最早识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势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并且他非常接近现代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他主要向工人发出呼吁。戈德温还出版了题为《沙利·傅立叶学说浅释》的小册子和《沙利·傅立叶传》。

和这些关于傅立叶主义的模范著作同样重要的是致力于这个事业的期刊。1843 年 10 月，布里斯班创办了他自己编辑并得到奥斯本·麦克丹尼尔有力合作的月刊《法郎吉》。它一直出版到 1845 年年中。当布鲁克农庄改信傅立叶主义时，

《法郎吉》才告停刊，而由《先驱》取而代之。

《先驱》为周刊。它在布鲁克农庄出版，这个公社解散后改在纽约出版。

布鲁克农庄的改变信仰，为傅立叶主义事业增加了一批新的才气横溢的作家。

其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便是布鲁克农庄的创始人乔治·里普利，一位学识渊博和思想特别优秀的人物。他是一位唯一神教的牧师，然而在任圣职工作十四年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职业是同他的社会和伦理见解不相容的，因而辞去牧师职位。他改信傅立叶主义，完全献身于这个事业。《先驱》周报在存在的四年中刊载了他写的不下三百一十五篇投稿。查尔斯·达纳是傅立叶主义运动另一个著名的新参加者。当时他很年青，然而对自己从事的一切事业却很稳重严肃。他所受的严格训练和有条不紊的方法使他在同事中间获得了“教授”绰号。达纳为《先驱》周报写了二百四十八篇文章。

但是《先驱》周报编辑部最多产的作家要算约翰·德怀特，他投的文章最多，有三百二十四篇。德怀特同里普利一样曾努力学习当牧师，又同后者一样自动放弃了圣职，他是诗人、文学和音乐的爱者和内行，同时又是对人类痛苦和穷困的一切呼声很敏感的人。

当时傅立叶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威廉·亨利·钱宁，一位唯一神教的牧师，因有辩才而出名。

在参加我国傅立叶主义运动的全国闻名的其他人士中，我们不妨提一提纳撒尼尔·霍桑、拉尔夫·沃尔多·埃默

森、西奥多·帕克、托马斯·希金森、亨利·詹姆斯、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弗朗西斯·肖和玛格丽特·富勒，除了上述的头三人，其余的都是《先驱》周报的投稿者。

《法郎吉》和《先驱》是傅立叶主义的正统机关刊物，但它们并不是它在期刊文献方面的唯一代表。布里斯班在我们上面提起的他的自传中，说到在创办《论坛报》前曾由他和格里利合办过一个周刊。这个周刊只存在两个月。布里斯班有一个时期还能取得约翰·穆尔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小日报《纪事报》和约翰·奥沙利文出版的月刊《民主主义者》的编辑部的管理权。他把这两个报刊转变成傅立叶主义的热烈拥护者。

除此之外，威斯康星州的傅立叶主义者创办了《搜集者》，密执安州的傅立叶主义者创办了一种叫做《未来》的报纸，威廉·亨利·钱宁创办了《现今》。

在我国传播傅立叶主义的另一个有力因素是运动的先驱者非常频繁地举行的公开演讲。布里斯班、格里利、钱宁、戈德温、达纳以及许多名气不大的演说者，向不论多寡的听众和在可能的任何地方，总是歌颂协作社的优点。这里是萨瑟伦^①援引《论坛报》刊载的这种会议之一的典型通告：

“托马斯·惠特利和霍勒斯·格里利于今晚七时半在昆比博物馆后面的救济厅向纽瓦克愿听讲的市民讲‘协作社’问题。”

重要的傅立叶主义者特别是约翰·艾伦、约翰·奥维斯和查尔斯·达纳还在各个时期作了广泛的演说旅行，在多数

^① 查尔斯·萨瑟伦：《霍勒斯·格里利和其他美国社会主义先驱》，纽约1892年出版。

的情况下这些讲演和讲话吸引了许多的热心听众。

这个时期特别使人易于接受他们的学说。这个国家正经历着一场周期性危机，而这类危机一经发生，似乎就要威胁我们经济和工业体系的基础。生产差不多陷于停顿，大批工人失业，特别是在东北部的工业城市，居民的贫穷是骇人听闻的，并且流离失所的现象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若干市、州为了救济而设立的慈善组织和官方委员会力图对付这个局势，但是失败了：它已经弄得不可收拾。国家在这个盲目的经济力量破坏作用面前陷于手足无措和毫无办法的境地。成千个思想家的得意的社会哲学突然被危机的出现所震撼，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迫使他们注意。

与此同时，废除奴隶运动正开始呈现严重的局面，同几乎一切解放运动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它很快超越了它原来的目的和范围。对蓄奴制的责难必然引向对一切其他形式的人的社会从属状态的批评。“废除蓄奴制和工资奴隶制”是废除奴隶运动的比较激进部分的标语之一，是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当时其他许多著名宣传家的感动人心的呼吁的主要方针。

正是在这个时候，傅立叶主义在美国出现了。它有可能给工业带来永久的秩序与和谐，把自食其力带进人的社会关系。这些希望是光明的和诱人的，并且大多数有口才的人都加以宣传。因此，运动在我国迅速扩展起来是不足为奇的。

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和密执安等州成立了许多傅立叶主义团体。时常在所有这些州里举行地方代表大会，1844年4月4日举行了协作社会主义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纽约克

林顿大厅举行，那是一个非常出色和热烈的会议。乔治·里普利当选主席，副主席中有霍勒斯·格里利、艾伯特·布里斯班、帕克·戈德温 and 查尔斯·达纳。

从全国各地收到了表示同情和鼓励的来信。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大多数是关于组织合作社问题的。按照傅立叶的法郎吉计划组成的合作社被宣称是根治一切社会罪恶现象的普遍有效的补救办法，但同时他们警告信徒，不要进行规模太小的或准备不充分的实验。

代表大会还决定成立一个常设的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以《法郎吉》作为它的正式机关报，并成立一个常设的十八人执行委员会。它还宣布赞成合作社主义者实行国际合作，任命艾伯特·布里斯班领导一个委员会和欧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就相互合作的最好方式问题交换意见。

可以把紧接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时期看作是我国傅立叶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它的衰落。

三、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

傅立叶早就预见到为发展他的运动而进行轻率实验的危险。他宣布法郎吉不可能显示它的好处和优点，并且不可能获得成功，除非它有一千五百至二千个社员、资金约一百万法郎，并且他在晚年竭力反对一切小规模试验。

布里斯班修改这位大师的高标准，把成立一个法郎吉所需要的人数减少到四百人。

他论证说：“开创一个合作社的最简易的计划将是劝导四百个人联合起来，每人收股金一千美元，总资金就共有四十万

美元。股东将领取合作社的总生产品或总利润的四分之一；如果他们情愿，他们也可以领取百分之八的定息。一千美元投资每年将有八十美元的利息。有了这笔钱，合作社就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居住和生活；这一点是办得到的。建造大厦用十五万美元，其利息以百分之十计算将有一万五千美元。这笔钱由四百个人摊派，每人每年房租为三十七点五美元。有些公寓有几个房间，房租为一百美元左右，这样就约有一半房间的租金每年为二十美元。一个愿住租金最少的房间的人在付了房租后还剩余六十美元。由于合作社种植一切水果、谷物、蔬菜和饲养牲畜等，由于它大量节省燃料、厨师人数和其他一切，它可以供给每年六十美元的最便宜的膳食。因此，投资一千美元的人如果生活节省一点，肯定可以用他的利息得到舒适的房间和膳食，并且还会另外获得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不管什么东西。此外，他还会住在一幢周围有美丽田野和花园的雅致的大厦里面。”

布里斯班自己和其他重要的傅立叶主义者始终坚持这种要举办一个巨大的和富有的合作社的理想，并且经常公开告诫运动的急性者不要做资金不足和人数不足的草率实验。

然而，这个告诫简直没有被注意。有力的和坚持不懈的合作社主义宣传造成了普遍的热潮，很快就弄得领导者们无法控制。傅立叶主义在广大居民群众中扎下了根，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实现这个新社会福音的光明希望。

法郎吉可以说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它们开创时人数不定，有多有少，有些拥有一点资金，但有时连一点资金都没有，并且很快就遍布傅立叶主义已经立脚的所有各州，构成名

副其实的网状组织。

这些实验的历史无一不是失败的纪录。傅立叶的社会组织计划一付诸实际试验，它固有的缺点就表现出来了。计划中的出于想象的实力，劳资之间利益的妥协，合作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调和，这些实际上就是重大弱点的根源。它使法郎吉或者至少使其中试图按照真正的傅立叶主义计划创办的那些法郎吉，丧失了团结一致的和努力，而这种团结一致是那种性质的社会实验绝对不可缺少的，并且唯有这种精神才能使所有成功的公社在它们早期试验和斗争时期生存下去。

但是在对傅立叶主义作公平评判时，也必须承认，按照傅立叶或布里斯班制定的方针而着手的实验的例子是极少极少的，失败的原因来自外在的因素多，来自傅立叶主义固有的缺点少。进行实验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象格里利所证明的那样“普遍缺乏能力、公众信任、干劲和资产”，特别是资产。

一个协作社开创时设法筹措的资金不是四十万美元，而往往是这个数目的百分之四。靠这笔钱来购置象“法郎吉”发起人所建议的、位于人口众多的城市郊区的肥沃美丽的“领地”，那显然是难以办到的。

实验者们通常不得不满足于旷野里的抵押金沉重的小片荒地。离城市遥远和资金不足，迫使移民专门从事农业，虽然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受过锻炼的农民。一座或几座简陋的木棚代替了供社交活动的华丽的“大厦”，“吸引人的工业”变成了笨拙的生手对十分可恶的瘦瘠土地进行的令人生厌的悲惨斗争。这个斗争通常持续到田地抵押的第一期付款到期为止，那时，由于受抵人不满足于傅立叶所规定的资本从利润中提

取十二分之三的办法，“领地”几乎毫不例外地被取消了赎回的权利。达到某种重要地位并在一个时期似乎有理由希望能永久成功的仅有的一些法郎吉，是新泽西州的“北美法郎吉”、威斯康星州的“布鲁克农庄法郎吉”和“塞雷斯科法郎吉”或“威斯康星法郎吉”。上述第一个法郎吉存在了整整十二年，其他两个的寿命分别为五年和六年。所有其他著名法郎吉的平均寿命约十五个月。以下几节将简述它们的历史。

对于傅立叶主义来说，其法郎吉比起其他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的实验对它们的学说而言，更胜一筹。其他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派都企图建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社会组织，并认为他们的公社不过是未来国家的实例和雏型，而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则是最后的国家；它们的创始人不但认为那是宣传的工具，而且是他们学说的具体实现。傅立叶主义计划的特色是它介绍了那种通过摊付的办法以达到社会幸福和均衡的国家。每个法郎吉都是那种社会国家的一部分，在其自己的范围内实现了它的目标，达到完善的地步，完全不依赖周围的世界。这样，法郎吉就自然成为傅立叶主义的试验，在它们失败之前运动早就消声匿迹了。

美国傅立叶主义宣传家徒劳地声明，他们领袖的学说没有得到充分的试验，对于违背傅立叶主义学说而仓促从事的许多社会实验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他们的声明没有为人注意。普遍的看法是，“傅立叶主义”和“法郎吉”是同义的，后者的失败就是前者不能实行的证明。除此之外，在运动形成时期大大有助于运动的工业萧条已经过去，希望实行彻底社会改革的热切心情也随之消失了。

作为一种学说，傅立叶主义有一个时期继续吸引了一些优秀的明达人士，但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它就在其初创和惊人发展的同一个十年——1840至1850年——中消亡了。

这个引人注目的运动的发起者和拥护者的以后经历，有着各种各样的性质。霍勒斯·格里利继续积极地关心公众生活。他的《论坛报》从废除奴隶制运动开始直到它最后胜利一直是该运动有力的和不倦的拥护者。他在1848年当选国会议员，1872年被自由共和党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并得到民主党的支持。竞选失败后不久，他于1872年11月29日逝世，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民都为损失一位诚挚的忠实的朋友而表示哀悼，在纽约市参加他的葬礼的群众队伍是相当浩荡的。格里利忠于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直到最后一息。

艾伯特·布里斯班活到1890年。他在欧洲度过很长时期，以其余年专心从事于学术和艺术研究。他的整个一生全神专注于傅立叶主义，以至当运动衰落时，它似乎已经夺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热情。他从事社会活动的生活告一段落，虽然他看到国内外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他却一直消极地（尽管有点同情地）观察它的发展。

乔治·里普利晚年献身文学事业。他是《论坛报》编辑部的定期撰稿者，并和查尔斯·达纳共同编纂了《美国百科全书》。他于1880年7月4日去世。

达纳也在1847年参加了《论坛报》编辑部。他在南北战争期间斯坦顿^①任陆军部长时担任副部长，1868年创办了

^① 埃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1814—1869)，在1862至1868年任美国陆军部长。——译者

《纽约太阳报》。他的急进的社会见解在傅立叶主义运动消失以后并没有存在多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和他的报纸成了政界一切保守和反动的东西的一贯得力的保卫者。他在1898年去世。

约翰·德怀特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音乐批评家，在1852到1881年主办了《德怀特音乐报》。他是一个仁慈、高尚和热情的老人，周围有许多好友。他于1893年逝世，享年八十岁。

四、北美法郎吉

在我国进行的所有傅立叶主义实验中，大概要算北美法郎吉最接近一个“法郎吉”那样的理想了。它由纽约和奥尔巴尼若干热心的和有文化的居民所建立，其目的在于“研究象艾伯特·布里斯班解释的”、象傅立叶社会改革学说的创始人在其关于宗旨的宣言中叙述的“傅立叶社会改革学说”。

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他们征求了格里利、布里斯班、戈德温、钱宁和里普利的意见，布里斯班是选择建议中的协作社地址的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最后选定的地址靠近新泽西州蒙默思县的红岸，1843年9月有几个人家占有了田地，立刻开始建造一座临时住宅的工作。次年实际的移民数目增加到九十人左右。

短时期内，一座正面一百五十英尺和侧翼一百五十英尺的三层大楼代替了临时住宅。在穿过田地的河畔建造了一个碾粉厂，并小规模地经营其他工业。然而，协作社的主要工作是农业。他们开辟了两个大果园，占地约七十英亩，种有各种各样的优良果树，他们的牧场和农田井井有条，收获比他们邻

居的好。协作社的原始投资为八千美元；在 1844 年第一年度结帐时，它的财产盘存二万八千美元，1852 年大概增加到八万美元。

协作社的工农业刚充分发展起来，就分小组和谢利叶进行生产，在分配利润时采取了傅立叶的“公平比例”法则。

付给必要的然而令人生厌的或很累的劳动以最高的工资；付给有用的然而不怎样令人生厌的劳动以较少的工资；选择愉快工作的人领取最少的报酬。

例如，从事制砖的人的工资每小时一角，从事农业的人约八分，而服务员和法郎吉医生则为每小时六点二五分。可是，除去这些工资之外，还对任何工业部门或协作社事务管理方面所表现的技能和才能给以特别报酬。例如，必须天天安排一切工作计划和监督工作的建筑小组组长，除去正规工资外，还领到每天五分的额外薪金。根据这个复杂制度计算的社员工资每小时从六分到十分，而十分则被认为是最高的报酬。

社员们有选择他们喜欢的职业和他们想多劳动或少劳动的完全自由。他们每天所做的劳动量和种类记在账上，每月领取全部工资，年终分配利润。按照这种利润分配办法给予劳动的报酬平均每年约为十三美元，而资本则从投资上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息。可以想见，社员的收入是不多的，然而法郎吉的生活费用按比例来说则是低的。主体大厦的一间相当大的、舒适的房间的一年租金为十二美元。

后来几年，可以照菜单点菜供应膳食，牛奶咖啡一杯半分；奶油半分；肉两分；馅饼两分；其他东西按比例计算。除此之外，每个社员每周付给餐厅使用费三角六分半，并按比例摊

付侍应费和房间灯费。侍者把每餐的费用记在由每个社员保存的专用登记簿上,每月月底结账。

根据一些屡次访问过他们的著名傅立叶主义者的热情叙述来判断,协作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是有文化有修养的,法郎吉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他们有一个小阅览室和图书馆,他们有一些乐器,每当他们从田间或工场收工回来时,他们就载歌载舞,寻欢作乐。

里普利写道:“我常常听到外客谈起在访问参观布鲁克农庄时为之感动的那种愉快和自在的精神,我也看到了北美协作社强烈地显示出来的同样东西。”奈德哈特评论社员的仪容说:“在他们大家身上有一种宁静的、真挚的爱,表示他们决心要等待他们正在从事的伟大实验的结果。妇女们看来是一群和蔼可亲、状至愉快、面带笑容、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的人。我想,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感情深厚的和真挚的眼睛。”

儿童教育是协作社一件最关心的事,对于他们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予以同样的注意。

北美法郎吉存在了十二年多。它是在傅立叶主义刚开始为人认识清楚的时候创立的,它经历了运动的鼎盛和衰落时期。它看到了四周所有其他法郎吉的死亡,它单独地遗存下来成为曾经显出很大希望但很快就衰落的运动的唯一纪念物。这个孤立的阵地不可能维持很久。公社的物质利益微不足道,它在生存的头几年,其所以能团结一致,基本上是靠广泛的和朝气蓬勃的运动(它也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所产生的热情的持久影响,当这种热情消失时,运动也就带走了协作社的灵魂本身。从表面上看,北美法郎吉在各方面照常不变地

继续存在,但是从内里看,瓦解的力量却已经在起作用。在管理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对收入微薄和协作社的暗淡前途偶尔表示不满,解散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一桩偶然事件加速了协作社的瓦解。1854年9月,协作社花了约一万二千美元建造的碾粉厂被烧掉。格里利自动提出要借给他们一笔足够重建的钱,协作社举行大会讨论这个建议和决定新碾粉厂的地址。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提议,他们最好根本建厂子而实行解散。这个提议完全出于意外,同讨论中的问题毫不相干,但是它似乎表达了大多数社员内心的情绪,在付表决时,使人人惊讶的是,协作社决定解散。北美法郎吉的寿命于是突然告终。它的财产拍卖了,按每元折六角六分偿还股东的股本。

五、布鲁克农庄

在换一种情况下颇为单调和平凡的美国傅立叶主义实验史上,布鲁克农庄占有非常出色和令人神往的一页。

这个农庄吸引了傅立叶主义最著名的和最优秀的人物,给整个运动增添了诗意和魔力。但布鲁克农庄仍然没有作为一个傅立叶主义实验而开始它的经历。布鲁克农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在新英格兰创始的以波士顿为其精神中心的一个哲学和人道主义运动。

其名字和这个运动有极其密切联系的人们是乔治·里普利和他的妻子索菲娅·里普利,威廉·埃勒里·钱宁和他的侄子威廉·亨利·钱宁,玛格丽特·富勒、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亨利·托茨、纳撒尼尔·霍桑、约翰·德怀特、伊丽

莎白·皮博迪，以及其名字此后成为我国历史一部分的其他几十个人。

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和热心家，是当时鼓动起来的一切社会、政治和宗教改革的热烈提倡者。

他们不定期地在彼此的住处会面，讨论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哲学、政治和宗教问题，他们虽然彼此之间没有正式组织，但很快就被外界称为“超绝俱乐部”。

最初取这个名字是含有嘲笑的意思的，但是象历史上常有的事一样，它后来被有意嘲笑的对象自豪地采用和保持下来了。

运动的乏味的怀疑派批评家怎样理解超绝论者这个名词，泰勒女士作了也许是最好的简洁巧妙的解释，她谈起他们时说，他们“钻进了广阔无边的空间，高高飞进了漫无边际的天涯，从没花一文钱”。另一方面，里普利利用下面的话说明了超绝论者自己对这个词的解释：“我们所以被称做超绝论者，是因为我们相信超越外部感官领域之外的真理秩序。我们的主导思想是精神驾凌物质。”

超绝俱乐部存在了若干年，它努力的直接结果是创办了一个具有高度文笔水平的一年四期的刊物《日规》。《日规》不定期地出版，登载了和运动有关的著名天才作家的许多有价值的投稿。

1840年，里普利终于决定实际应用超绝论者所提倡的原则和理论。他辞去牧师职位，在俱乐部几个比较热心的人士的鼓励下，开始建立一个公社。1841年春选定了地点。它是西罗克斯伯里的一个农庄，离波士顿约九英里。这个地方原

来是一个牛奶场，属于一个叫埃利斯先生的人。它约有二百英亩的好地，风景非常优美。第一批移民约二十人，包括里普利本人、他的妻子和姊妹、德怀特、霍索恩和威廉·艾伦。但是超绝俱乐部的其余成员中简直没有人跟随里普利到这农庄来。

这个小移民区的正式名称叫“布鲁克农业和教育农庄协会”，它的创始人在他们的“协作社章程”中规定协会的宗旨如下：

“更有效地促进人类文化的伟大目标；建立在智慧和纯洁基础上的外在生活关系；依照上帝的律法把正义和仁爱的原则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组织；以兄弟般合作的制度代替自私自利竞争的制度；保证我们的儿童和可能托付我们照料的人获得最大的体育、智育和德育的利益，在目前人类知识的情况下，我们掌握的财力可以进行上述三项的教育；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有效的和多产的工业系统；充分供应我们的必需品以防止世俗的忧虑；通过使个人取得的财产服从于正当和无私的用途的办法，来消灭过多蓄积财产的欲念；互相保证给以体力援助和精神发展的手段，从而给予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大程度的自由、朴素、诚实、高尚和道德尊严。”

依照协作社章程，他们还一致同意：公社的财产以股份代表；按能力和爱好给全体社员提供职业。他们还规定了一切劳动的统一报酬标准；工作日最多十小时；不仅免费供养未满十岁的儿童和年满七十的老年，也免费供养一切也许因病而不能劳动的人；免费教育、医疗以及免费利用图书馆和浴室。

公社的管理交给四个各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这四个委

员会是：总指导部、农业指导部、教育指导部和财务指导部。

由此可见，布鲁克农庄的社员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显示出对傅立叶主义的坚定倾向，他们以后正式改组成法郎吉是易如反掌的和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不是象人们所说的那种突然的转变。

这个年青公社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它的学校方面。学校分为四部：未满六岁儿童的幼儿园，未满十岁儿童的小学，想从事协会高级研究科目的学生的补习学校，准备进高等学校的青年的六年预科。

在许多有能力的讲师熟练和亲切的指导下，教给各门科学和艺术，同样注意体育和智育的发展。后来在我国文学界和政界起了重大作用的许多人，把大部分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在布鲁克农庄学校所受的教育。这样的学者中最出色的有柯蒂斯兄弟、詹姆斯·伯里尔（他是在英国科学界成名的，并且最后在那里安了家）和乔治·威廉（著名小说家，一度任《哈泼斯周报》编辑）；弗朗西斯·钱宁·巴洛，他在南北战争时任将军，后来任国务卿和纽约州总检察长，乔治·邓肯·威尔斯上校，因在南北战争中表现英勇而著名；约翰·托马斯·科德曼博士，他写了一本令人神往的布鲁克农庄回忆录^①。

在以后三年中，社员增加到约七十人。农庄的财政成绩不过平平，生活非常辛苦并缺乏世俗舒适。但是，布鲁克农庄社员有着以动人的诗情幔幕来遮盖他们的穷困、给他们枯燥无味的日常工作灌输魅力和空想的非凡本领。一天工作完毕

^① 约翰·托马斯·科德曼：《布鲁克农庄，历史的和个人的回忆录》，波士顿 1894 年出版。

之后，青年人照例到厨房和洗衣房去，自告奋勇帮助妇女洗涤碗碟和晾晒衣服。做完这些，便临时发起跳舞或游戏，农庄的青年全都参加，上了年纪的人们则很感兴趣地和表示赞赏地旁观着。

音乐、远足、文学和科学讨论常常填满全部的空闲时间，总的说来，布鲁克农庄社员是一群幸福的愉快的男女和儿童。

外界朋友们频繁地访问参观使农庄的生活更吸引人。最受欢迎的最经常的访客有玛格丽特·富勒、钱宁兄弟、西奥多·帕克、皮博迪女士，后来有霍勒斯·格里利、艾伯特·布里斯班、帕克·戈德温以及傅立叶主义运动的其他领袖。

1844年初，即在协作社全国代表大会不久以后，布鲁克农庄正式宣布为一个傅立叶主义公社，改名为“布鲁克农庄法郎吉”。

这个转变并没有使这个移民区的组织计划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但是这给它增加了一个新的特色。布鲁克农庄成为傅立叶主义宣传的中心和泉源。1844年春，《先驱》移交给农庄出版，这个第一流周刊的到来为布鲁克农庄社员的文学才能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里普利任编辑部领导，达纳任主要评论员，德怀特任艺术评论员，奥维斯主要写一些关于协作社的文章，里克曼是固定的投稿者，农庄其他社员偶尔写一篇文章或一首诗，他们对这个杂志都非常关心，讨论每篇文章的优缺点，每新出一期都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祝贺。除了出版《先驱》之外，布鲁克农庄社员还用种种方法来推进傅立叶主义运动，经常派它的一些最有口才和最有能力的社员对外界宣传协作社的幸福。达纳、艾伦和奥维斯为此而作的讲演

旅行是农庄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事业。

就在这时，这个协作社根据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一项特别条例组成为法人组织，并且也是在这时，决定在农庄修建一座单一的大建筑物。

这时布鲁克农庄处于最繁盛时期。它已名闻全国。访问参观者每年达几千人，要求入社的申请书如雪片飞来，它的财政赢余虽然增加很慢，然而是在逐步上升的。

农庄非常活跃，充满希望，洋溢着生气和情趣。但是社员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单一的法郎吉建筑物亦即“大厦”上面，他们为此已经不倦地劳动了两年多，这时即将完工。

人们期望，这个大建筑物将使协作社能接纳由于农庄缺乏设备所以直到目前还不能收容的许多该被接受的申请者入社，并且新社员的入社将大大加强这个移民区的财力和劳动力。

1846年一个晴朗的春天夜晚，在这些愉快的期望中，布鲁克农庄社员（其中大多数象往常一样正在跳舞和欢乐）被叫喊“法伦斯泰尔着火了！”的呼声吓了一跳。

果然不错。由于正忙着在大厦上最后加工的工人的疏忽，这座巨大的木造建筑着火了，当火焰无情地包围他们全部劳动和希望的对象并且迅速地使之化为灰烬的时候，伤心的布鲁克农庄社员们吓得束手无策地凝视着。如果这次火灾发生在两年前傅立叶主义运动仍然有力量的时候，布鲁克农庄也许能够复元；但是在1846年，运动已经在衰落之中，它的信徒对布鲁克农庄的热情大大减退，法伦斯泰尔的烧毁成了农庄再生存下去的致命伤，就象碾粉厂的毁灭成了北美法郎吉

的致命伤一样。这个合作社努力支持过了次年春夏两季，但是到了秋季它渐渐瓦解了，《先驱》迁到纽约，合作社的财产被卖掉。布鲁克农庄的地址现在由一个路德教堂办的孤儿院所占有。^①

六、威斯康星法郎吉即塞雷斯科法郎吉

在所有傅立叶主义实验中，威斯康星法郎吉是按照最健全的事业原则经营的，它的大部分物质成就应归功于自始至终的领导人沃伦·蔡斯的伟大的管理才能。

这个合作社于 1844 年 5 月在威斯康星州丰杜拉克县创立。该地区周围好几英里荒无人烟，土地非常便宜，每英亩售价一点二五美元。

移民们给买进的土地付了现款，这是合作社从未在自己的财产上负债的一些显著特点之一。

最初的移民约二十人，来的时候带了马车、家畜、帐篷和农具，很快修建了一座大的住宅和锯木厂。在来到后的几个月中，他们的家属也来了，不到一年时间常住社员增加到一百八十人左右。他们制订了宪章和细则，根据宪章和细则他们获得州议会的特许组成法人组织“威斯康星法郎吉”，他们还成立了塞雷斯科区，州议会同样也给予特许。区内除了法郎吉的成员，只有极少数的移民，因此前者当选担任所有区的公职。根据州的法律，需要他们在其余的人中间选举三名治安推事，但是由于他们根本没有罪犯，也没有任何诉讼，这种职

^① 关于布鲁克农庄实验的详尽叙述，参看林赛·斯维夫特：《布鲁克农庄，它的社员、学者和访问者》，纽约 1900 年出版。

位变成了纯礼节性的职位，他们一贯选举他们最年老的三个人来担任。他们还推举他们的一个社员参加在他们存在时期在密执安州举行的两次制宪会议，并且派了三个社员参加州参议院。他们的一个社员甚至作为自由土地党的候选人竞选州长，但是他在区外只获得极少的选票，结果被击败了。他们还要求并获得了他们区里的邮政局职位，一个社员任邮政局局长直到泰勒政府上台为止。

他们开始经营时只有极少的资本，后来渐渐增加到三万三千美元左右。

他们颇为勤奋，耕种七百多英亩土地，一季收获小麦一万多蒲式耳。

他们从没有完全采用小组和谢利叶的劳动制度，而是力求尽可能切实地按照傅立叶主义的方案规定劳动、资本和才能的报酬。工资平均每小时为六至七分；膳费平均每周六角至七点五角。他们选择新社员相当审慎，没有接受一个资产不足或者体质孱弱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能成为他们公社的负担。

他们有一个免费学校，但多少有点忽视了学问研究和社会生活。他们没有图书馆或阅览室，没有联谊会或任何重要的游艺。总的说来，威斯康星法郎吉在物质繁荣这点上胜过其他的傅立叶主义实验，然而在文化和教养方面达不到平均水平。

这个协作社经常的意见分歧是关于统一集中家务还是一家一户的家务的问题。移民区在这个问题上赞成与反对的大概势均力敌，并且他们的区选举主要关键就在这个争执上。

主张统一集中家务的人始终占着微弱多数的优势，因此维持了公共食堂和公共住宅，然而少数派不想服从，继续单门独户地生活，在单独的家庭住宅里处理家务。

这个争执加上一些助长争执的原因(缺乏和谐精神和热情可以被认为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终于诱使协作社会主义者散伙。1850年正式宣告解散并分配利润。出售财产的收入为投资的百分之一百零八，这是一个法郎吉解散而它的创立者和股东没有受到损失的唯一实例。

七、一批宾夕法尼亚的法郎吉

上世纪中期，宾夕法尼亚州的北部是一个极不宜于移民的地方。这个地区是多岩石的荒芜之地，四周好几英里没有工业中心或商业中心，土地贫瘠寒冷，覆盖着深密的漂砾。可是地价便宜成了我们社会实验者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根据了解在1843到1845年在这个地区至少建立了七个傅立叶主义移民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夕法尼亚协作社、和平联合移民区、社会改革社团和勒雷斯维尔法郎吉。

夕法尼亚协作社是美国第一个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它是由纽约和奥尔巴尼的一些居民于1843年5月创立的。托马斯·惠特利任主席，霍勒斯·格里利任会计。田地是由一个风景画家、一个顺势疗法医师和一个桶匠组成的委员会选择的，它有二千三百英亩，坐落在派克县拉卡威克森区。它有一个破烂的碾粉厂(移民很快把它修好)和三座两层的木造住宅，这三座住宅有一个时期不得不容纳全部社员一百三十六人。后来，移民们建筑了一座巨大的公共住所，纵横各四十英

尺，三层高。

他们一致同意以九千美元购买土地，每年摊付一千美元，在取得土地时支付第一期款项，但是当第二期付款到期时，他们发觉自己不能偿付，地主慷慨地同意把土地连同移民所做的一切改善设备收回，并免除他们另外的义务。夕法尼亚协作社只存在了十八个月左右。

和平联合移民区坐落在华伦县，约有土地一万英亩。它是由一位奥地利圣经研究和批评教授安德里亚斯·贝尔纳杜斯·斯莫耳尼卡尔创建的，他认为在地球上建立普遍和平是他的特殊使命。这个移民区差不多全是德国人，移民们在同他们领域内的顽强土地作了短期然而猛烈的斗争后就放弃了试验。

社会改革社团是纽约州布鲁克林的一批傅立叶主义者建立的。产业有二千英亩土地，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州派克县。土地以每英亩一点二五美元卖给移民，但是他们只对全部买进的土 地暂付一百美元，即每英亩五分。

他们草成和印刷了一份很精细的章程，可是他们从没有利用。土地的荒芜、他们耕作经验的缺乏和他们的极端贫穷，使这个协作社在几个月内就瓦解了。

勒雷斯维尔法郎吉是以独特的方式成立的。在靠近布莱德福县勒雷斯维尔村的地方，有七个毗连着的农场。农场的主人全是斯威敦堡教派的信徒，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耶路撒冷教派的牧师累谬埃尔·贝尔丁博士。

当傅立叶主义思潮传到这一小批会众时，贝尔丁博士和他的朋友决定把他们的七个农场联合为一块领地。在令人难

忘的仪式中，他们拆毁了旧的分界篱笆，各把农场以议价移交给法郎吉，换取股份。除了这七个原始创始人以外，不久又来了新的参加者，其中有几个医师、牧师和律师以及一些工匠。这个移民区开始的时候颇有希望，但不久在领地的原有主人和新来者之间出现了敌对，因此这个协作社在存在了短短的八个月之后便宣告解散。

八、一批纽约的法郎吉

有一个时期纽约州西部是傅立叶主义运动的温床。在艾伯特·布里斯班的故乡杰尼西县和邻近的门罗县与安大略县（它们没有一个傅立叶主义者小组）几乎没有一个村落或小村庄。

布里斯班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在这个地区宣传协作社的原理；在巴达维亚和罗彻斯特举行了几次有许多人参加的县会议，并且创立了好几个法郎吉。

诺伊斯叙述了由这个运动产生出来的、其历史几乎是同样的七个实验。它们着手的时候全都是热情洋溢和没有什么准备，寿命短促，给它们的创立者造成巨大的财政损失。

纽约法郎吉中最重要的有：克拉克森法郎吉、索达斯湾法郎吉、布卢姆菲尔德协作社和安大略联合会。

这四个协作社有一个共同的来历，它们的创办是1843年8月在罗彻斯特举行的群众会议上决定的。它们位于安大略湖湖畔，彼此相距很近，总共有一千多社员，投资十万多美元。它们的平均寿命将近一年。

这批法郎吉之所以值得注意，是由于那是唯一组成协作

社联盟的一批法郎吉。

这个联盟叫做“美国工业联合会”。它的管理权操在由它所属各法郎吉的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手里。

理事会在 1844 年 5 月举行过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处理各法郎吉事务，关于在它们之间建立交换产品的制度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从没有执行。

这些纽约实验的失败，使人们对一度是傅立叶主义根据地的这个地区的傅立叶主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偏见。

九、一批俄亥俄的法郎吉

诺伊斯记载了俄亥俄州五个法郎吉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似乎有以下几个：

特朗布耳县的特朗布耳法郎吉。这个法郎吉于 1844 年上半年创立，存在到 1847 年秋季。

这个协作社的领地约有一千五百英亩土地，一部分是法郎吉创立者购置的，一部分是邻近一些农民为交换协作社的股票而提供出来的。

土地有好些沼泽，疟疾盛行，还有其他种种疾病；居住设备只有几座小的住宅，拥挤不堪，社员究竟能够享受怎样的奢侈和舒适生活，从平均生活费估计每人每周四角这一事实推断，不难看出。

在这种逆境下，二百五十个男女和儿童（其中大多数人抛弃了舒适的家庭），用那种使同时代人深感钦佩的精力和克己精神，拚命撑持了三年半多。

但是，斗争的绝望终于使他们当中最有自信的人渐渐明

白过来，他们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们曾经寄予很大希望和曾经为之作了很大牺牲的事业。

俄亥俄法郎吉在锣鼓喧闹声中诞生，有一个时期协作社会主义者对它抱有很大希望。它的创立者有格兰特、范·阿姆林奇和傅立叶主义的其他知名人士，在决定着手创办的热烈的群众代表大会上，人们保证凑出十万美元加以支持。

这个协作社是 1844 年 3 月在靠近俄亥俄州贝耳芒特县惠林地方的约二千英亩土地的领地上建立的。

它似乎苦于过多的理论知识和相对地缺乏实际经验。在很短的存在时期中，它有过许多辩论，几次多少带有严重性质的分裂，一次根本的改组。它最后在 1845 年 6 月解散。

克拉芒特法郎吉和总体法郎吉两者都创办在辛辛那提，位于离该城不远的地方。这两个实验都是用创立者的资金经营的，它们全失败了。总体法郎吉办了一个叫《犁头和剪枝铗》的刊物。这个杂志总的说来是阐释傅立叶的学说的，特别是宣传该法郎吉的好处；它是双周刊，但似乎只出了两期。

哥伦比亚法郎吉是俄亥俄州另一个傅立叶主义实验的名称。但是，除了知道它位于富兰克林县和在 1845 年创办以外，一般都不知道该协作社存在期间的详细情节。

十、其他的傅立叶主义实验

在至今还有记载可考的其他法郎吉中，有四个在密执安州，几个在衣阿华州和伊利诺斯州。在这些法郎吉中，密执安州的阿耳法德尔菲亚法郎吉是最重要的。它存在了一年多，办了一个叫《警钟》的刊物。它的领导人是一个叫谢特利博士

的人——布里斯班的信徒。

诺伊斯总共收集了不下四十一个法郎吉的材料，关于这些法郎吉他在麦克唐纳的集子^①中或在《法郎吉》和《先驱》合订本中找到了说明或记载，并且大概还有许多法郎吉存在过，可是没有留下记载。要了解运动的整个规模，我们必须记住，在全法国——傅立叶主义的故乡——只试办过两个法郎吉，其中只有一个是在傅立叶活着的时候试办的。

^① 麦克唐纳是第一个写美国公社史的历史家。他亲自访问参观过大多数的共产主义公社，写下了他调查和观察的结果。在他逝世之后，诺伊斯收藏了这批手稿。他的《美国社会主义史》基本上是以麦克唐纳的记叙为依据的。

第四章 伊加利亚派公社

一、伊加利亚的由来

在美国共产主义历史上最有趣的章页中应该提到关于伊加利亚派实验的篇页。这些移民区忍受痛苦、英勇献身和剧烈不和的记载差不多包括半个世纪；它们充满哀愁和教训，成为许多专论、小册子和刊物文章的题目。

伊加利亚派公社的创始人和精神上的鼻祖埃田·卡贝于1788年生在法国第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攻读医学和法律，在故乡操律师业时非常成功。他早年旅居巴黎，在那里他加入了当时法国首都比比皆是的神秘的革命团体。

在1830年革命中，他作为“起义委员会”的委员起了重要作用，在路易·腓力普升为法国国王时，他被任命为科西嘉总检察长。这个任命是政府方面假托他在革命中有功予以奖赏而把这位危险的民主主义者赶出巴黎革命环境的狡猾行动。但是这位“平民国王”的顾问们并没有考虑到卡贝的正直本性，他刚在科西嘉就任总检察长新职，我们就发觉他在反政府的激进党的队伍中非常活跃。果然不出所料，他不久便被革职，1834年他的第戎市民选举他任下议院议员。他的坚定不移的反政府立场和在下议院的革命态度，再一次招致了政府对他的愤怒，以“大逆”的罪名受审，在二年徒刑和五年流放两者之间听他选择。

卡贝选择了后者，侨居英国。在那里这位席不暇暖的政治家第一次有了空闲进行研究和深思，结果他制定了一种非常类似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制度。

1839年卡贝返回法国，在题为《伊加利亚游记》一书中发表了他的见解，该书的出版标志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伊加利亚游记》是用小说形式，它的极简单的情节大致可以概括如下：英国贵族青年卡里斯道尔爵士偶然听说有一个叫做伊加利亚的遥远的孤立的国家。伊加利亚人奇怪的生活方式、习惯和政府形式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此他决定去访问他们的国家。《伊加利亚游记》可以称做一本日记，在日记中我们的这位旅游家记载着他在那个奇异国家的惊人经历和发现。

这书的第一部分热烈地赞扬伊加利亚人工业合作制度的幸福、他们各种各样的职业和技能、舒适的生活方式、令人羡慕的教育制度、高度的道德品质、政治自由、男女平等和普遍幸福。第二部分包含伊加利亚的历史。看来这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同1782年以前世界其他国家盛行的秩序相似，但在1782年，伟大的民族英雄伊加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制度。

这个故事使卡贝有机会严厉地批评当时社会结构的弊端，也大致陈述了他的关于从那个制度向新政权过渡的得意方案。

这些方案中突出的是实行累进所得税，废除继承权，由国家规定工资，兴办国有工厂，开辟农业移民区，特别是采用彻底的高等普通教育制度。该书的最后部分专门叙述共产主义

思想发展史，扼要地叙述了从柏拉图起到十九世纪初叶为止著名空想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知名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小说的轮廓同在此之前出版的莫尔的《乌托邦》或摩莱里的《巴齐里阿达》并无显著不同，同以后出版的贝拉米、豪厄尔或赫茨卡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也没有重大差别，但这本书的成功则是异乎寻常的。

在 1830 年革命和 1848 年革命之间，法国群众一直处于笼统的不满状态，探求作一些明确的表示，卡贝的著作由于它那通俗的笔调、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强烈责难和对人类幸福的兄弟般友谊的热情描绘，被他们欢呼为新的福音。这书接连再版，法国工人没有读过的寥寥无几。

卡贝在《伊加利亚游记》受到好评的鼓励下，致其全力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为此在 1840 年和 1847 年之间办了《人民》和《伊加利亚历书》两个刊物。

他靠这些期刊、《伊加利亚游记》和其他著作，在法国工人中间产生了有力的影响，据说 1847 年在他们中间至少有四十万信徒。

当卡贝写《伊加利亚游记》时，他大概只想表示他对社会问题的一般看法，这些看法可以适用于任何文明国家，他没有期望使这些看法成为立刻进行社会实验的课题。但是，由于“伊加利亚主义”的宣传鼓动日益有力，引起同运动的反对者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他的热情的信徒便极力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伊加利亚”移民区，以使用实例来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因此，卡贝于 1847 年 5 月向法国工人发表了《让我们到伊加利亚去！》的号召书。

号召书的语言在笔调上具有卡贝的热情洋溢的特点。

号召书详述了伊加利亚主义者在法国受到的困苦和迫害，宣称他们祖国的革命即使成功，也不会对工人阶级有利。它展示了伊加利亚移民区宏伟的未来远景。卡贝相信，至少会有一万到两万工人立刻响应呼吁，短时期内就会有一百万熟练工人和工匠跟随他们。有了这支大军，他希望按照共产主义计划建立一些拥有大工业、学校、剧院等等的大城市和村落；总之，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幸福的真正人间乐园。这个文件最后引人入胜地描述了“美洲”的美丽气候和肥沃土地。

号召书对伊加利亚主义者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卡贝收到了他的热情门徒几千封信件，其中包括自愿向未来公社贡献礼物的信件。所献的礼物包括家具、工具、衣服、图画、枪支、种籽、藏书、珠宝、钱财以及任何想象得到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一些可以在新移民区试验的各种很有价值的发明。号召书发表几个星期之后，卡贝在《人民》上宣布，他想为他的事业联合一百万以上的合作者。

这时，决定为拟议中的移民区选择一个比很含糊的“美洲”更加明确的地址就成为必要的了，1847年9月卡贝赴伦敦征求罗伯特·欧文关于这一点的意见。欧文建议在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州当时刚被接纳加入北美合众国，极想使人们居住到它那大片空旷的土地上去。这个新州把大量土地赠给私营公司，但以保证迁入移民为条件。有一个这样的公司——彼得斯公司——的代表碰巧于1848年1月在伦敦。卡贝知道了这件事，又立刻赶到伦敦，于1848年1月3日和彼

得斯公司签订了合同，根据合同后者同意立契出让得克萨斯州一百万英亩土地，其条件是移民们应在1848年7月1日以前进驻。

卡贝很高兴，立即在他的《人民》期刊上宣布，“在对所有可供选择的国家进行仔细审查后”，他为拟议中的移民区选择了得克萨斯州的一块美丽肥沃的土地。

由六十九人组成的第一批“先锋队”于1848年2月从阿弗尔启航。在他们动身之前码头上举行了非常感动人的仪式。这些先驱者在“社会契约”上庄严地签了字，发誓忠于共产主义原理；卡贝发表了关于运动的目的和前途的生动演说，回家之后他在《人民》期刊上写道：“从先锋队那样一些人看来，我毫不怀疑人类是可以更生的……1848年2月3日将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壮举之一——先锋队已乘“罗马号”轮船前往伊加利亚……祝你们，人类的勇士，一路平安！我们，还没有启程的伊加利亚主义者，让我们抓紧时间作好准备，去同我们的朋友们和兄弟们会师吧！”

二、得克萨斯公社

伊加利亚主义者的“先锋队”于1848年3月27日抵达新奥尔良，他们立刻开始感到失望。事情似乎是，卡贝不知道我们美国的土地经理人狡猾的生意手段，他把彼得斯公司代表的话理解得太死板了。伊加利亚主义者一直以为彼得斯公司的土地受雷德河的冲刷，可乘小船直达，但是一查地图，才明白这个“伊加利亚”和雷德河之间隔着二百五十多英里无路可

通的荒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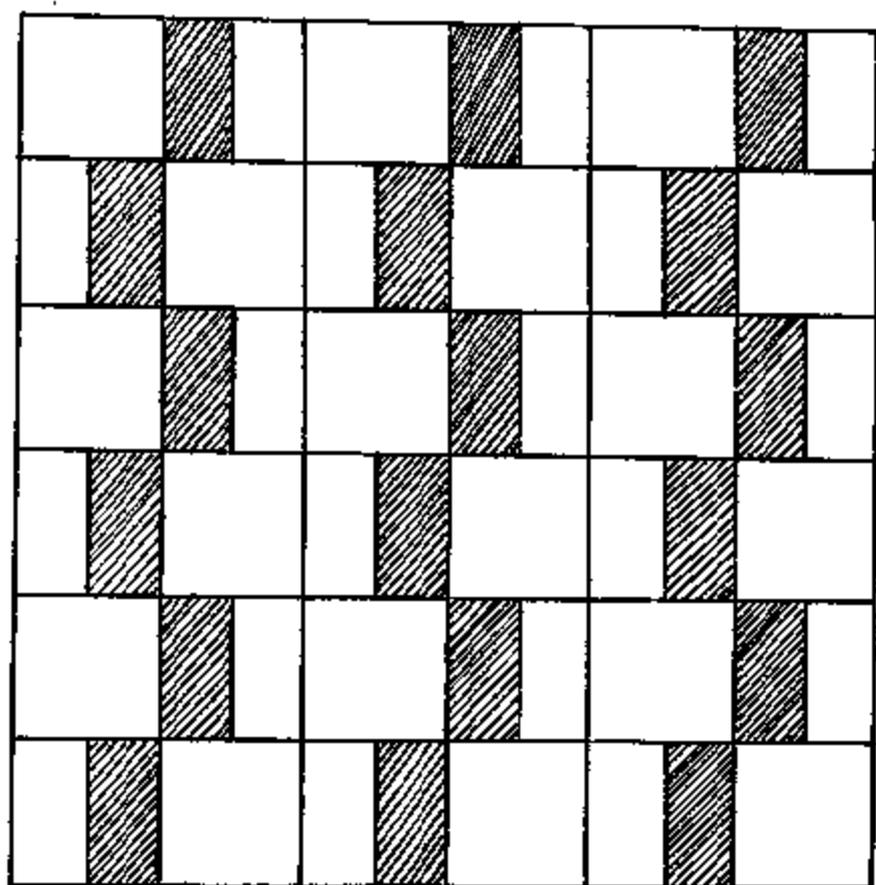
这些先驱者对土地的特殊分配也同样感到十分失望。得克萨斯州已经把无人居住的土地分成许多方块，每块六百四十英亩（一平方英里），并且把一些地区的交错部分赠给彼得斯公司。彼得斯公司然后又把它的方块土地分成三百二十英亩的半块，并把交错的半块让与伊加利亚主义者。为了使读者对我们伊加利亚移民的土地位置获得清楚的概念，我们在下页转载了艾伯特·肖博士在其《伊加利亚》一书中刊载的图解。

在这个图解中，空白方块代表得克萨斯州保留的土地，空白半块代表彼得斯公司保留的土地，画黑线的半块代表卡贝所获得的土地。

试图在这样分散和互不相连的许多片断土地上建立一个有中央管理和工农业合作体系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其荒谬十分明显，毋需加以评论。

问题还不仅这些。《人民》期刊曾经向伊加利亚主义者保证说，卡贝已获得一百万英亩土地，但是经过更仔细的检查，似乎彼得斯公司的合同明白规定，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或家庭各领三百二十英亩土地，条件是他们在1848年7月1日以前要实际占有，即在他们各自的一块土地上至少建造一座圆木小屋。由于这大批先锋队不可能在1848年7月1日以前顺利地建造约三十多座圆木小屋，他们只能取得约一万英亩土地，即已允诺的一百万英亩的百分之一。

下面是得克萨斯州伊加利亚土地分配图：



然而，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并没有能够阻挡这一群不屈不挠的人的进程。他们抵达什里夫波特，弄到一些公牛队和一辆运货马车，开始向伊加利亚进发。这种望而生厌的跋涉的艰苦简直难以形容。他们唯一的运货马车损坏了，给养消耗尽了，疾病袭来了。他们终于到达所想望的地方——令人悲观生厌的地区。

但是，由于有着开拓者的干劲和快活性格，他们便立刻开始工作。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和几所木棚，他们开始开垦草原。7月来临了，同时疟疾也流行起来。体质变得衰弱的和过劳的伊加利亚主义者很容易地受到疾病的侵袭，他们有四人死亡，仅有的一位医师也成了医治罔效的疯子，移民区人人为疾

病所折磨。

9月的事态就是这样，当时伊加利亚主义者第二批先锋队的一部分约十人（第二批先锋队共十九人而不是约定的一千五百人，其中一部分因在途中生病没有抵达伊加利亚）前来和他们会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开拓者决定放弃得克萨斯州。为了便于撤退，他们分成二至四人的小组，给每人约六美元，这是遗留给他们的全部财产。这群疲倦的人备尝艰苦，于1848年冬季到达新奥尔良。在那里同他们会师的，有来自法国的几个新的伊加利亚移民支队，其中包括卡贝本人。

至此伊加利亚运动已在法国失去了它的大部分力量。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路易·腓力普王朝，建立了第二共和国，宣布了“劳动权利”，并且开办了“国有工厂”。法国工人满怀着本国将实行社会革新的希望，对于在国外建立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运动，简直不感兴趣。

卡贝在1847年年底所希望的百万伊加利亚主义者减少到不足五百人，这些人于1848年12月和1849年1月在新奥尔良集结在他的周围。

伊加利亚主义者的基金当时计约一万七千美元。

以这样区区的财力在第一批先锋队的挫折经历之后再向得克萨斯州移民，是绝对办不到的，伊加利亚主义者只好留在新奥尔良，等待获得适当的地点。

与此同时，伊加利亚主义者产生了意见分歧，结果他们当中约有二百人退出。剩下的约二百八十人最后决定选择伊利诺斯州的诺伏作为移民地，他们在1849年3月中旬抵达该区，在旅途中有二十人因霍乱逝世。

三、诺伏公社

诺伏区在伊利诺斯州汉考克县，是摩门教徒^①在约瑟夫·史密斯领导下建立的。1845年当芝加哥的人口约有八千人时，诺伏有一万五千居民，是该州最繁荣最兴旺的镇市。

但是，摩门教徒深受迫害。约瑟夫·史密斯被杀害，他的继承者布里格姆·杨格组织他的信徒向犹他州大迁移。

1849年，诺伏连同它的大片耕地和许多建筑物实际上已被抛弃，只留下一个摩门教代理人看管财产，渴望寻找买主或佃户。

对我们的伊加利亚主义者来说，这个机会似乎差不多是天赐的，他们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们租了约八百英亩土地，买了面粉厂、酒坊和几幢房屋，他们似乎第一次走运了。

此后六、七年是伊加利亚历史上普遍繁盛的时代。他们的主体大厦是一幢宽约一百五十英尺的建筑物，作公共食堂、会场等之用。此外，他们有一所学校、几个工厂、一幢四十个房间的住宅和若干小房屋。

他们保持约一千英亩租入的耕地，经营一个面粉厂、锯木厂和威士忌酒坊，经营几个裁缝铺、鞋铺和木作铺，他们的财产估计约值七万五千美元。他们生活的知识和伦理方面也没有被忽视。儿童在校学习各种科目并受伊加利亚哲学原理的严格训练。他们出版英、法、德三种文字的报纸、小册子和书

^① 摩门教徒是1830年约瑟夫·史密斯在美国创立的基督教的一派，过去以一夫多妻为特征。——译者

籍来宣传他们的思想，维持一个有五千多册书籍的图书馆，常常很愉快地参加业余戏剧演出、音乐和舞蹈。

他们的社员在那个时期几乎增加了一倍，伊加利亚的前途看来无限光明灿烂。

但是，在平静的表面下风波已经在酝酿着。1850年2月，伊加利亚主义者通过了一个章程，规定由六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管理他们的事务。这些董事的第一把手任公社主席，其他五人分别任下列五个部门的领导：

- 一、财政和食品。
- 二、衣着和住宿。
- 三、教育、卫生和娱乐。
- 四、工业和农业。
- 五、印刷厂。

可是，董事会的决议须经全体年满二十岁的男社员组成的大会批准。

根据这个章程，卡贝年年当选主席，并且最初非常谨慎地行使他的权力。但是随着一年一年的过去，这位伊加利亚的创立者愈来愈老，愈来愈心胸狭窄，愈来愈独断独行，他的行动常常引起不愉快的摩擦。

在这些逐渐变得非常激烈的争论中，管理部门的成员团结在卡贝的周围，而反对派则控制了大会。

两派之间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敌对，相当有力地继续到1856年8月3日，这时终于发生了分裂。董事半年改选是破裂的近因。新选出的三个董事全是卡贝的反对者，卡贝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承认他们。

无秩序和大混乱这时笼罩着伊加利亚。对立的两派互相厉声攻讦；纷纷发表宣言、檄文、呼吁书和诽谤文；殴打成了平常的事，直到诺伏民政当局进行干预，用武力使新选举的董事就职为止。卡贝和他的一派不愿爽爽快地承认失败。他们停止工作，给他们自己一派另租了一幢房屋，甚至请求州议会收回伊加利亚的特许状，不遗余力地要促使公社解体。

1856年10月，卡贝被正式开除公社的社员资格，11月初他和他的忠实的少数派约一百八十人离开诺伏前往圣路易。

一星期后，埃田·卡贝逝世。

伊加利亚的鼻祖和上世纪中叶法国最强大的群众运动之一的发起者，于1856年11月8日在圣路易突然中风而死。他远离他热爱的祖国和离开他晚年倾其全部思想和兴趣于其上的公社，在流亡中死去。

四、契耳坦哈姆公社

跟着卡贝到圣路易去的那一伙一百八十人的忠实追随者，这时处于可怜的境地。他们失去领袖，毫无资产可言，面临严冬，当时决不会想到要建立一个新的移民区。

这批人对这一职业或那一职业几乎全有一技之长，因而获得了工作，留在圣路易直到1858年5月，那时他们大部分（约一百五十人）迁居契耳坦哈姆，恢复他们中断的公社生活。

契耳坦哈姆是一个拥有二十八英亩耕地的庄园，在圣路易西面约六英里的地方。它有一幢石砌大厦和六幢小木房，离城很近。然而不幸，这些有利条件更多地被庄园的不利特点抵销了：当地是道道地地的热病温床；二万五千美元的买

价过高,并且因为所付的现款太少,抵押就相当沉重。

但是,我们的伊加利亚主义者一点也不气馁。他们拿出由热情产生出来的奋发精神开始建立他们新移民区的社会和工业组织。他们开办了许多工场——这些工场为圣路易附近的主顾做了报酬相当丰厚的工作,创办了一个印刷厂、几所学校、必不可少的乐队和剧院,举办了定期讲座和讨论。

卡贝的名望使他们在法国的伊加利亚主义者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被巴黎局承认是唯一真正的伊加利亚公社,从旧日的祖国得到许多财政和精神的鼓励。为了他们而在巴黎展开的一次募捐使他们净得了一万美元之多。

他们的物质繁荣似乎在 1859 年得到了保证,但就在这时,所有伊加利亚公社都发生过争论的避免不了的老问题、即管理形式问题又在他们辩论中出现。这个争执把契耳坦哈姆移民分成两个对立的营垒。基本上由老年社员组成的多数派主张要有一个拥有独裁权力的领袖,而青年分子则提倡民主的管理形式。争论以保守分子的大胜告终,失败的四十二人少数派全体退出了公社。这么多壮年的离去是对这个年轻公社致命的打击。

契耳坦哈姆的工业大大削弱了,它的社会生活没有欢乐,社员不断退出,到了 1864 年公社只剩下十五个男女成年人和若干儿童。

那是一个伤心的日子,契耳坦哈姆公社最后一任主席、英勇忠实的索瓦召集这些最后的马喜坎人开了一次大会,在这最后的“人民大会”的一片呜咽声中宣布契耳坦哈姆正式解散。

五、衣阿华公社

伊加利亚主义者队伍的第一次分裂不但有害地影响了契耳坦哈姆分离者，也影响了诺伏移民。

卡贝和他的大批信徒的退出打乱了他们的整个工业体系；他们的财产整个减少了，同时他们的负债迅速增加了，为了避免其势难免的解体，他们决定更换一个新的地区。伊加利亚主义者始终认为诺伏是一个临时移民区。对于他们伟大的社会计划来说，这个地方太小，靠文明中心太近。他们打算大规模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和非常复杂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他们需要一片远离我国人口中心的辽阔的土地。

他们抱着这个目的，早在 1852 年就在衣阿华州西南部获得了三千多英亩土地，这时他们就迁到那里去。根本不可能有比这选择更糟糕的了。

那时，衣阿华州是一片茫茫荒野，伊加利亚主义者选择的土地则在该州最偏远的地方。这个移民区离密苏里河六十英里。现在穿过这个地区的铁路在 1860 年尚未筑成；周围好几英里的土地都是人迹罕至的未经开垦的草原，找不到一个小村庄或任何人类住所。巨大的运输费用使他们向外客销售农产品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除此以外，土地抵押价很重；抵押支付百分之十的利息，因为伊加利亚主义者无力付这笔利息，债务以惊人的速度累增着。

即使对许多勇敢而有毅力的伊加利亚主义者来说，衣阿华州开拓初期的艰苦也显得难以应付；社员成批成批地退出，到了 1863 年信仰坚定的人数减少到连男女带孩子只有三十

五人，他们的负债数目超过一万五千美元。

当叛乱战争^①爆发时，这个公社似乎面对着必然的毁灭。这场战争给这小移民区带来暂时的救助。它使他们能以高价卖掉剩余农产品，貯蓄足够的钱跟他们的受抵人结账，根据结账受抵人得了五千五百美元现款和二千英亩土地作为抵押的报偿。

衣阿华公社历史上此后年代的特点是移民一贯不屈不挠地努力保证他们的物质福利。

他们居住简陋的茅屋，常常缺乏最必需的衣食，繁剧的劳动使他们精神恍惚，然而一个伟大美丽的伊加利亚的光明憧憬常常展现在他们眼前，这给他们变得衰弱的身体增添新的精力，给他们厌倦的心情增加新的热情。

他们渐渐振奋起来。在原有的许多小木屋以外，不久又增加了一个公共食堂和会议室；他们购买了更多的土地，建造了一个面粉厂和锯木厂，饲养了大量家畜。

公社愈来愈繁荣，他们的社员人数也增加了，到1868年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

芝加哥-柏林顿-昆西铁路的完成给他们的工业带来新的刺激，他们这时进入了稳定繁荣的时代。

原始的小木屋被比较舒适的住宅所代替，并且建筑了一座六十英尺宽两层高的新的中央大厅。

由于物质舒适的恢复，公社又把注意力转向生活的社交方面和审美方面。象繁盛时期的诺伏和契耳坦哈姆一样，业余演出、音乐、公开讲读会、特别是在公共会议室举行的公开

^① 指1861—1865年美国南部奴隶主统治的各州发动的内战。——译者

辩论会，成了衣阿华移民生活中经常具有的特点。

象在诺伏和契耳坦哈姆一样，公开辩论终于导致公社内部派别的形成。衣阿华荒野的艰苦的开拓生活自然使老年一代保守起来。他们的比较繁荣的局面是他们在猛烈顽强的战斗中从敌对环境夺取来的；它是无数牺牲和艰难的结果，因此他们以慈母般的热爱和柔情坚守着它。斗争初期曾经激励他们工作的崇高理想渐渐退居次要地位；他们最初认为不过是实现伟大社会理论的手段的物质福利很快变成了目的，这些乌托邦空想家和热心家发展成了平常的农民，而残余的激进传统也成了空虚的信条。

伊加利亚的青年社员和这种精神状态形成了显著的对照。其中一部分人是在公社成长起来的，但他们父辈的早期斗争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童年的淡薄回忆，其余的人则是最近加入的，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新的气氛。

《伊加利亚游记》一书出版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前半期乌托邦的空想已经让位于卡尔·马克思的现代社会主义；“国际”^①已经确立了所有欧洲大国社会主义者的休戚相关的牢固联盟，最近巴黎公社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欧洲爆发了活跃的阶级战争，同时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也正在飞跃发展。

“进步派”中的一些人是国际的成员，而其余的人则于1871年在巴黎的街垒中作过战。

主要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青年“进步派”组织起来和老年伊加利亚主义者的“保守派”相对抗。

^① 即国际工人协会。——译者

两派间的斗争最初非常温和，但是它渐渐地带有比较严重和危险的性质。

这些青年要求在工业和农业方法方面作一些改革，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建议在外界人士中间进行宣传，并提出要整批接受新成员和采取其他激进措施；而老年开拓者对一切革新和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持怀疑态度。

1877年9月，摩擦发展到处于少数地位的“进步派”要求正式分离的地步。这个要求遭到多数派的断然拒绝，心怀不满的少数派因而宣布对敌手激战。

这场冲突渐渐变成了人身攻击并变得激烈起来，两派都不择手段地想要压服自己的敌手。少壮派最后竟向民事法庭申请解散公社，并且为了找到申请的正当法律理由，他们“进步派”控告伊加利亚公社（它是作为一个农业股份协作社而组成的法人组织）犯了越权和以其共产主义措施违反特许状条款的罪名。

1878年8月，巡回法院宣布伊加利亚的特许状无效，他们推选三个受托人清理结束它的事务。

伊加利亚主义者没有从分裂的影响下恢复过来，虽然两派都在公社正式解散后各自做了重建的巨大努力。

“进步派”根据同受托人和公社中他们从前的反对者所商定的协议，继续占有旧的村落，重新成立一个名叫“伊加利亚公社”的法人组织。但是这个公社不知何故没有兴盛起来，1884年青年伊加利亚主义者迁往加利福尼亚州克洛佛德尔附近的布路克索姆大农场，那是不久以前他们的一些朋友购置的一个园艺农场。这个新移民区命名为伊加利亚·斯佩兰

扎。它从没有繁荣起来，终于在 1887 年被法院命令解散。

在这同时，老年派改组叫“新伊加利亚公社”，老资格的伊加利亚主义者马尔香先生担任主席。他们得到了前公社的一份财产即旧地产的东部、一千五百美元现款和八幢木房。他们把这八幢木房全部从旧宅基迁走。他们造了一座新的会议大厅，恢复了农业。

由于没有外界的新成员参加，由于社员偶然死亡或退社所造成的他们自己队伍的逐渐减少，他们竭力支持到 1895 年公社最后解散。

半个世纪前那样大吹大擂地出现的伟大的伊加利亚运动，由于依靠单纯消极的证据来证明兄弟般公社生活的幸福，从而大胆地满口答应要革新全世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观察和结论

美国共产主义实验的历史包含一个很长的时期，它为分析和归纳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以致不作一些概括的观察就结束这一叙述，那简直是不适当的。

在这些实验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各个不同团体获得的不同程度的成就。

毫无疑问，宗派公社即教派公社就其平均寿命和物质繁荣程度来说，是最成功的。列为宗派会社的大多数会社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少数的现在还存在，有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其中有些如震教徒会社，经济移民区、奥奈达公社和阿马纳公社积聚了财产，所有其他的公社在短短的开拓时期之后都过

着或已经过着比较舒适富裕的生活。

另一方面，“非宗教的”公社的经历通常是短命的，充满了艰辛。欧文主义一类公社的平均寿命不过两年多点，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的平均寿命，除了北美法郎吉、布鲁克农庄和威斯康星法郎吉三个显著的例外，全都沒有超过两年，伊加利亚公社则处于不断的灭亡和改组的过程中。此外，这些公社从未达到任何程度的物质繁荣，除了少数例外，它们过的是赤贫的生活。

非常相似的事业在财产和成绩方面所形成的这种显著的悬殊，不能不引起研究公社生活的人发表许多评论。诺德霍夫和其他一些人试图用以解释这个现象的论据是，宗教会有坚强的领导；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随便哪个公社要是沒有懂得怎样获得全体成员信任的干练明达的个人的指导，是不可能兴旺起来的。另一方面，诺伊斯和格里利则提出这样的看法：象那样的宗教是公社的支持力，是一切共产主义实验获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

可是，经过比较仔细的考察，这两种意见看来都颇为肤浅，和下面的事实不相调和：震教徒会社自从安·李时代以来几乎从未有过一个全体公认的权威领袖，他们的繁荣在这位女先知者逝世后仍然沒有减退，几乎达一世纪之久，与此同时新谐和公社尽管有罗伯特·欧文这样有才智和行政能力的人作领导，却明显地归于失败。同样，傅立叶主义的法郎吉的寿命都很短促，虽然它们在多数情况下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公开自称信奉不可知论的伊加利亚主义者则设法维持生存几乎达两代之久。

然而，教派公社获得相当成功的真正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这些公社的社员主要是德国农民，擅长种地，他们的生活要求不超过一般水平；而“非宗教的”公社的社员大半是一群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空想者，惯于过较高水平的生活，并且往往缺乏任何农业知识。那么，前者会把他们的“田地”即农场耕种得比后者更有成绩，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其次，宗教公社是为了宗教目的而不是为了宣传共产主义创立的；它们的共产主义对于它们的存在来说不过是次要的小事，只要它们的物质利益有那样的需要，它们就毫不在乎地加以抛弃。震教徒、谐和派、阿马纳派、至善论派和其他教派公社招了雇工从事田间和工场劳动，它们在快灭亡时实际上已不再是公社，而变成了农业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它们的物质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它们的共产主义，而是由于它们背离了共产主义。换言之，宗派或教派的公社最后放弃了共产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商业企业；而“非宗教的”公社则始终坚持共产主义制度，它们的经历几乎都是短命的和失败的。

因此必得承认，美国的公社作为实际共产主义的实验是完全失败了。象麦克唐纳和同一类型的其他历史学家那样，试图探究每一个别公社失败的具体原因，那是徒劳无益的；所有共产主义实验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成为它们存在基础的根本思想是空想性质的。

所有公社的创始人都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小型社会，消除他们似乎不能接受的一切现代文明的特点，完全按照自己对于正当的社会关系的见解把它组织起

来,并使自己同周围世界及其腐败的影响完全隔绝。

但是个别的或合群的鲁宾逊一流人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近几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已经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很大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已使人类成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我们现今文明的一切惊人成就应归功于全世界田野和矿山、铁路和轮船、工厂和实验室的劳动者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合作;社会的个体成员只有从参加这个巨大的合作劳动或其成果中才能得到力量,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脱离社会而不重陷于野蛮状态。

社会的不可分性是建立一切共产主义实验的磐石。他们决不可能建立一个一切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不得不经常地和外界交易,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受竞争制度法则的支配。和教派公社一样,其中顺着潮流的实验就逐渐采取了竞争工业的一切特点,并且繁荣起来,而仍然坚持其乌托邦空想的实验则灭亡了。

现代社会主义者早已抛弃了用共产主义零碎的补丁来修补现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工业制度的想法。他们认识到,社会不是由若干独立的和互不相连的团体组成的,它是一个有机体,并且认识到,他们全部的希望和努力正是以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进步为目标的。

另一个对社会问题研究者也许更有兴趣的问题是公社生活对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

欧文时期的公社的寿命非常短促,以致不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社员的性格和习惯,傅立叶主义的实验也是如此,大概北美法郎吉、威斯康星法郎吉和布鲁克农庄则是例外。

但是，伊加利亚公社、特别是宗派的或宗教的公社存在了几代之久。虽然伊加利亚主义者的生活和事业受到内讧和物质艰难的许多骚扰，宗派共产主义往往不是纯净的，但是这两类的公社毕竟造就了一种类型的男女，其特性和其余的人类多少有点不同。

人们常常重复声称，竞争给独创精神和勤奋刻苦提供唯一的刺激，就这方面来说，注意一下共产主义者一般都高度地具有这些品质，那是有趣的。决不是偏颇的观察家诺德霍夫就这一点评论说：“凡是访问参观一个已经存在了若干时候的共产主义会社的人，不能不被人们中间发挥出来的大量发明才能、创作技能和业务才干所感动，而这些品质是谁也不能期望从外界的人们那里得到的。”他又说：“最使我惊讶的，是发现各公社都有各种各样大量的事业技能和机械技能，不管其社员的性格和智力如何。”

所有的观察家也异口同声地证明说，共产主义者一般都是非常勤勤恳恳的，虽然公社并没有行使强迫手段。伊利评论说，“合作劳动的愉快是公社生活达到全盛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海恩兹在亲自看了许多公社以后发表评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保有财产的个人并不是勤奋刻苦和努力地经营复杂业务这种精神所不可缺少的。诺德霍夫用下面一段话证实他们的评论：

我在许多地方问道，“你们怎样对付你们的懒汉？”然而公社根本没有懒汉。我得出的结论是人不是生来懒惰的。毫无办法的“过冬震教徒”，当冷天临近时，就要到震教徒会社和其他公社寻求庇护，表明希望成为社员；象一个老年震教徒对我

说的那样，他们在初冬“带着空的肚子和空的衣箱而来，当玫瑰初绽时满载而去”，——即使这些穷家伙也屈服于当地有条不紊的和有组织的规矩，毫不偷懒地做他们的一份劳动，直到煦和的春天的阳光引诱他们去过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

共产主义公社的成员固然并不懒惰，他们认真地和很好地工作，可是也没有表现出有损现代文明中劳动愉快的任何损伤元气的忙乱的迹象。他们从容不迫地生活着。

震教徒说，“许多人做轻松的工作，”他们还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没有必要使工作成为精神上的负担。

奥奈达公社共产主义者的劳动时间短，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很多；阿马纳公社共产主义者承认，一个雇工一天做的工作同一个公社社员常常在两天做的工作一样多。

这些共产主义者一般还严格注意合理的健康规则，是清洁的模范，他们几乎毫不例外地在生活习惯中重视节制，虽然德籍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喝好的啤酒和葡萄酒，特别在收割季节。

同一般印象相反，就整个说来共产主义公社的生活并不是单调的。这些共产主义者努力使他们的习惯和职业尽可能多种多样。谐和派、至善论派、伊加利亚派和震教徒都几次更换了地方。关于奥奈达公社，诺德霍夫说：“他们看来几乎非常厌恶固定的形式。于是他们常常改变他们的职业；他们颇为慎重地改变晚会和娱乐的程序，甚至改变了他们进餐的时间。”对于傅立叶主义法郎吉来说，工作的多种多样是主要原则之一，所有其他的公社也差不多如此。

他们按照自己那种宁静的方式寻欢取乐；他们极少患病，

沒有听说他们有谁得神经病或自杀的。

在这种情况下，难怪听说那些共产主义者在美国是寿命最长的了。

最近在阿马纳公社社员中九十岁以上的有两人，八十至九十岁的约二十五人。谐和派大多数活到七十岁以上；震教徒中九十岁的人是不稀罕的；左雅尔派 1877 年有一个社员九十五岁，有一个女社员九十三岁，他们两人自动继续劳动，许多社员都在七十五岁以上；奥奈达公社许多社员活到八十岁以上。在公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中间，拉普活到九十岁；博伊梅勒尔和诺伊斯活到七十五岁；主要的伊加利亚主义者之一马尔香现已八十七岁，仍然精神抖擞。

公社生活对共产主义者的德育和智育方面的发展同对他们的体育方面的发展一样，似乎起了有益的影响。由七个不同的村落组成的、人口有时超过二千人的阿马纳公社内没有一个律师；这个公社以及贝瑟尔公社、奥罗拉公社、威斯康星法郎吉、布鲁克农庄和其他许多公社都自豪地宣称，从来没有发生过控告它们公社的案件或者社员中起诉的案件。

它们的簿记一般是非常原始的。它们并没有向管理人员强要任何担保，但是沒有发生盗用公款或管理不善的事情。

诺德霍夫说，“这些共产主义者是诚实不苟的；他们喜欢优良而彻底的工作，重视诚实和公正办事的名声。他们的乡邻在这方面常常对他们评价很高。”

他们也以殷勤好客、仁慈厚道和乐于援助求助者著称。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共产主义者始终不渝地颇为注意他们儿童的教育和自己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学校一般比邻

近村镇的学校好；他们多半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举行定期的公开讨论会，比其他同等身份的男女更有文化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因此，整个说来，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显然比个人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德智体三育的发展。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

绪论 美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尽力探究美国现代社会主义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会偶然发现看来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和他早期的空想阶段之间的连接物。

例如，伊加利亚派公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同魏特林的工人同盟^①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稍后，它们积极参加了“国际”的工作，它们的杂志《伊加利亚评论》和《青年伊加利亚》到1879年还列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

和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显著关系的艾尔坎德·朗利在1880年左右重新露面，做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圣路易支部”的成员，在他的《共产主义者》刊物上尽力鼓吹该党的原理。许多傅立叶主义者对晚近社会主义的发展表示了同情的关切，至少有一个布鲁克农庄庄员费拉德尔菲亚的霍默·杜瑟医生至今还和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积极的联系。

但是，必须把这些例证当作通则的例外来看待，整个说来，确实可以说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移民区对美国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形成只起了微不足道的影响。

两个运动在性质和起源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① 全名为工人总同盟。——译者

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在纯道德概念的基础上，从基督的教义或其他伦理礼法得到启发；它存在于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存在于我国和旧大陆，是有同样理由的。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主义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在任何国家的社会条件和工业条件使运动的时机成熟之前不可能在那里生根。

现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柱是脱离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永久沦于雇佣劳动者队伍的巨大工人阶级的存在。它还要以发展到这样程度的工业制度为条件：这个工业制度变成压在工人身上的大山，酝酿着不满，并迫使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换句话说，这个运动必需先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厂制度，以及伴随这种制度的一切社会差别和经济斗争为条件。

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条件在美国并不存在。美国在世界各国中长期居于例外地位。在欧洲各国几乎耕尽每平方英尺土地和耗尽它们的一切天然资源的时候，西半球还有辽阔无际的肥沃土地等待先来者占领。在制造业和工业成为欧洲主要因素的时候，农业在美国是一个相当松动和有利可图的职业，自耕农占美国人口的大部分。充裕的土地把大部分的壮年吸引到田野和牧场，使新兴工业的劳力供应远远落后于需求，并保持特别高的工资水平。

整个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劳动临时性的多，永久性的少；工人往往只需要做很短时期的工，就可以积蓄足够的钱在农场安居下来，或者购置本行业的很简单和便宜的工具，独力经营业务。

美国生活的幸福也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利益。全国上下

对独立战争的伟大斗争和胜利记忆犹新；独立宣言的令人鼓舞的原则对美国人说来言犹在耳；人们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与让的权利”，这对他们说来是活生生的真理；他们以自己的政治主权、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感到自豪。这个年青共和国是繁荣的，它的前途是光明的；它没有政治特权，也几乎没有任何经济阶级。它竟然产生出了一种全国一致的乐观主义和自足自得的心理，乃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乐观主义和自足自得的心理使它轻视任何建立在对现行制度不满的基础上的运动。

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空前的人口增加使公有土地的面积逐年缩小；较肥沃的土地被迅速地占据，剩下的大半是森林或荒芜的原野。土地变成了商业和投机的对象，地价不断上涨，穷人愈来愈难以购置，因此他们被迫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去。这样就奠定了永久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基础。

同时，作为该运动一部分的现代工业在美国出现，并且很快地呈现惊人的规模。这个国家用之不尽的原料资源及其居民的进取精神和发明才能，不久便使它跻于工业国家的前列。商业城市、工厂城镇和采矿帐篷在全大陆各地出现；铁路线和电报线路象蛛网似的遍布全大陆，于是美国从一个和平的、自足的农业社会变成一个嗵嗵喷烟的、忙忙碌碌的和熙熙攘攘的工场。

工业革命跟着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引起颇为剧烈的变化。美国国民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大富豪和货币大王的时代，空前奢侈和豪华的时代，但也是赤贫和悲惨的时代。

以罢工、闭厂和抵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劳资之间的公开斗争愈来愈频繁，往往还伴以暴力举动。

同时，工人流入工业中心造成人口拥挤，在某些情况下仅堪与中国的情况相比；贫民窟和经济公寓同华丽的林荫道和大楼一样，成了我们主要都市的特点。

总之，美国最近还是平等和独立的公民的理想共和国，一下子就变成了现代所见过的最激烈的阶级战争和最显著的社会差别的现场。

所有这些惊人的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很难置信的快速完成了。1850年，美国人口不过略多于二千三百万；半世纪以后增加到七千五百万以上。1850年，全国财富合计七十亿美元稍多一些，并且按人口分配相当平均；1890年，“国民财富”超过六百五十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不过四万家即占人口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的人手里。1850年，美国百分之五十五的财富来自农业；1890年，农业只占国家财富的不到百分之二十四。1860年，美国的全部工业投资稍稍多于十亿美元；在以后三十年中增加了六倍多。

1870年，劳动力远远供不应求；可是三十年后就有一百万以上失业工人的常备军。1870年，在美国几乎没听说过罢工和闭厂的事；1881到1894年，全国经历了一万四千起劳资纠纷，参加的工人约有四百万人。

前面几页概述的发展过程就这样为现代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准备了基础，但是，起源于我国特有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历史特点的种种情况对运动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首先，美国工人仍旧比大西洋彼岸兄弟工人享受优越一

些的实际利益。五花八门的工业和新的企业领域的不断开辟，使美国成为相当好的劳动力市场，尽管发生暂时的工业衰退，就整个来说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比欧洲雇佣劳动者较高和较好。其次，美国工人阶级和欧洲工人阶级的性格和心情有很大不同，这是由他们的出身和历史的差别造成的。

欧洲的工业是从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的小规模制造业发展起来的；从前工场的老板变成现今的资本家，而学徒和助手变成现代雇佣劳动者。这个过程是缓慢渐进的过程，两个阶级都是经过长时期才形成的。欧洲工人已有好几代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阶级传统和感情；他们是“有阶级意识的”。

美国工人并非如此。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还是极晚近的事，以至他们没有发展起明显的阶级感情；他们亲眼看到就在他们面前有许许多多的人从普通工人登到财富和权力的最高峰的事例；他们仍然以为雇佣劳动不过是暂时的状况。

妨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另一个障碍物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找到：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一般都被剥夺了其他阶级的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政治权利，为取得这些权利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往往是使他们团结到一个特殊的政治联盟中去的首要原因。“普选权”是德国工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团结在拉萨尔周围并建立现今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时提出的口号。“废除一切剥夺个人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联盟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法律”是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运动复活时提出的初步要求之一；同样，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国的社会主义者的初期斗争是争取普选权，争取集会和结社自由，争取工人阶级联合的权利。

可是，美国工人始终享受充分的政治平等，因此不怎样想以阶级做基础在政治上组织起来。

再次，我国政治舞台上激进改革政党的定期出现往往促使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入另外的渠道。

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不很重要的障碍有助于使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更为缓慢和更加困难。

现代社会主义的最早几个发端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结束之前在这个大陆出现的，但是又过了半个世纪运动才可以说是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环境。

为了方便起见，虽然多少有点武断，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这个时期的历史可以分为下面四个时期：

一、南北战争以前时期，从 1848 年左右到南北战争开始。这个时期的运动几乎完全限于德国移民，这些德国移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它不但在深度上而且在广度上是无足轻重的，并且几乎整个地被南北战争的骚动冲掉了。

二、组织时期，包括 1867 至 1877 年的十年，它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相继产生，起初是地方规模的，然后是全国规模的，最后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为其高峰。

三、社会主义工人党时期，持续了二十年，它的特点是对运动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和外部的斗争。

四、现今社会主义，包括最近几年的时期，它的特点是运动的适应环境和社会党的诞生。

第一章 南北战争以前时期

一、运动的发端

十九世纪初叶，组成德意志祖国的三十多个地区对它们的子孙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个国家的政治浩劫和经济落后造成了人口源源外流，这种情况只是在帝国建立之后才有所缓和。根据不充分的材料估计，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有三百方以上的德国人离开祖国。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和工匠，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德国始终过剩的有文化教育的人；最后，不幸的 1830 年革命和 1848 年革命给人口外流增加了一个人数很多的新因素——政治亡命者的因素。

德国侨民在法国、英国、瑞士和比利时形成一些巨大的居留地，其中许多人最后在我国海岸登陆。1830 年左右，德国人有相当的比重分布在合众国的几乎各州和准州地区，人数特别多的是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纽约和马里兰州。

在欧洲和美国的这些侨民被他们祖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孕育起来的激进主义，在法国人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又找到了支持，不久便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广泛的运动。他们成立了秘密的革命团体，组织了工人们讨论社会问题的教育俱乐部，其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了积极和领导的作用，特别是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们一群著名的朋友和合作者。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创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应它的请求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宣言》包含着最初对马克思的亦即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完整解释，因此可以说 1848 年 2 月这个文献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社会主义的肇始，虽然运动在此后的长时期内几乎完全限于德国侨民中的名流。

德国侨民中间的这个广泛运动不能不在美国得到一点共鸣。为了把政治亡命者集结起来并使他们经常准备在下次政治革命爆发时立即返回祖国这一公开目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纽约城成立了“日耳曼尼亚”协会^①。

当自由土地党^②在美国政界出现时，德国工人是首先响应者之一；他们组织了许多自由土地俱乐部，于 1846 年为该党创办了一个周刊《人民论坛》。

此外，好几千德国侨民被组织参加辩论会、合作社团、体育协会和多少带有初步性质的职工组织。但是这个运动颇为支离破碎，在著名德国共产主义者威廉·魏特林抵达美国以前没有获得可观的力量和影响。

二、威廉·魏特林和工人总同盟

威廉·魏特林于 1808 年生于马格德堡，是一个家道贫寒的妇女的私生子。

他少年时代学习缝纫业，按照当时德国职工的惯例，他在

① 《在安东·艾克霍夫的新家乡》，纽约 1884 年出版。

② 自由土地即禁止用奴隶的土地，因此自由土地党亦称反奴隶制度党。

——译者

学徒时期作了广泛的旅行。

这位青年兼备非凡的智力和真诚的求知欲，他在旅行期间设法掌握了法语和弥补了他的荒疏教育的许多不足。

他年轻时就成为热情的共产主义宣传家，致全力于侨居外国的德国工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在巴黎和瑞士开了供学徒期满的缝工用的若干合作餐馆，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工人教育协会。他积极参加了巴黎当时流行的各种秘密的革命团体，1846年他参加了由年青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领导的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

魏特林的引起广泛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是秘密革命出版社1838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现实的世界和理想的世界》，最早对作者的共产主义理论作了解释。

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在四年后出版，并不费力地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它被广泛地阅读和评论，并被译成法文和英文。

这两本书和1846年出版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构成他的主要著作。

在社会哲学方面，可以说魏特林是原始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的桥梁。他基本上仍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著作明显地流露出早期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似，他把他的哲学完全建筑在道德的基础上。他认为不幸和贫穷不过是人类恶念的结果，因此他大声疾呼要求“永恒的正义”，要求“全体人类的绝对自由和平等”。他在批评现行制度时紧紧地依靠傅立叶的思想，他还效法后者把劳动分为必需的、有用的和有吸引力的三类，并且因袭了

“有吸引力的工业”的组织计划。

他的未来社会状况的理想使人联想到圣西门的科学家政府的主张。全世界的事务管理权将掌握在“哲学的医学”、物理学和力学三个最伟大的权威手里，并设若干附属委员会来协助工作。他理想的未来国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对此他通常加以详细的叙述。魏特林在某种程度上接近现代社会主义概念的地方是他承认在雇主和雇工之间存在阶级差别。承认这个差别决不等于有意识地赞成现代社会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学说，然而他的关于“穷人”和“富人”间的对立的见解则十分接近于这个学说。他坚信劳工组织是发挥工人阶级管理能力的一个因素；成立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是他的得意计划之一，他的呼吁主要是向着工人而发的。

不象他的大多数前辈和同辈，魏特林不仅是一位批评家；而且他是热心的宣传家，一种新信仰的提倡家；他的著作和讲话说出了对他同胞的热爱和对他们幸福的热望。

魏特林的富有魅力的人格和谦虚的态度使他博得了工人同志的爱戴，瑞士和德国两国政府不断对他进行的迫害更增加了他的声望。

毫无疑问，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是瑞士、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许多德国工人移民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

应一批德籍自由土地党人关于负责编辑上面提到的《人民论坛》的邀请，魏特林在1846年底第一次赴美国。但是，他一到美国就发觉该刊物已经停刊，一年后当他的祖国将要爆发革命的流言传到我国时，他赶忙返回德国。“光荣的1848年革命”刚一露头便立刻被扼杀，魏特林感到失望然而毫不气

馁，于 1849 年又赴美国。在这里他找到了广阔的和有利的活动天地。

如前所述，德国侨民那时已成立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劳工组织，然而这些组织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更谈不到统一的目的和意志，魏特林立即抓起使运动中央集权化并指引它纳入明确渠道的工作。为此，他创办了《工人共和国》，这个杂志 1850 年为月刊，1851 年 4 月改为周刊。

也是在魏特林的影响下，“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于 1850 年在纽约成立。这是一个有二千至二千五百名会员的一些劳工组织的代表组织。合众国其他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组织，一个热烈的运动不久便在德国工人中间蓬勃展开，尤其是在东部。

举行了群众大会，散发了传单，组织了许多俱乐部。运动引起美国报纸的注意，成为大量赞成和反对的评论的题目，结果它不久就扩展开来，越出纯德籍劳工组织的范围，得到了其他国籍工人包括美国本国工人的同情和合作。

那个时期每一期的《工人共和国》都刊载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1850 年 3 月，在纽约举行的黑人群众大会宣布同意魏特林的“劳动交换银行”的主张，同年 4 月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采取了同样的态度。5 月 10 日，《工人共和国》发表了卡贝的来信，这位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表示赞成在诺伏的伊加利亚移民区和魏特林的运动之间进行和谐的合作，该刊物同一期还刊载了这样的消息：新泽西州威德波特的一些美国农民，为了设立魏特林计划的劳动交换银行，组织了“农民和工匠保护联合会”。9 月 21 日，《工人共和国》刊载

了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魏特林长期倡议的一件事——的通知，这次大会实际上是 1850 年 10 月在费城举行的。

这是美国德籍工人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国工人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者来看是极为重要的事件。代表大会于 10 月 22 日开幕，于 10 月 28 日完成工作。

代表的基础是每一百个有组织的会员选一名代表，派代表的会员人数为四千四百人。这些会员分布在下列十个城市的四十二个组织：圣路易、路易斯维尔、巴尔的摩、匹兹堡、费城、纽约、布法罗、威廉斯堡、纽瓦克和辛辛那提。

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如下：

1. 劳动交换银行。
2. 协作会社。
3. 政党组织。
4. 教育和教导。
5. 宣传。
6. 移民区。
7. 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在《工人共和国》和别的报纸刊载的决议中都作了说明。

魏特林的“交换银行”和欧文的“公平劳动交换银行”基本上是相同的。它是一个机构，在那里，一切有用商品的生产者可储存产品，换取等价的纸券，回头他可用纸券照原价购买银行储存的任何物品。欧文计划和魏特林计划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合作社工业是银行不可缺少的补充物。

交换银行是魏特林的得意主张；他希望通过它的作用渐

渐排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从不厌倦地歌颂他的理论的优点。

代表大会原封不动地通过了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详细规定了这个机构的管理方式和实际工作。

代表大会的政治主张归纳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这样一句口号，纲领包括十二项要求，差不多全是从自由土地党纲领中搬来的。

代表们还规定每个城市设立一个由七人组成的中心政治委员会，它们在州选举和全国选举时要彼此共同行动，他们还通过了赞成扩展教育机关和成立共产主义居住区的决议。

代表大会任命纽约“交换委员会”为运动的临时执行机关，并规定下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间和方式。但是非常奇怪，代表们没有给予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各组织的联合机构以正式的名称，这个团体此后有一个时期含糊地叫“运动”、“联合会”、“城市联合会”，直到全体一致决定给它定名为“工人总同盟”。

紧接着费城代表大会之后的时期是魏特林社会活动显示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代，再后便是一落千丈的时期。他的交换银行计划从未实现。虽然给这个计划偶然征募了一些钱并为它发行了一点股票，实得的数目是完全不够举办即使是很简朴的实验的，因此魏特林勉强放弃了他的得意空想。

他的信徒作了一次实现他的移民计划的尝试，于1849年在衣阿华州创立“康缪尼亚”移民区，然而这个尝试结果陷于惨败，使创办人遭到财政损失和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不愉快的争论。

在这同时，魏特林的做法和他的专断举动引起了工人总同盟许多杰出成员的反，经过一番短时而激烈的争吵后，魏特林在愤怒怨恨之下退出了公共生活。

后来他在纽约“移民局”担任办事员度过晚年。在生命快结束时，他对自己成就的评价是惊人地夸大的。他写了一本天文学的书，他断言该书中的发现远远超过牛顿的发现，他还自认为发明了缝纫机上许多有价值的设计，而所有这些设计据他说都是被人从他那里偷走，借此获得了巨额利润的。

他对工人运动的以后几个阶段始终保持冷淡态度，唯一的例外是他出席了1871年1月22日召开的“国际”纽约支部联席会议。三天之后他与世长辞。

工人总同盟在魏特林退出后继续存在了几年，但是它从未达到它那光辉的开端使人期望的重要地位。

1853年，发出了在纽约举行第二次职工组织代表大会的通告，但是只有排字工人这个行业派了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约瑟夫·魏德迈耶^①的活动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运动注入了一些新的精神。魏德迈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友，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诣很深。他和魏特林大约是在同一时期来到纽约的。1852年春，他创办了《革命》月刊^②，第二期也是最后一期第一次刊载了马克思著名的有历史意义的论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魏德迈耶尽力给工人同盟灌输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学说，并用德语和英语就这个问题向

^① 参看卡尔·欧伯曼：《约瑟夫·魏德迈耶——美国社会主义的先驱》，益坚译，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译者

^② 前引书说《革命》是周刊，第一期于1852年1月6日出版，第二期1月13日出版，此后因缺经费停刊。——译者

成员发表了许多演说。

1856年底，魏德迈耶定居在芝加哥，在那里一直呆到南北战争爆发。

1858年，同盟创办了新的周刊，名为《社会共和国》，推选了著名的德国革命家古斯塔夫·斯鲁夫为该刊编辑，他喜欢不着边际地搬弄华丽词藻，思想混乱。在他的影响下同盟不久便败落了。为了说明同盟当时的精神和智能的特点，我们援引下列关于其政治职位候选人的义务的决议^①：

“决议：在行政官或监督官之前向各候选人询问下面的问题：

“1. 你决心准备打碎资本束缚劳动的枷锁并尽全力保卫穷人的权利吗？

“2. 你决心准备维持工人在法律之前的绝对权利并反对那种凭借偏袒土著居民的倾向等等侵害移民的不公正行为吗？”

接着还有一长串类似的问题，最后发表下面断然的声明：

“决议：凡不遵守上述原则而违约的任何候选人将交人民审判。”

《社会共和国》于1860年停刊，工人总同盟此后也就默默无闻了。

^① 对于这些引文和这个时期运动的别的许多细节，著者援引了左尔格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出色论文。左尔格：《美国工人运动，1850至1860年》。载《新时代》1890—1891年第31期。

关于魏特林在美国经历的其他详情，研究者可查阅《工人共和国》合订本，关于魏特林的传记，可参考埃米耳·卡累尔的小册子：《威廉·魏特林，他的鼓动和学说》，格丁根-苏黎世1887年出版。

三、体育协会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学说传播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还有德国体育协会。

那时，靠正规体操发展整个人体组织的体育的重要意义刚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在普鲁士，1842年6月的内阁命令承认体育是正规学校锻炼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纷纷仿效，象一切新的和不花钱的运动常有的情况一样，事情最初做得过火了些。体育渐渐流行起来，特别是在贫民阶级中间。工人体育协会在全德国和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美国，大多数这样的协会特地留出一些会议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精神体育”。最早的体育协会的政治见解一般是很激进的。1850年，即魏特林在费城召开劳工组织代表大会的那一年，它们也在该城举行了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七个地方的代表，并且成立了全国联合会，名为“北美体育协会联合会”。1851年，这个组织改名为“社会主义体育协会”。

体育协会在政治上接近自由土地党，但声明它们的目的是在美国成立社会党。伊利教授在前述的他的《美国工人运动》一书中，以及其后德国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家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都相当重视体育协会在我国现代社会主义早期所起的作用，但左尔格——他有亲自观察和回忆的便利条件——不同意他们的这个意见。无论如何，体育协会似乎在南北战争前没有对工人运动发生任何直接影响，战后体育协会朝保守主义的方向大大修改了它们的政治和社

会信念,把它们的全局组织改名叫“北美体育协会”,虽然有一些个别地方组织仍旧保留“社会主义”字样作为它们名称的一部分,并且仍然同情社会主义运动。

四、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在美国出现的有显著社会主义倾向的第二个组织是1857年在纽约成立的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但是人们对这个俱乐部的历史知道得极少。它的成员似乎主要是在德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阶级的人们。他们的共产主义与其说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建筑在哲学基础上,他们的宗旨和目的在他们1857年10月印行的组织章程^①中作了说明,原文如下:

“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成员拒绝接受不论以什么姿态出现的一切宗教信仰,并拒绝接受不以感官的直接证明为基础的一切观点。他们承认不分肤色和性别人人完全平等,因此他们首先要尽力废除不管是继承的或是蓄积的私有财产,开始代替它的是人人都参加世界上的物质和精神享受。他们签字保证在目前状态的社会中以最大的努力来贯彻执行他们的宗旨,互相给予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他们的组织章程还规定成立俱乐部分部,但好象一个也没有组织起来。

俱乐部吸引广泛注意的仅有的一次是它在1858年为纪念1848年巴黎起义而安排的有许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

^① 《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章程》,1857年10月,纽约。

五、南北战争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者

当然，早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完全赞成废除奴隶制运动，而且废除蓄奴制一贯是他们的政治要求之一。但是，随着迫在眉睫的斗争日益临近，这个问题对他们就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当终于宣战时，战争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把其他一切政治兴趣搁在一边。

当时存在的各派社会主义组织都给联邦军提供了足额的士兵。伊利教授叙述道：“各地的体育协会响应林肯的参军号召，其中有些协会派遣了它们一半以上的成员。在纽约，几天内它们就组织了一个整团，许多地方它们派了几个连。在密苏里州第一团中有三个连，而第十七团则几乎完全是体育协会的成员组成的。据估计，体育协会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会员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参加了战争。”

其他社会主义组织提供的士兵在比例上大概达不到上述数字，但还是相当大的，其中包括年青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若干最有力的领袖。约瑟夫·魏德迈耶在战争期间在联邦方面服役获得了特殊功勋，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被任命担任圣路易市政的负责职位。

奥古斯特·威利赫于1848年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参加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53年来到美国，在战争刚爆发时就参了军，他很快晋升到中尉和上校，于1862年被任命为陆军准将。

普鲁士军退伍军官和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会员罗贝尔特·罗萨在纽约第四十五团服役，晋升到少校。他在1901年

逝世。

共产主义者俱乐部最有才华和最有前途的青年会员之一弗里茨·雅科比参加联邦军当战士。他被提升到中尉，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牺牲。

博伊斯特医生、阿洛伊斯·提耳巴赫和其他许多不怎样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都参加了德侨志愿队。^①事实上，战争使初期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队伍减少很多，因此它们的活动一蹶不振，到了1867年运动才开始恢复。

^① 这个报道的大部分是左尔格先生供给的。

第二章 组织时期

一、国际工人协会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的一个时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是和欧洲国际工人协会的事业密切联系着的,稍微熟悉一下这个协会的性质和历史对于正确了解这个时期的运动将有很大帮助。

国际工人协会通称第一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正式成立的。无论从所选择的时间或地点来说,没有比这更有利于开创一个就其观点的豪放、理想的崇高和规模的宏伟而言在多事的十九世纪历史上都是无匹的运动了。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看到了东西半球所有文明国家的极其显著的工业、社会和政治的剧变。

蒸汽动力和铁路的诞生,迅速革新了欧洲和美国的从前缓慢的生产方法和运输方法。家庭工业和小型制造业被大工厂和大规模生产体系所代替。发明了新机器,建立了新工业,发现了新市场,确立了新关系。一阵清风拂过古老的国度,给它们带来新的精神和生气。

继工业进步而来的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普遍的政治觉醒和复活。

在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冷淡和政治反动让位

于要求祖国统一的强烈的鼓动，工人在他们的无畏和雄辩的战士斐迪南·拉萨尔的鼓舞下，展开了一个要求普选权和工人权利的蓬勃的运动。在意大利，人民在加里波的和玛志尼的领导下，对奥地利、法国和罗马教皇的征服进行殊死斗争，要求“统一共和国”的呼声往往淹没建立“独立王国”的要求。

在美国，废除奴隶制运动在南北战争爆发时达到高潮；不幸的波兰人在英勇的但无望的反对所有俄国专制君主斗争中的英勇功绩正博得欧洲的同情和钦佩。

在英国和法国，工会运动正迅速地发展着，在同资本进行的许多冲突中已经获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

整个欧洲大陆处于政治和社会不安的状态，伦敦充满了各国的政治流亡者。当时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多多少少地有大批代表驻在英国首都，并且这些流亡者经常彼此友好交往。

在1862年世界展览会的时候，由自己工人推选的、得到拿破仑第三特别许可的几个法国工人，由政府出钱被派往伦敦。英国工人兄弟对他们热情款待，安排了一个“国际同志联欢节”，在会上各国工人交换了意见，表示了希望看到欧洲工人之间建立永久联合会的愿望。约一年后，在1863年7月22日，伦敦工人组织了一次声援波兰革命者的公众示威，几个有组织的法国工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再一次提出了工人在国际上联合起来的主张。

这个问题在这一次引起更多的关心，大会组织者决定为运动的实际创立立即采取步骤。

于是以鞋匠奥哲尔为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准备了致法国工

人呼吁书。呼吁书语句雄辩有力，特别着重指出劳工市场国际竞争的祸害。呼吁书执笔者论证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国家的工人被充分组织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或缩短工时，他们就遭到雇主雇佣廉价的外国劳工的威胁，只有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组织起来才能消灭这种祸害。”

呼吁书产生了非常有力的效果，法国工人立刻选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伦敦递交他们的答复。

正是为了欢迎法国代表团，才在圣马丁堂召开了前述的大会。

非常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初期活动的比斯利教授担任主席，法国代表团团长亨利·托伦宣读了他的同胞对伦敦呼吁书的答复。这个答复实际上是无条件地赞成英国人采取的态度。

经过相当热烈的讨论，大会选举了一个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个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暂时实施到协会下次代表大会举行时为止。

这个委员会后来增加到五十个委员，各国委员人数如下：英国二十一人，德国十人，法国九人，意大利六人，波兰二人，瑞士二人。

被指定提出一项组织章程和原则宣言的小组委员会提供了两个草案：一个是著名的意大利爱国者玛志尼起草的，另一个是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起草的。后者被全体一致接受。

这个草案规定以原来形式参加第一国际的各国全国劳工组织继续存在，并成立一个总委员会管理协会的国际事务。

总委员会由参加第一国际的各国代表组成，它的职责是：作为各国工人之间的桥梁，仲裁劳工组织间的一切国际争端，经常向成员报告各国工人运动发展情况，编纂和发表国际劳工统计和其他有用的消息等等。

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力的话说，第一国际是“一个包括欧洲和美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工人的协会，它向工人自己，也向资本家和各国政府具体地表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使工人阶级得安慰和鼓励，使它的敌人害怕。”

纲领或原则宣言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根本主张的简要解说；它从来没有被第一国际修改，并已为几个社会党通过作为它们的全国纲领。

我们转载它的全文如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

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的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下面署名的委员会委员,根据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所作决议赋予的全权,采取了必要的步骤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

他们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①

第一国际的事业活跃时期约有八年之久,即从 1864 到 1872 年,它的力量 and 影响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达到高峰。

第一国际的组织是颇为松弛的,几乎不可能对任何时期它的参加人数作稍微精确的估计。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当时最广泛和最有影响的工人组织。它在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荷兰、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士、波兰以及在澳大利亚和美国有许多支部。

欧洲的报纸开头还认为第一国际的存在是一种笑话,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5—16 页。希尔奎特在摘引时没有“鉴于上述理由,……来创立国际工人协会。”这整个一段。——译者

久就对该组织的发展表示震惊，并向这个“对有组织社会的欧洲巨大威胁”发起了扑灭运动。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眼中，第一国际成了一个拥有自由支配的无尽资源的枝叶广布的秘密团体，忙于在欧洲各国阴谋发动即将出现的政治革命。他们发表和散播了关于第一国际的势力和行动的最虚构和最荒唐的故事，把当时几乎一切重大的劳工斗争以及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件的责任都转嫁到它身上。

然而，第一国际决不是一个阴谋团体，它对欧洲政治和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纯粹是道义性质的。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了各国工人间更密切和更和谐的关系，在于它的代表大会的慎重商讨。主要欧洲国家的劳工组织往往派最有才能的思想家和最有影响的领袖出席这些代表大会，它们总共有六次，其地点和日期如下：

日内瓦	1866年9月3日至9日
洛桑	1867年9月2日至8日
布鲁塞尔	1868年9月6日至13日
巴塞尔	1869年9月5日至11日
海牙	1872年9月2日至7日
日内瓦	1873年9月8日至13日

出席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从六十人至一百人不等，他们注意的问题包括：罢工，缩减工时，最低工资率，女工和童工，合作社工业，工会，直接税，常备军，出版自由，失业者，机器及其影响，分工，国家的职能，社会服务，运输交通工具，惩罚权，工人阶级对战争的态度，土地所有制，工人的不满，继承权，工人的互助和信贷，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以及工人运动别的许多重大问题。代表大会上的讨论通常是彻底的

和有教益的，第一国际就这些问题通过的决议对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是极其宝贵的贡献。

卡尔·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第一国际的领导人，他的政策和主张在这个组织中保持无可争辩的支配地位，到了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首次出现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这个反对是由著名的革命无政府主义提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领导的。

巴枯宁是十九世纪中叶暴风雨般的政治气氛所产生的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似乎是精力充沛、口若悬河和大胆勇敢的，但同样也是野心勃勃、缺乏定见和三心二意的；甚至在他逝世二十五年多以后的今天，关于他的性格和动机的极其矛盾的故事还很流行。他是俄国高等贵族家庭的子弟，青年时代专攻德国哲学。他同1848年以前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一切革命运动都有关系，在1849年萨克森起义时被派负责保卫德累斯顿。他被捕并被宣判死刑，由于奥地利和俄国以它们有优先执行权为理由相继要求引渡而保全了性命。他被引渡给俄国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从那里逃跑，于1860年抵达伦敦。他那无休止的活动从这时起分为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和一个标新立异的革命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1868年，他创立“民主社会主义国际同盟”——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团体，这个团体有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组织，其目的是要摧毁当前一切形式的政府和工业，实行以自治的农业和工业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制度。1868年，“同盟”申请作为一个团体加入第一国际，但是这个申请被总委员会拒绝了，理由是“同盟”的主张同第一国际的主张是不相调和的。这时两个组织之间进行

紧张激烈的争执，到了1872年第一国际召开海牙代表大会时，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结果西班牙、比利时和汝拉的联合会退出第一国际而加入“同盟”。同时，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会址从伦敦迁往纽约。

第一国际的主要执行机关的远离工人运动中心，实际上等于宣告它死亡，但象马克思和其他主张采取这个措施的人那样锐利的策略家，肯定是会了解这一点的。这个步骤是经过慎重考虑而采取的。

第一国际在其经历的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到了衰老无用的时期；它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各国工人阶级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统一起来，而这个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鉴于各国工人运动的规模日益增长，要第一国际正式的组织继续存在已经办不到了，并且鉴于巴枯宁及其党徒对它施展种种阴谋，要它继续存在也是危险的。

二、第一国际和“全国劳工同盟”

第一国际对美国工人运动是通过两个不同途径发挥其影响的：主要是出身外国的公开的社会主义者通过在我国各地成立的支部组织和它直接发生联系；土生的美国工人运动主要通过全国劳工同盟这个媒介而接受第一国际的鼓动。

我们先叙述全国劳工同盟。

南北战争刚结束，强大的工会运动就在美国发展起来。几乎各行各业都有新的地方组织和全国组织出现，但是在这些组织之间还没有共同的联盟。

把美国有组织劳工的力量统一起来的问题经常在运动的

领袖中间讨论，机工和铁匠联合会在 1863 年的年会上终于采取主动，指派一个委员会“请其他全国的和国际的工会任命同样的委员会，受有全权同它们商谈成立一个全国职工大会”。可是，在运动的若干著名人士为了重新考虑这个提议于 1866 年 3 月在纽约举行预备会议之前，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其他工会的响应。预备会议发出定于同年 8 月在巴尔的摩举行代表大会的邀请，于是举行了代表大会。这是一次真挚热烈的工人会议，有六十多个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指派委员会提出关于代表大会所讨论的各个问题的决议案，对这些决议草案的辩论常常是很剧烈的。

在这些辩论方面，拉萨尔派的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施累格尔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非常有趣的。施累格尔是芝加哥德籍工人协会的代表，他最先提出成立一个独立的劳工政党的问题。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是雄辩的有说服力的。他特别说：“一个人民的新政党当它刚开始活动时必然居于少数；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时间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将使我们赢得胜利；要是我们不愿牺牲时间和发挥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就不配获得胜利。一个由美国劳工组成的新政党必须成立起来。我们不敢同旧的政党进行斗争，但这是不应当的。如果我们的主张是对的，那就让我们坚决干下去。自由土地党最初只得到几千张选票，但如果沒有该党的成立，林肯就永远也不可能当选美国总统……政治问题是一个在投票箱上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这里解决。”代表大会虽然沒有立即采取趋向于成立劳工政党的步骤，施累格尔的热情奔放的呼吁却给了代表们深刻的印象，而代表们全体选举他当

副主席就足以证明他们“赏识他的见解和能力”。

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述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后不到两星期在日内瓦举行，这两个代表大会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果在许多方面十分相象，使人认为二者是按照一个共同的和预定的计划行事的。两个代表大会都讨论了工会、罢工、女工和童工以及合作社工业问题，全国劳工同盟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虽然不及第一国际分析性和科学性强，但是和它大体上是一致的。更加明显的是，两个组织在缩减工时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相似的。全国劳工同盟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如下：

“决议：在目前，要把我国的劳工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头一件要做的大事，是制定一项法律使美利坚合众国各州都以八小时为法定工作日制。我们坚决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达到这个光荣的目的。”

第一国际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如下：

“把缩短工时有法律固定下来，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它，一切想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和最后把它解放出来的努力，都会归于失败。这对于恢复工人阶级——占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健康、体力和精力是必要的，正如对于使工人阶级获得发展智力以及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是必要的一样。因此，代表大会建议以八小时为法定工作日制。美国工人现在正普遍要求缩短工作日；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

但是，两个代表大会的记录的相似只能用大西洋两岸工人状况的相似来解释，在其他方面两个组织当时是没有联

系的。

全国劳工同盟第一次提到第一国际的存在是在1867年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远比第一次为多，代表人数超过二百人，并且由于注定一个时期要在该组织的理事会中起极其重要作用的人物——威廉·西耳维斯的出席，人们增加了对它的活动的注意。

西耳维斯对我们现在论述的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在这里对他的一生只作简单的叙述是不适当的。

威廉·西耳维斯于1828年11月26日生于宾夕法尼亚州阿尔马村，是日工货车制造工人的次子。父母非常贫穷，无力供他上学，他十七岁时受雇于一个叫波林先生的人，做一种家庭的和普通的农业工人。波林首先教他字母。他十八岁学习翻砂，1857年参加当时成立不久的费拉德尔菲亚铸工联合会。从这时起到逝世西耳维斯一直积极地参加工会运动。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的同业工人进行任何规模的事业或斗争，西耳维斯必定站在运动的前列，他的名字同这个时期工会历史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都是分不开的。

1859年，根据西耳维斯的建议召开了铸工全国代表大会。他又是代表大会发表的告美国铸工书的执笔人。

告铸工书是一个简洁有力的文件，是一个出色的证据，说明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虽然没有值得一提的教育上的优越条件，却有非凡的才智和口才。

告铸工书说：“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候，那些占有资本的人总是利用资本来垄断特殊的实业部门，直到把世界上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工业都置于占人类相当少数的人的直接控

制之下为止。”

告铸工书又说：

“我们美国工匠在社会上将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将得到足以相当独立地和体面地维持我们的生活、取得用以教育我们孩子的手段并使他们有资格在世界的戏剧里演出的我们劳动的等值物吗？还是必须被迫向资产者屈膝，辛辛苦苦地劳动而得不到一点利益，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悲痛的生活，没有丝毫理由可以使人相信那些把我们绑在我们悲惨的命运上的种种说法？”

西耳维斯连续当选全国联合会的司库和主席，在这个组织的锐气遭到战争激情的严重挫折之后，它那艰巨的改组工作又落到他的肩上。他的兄弟叙述道：“在这一时期，西耳维斯的衣服总是穿到破旧不堪无法再穿为止；他用到临终那天的一条围巾洞眼累累，而这些洞眼是他到陌生城市去恳求他们组织起来的翻砂工人杓子里溅出来的星星熔铁烧坏的，他不止一次地被迫要求乘一辆机车到处旅行，因为他付不起旅费。”^①

西耳维斯的非凡努力获得了成功的光荣，在短短时期内，全国铸工联合会成了我国最强大的和最兴隆的劳工组织之一。

西耳维斯积极和出色地参与全国劳工同盟的成立，但是他因病未能出席该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在1867年芝加哥代表大会中起了重要作用。西耳维

^① 他的兄弟詹姆斯·西耳维斯：《威廉·西耳维斯的生平、演说、工作和文选》，费城1872年出版。

斯再次提出成立独立的劳工政党的问题，他以惯常的那种条理分明的措辞和意气风发的精神倡导这个方案，但是多数代表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下决心赞成这样激进的步骤，因此这项提议以相当接近的票数被否决了。

会议还讨论了和欧洲的第一国际建立正式联系的问题，同盟主席杰塞普和西耳维斯坚决拥护这个主张，而后者在前次曾就这个问题说了如下的话：“此刻，斗争正在旧世界进行着，其结果将是千百万被奴役的人从社会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还用得着我问全世界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吗？……工资平衡应当在全世界建立起来，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外国的伟大改革运动表示同情和关怀。他们的胜利将是我们的胜利；他们胜利的消息将传到大西洋此岸；美国工人将把胜利呼声从缅因州传到加利福尼亚州。”

可是，代表大会决定不参加第一国际，这个问题是通过如下的决议解决的：

“鉴于欧洲工人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为了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为了从过去和现在所受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作的努力，是促进正义、教化和文明的可喜证据；

“决议：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兹声明同情欧洲有组织的工人们反对政治和社会不公平的斗争，并保证在这个斗争中给予合作。”

全国劳工同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868年8月在纽约举行。这时，该组织的人数、影响和权力已经大大增长，一些职业政客已经能够钻进它的理事会。

但是，这次代表大会的领导人西耳维斯，他的得意主

张——成立独立的劳工政党——终于实现了；全国改革党在会议许多代表的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宣告成立。

西耳维斯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并且也由他起草了纲领。这个文件模仿独立宣言；它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劳工的权利，并以很大篇幅讨论了凯洛格和西耳维斯受其影响的绿背纸币党^①所说的货币改革。

这时在西耳维斯面前打开了新的和富有成效的活动领域，他以他的通常的热情和精力着手建立新政党的工作。不管在我国什么地方举行的任何大大小小的劳工会议，几乎没有一次不收到这位不倦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信件或传单。

他在一份传单中宣称：“为了获得对国会和若干州议会的控制而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工人的政党——是一项巨大的工作，然而这个工作能够完成并且必须完成。我们过去很长时期一直是一切政党的职业政客的工具；现在让我们断绝和一切政党的关系，组织一个以诚实、经济和人人权利和特权平等为基础的工人的政党吧。”

他在另一份传单中说：

“我国人民正划分为两个阶级——富人和穷人，生产者和非生产者。

“我国的劳动人民——白人和黑人，男子和妇女，正在沦于农奴的境地。即使在现今，在我们的国土上还存在着比旧的奴隶制度更糟糕的奴役。”

^① 正式名称为独立党，反对减少绿背纸币的发行量，也反对除国家发行的纸币以外的其他一切纸币。它于1874年11月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1878年并入国民党。——译者

自从劳工改革党创立以后，西耳维斯一直和欧洲的第一国际的重要成员通讯，并且有力地现代社会主义方面发展。他在那时前后给总委员会的信中写道：

“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贫穷对财富的战争。我们上一次战争的结果发展了一个臭名昭著的金融贵族。这个金融力量正在迅速地毁灭人民的力量。我们正在对它作战，希望获得胜利。”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对这些提议立刻作了回答。1869年5月，它写给全国劳工同盟一封公开信，我们援引其中的一段如下：

“在我们给林肯先生重新当选美国总统的贺信中，我们表示我们的信念是：南北战争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如独立战争对资产阶级的发展曾经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一样。

“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的胜利结束，确实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纪元。在合众国，独立的工人运动从此兴起来了，对此，旧的政党和职业政客们完全不是以赞成的目光来看待的。”

继这封信之后，正式邀请全国劳工同盟派代表出席第一国际定于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下一次代表大会。

全国劳工同盟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间的另一个桥梁，乃是美国的德籍劳工组织。

在1866年，纽约市若干德籍工会就已经组织了一个中央组织“工人同盟”，两年后该组织开始创办同名的报纸《工人同盟报》，该报在德籍工人运动中逐渐产生很大影响。

当劳工改革党创立时，《工人同盟报》加以支持，但同时它

刊载了第一国际的会议活动的报道，并渐渐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当阿道夫·多威博士主编该报时情况尤其是如此。

多威有着变故颇多的经历。他于1819年生在德国阿尔滕堡，受过良好的教育，并献身于他选择的教师职业。他积极参加了1848年革命，被捕受审，并被下狱，1852年他侨居得克萨斯州。他在圣安东尼奥办了一家小报，编写、排字、印刷和销售都由他自己担任而没有外界任何帮助，以致他往往不得不每周工作一百小时。该报致力于废除奴隶制运动，因此它的编辑常常受到暴徒的迫害和虐待。经过三年的斗争后，多威不得不离开圣安东尼奥，但是得克萨斯州的黑人因他忠于他们的事业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对他念念不忘。1868年，他收到一份在第一版头条用大号铅字登载的下面的通告：

“本报由黑人编排，是用多威博士当初在得克萨斯州提倡黑人解放时所用的同一架印刷机印刷的。让我们以此来表示有色人种对他的感激之情吧，他们是不会忘怀他们争取自由的努力的。”

在以后十年中，多威在波士顿、霍博肯和纽约又从事他的中断了的教育工作，直到1868年被推举担任《工人同盟报》编辑。后来，多威成为美国马克思社会主义重要代表者之一，并且是1878至1888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最受尊重的成员之一。可是，《工人同盟报》不过是他在实际工人运动中事业的开端，他对一切问题还没有形成十分明确的看法。他在同一时期对全国劳工改革党政纲的支持和对第一国际原则的拥护往往被批评说是前后矛盾的；可是，即使这样，他的报纸对建立两个运动间的友好关系作了重大的贡献，当德籍工人总协

会于 1869 年 2 月参加全国劳工同盟时，这些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因此，全国劳工同盟和劳工改革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即将召开，完全具有在全国劳工同盟和第一国际之间确立联合关系的希望，但是朝这个方面发展的趋势突然遭到意外事件的挫折——西耳维斯在短期患病以后于 1869 年 7 月 27 日逝世。

一般说来，个别人的生死对巨大的社会或政治运动没有什么重要关系，然而在一个新兴的运动到了岔口关头，群众没有教育、没有经验，而易于被引向任何方向的时候，一个头脑清醒、干劲十足和忠心耿耿的领袖的逝世则是重大的打击。无疑，这就是西耳维斯的逝世对全国劳工同盟此后事业的影响。第一国际对这个损失的充分估价从总委员会的唁电得到证明，唁电最后这样说：

“美国工人运动不取决于一个人的存在，那是肯定的，但现在劳工代表大会由于西耳维斯逝世而受到的损失无法补偿，这同样是肯定的。大家的目光都转向西耳维斯，他作为无产阶级大军的一员大将，除了他的伟大才能外，还有十年的经验——而西耳维斯与世永别了。”

它的领袖的过早的去世是对全国劳工同盟发展的致命伤。

西耳维斯没有在该组织的队伍中留下一个有足够才智和能力的继承人，把第一国际的实质和精神——劳工利益的特殊性——灌输进这个新兴的运动，美国的德籍社会主义者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简直微不足道，不能指导它的政治方向。

在全国劳工同盟于 1869 年 8 月在费城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派一名正式代表参加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卡梅伦当选代表，出席第一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在那里他大大夸张了他所代表的组织的力量，但他再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讨论。

全国劳工同盟在西耳维斯去世后继续积极和第一国际通讯的唯一著名成员是杰塞普，并且也是他在该组织于 1870 年 8 月在辛辛那提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使下面的决议获得通过：“全国劳工同盟宣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短期内加入协会。”

但是全国劳工同盟从没有加入第一国际，从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政党。

全国劳工同盟此后的命运，以及劳工改革党此后的命运，是工会在全国劳工同盟前后成立的一切独立的政党的共同命运。它一获得相当可观的力量，就遭到职业政客的侵袭，他们使它卷入到同其他政党联合的纠葛中去；它的纲领渐渐被冲淡，它的阶级性被湮没，它的本来面目被弄得模糊不清，它终于消失在一个占优势的政党之中。

此外，一系列失败的罢工加速了全国劳工同盟的瓦解，削弱了美国工人运动。1871 年 1 月，运动的领袖们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讨论竞选的计划。鉴于产业工人方面对运动的兴趣日益减退，全国劳工同盟决定在政纲中采纳一些农民的政纲来争取农民的同情。这个修改的结果是，最强大的工会退出了全国劳工同盟，当它在同年 8 月在圣路易举行一年一度的代

表大会时，只有二十一个代表出席会议。象乌鸦嗅得尸体的气味一样，职业改革家聚集在这具政治尸首周围。这次是温德尔·菲利普斯和本杰明·巴特勒主持这个从前强大的和有前途的劳工组织的葬礼。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乃是中产阶级改革家惯常贩卖的货色。此外还作了两次使运动复活的努力，为此于1873年在哥伦布和1874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两次代表大会，但是这些大会没有唤起工人阶级的兴趣或热情，全国劳工同盟终于消亡。

三、第一国际在美国

美国最早和第一国际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是1868年左右诞生的。它们是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的一些小团体，成员差不多全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称做国际工人协会“支部”。

在纽约，运动是由1867年12月发出的定于1868年1月在鲍威里街日耳曼尼亚会厅召开群众大会的通告创始的。在通告上署名的是卡尔·艾伦伯格、卡姆普、克腊林格尔和佩特尔森，他们都是德国劳工界的有力人物。参加大会的人很多。

经过对政局的充分讨论之后，会议决定组织独立的劳工政党，于是成立了纽约及附近地区社会党。

该党通过了介于第一国际原则宣言和全国劳工同盟纲领之间的一种折衷的政纲，任命了两个执行委员会——一个操英语的，一个操德语的——共同组成党的政治竞选委员会。社会党单独提名一个候选人参加1868年的选举，但是它获得的选票似乎是十分微不足道的。

紧接在它的这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竞选运动之后，

该党就解散了，它的一些最活跃最有才智的成员组织了德籍工人总协会。

这是美国国土上具有一些力量和影响的第一个纯粹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并且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近阶段是从该协会的创立开始的。

左尔格叙述道^①：“会员差不多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雇佣劳动者，他们争相研究最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协会 1869 到 1874 年的数百名会员中，几乎没有一个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他们当中有十几个人已精通最深奥的章节和定义，武装起来以抵抗资本家、中产阶级、激进派或改良派的任何攻击。”

1869 年 2 月，德籍工人总协会被接纳加入全国劳工同盟，命名“纽约第五劳工同盟”。它派了代表出席全国劳工同盟 1869 年和 1870 年的两次代表大会，但在 1870 年代表大会后不久便退出了该组织。

1869 年秋季，协会加入第一国际，称作“纽约第一支部”，在第一国际整个历史中，它一直是第一国际在我国最强大和最可靠的支部。

第一支部同我国的一些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保持积极友好的关系，并对第一国际的其他美国支部的成立起了帮助作用。

1870 年，第一国际法国人支部在纽约成立，同年秋季成立了波希米亚人支部。

^① 左尔格：《美国工人运动，1867—1877 年》。载 1891—1892 年《新时代》第 13 期。

1868年，德国人支部在旧金山成立，一年后芝加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成立了第一个支部。

1870年12月，第一国际的三个纽约支部在总委员会指导下成立了美国临时中央委员会，这个运动开始取得显著的进步。第一国际在“菲尼安同志会”^①领袖奥多诺范·罗萨于1871年抵达纽约时对他的热烈欢迎，为自己博得了许多爱尔兰人的同情；同年巴黎公社的覆灭把许多激进的法国人赶到我国，在这里他们受到第一国际的热烈欢迎；该组织由于积极支持这年的许多罢工而终于能够扩展到美国工人队伍中去。

这些罢工中最重要的是持续了六个多月和席卷了三万多人的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工的罢工。

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第一国际飞跃发展起来。在大约一年之内，支部的数目从六个增加到至少三十个，它们分布的地方包括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新奥尔良、纽瓦克、斯普林菲尔德、华盛顿和威廉斯堡等城市。登记的会员总数约五千人，他们是美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波希米亚人。左尔格在他的上述文章中说：“国际工人协会那时已经盛极一时。”报纸用大量篇幅刊载它的记录，公众集会上讨论它的主张和方法，甚至美国国会也相当注意它的举动。国会议员、后来在克利夫兰政府担任首席检察官的霍尔，在关于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劳工状况的辩论过程中，用赞成的口吻大量援引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通过的一些决议。

^① “菲尼安同志会”是1856年在美国纽约成立并于翌年扩展到爱尔兰的秘密组织，其成员主要为爱尔兰人，目的在于推翻英国人在爱尔兰的统治。——译者

然而，这个突享盛名的运动遭到了厄运。

形形色色的改革家打进了第一国际，各人都想利用这个组织来宣传自己特有的社会学说。在这方面特别引起麻烦的是纽约美国人支部之一的第十二支部。这个支部被维多利亚·伍德赫尔和田纳西·克拉夫林两姐妹所控制，她们是有文化和有钱的，然而对许多问题抱着很特别的看法，这些看法她们都在自己的杂志《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出来。

在这两位太太的领导下，第十二支部和继它之后的第九支部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美国人的”运动来反对“外国人的”运动，并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妇女权利、自由恋爱等方面。

第一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在一项正式文件^①中抱怨说：“第十二支部终于开始私自向美国操英语的公民发出要求他们加入的呼吁，这个呼吁之所以著名，就在于它荒唐地企图把劳工运动以外的一切凭空想出来的争论意见归诸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名称看来甚至都不适合该支部的口胃，因为在那个相当长的呼吁书中简直没有提及。”

这个举动引起老的支部的不满。第一支部要求暂时开除第十二支部，这个要求得到多数的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支部的支持。美国人支部、两个德国人支部和多数的法国人支部都站在第十二支部一边，结果第一国际组织分裂了，第一支部及其支持者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委员会。

双方都向伦敦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提出自己的不满，后者于1872年3月就这个争论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第十

^① 《告美国工人书》，1872年，纽约。

二支部被暂时开除，两派的行政委员会奉命联合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直到下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而这个代表大会将规定第一国际美国人支部事务管理的明确规章。争执于是告终。第十二支部继续独立存在了一个时期，但是它的行动变得非常荒谬可笑，以致失去了它对第一国际中前支持者的一切影响。第十二支部经历中的最后活动是召开定于5月11日在纽约阿波罗剧院举行的全体“美国男女”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按照通告举行，在讨论包括采用世界语问题在内的各种改革之后，以提名维多利亚·伍德赫尔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并提出其他候选人名单而告结束。

第一国际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872年7月6日在纽约市举行。二十二个支部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大会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并通过了一套事务管理规章。

该组织的行政职能授与一个叫联合会委员会的九人委员会，被选出的头一年的委员会由三个德国人、两个法国人、两个爱尔兰人、一个瑞典人和一个意大利人组成。

规章还规定，凡在将来成立的支部，其成员至少应有四分之三为雇佣劳动者，并责成所有支部“同工会保持良好关系，鼓励它们组织起来”。

约在同时，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地址从伦敦迁往纽约，这给了美国运动以新的激励。海牙代表大会给总委员会选举了十二个委员，其中四个是德国人，三个是法国人，两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瑞典人，一个是意大利人。弗·阿·左尔格任总书记领导总委员会，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负责

的和伤脑筋的职务。他是德国 1848 年革命的老战士，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友和同事。他于 1852 年抵达我国，由于他的老练、能干和熟悉劳工问题，他不久便居于我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前列。

他是在美国的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在创建新的支部并指导它们的活动方面一向都很积极，他的名字同这个时期运动的各方面都有突出的关系。在运动的后来发展中，左尔格是不怎么积极的，目前他在新泽西州霍博肯过着多少有点隐退的生活。

在上述情况后的一年中，第一国际的历史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件。一些老的支部解散了，一些新支部成立了，整个来说，该组织仍然是稳定的，如果不是有点停滞的话。

但是到次年年底，该组织由于和我国普遍的劳工纠纷发生关系而再次特别引起公众注意。

1873 年北太平洋公司的倒闭造成了美国差不多是空前未有的财政和工业恐慌。所有工业中心居民的贫穷愈来愈严重，特别是在严冬，据估计仅纽约一州就有十八万多工人毫无生计。发起了热烈的救济失业者的运动，纽约市的德籍社会主义者站在运动的前列。第一国际的官方机关报《工人报》刊载了包括下面三点的救济失业者计划：

一、公共事业雇佣失业者。

二、对于凡是需要救济的人，贷给他们至少维持一个星期生活的现金或食物。

三、暂停执行驱逐拖欠房租的房客的一切法律。

接着第一国际的一些支部和一些美国工会在库柏讲习

会^①会所举行联合群众大会，并选举一个执行委员会受命在运动中采取它认为有利的进一步的步骤。

在这个委员会的安排下，举行了若干次公众集会，并向市长递交了救济请愿书。

当鼓动达到高潮时，安排了定于1874年1月13日举行的失业者游行形式的大规模示威运动。委员会原来的计划是游行队伍将在市政厅前解散，但是这个计划被当局取缔了，因此汤普金斯广场乃被选择为第二个最好的示威地点。

游行队伍在指定时间组成。从全市四面八方来的成群结队的工人在进发中加入了队伍，当人流到了汤普金斯广场的时候，它就扩大成为浩浩荡荡的行列。

没有马上就要发生麻烦的迹象；游行队伍秩序井然，平安无事，预料市长会向示威群众讲话并提出救济办法。

但是示威游行一到汤普金斯广场，大批警察就不问青红皂白，不加警告，拔出木棍围打群众，在以后的大混战中有几百个工人受了重伤。

有些人因而被捕，“肇事者”以反抗警察的罪名受到严惩。

汤普金斯广场事件使纽约工人群情激昂。

大约在同一时间，芝加哥举行了规模相似但结果没有那样悲惨的示威游行。当1873年的经济恐慌再次把该市投入无法形容的贫穷境地时，它还只是正在从著名的大火灾的恐怖中恢复过来。

第一国际的芝加哥各支部和一些别的劳工组织共同发起

^① 库柏讲习会于1859年由彼得·库柏在纽约市创立，向工人阶级传授应用科学和艺术。——译者

了类似纽约的救济失业者运动。1873年12月21日，运动领导者安排了据说有五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用五种语言发表了讲话，选举了一个八人委员会把大会的要求提交市参议会。为了保证促起市参议员的更大注意，决定派一群失业工人保护代表团。

次日，芝加哥城呈现了一个极其惊人和意料不到的景象。傍晚，成群结队的工人在指定的地点集合，排成队伍。全芝加哥好象就要站起来，当八人代表团带头的游行队伍向目的地出发时，浩浩荡荡的队伍有二万多人。看上去似乎没有指挥者或领导者，但是整个队伍的秩序十分良好，并且整个游行队伍看上去比早一天晚间随便集合的一群成分混杂的工人更像是训练良好和纪律严明的军事组织。

这次示威游行对市参议会产生了影响：后者答应尽力依从失业者的要求，并邀请代表团于次日就该问题举行会谈。没有履行这些诺言，示威游行没有产生实际结果，然而运动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有二千多党员的伊利诺斯劳工党。

合众国其他城市特别是费城、辛辛那提、圣路易、路易斯维尔和纽瓦克也爆发了类似的事件，第一国际的成员积极参与了这些城市失业者的鼓动工作和示威游行。

1874年4月11日，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在费城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不是在非常顺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刚才叙述的工人运动最近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关于第一国际将来奉行什么政策的激烈争论。大部分成员，其中有些是最活跃的分

子,主张多注意国内工人运动而少注意外国工人运动,主张从宽解释第一国际的规章,以便让它同按照科学意义不能划作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中的分子进行合作;另一方面,比较老的和比较有影响的成员则坚决主张完全保存第一国际旧的原则和方法。

在芝加哥,这些争论的结果是成立了一个敌对的社会主义政党,即上述的伊利诺斯劳工党。在纽约,若干支部由于同样原因退出了该组织,并在几个月后组织了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

在这种情况下,象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出席费城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寥寥无几的。只有二十三个支部派了代表。会议提议将联合会委员会的地址迁到费城或巴尔的摩,但是这两个城市都不愿接受这个送上门来的光荣,因此代表大会结束时决定完全取消这个机关并把它职能交给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为了防止总委员会滥用权力,任命了一个监督委员会,有权调查和转达对该组织正式行动的不满意见。

第一国际对在美国的政治行动的态度用下面的决议来说明:

“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争取,

“北美联合会大会决议:

“北美联合会拒绝与有产阶级所组织的政党进行一切合作和发生一切关系,不论他们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或独立党人,或自由党人,或工业互济会员,或农民互济会员,或改革者,或他们可能用的任何别的名称。因此,凡联合会会员

都不再可以做这种政党的党员。

“联合会的政治行动一般限于努力获得有利于工人阶级本身的法律条例，并且始终如一地使工人政党同有产阶级的一切政党划清界限。

“在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而发挥可以看得见的影响之前，联合会将不参加真正的政治运动或选举运动，而且首先是对自治市、镇或市(市区)发挥可以看得见的影响，这个政治运动可以按照情况并始终依据国会的决议从那里转移到更大的社会(县、州、合众国)。”

1874年代表大会未能使第一国际适应于美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并且，尽管它的会议记录表面上颇为和谐，它却没有能够消除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

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在1873年创办的第一国际正式机关报《工人报》编辑管理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左尔格及其支持者对该报经营方法表示不满，提出一些改进建议。该报编辑卡尔对这个批评表示愤慨。争论愈来愈激烈而变成人身攻击。

到这时为止仍是第一国际最强大的组织的纽约第一支部支持卡尔，声称把该报当做它自己的报纸，任命了由十个人组成的警卫队保护它的财产，免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侵犯。

后者立即反击，暂时开除该支部。接着，这个问题控告到法院，《工人报》停刊，第一国际队伍的分裂变成总分裂。

但是，如果说第一国际在美国的进展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它在欧洲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自从总委员会地址由伦敦迁到纽约时起，它在欧洲不过是名存实亡罢了。

1875年，决定取消预定该年举行的第一国际代表大会。

新的总委员会在当时发出的一项通告中抱怨说：“我们协会的状况从日内瓦代表大会以来每况愈下。只同苏黎世和伦敦多少有点定期联络，同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保持松弛的联系。在所有从前的联合会中只有北美联合会还存在，而且即使这一个联合会的存在也因为内部意见分歧而受到重大损害。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我们的成员和支持者正遭到这样程度的迫害，甚至连其中最忠实的人也渐渐有点胆怯，被迫放弃同我们的直接联系。”

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费城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同第一国际在全盛时期的大统一形成了凄惨的对照：只有美国的十个代表和一个被认为是代表一批德国成员的名叫奥托-瓦耳斯特尔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考虑使这个从前强大的国际工人组织继续虚有其名地存在下去；因此，这个组织不得不正式解散，代表们立刻着手执行这个可悲的任务。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被撤销，该组织的档案和文件交给弗·阿·左尔格和卡·斯派尔保管，由他们移交将来组成的任何新的国际工会。这次代表大会在休会前通过了下面的宣言：

“工人同志们：

“在费城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已经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该组织的对外关系已不复存在。

“‘国际消亡了！’各国的资产阶级又会这样叫喊，并且还

会以嘲笑和欢欣的态度指着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说它是世界工人运动失败的证明文件。让我们不要为我们敌人的喊叫声迷惑住了！我们放弃‘国际’的组织，是由于目前欧洲政局所使然的，但是在我们看到该组织的原则已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进步工人所承认所维护的时候，我们觉得已得到了补偿。如果我们给欧洲工人同志们一点时间去加强他们的国内事务，他们一定会能够立刻铲除存在于他们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之间的障碍。

“同志们：你们已经以真诚热爱的心情接受了‘国际’的原则；你们会设法甚至在沒有组织形式的情况下扩大热爱该原则的人的圈子。你们将争取到一批愿意为实现我们协会的目的而工作的新战士。美国的同志们向你们保证，他们决心忠实地保卫和珍视‘国际’在这个国家所已经获得的成就，一直到更有利的条件将再度把各国的工人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那时将空前嘹亮地再度响彻这样的呼声：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一国际的这个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预言已经实现。十三年后，一系列光辉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出席的有来自欧洲二十个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九十五名代表。

四、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

在上一节中，我们会顺便介绍了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的成立。该党是1874年上半年退出第一国际的几个支部与纽约、威廉斯堡、纽瓦克和费城的一些激进劳工组织共同于

1874年7月4日正式创立的。

该党通过一个简明的纲领和原则宣言，一年后作了修改，原文如下：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努力建立一个以劳工为基础的
自由国家。凡本党党员保证尽力拥护下列原则：

“一、废除当前不公平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二、取消一切阶级统治和阶级特权。

“三、废止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采用合作劳动来代替雇
佣制度，以便每一工人都能获得其劳动的全部价值。

“四、取得政权作为解决劳工问题的先决条件。

“五、全体工人联合斗争，联合组织起来，个人严格服从为
了全体幸福而制订的法规。

“六、同情为达到同样目标而奋斗的各国工人。”

党的事务管理授与由五个委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由九
个委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首任书记是纽约烟
草工人斯特拉塞，一个非常机智和精神奋发的人。他在本时
期我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则完全献身于
工会运动。

随着第一国际在美国失利，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就得势
起来。

1875年7月4日、5日和6日三天在费城举行了第二次
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很多。若干新的成员已经加入了该党，
其中有些是十分积极的组织者和有才能的宣传鼓动者，例如：
麦圭尔，后来任木工联合会总书记多年；帕森斯，后来成为无
政府主义者，在1886年芝加哥惨案中起了显著作用；希林，雄

辯演说家和芝加哥劳工界有相当影响的人物。

该党在那时前后还在纽约创办了英语周刊《社会主义者》。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行动是通过一个决议，命令执行委员会尽力把我国所有社会主义组织组成一个联盟。

于是在 1875 年秋季在纽约市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会议的有：麦克唐奈和克朗伯格，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独立的操英语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联合工人”，曾经加入过第一国际；斯特拉塞、麦格雷戈、杰·斯派尔和汉森，他们代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一国际操德语的支部的代表左尔格、贝尔特兰德、莱布和黑塞，法国人支部的代表著名的伊加利亚主义者和巴黎公社参加者索瓦。

会议没有获得明确的结果。在这同时，全国劳工同盟分散的残余分子集结起来作最后努力以复活他们的运动。在《国民论坛报》编辑和曾为全国劳工同盟总统候选人的约翰·戴维斯的倡议下，为了组织一个新的劳工政党而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定于 1876 年 4 月 17 日在匹兹堡举行。美国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建议中的代表大会是加强他们的运动的好机会，他们各派和各组织的代表通过协商于代表大会前夕在匹兹堡举行了会议。

出席这次全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的有政治面貌极其复杂的一百零六名代表，但会议被其中的社会主义者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他们约二十人，在言论和行动上团结一致，见解明确，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见解。

由于代表大会无结果而闭会，这个胜利没有实际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对社会主义运动是有收益的——在匹兹堡集会的各社会主义团体一致赞成组织一个同盟的计划，并且为了执行这个计划安排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于1876年7月19日至22日在费城举行。

参加代表大会的单位和人员如下：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它有会员六百三十五人，代表是弗·阿·左尔格和奥托·魏德迈耶；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它有党员一千五百人，代表是斯特拉塞、麦圭尔和加布里埃尔；伊利诺斯劳工党，它有党员五百九十三人，代表是康泽特；辛辛那提社会政治劳工联合会，号称有会员二百五十人，代表是查尔斯·布朗。

费城自由德国人公团、辛辛那提斯拉夫社会政治劳工同盟和密尔沃基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被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理由是他们各自的组织未曾参加匹兹堡会议。代表大会的工作一开始就把参加会议的几个组织正式合并成一个政党，叫美国工人党。

这个新党设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该委员会受五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全国委员会设在芝加哥，监察委员会设在纽黑文。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以前办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被宣布为新党的正式机关报，分别改称《劳工旗帜》和《工人呼声》。伊利诺斯劳工党在芝加哥出版的《先驱》仍沿用旧名，也成为该党的正式机关报。

麦克唐奈被选为《劳动旗帜》的编辑，康泽特为《先驱》编辑，《工人呼声》编辑部原班人马不动，而多威则任上述三个刊

物的副总编辑。

美国工人党通过的纲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了科学的和多少有些抽象的阐述。

1877年12月，在新泽西州纽瓦克举行的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的名称改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第三章 社会主义工人党时期

一、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达二十多年，它的变化多端的经历构成美国社会主义史中最错综复杂最有趣的部分。

乍看起来，它仿佛是一连串互不相干的事件，考虑不周的政治实验，突然的政策改变，不适当的联盟，内部和外部的斗争，一系列很难加以说明的盛衰，既没有可以看得出来的进步，也没有明显的收获。

但是，这种混乱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只要作一番仔细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贯串该党表面上迂回曲折的进程的逻辑线索，并且可以找到说明它的全部表面上无计划的行动的充分理由。

横阻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道路上的障碍是异乎寻常的。作为我国创立最早的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它曾经不得不应付一切激进改良运动在其历史开始时所出现的常有的逆境——它自己队伍内部的软弱和胆怯，来自外部的敌视和嘲笑。

但是，除去这些自然的障碍之外，社会主义工人党还碰到一个严重的不利情况、特别是它自己的不利情况的损害。在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是在本国人民中间兴起的，能够非常

机械地和毫不费力地适应各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但是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据估计，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我们所叙述的时期至多只有百分之十的党员是美国本国人。其余全部，包括党的最积极和最有影响的领袖在内，都是出身外国的人，他们对于所归化的国家的制度、风俗和习惯了解不够，对它的语言本身往往一窍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的先驱者很快认识到，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在我国实行激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工作是没有希望的，从此以后，他们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使运动适应美国工人并把它交给他们去进一步加以发展。使社会主义运动“美国化”的努力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整个历史上活动的主要方针。

只有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受到社会主义宣传之后，运动才能“美国化”，这一点是十分明显，无可争辩的：重大的问题是如何最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宣传。

这个问题始终是党内讨论得最热烈和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它形成了党的政策，决定了党的行动，是党的一切斗争的主要原因。

在实地观察了美国的制度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发现两条主要的道路——工会和政治活动，通过这两条道路他们可以希望有最大的成功机会去接近本地工人。

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有时居于工会运动之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工会运动，有时两个运动同时发展并被看作是互相必要的补充，就整个来说，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完全一致的。

在美国，工会运动兴起于社会主义运动之前，社会主义工

人党还刚进入全盛时期。1878年，劳工协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开始了它的显著发展时期。三年之后，工会和劳工协会联合会创立，它后来发展成为美国劳工联合会。

在以后几年中，几十万美国工人不仅参加了许多没有联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会和地方性工会，而且也参加了这两个组织。他们的纲领往往是激进的，在许多方面明显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在他们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中，他们讨论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在屡次发生的罢工中，他们正在受到对资本进行积极斗争的锻炼。因此，难怪社会主义者把工会看作是他们的天然同盟军，他们尽力使两个运动彼此发生密切的联系。

社会主义工人党几乎在历次代表大会中都声明它赞成工会的目的和方法，号召党员参加本行业的组织；该党好几次试图派代表直接参加有组织劳工的中央机关；它的正式机关报支持工会，在许多重大罢工中社会主义者都站在罢工者方面，协助、劝告并有时指导他们进行战斗。但是，尽管作了这些努力，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工会运动的影响在很长时期还是微不足道的。到那时为止，社会主义者人数还非常少，不足以象他们希望的那样渗入派别众多的工人运动并决定它的路线，党内也常常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它在工会中的活动是浪费时间。

这些异议在工业萧条时期变得特别猛烈，那时工会的效率大大受了损害。在这样的时候，该党往往对工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另外，只要工会由于一阵繁荣而显露头角，党就恢复它在它们中间的活动。

该党在政治范围内的盛衰也是同样有很大变化的。

社会主义者始终认为政治是他们运动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的问题按其性质来说是政治的问题；社会主义者认为夺取政治机器是实现他们社会理想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他们相信可以用立法手段纠正经济弊病，最后，他们认为竞选运动是重大的教育因素，是在全体居民中间传播新的社会理论的绝好机会。

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德国的社会主义者走上政治舞台已经约十年了，并且已经能够把五十万左右的选民团结在他们的旗帜下；在美国，由于它政府的形式比较民主，选举又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和经常举行，这些机会就更有诱惑力。但是如何着手进行呢？在这一问题上，这个阵营分裂了若干年。一派主要是党内美国本国人和一些前拉萨尔分子，他们始终主张进行积极的和独立的政治活动，而其他的人则认为党的力量薄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极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因而提出意见，主张等党强大到足以在选举中大显身手的时候再参加政治活动，或者同其他现有的改革政党进行合作，力求尽可能把社会主义学说灌输给后者。随着这个国家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是这一派的主张就是那一派的主张在党内占了上风。

一个时期的工业萧条所造成的一系列劳工纠纷，往往产生有利于提出激进的改良政策的情绪，党常常或者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或者就同一个改革政党进行合作，如果上述的情绪已经使这样一个政党崛起的话。在有些地方和有些时候，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单独或者和它的政治同盟军合作在选举中

获得相当多的选票，但是它没有办法继续争取和保持它的收获。一个新的繁荣浪潮会来到这个国家，不满的心情会平息，因此社会主义者的选票也会随之消失。

在这种倒楣的情况下，甚至连社会主义者当中最坚定最乐观的人也有时被气馁的情绪所屈服，而意志较弱的那些人不是完全退出公众生活，就是在工会运动或老的政党的队伍中寻找比较平静的安息所，这是不足奇怪的。

正是在社会主义者阵营极其凄凉的时期，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美国隐隐出期了。无政府主义由于它否定一切社会进步规律，嘲笑改良措施，宣扬暴力破毁——作为一般绝望哲学的无政府主义——对这个时期沮丧的和不满的社会主义者具有特别的迷惑力。这个新的主义大有可能深深侵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队伍，毁坏这个年轻组织所取得的不管多么小的进步，使它在美国工人心目中名誉扫地。这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增加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任务，它有好几年不能专心从事促进它自己的运动的工作，而要转移力量来同这个新的敌人作斗争。

双方都无情地进行了这场斗争，只是当无政府主义失去对美国工人运动的一切影响时斗争才告结束。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种种实验、挫折和斗争，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或由其所引起的宣传方针和方法上的频频改变，自然不能不对党员彼此间的关系发生影响。每一种新的实验都引起关于它的得失的激烈争执，每一次新的失败都引起关于它的原因的纷纷辩论，并且这些争论都是以新信仰或新学说的信奉者所特有的那种认真态度进行的。有时，这些内部争论一

连几个月载满党报各版，而党的其他一切工作便暂时看不见了；有时，这些争论是没有必要那样激烈地进行的，并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有时，这些意见分歧超越纯争论的范围而发展为分裂，有好几次使党分裂成为两派。

因此，人们一再说，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是一伙动辄发脾气的个人，他们把时间浪费在互相攻讦上，对他们的事业几乎没有贡献。

没有比这意见更不公平的了。

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负起使社会主义运动适应我国情况的任务时，他们就着手进行一项非常困难和规模巨大的事业。

在任何别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无与伦比的逆境面前，他们勤勤恳恳地从事自己要做的工作大约整整一代之久。他们内部的斗争不过是他们同敌对环境作重大奋斗的自然反应，那是可以容易谅解的；他们的勇气、坚忍不拔和忠于事业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钦佩。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完成了伟大的使命。通过他们的试验和失败，他们改进了社会主义活动的工作方法，通过他们不断的宣传鼓动，他们为真正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该党不幸的是过了它能发挥作用的时期以后还继续存在，它的残余分子给运动带来刺耳的不调和的旋律，但是这一点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作了我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开拓工作，其所以有现今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上应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经历

(一)早期的胜利和失败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相当顺利的情况下揭开它的历史的。最初是南北战争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惊人的工业活动，紧接着发生了1873年的金融大恐慌。这次恐慌的严重阶段在几个月后就过去了，但是金融萧条持续了整整五年，造成了我国居民空前未有的贫穷。大工业城市不仅个人而且全家饿死的事件，警察局每周都有报告。1877年冬季，各警察分局每晚都挤满了想要躲避露天寒冷的工人群众及其家属，警务法院被哀求送往救济院的男女和儿童所包围。估计美国失业者至少有三百万人。同时，在业者的工资逐年减少，1877年工资的空前低微引起工人反抗，于是一系列的罢工发生了。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与其说它是有计划的和经过慎重考虑的行动，还不如说是绝望的爆发；时间选择得不当，群众没有加以组织和训练，罢工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从规模和斗争的激烈程度来说，这一系列罢工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员工的罢工。

南北战争刚结束，修筑铁路就成了投资和金融投机颇受欢迎的形式。1867到1877年，铺设了约二万五千英里新的路轨，1877年全国铁路估计资本约为五亿美元。这些铁路的建筑往往全凭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预期而没有参考运输的实际需要。因此，当1873年的经济恐慌袭来时，铁路受到的影响比任何别的工业大，而受害最严重的则是职工。1873到1877年，铁路工人的工资平均减少了约百分之二十五，1877年6

月主要的几条干线宣布再削减百分之十。

正是为了反抗最后这次减低工资，罢工才爆发的。第一次冲突于7月16日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斯堡发生，但是运动很快就蔓延开来，不到两个星期便遍及十七个州。

最先停工的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机器工人和扳道工人，这条铁路的机车工人和其他职工立刻参加了他们的行列。铁路的经理部门很快就能找人填补罢工者的空缺，但是当新手试图开车时，他们被武力阻止了。州长派遣的两个州民兵连无力应付局势，海斯总统调往斗争现场的二百五十名正规军也收不到更好的效果。

然而，西弗吉尼亚州没有发生严重的混乱，但是在同时爆发罢工的马里兰州，一连民兵遭到罢工者和同情他们的群众的怒骂和嘲笑，这很快就变成积极的袭击。民兵遭到投掷过去的各种东西的猛攻，他们向群众放排枪进行报复，结果打死十人，受伤的人更多。这次开枪引起了暴动；民兵队被击败，铁轨被拆掉，车厢被烧毁。

同日，即7月19日，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沿线出现了一系列的骚动。在那里，运动是由扳道工人发动的，他们罢工反对实行“双车头火车”制。在这一天中，该铁路所有其他服务部门的职工都参加了他们的行列，罢工者这时不但要求取消“双车头火车”制，而且要求收回最近一次削减工资百分之十的决定。

傍晚，匹兹堡的一切货运都告中断。成群结队的罢工者在该城街道上游行，许许多多的失业者和不满的劳工迅速扩大了游行队伍。群众的举动每小时都变得越来越带有危险

性，警察局长征召的地方民兵队拒绝干涉，从费城调来了六百名民兵。但是他们的来到只使群众的激昂情绪火上加油。接着敌对的双方展开了短时而猛烈的战斗，战败的民兵退却到铁路公司的机车库，筑起路障以防止罢工者的猛攻。那里他们在愤怒的群众威胁的叫喊声中和穿过窗户的噓噓子弹声中度过了很不安的一夜。次日清晨他们离开匹兹堡，在撤退途中没有停脚，直到他们抵达离该城约十二英里的克莱尔蒙特。

群众这时是局势的无可争辩的支配者，他们对铁路公司长期郁积的仇恨，由于他们刚和民兵队战斗而变得炽烈起来，就发泄在疯狂破毁公司财产的突击上面。据说一天之内他们就毁坏了一千六百个车厢和一百二十辆机车。

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斯、密苏里等州各地也发生了性质差不多同样严重的骚动。

在宾夕法尼亚州雷丁，派出大队民兵和罢工者战斗，但在这里发生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事情。

民兵连的大多数人都是工人，他们和罢工者公开表示友爱，把武器弹药发给他们，并且扬言要调转枪口对付所有敌对的民兵。然而，一个差不多完全募自有产阶级的由一位鲁莽的军官带领的民兵连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十三人，打伤了二十二人。这个无理行动的后果是激起了罢工者及其同情者的愤怒；吵吵嚷嚷但态度温和的群众变成了疯狂的和危险的暴民，货车被拉出轨道，车厢被破坏，桥梁被烧毁。敌对的民兵受到虐待，其中大多数只好脱掉军服，换上便衣，设法逃离该城。

可是，其中最特别的是圣路易发生的事件。那里，激昂的情绪蔓延到劳动人民的各个阶层。连接东西圣路易的桥上交

通停止，东部和西部各州间的一切交通往来从而被切断；屠宰场和工厂关了门，罢工者占领了全城。社会主义者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选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来保护工人的利益。始终谁都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究竟是哪些人。它似乎是一个由碰巧来参加讨论的人组成的相当松懈的组织。它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它的活动只限于把该城的一切工业冻结起来。

但是，普遍的愤激情绪十分高昂，使得这个不明不白的委员会确实控制了该城整整一星期。只是在普遍的不安和激昂情绪稍微消退时，市政府在圣路易“居于领导地位的公民”的协助下才振作起来采取一些行动。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以对抗执行委员会，前者在全市警察和几连民兵的协助下终于包围了舒勒党的执行委员会总部，迫使造反者投降。在袭击中有七十五人被捕，但是不得不把他们全部释放，因为他们似乎不过是同这次造反毫无关系的游民和爱管闲事的人。失魂落魄的“执行委员会”从此就无影无踪了。

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参加 1877 年劳资纠纷的鼓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忽视在激愤的群众当中宣传他们理论的大好机会。他们没有高估罢工的重要性，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运动不过是劳资斗争中的一个暂时的局面。他们反对不必要的暴力行为，在由他们召开的许多群众大会上，他们几乎一贯地谈论无计划暴动的徒劳无益，以及工人阶级采取有组织、有理智的行动的必要性。

该党决定在费城召开两次群众大会“以平静温和的态度讨论悬而未决的劳资争端，并对罢工者表示同情，然而着重声

明反对对财产进行任何破坏”。

新泽西州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瓦克和帕特森举行了几次群众大会。在布鲁克林，当地的社会主义者召开的一次有二千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声明赞成把铁路收归公有。

在纽约，该党在汤普金斯广场和库柏讲习所主持召开了两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参加前者的整整有一万二千人。约翰·斯温顿用英语向大会发表了讲话，亚历山大·约纳斯和奥托·瓦尔特用德语发表了讲话。大会通过了对罢工者表示同情的决议，决议最后声明说，“成立一个以工人天赋权利为基础的纲领、以制定反对压迫人民的垄断资本的法律为目的的政党”，已成为必要的事。

在芝加哥，罢工鼓动是在 1876 年统一代表大会后不久组织的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直接监督下进行的。芝加哥鼓动者中的领袖是党的全国书记菲利普·范·帕顿、市委员会主席希林和帕森斯。

但是，党的活动决不限于它在罢工期间的鼓动。这个时期的许多劳资纠纷和人民的普遍贫穷状况已使工人阶级的思想比以前更易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者力图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利用形势。在所有大的工业中心，安排了示威游行，发表了宣言，举行了街头集会，党的一些最有口才的演说家——麦圭尔、帕森斯、萨瓦里和其他许多人——开始作全国广泛的和有系统的演说旅行。多种文字的社会主义报纸在美国各地出版。1876 至 1877 年，创办了直接或间接支持该党的至少二十四种报纸。其中八种是英语报——一种日报，即圣路易《明星报》；七种周报，即纽约的《劳工旗帜》、波士

顿的《工人投票》和《回声》、密尔沃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辛辛那提的《解放者》、底特律的《社会主义者》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时代》。德语报有十四种，其中至少有七种是日报，即芝加哥的《芝加哥社会主义者》和《芝加哥人民报》、圣路易的《西部人民呼声报》、路易斯维尔的《新时代》、费城的《费城日报》、纽瓦克的《前进报》和辛辛那提的《俄亥俄人民报》；一种一周出三期的《芝加哥工人新闻》；六种周刊，即纽约的《工人呼声》、辛辛那提的《俄亥俄工人》和《自由旗帜》、芝加哥的《新时代》和《先驱》、密尔沃基的《前进》。

波希米亚人有一个周刊《工人周报》，在克利夫兰出版，党的斯塔的纳维亚党员在芝加哥出版一种瑞典文周刊，名叫《新时代》。

党在当时有利条件帮助下开展的生气勃勃的活动产生了良好结果；该组织在党员人数和影响方面有迅速的增长。

1877年12月26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一个支部的三十八名代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地址从芝加哥迁到辛辛那提，范·帕顿再度当选全国书记。代表大会所产生的主要转变是关于政治行动的转变。1876年统一代表大会曾认为这个新组织的党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宣传，并按这种想法制定了它的纲领和组织章程。纲领强调经济斗争高于政治斗争，组织章程没有就党或其分支机构的政治行动作出规定，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一个单独的决议明白要求“党员和一般地要求全体工人暂不参加选举，暂不理睬投票箱”。

但是，从那时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迅速发展

和它在投票箱上获得的意外胜利，向社会主义者证明了政治活动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并且产生了赞成政治活动的反应。党在政治组织的基础上加以改组，它的纲领和组织章程作了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也就是在上述的这次代表大会上，党的名称由美国工人党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

党在次年一直有增无减地继续发展，1879年初党在二十五个州约有一百个单独的“支部”，登记的党员总数约一万人。但与此同时，我国工业状况已在酝酿着另一次变化。工业萧条时期渐渐过去，接着是一个繁荣时代。全国工厂复业了，新的工业部门设立了，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工资上升了。前两三年曾使工人那样易于感应社会主义呼吁的普遍不满情绪迅速消失了，社会主义鼓动家发现在他们从前受到热情群众包围的地方只有稀稀疏疏和漠不关心的听众。范·帕顿悲叹说：“被掠夺的劳动者正被迅速地拉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正拒绝倾听理智的呼吁。他们为了代价巨大的物质享受正在出卖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为了贪图眼前的小利而抛弃未来解放的希望。”

那时党还年轻而无经验，它掌握自己党员的能力还相当薄弱。随着繁荣的回潮，它迅速解体了，它的领袖们企图遏止瓦解趋势的努力简直没有什么效果。它的党员人数减少了，支部解散了，报纸因缺少读者而宣告停刊。据说在1877年纽瓦克代表大会时存在的八种英文党报中，到了1879年没有一种出版。党在1878年5月创办了一种新的英文机关报《全国社会主义者》，付出重大的牺牲才维持了一年多。在德文报纸中，《费城日报》和《工人报》、芝加哥的《先驱》是仅有的几种经过

大难而尚能幸存的报刊。

可是，在 1878 年初，党的出版物由于一种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利益的德文日报《纽约人民新闻》的创办而得到显著的加强。该报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最有本领和最有经验的新闻记者组成的编辑部以非凡的才干编辑的，编辑部的成员包括已在前面提到的亚历山大·约纳斯和多威，还有俄国贵族出身、曾在德国和英国受过教育的有口才的演说家和才气横溢的作家谢维茨奇。多威逝世后，接替他的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人——赫尔曼·施留特尔，他是东西半球社会主义运动的老战士，现在仍主持《纽约人民新闻》的编辑部。

《纽约人民新闻》从出版的第一天起就居于我国社会主义报界的领导地位，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保持这个地位。它的英明判断和慎重态度帮助党安全地渡过它历史上初期的许多危机。

1879 年 12 月 26 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城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二十个支部的二十四名代表。大会没有正式报告党员总数，但肯定是非常少的。据后来麦圭尔在 1881 年瑞士库尔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报告说，约有二千六百人，据斯特拉塞估计，只有一千五百人^①。

全国书记关于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语气颇为凄凉。代表大会决定建议在纽约市创办一种社会主义日报《联合报》；它把美国疆土分为四个地理的“鼓动区”，

^① 参看《萨尔托里乌斯·冯·华尔特斯豪森传》，第 162 页。

以便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将党章作了一些细小的修改，并把大部分的时间用于讨论关于党参加 1880 年总统选举的问题。

就整个来说，阿勒格尼代表大会对振奋运动的日趋颓丧的精神没有多大成就。1880 年底和 1881 年初，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好几批德国政治流亡者的来到而增加了一些实力。这些流亡者多数曾积极地参加过他们祖国的社会民主运动，因此是 1878 年反社会主义法案开始镇压社会主义者的时期被德国政府流放出来的。他们受到大西洋此岸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安排了欢迎他们的一些公众集会。

1880 年 8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维登堡代表大会上，为了把党在反社会党人法下受迫害的状况告知德籍美国工人，并为了即将来临的德国国会选举征募基金，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两个社会民主党议员、有声望的演说家弗里切和路易斯·维雷克被遴选担任这个工作，他们于 1881 年 2 月抵达美国。他们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热烈欢迎，而且受到一些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们在纽约、波士顿、纽瓦克、费城、密尔沃基、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向热情的听众发表了讲话。一般说来，他们的大会提供了普遍宣传社会主义的机会，会上的英语致词往往穿插着他们的德语讲话。因此，这些德国代表的鼓动旅行虽然是为了不同的目的，却产生了使当地社会主义运动复活起来的效果。

但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活不过是暂时的。这两个德国鼓动家刚离开这个国家的海岸，新吸收的党员就渐渐减少，党又陷于从前的静止状态。1881 年 12 月，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在纽约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十七个支部的约二十名代表，其中多数来自纽约和布鲁克林，不是作为地方支部的代表，就是作为其他支部的代理代表。没有处理重要事务，全国书记惋惜地报告说，美国社会主义者多数都没有入党。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斗争变得愈来愈艰巨：群众对社会的满足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似乎是难以克服的，没有吸收新的党员，而老的党员垂头丧气，大批地退党。

可是，使党的地位更加朝不保夕的，是那个时期出现在美国工人运动地平线上的新的和咄咄逼人的幽灵——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二)同无政府主义进行的斗争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样起因于对现今社会组织的批评，在谴责现行社会和经济制度方面是一致的。

但是，这两种社会理论的相似之处只止于此；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们是彼此直接对立的。

社会主义意味着集体的社会组织高于个人，而形式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则意味着个人彻底脱离社会。这种对社会和个人各自权利和作用的根本不同的概念，造成了两派社会理论的一切分歧。

社会主义者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个人不过是为整个组织担负不同职能的个别器官，并反过来从整个组织的福利中获得力量。一个健康的和井井有条的有机体——社会的或生物的——是这样——是一个组织，其中每一器官都达到其最大限度的个别的正常发展，充分地尽其一切有用的职能。另一方

面，只要一个或几个器官的职能行使过度而其他器官保持静止，这个有机体的平衡就会被打乱，有机体本身就会失常和发生毛病。社会主义者认为当前的社会国家有严重缺陷，其特点就是缺乏应有的社会平衡；他们关于人类文明的理想是建立合作共和国，即保持这样的社会国家，其中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都组织在合理的和科学的基础之上，要求每个个人在其自己的范围内作出应有的一份贡献，并且保证给每人以发挥其一切才能的平等机会。

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是许多独立个人的一种纯粹无机的集合体。他们认为最高度的发展状态是个人的绝对自主，认为社会对绝对的和不受束缚的个人自由所施加的一切约束是人类文明中有害的和反动的东西。他们认为国家是抑制公民个人自由的专横机关，并且憎恶一切政治和法律，把它们看作是对自由发挥个人意志和兴趣的许多不必要的障碍物。无政府主义者指责当前的社会国家，不是因为它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谋全体公众的福利，而是因为它组织得过分了。他们的理想国家乃是多少有点按照傅立叶主义法郎吉的路线，为了生产和交换而自由地、松弛地组织起来的许多由个人组成的自治团体的总体。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对生产和工业作有系统的调节，信赖供求关系自由活动的自然结果。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管理和社会限制，非常相信人性是天生善良的，并深信不疑地预言：现有人为的社会机关和政府机关一旦废除，一切罪恶就会绝迹，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就会自动建立起来。无政府主义者憎恶多数原则，认为它是最坏的专制形式，并且指出：我们人类历史上极为有用的革新通常都是

经过同多数人的激烈斗争才被采用的。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立的行动策略和方法，不过是它们实际应用对立的社会哲学的结果。

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设想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一方面承认它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并受一定的社会学法则的支配。他们不承认社会有彻底改造的可能性，除非有了一系列社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相应地逐渐转变而为这种彻底的社会改造准备了可能性。他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是个人。他们对社会革新的希望是建立在他们所看到的现代工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希望靠大部分人民的一致努力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相信工人阶级将是社会改造中的首要因素，因为这种改造的好处更加直接符合这个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致力于使广大工人准备负起这一任务的工作。

他们力图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宣传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来启发工人对阶级利益的觉悟。在工人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方面，他们看到了对现行工业制度罪恶开始不满的征兆，他们鼓励工人，竭力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哲学。社会主义者认为政治是形成、表达和坚持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有力手段，因此他们主张工人阶级采取社会主义路线的政治行动。社会主义的口号是教育和组织，它的武器是宣传、同工会合作以及投票箱。

可是，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哲学的观点来看，这些行动方法是极其无聊和缓慢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不承认人类社会的有机性质，一方面否认它的循序渐进的和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全世界的人民随时都准备实行最激烈的革命，为

胜利完成这些革命所需要的不过是甘愿为被压迫人民的幸福冒生命危险的少数意志坚决的人士。勇敢的革命者也许得不到多数人民的支持或同情，这没有什么关系：人民的绝大多数决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在成功地作了一件勇敢高尚的业绩以后，他们才会表示欣赏。无政府主义者论证说，一切伟大的革命都是由极少数人完成的，一切巨大的公共利益都是强加于人类的。

和这些观点相一致，无政府主义者斥责政治行动是无益的闹剧，反对工会和社会主义者改善工人阶级现状的一切努力，认为压抑工人对现状的不满从而推迟革命乃是反动的措施。他们的努力方向是在穷人中间散播反抗的种子，同他们认为应对一切社会罪恶负责的各国高官显要进行个人的战争。他们的武器是“言语的宣传”和“行动的宣传”。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从英法派的个人主义哲学推断出来的极端的然而也是必然的结论。赫伯特·斯宾塞的理论和约翰·莫斯特的理论不过在程度上有点差别，在性质上则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系统论述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人是法国的改革家和经济学家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他在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第一次提到这个新的社会理论，在其主要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中则更详细地发挥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体系。^①

米哈伊尔·巴枯宁稍稍修改并推广了这个体系，我们在叙述第一国际的历史时会提到他的名字，晚近这个体系的主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柏林出版。

要宣传者是克鲁泡特金和约翰·莫斯特。他们各对这个理论增添了一些内容，并且相继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虽然所有这些作者的根本前提是相同的，他们从这些前提得出的结论却很有差别，人们常说，有多少无政府主义作者，就有多少无政府主义体系。对这些体系最新的贡献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一种想把极端个人主义原则和集体主义原则结合起来的相当笨拙的企图。

在巴枯宁鼓动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曾经相当流行；在德国它几乎是默默无闻，因为一般地说有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即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地方是最没有市场的。

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最早的征兆同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初显露的衰微迹象大约发生在同一个时候。早在1879年阿勒格尼代表大会上，就已经看出党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在这以前不久，芝加哥和辛辛那提的社会主义者创立了几个叫做“教育和防卫协会”的工人军事组织。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反对这些组织，理由是它们会给人造成一种它们具有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的虚假印象。范·帕顿向代表大会报告说：“由于它们打着红旗并自承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公众就认为社会主义者决心要用武力来达到他们不能靠选票达到的目的了。”全国执行委员会公开否认和这些军事组织有任何关系，要求所有的党员退出这些军事组织。

这些工人军事组织的发起人对执行委员会的这种干涉表示愤慨，当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们提出不信任后者的动议。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这个动议被微弱的多数通过。

可是就整个来说，代表大会与其说是被激进派控制，还不如说是被温和派控制的，前者很快就公开显出对党的领导机关不满。1880年11月，党的一些纽约支部^①的若干党员退出了组织，成立了一个“革命同志会”，该会通过了一个基本上仿效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但穿插一些激烈的无政府主义词句的纲领。运动的领导人是老拉萨尔分子、前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威廉·哈塞耳曼，他在其祖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曾起过杰出作用，当时来到纽约不久。这个新的运动的其他著名人物是贾斯特斯·施瓦布和巴克曼。类似的革命同志会不久就在波士顿、费城和密尔沃基兴起。但是芝加哥的一些同志会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们的领导人是保罗·格罗特考、奥古斯特·斯皮斯和帕森斯。

1881年10月，革命同志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它们创立了“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

这个新的运动的性质到这时为止还是相当模糊的；它在色彩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和直言不讳的无政府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它缺少一位能够把它纳入明确途径的有充分力量 and 影响的领袖。不久就发现约翰·莫斯特是这样的领袖。

约翰·莫斯特于1846年生于德国奥格斯堡，是一个穷尉官的儿子。五年之久的疾病、永久毁伤了他的面容的手术、残酷的继母、后来他从其学徒的更加残酷的雇主，是充满这位未来无政府主义宣传家童年时代的不愉快的事件。他受的学校教育极少，但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在年青时代周游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在瑞士他和第一国际发生接触，热切地

^①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地方部门或分部叫“支部”。

采纳了它的理论，并且从那时以来就积极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革命运动。

1869年夏季，他因在维也纳发表煽动的演说被判一个月徒刑。次年，他参加组织一次争取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以叛国罪被捕，判决有罪，处以五年政治犯徒刑。可是，几个月后他被赦免，又几个月后他被驱逐出奥地利。在以后的七年中，他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并于1874年和第二次于1877年当选为代表克姆尼茨区的国会议员。在这个时期他服过两次徒刑，都是为了发表暴动性的演说，1878年，在反社会党人法制定后不久，他被驱逐出柏林。这时莫斯特定居伦敦，在那里他开始出版《自由》周刊。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渐渐背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越来越倾向于革命的无政府主义。

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暗杀时，莫斯特在他的《自由》周刊上发表文章，赞扬这个行动，并号召别人仿效。因为发表这篇文章，他受到英国法院审问，被处十六个月苦役徒刑。在服满徒刑后不久，莫斯特便到了纽约。

对革命同志会的会员或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的人们来说，莫斯特不是平平常常的新将。作为一个有力的和有名气的演说家、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一个事业的“殉道者”，他是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沮丧颓废分子汇集在暴动和破坏旗帜下的理想人物。

为了欢迎他而于1882年12月在库柏讲习所大礼堂举行的盛大群众大会，变成了迎接这个“资产阶级正义的牺牲者”的真正的凯旋式，他在1883年上半年周游我国主要城市的宣

传旅行象是一次胜利的行军。参加他召开的集会的人很多并且很热烈，这些集会受到报纸广泛的评论，由于他的鼓动创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小组”。

1883年10月，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匹兹堡举行了联合代表大会。参加代表大会的有二十六个城市代表，其中包括莫斯特、斯皮斯和帕森斯。收到了从美国许多地方寄来的和从法国、英国、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无政府主义小组寄来的贺信和声援信。代表大会成立了所有社会革命小组和无政府主义小组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国际劳动人民协会”。这些小组的行政仍然保持自治，并且为了小组间的联络成立了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总“情报局”，但它无执行权力。

可是，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通过一个原则宣言，这个宣言此后以“匹兹堡宣言”闻名，并且至今还被看作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解释。

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本身一样，这个原则宣言是许多并不总是前后一贯的因素的特殊混合物。

独立宣言非常奇怪地穿插着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互不相容的理论以及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据说运动的目的是“采取一切手段，即采取有力的、毫不容情的、革命的和国际性的行动，来摧毁现有的阶级政府”，并且以“各生产组织之间自由交换等价产品而不让经纪人和投机者夹在当中”为基础，来建立工业制度。

匹兹堡代表大会以及莫斯特和其他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接二连三的演说旅行产生了影响。

无政府主义成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激进派、特别是它的操德语部分的一支力量。“小组”逐年增加，它们的成员也不断增多。《自由》周刊销路扩大，前社会主义报刊中的一些报纸如芝加哥《工人报》和《先驱》背弃社会主义营垒而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还创办了几种新的无政府主义机关报。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削弱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已经衰败了的队伍。许多党员对他们最近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感到沮丧，对社会主义宣传的缓慢的方法最后获得成功感到失望，他们愿意倾听无政府主义者的否定一切的方便理论，于是许多支部相继脱离该党而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分子共命运。

188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减少到一千五百人左右，它的领导者不得不竭尽全力来防止进一步的侵害。

接着在《自由》周刊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机关报《公报》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个争论的进程中，后者拿出了非常认真的精神，前者则用了相当多的机智和技巧。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如果《自由》周刊在论证方面不是始终占最有利的地位，那么它多半是后发制人，并且一般地说是更加成功的论战者。

任全国书记六年多的菲利普·范·帕顿在这场斗争中被击败，对党的总趋势感到沮丧，绝望地放弃了战斗。1883年4月22日，他突然失踪，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宣布他想自杀。可是后来发现，这封信不过是一种策略，企图转移他从前的同志们的注意而不去追究他的行踪；事实上，范·帕顿已经寻找到了一个更安宁和报酬更多的公务员的生活。在此时刻失去了

范·帕顿的领导是对我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严重打击。范·帕顿是名门出身的美国人，受过良好教育，是十年如一日地积极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他非常热情，忠心耿耿，但决不是有魄力的和孚众望的领袖。使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极大挫折的，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消失，还不如说是他的引退所产生的精神影响。一个叫施奈德的人继范·帕顿任全国书记，当前者于1883年10月辞职时，雨果·伏格特当选接任到预定于12月召开的党的下次代表大会为止。

当这年上半年社会革命党人在匹兹堡举行代表大会时，社会主义工人党曾被邀派代表参加，但全国执行委员会拒绝了邀请，声明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基础。

然而，匹兹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要比预料的温和得多，似乎为联合行动提供了一点基础。匹兹堡代表大会创立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到这时为止还不是纯粹无政府主义的组织，而是各种派别的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组织的联盟。代表大会的讨论结果刚一发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就发出了要同这个新组织联合的呼声，既然该党完全瓦解了，要求联合的呼声就普遍起来。1883年12月，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些著名党员毅然正式提议该党和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合并。这个提议是用书面致送芝加哥“小组”的，签名者有亚历山大·约纳斯、亨利·埃姆里奇、乔治·勒尔和莫耳肯布尔。执笔者论证的犀利之处就是谈到两个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如何明智以及它们的见解如何相似。他们声称：“读了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在匹兹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除了也许某些带有反动色彩的

意思含糊的语句以外，我们在其中找不到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贯不同意的任何东西。”

收到了斯皮斯代表芝加哥“小组”写来的复信。该信对拟议中的联合没有表示丝毫的热忱，实质上是劝告社会主义工人党拆散成自治的小组，以便象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其他小组那样参加这个组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83年12月26日至28日在巴尔的摩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该党历来所召开的最凄凉的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六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四名来自巴尔的摩，十名来自纽约及其附近地区。

代表大会对党纲和党章作了一些修改，显然是想抚慰运动中比较激进的分子。取消了全国书记职位，缩小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给予支部以较大的自治权来管理自己的事务。除去党纲外，代表大会仿效匹兹堡大会的先例通过一项“宣言”。这个文件的语气比党以前任何宣言都激烈：建议把政治只作为宣传手段，并表示相信特权阶级决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权，除非用武力强迫他们这样做。代表大会向“社会革命党人”作了这些让步之后，以非常明白的语句开始说明它对直言不讳的无政府主义的态度。

代表们声明：“我们不同意那些认为炸弹是最好的鼓动手段的人的愚蠢想法。我们完全懂得，革命必须在人们的头脑中和工业生活中进行，然后工人阶级才能获得永久的胜利。”

代表大会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划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明确界限。那种多少有点含糊的“社会革命主义”的概念

迅速地声销影匿；运动的比较温和的分子如保罗·格罗特考回到社会主义工人党队伍中来，而极端分子则断然去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命运。

从此之后，放弃了一切和解的努力，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两个敌对的营垒之间只有斗争。

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报纸和无政府主义报纸登满了关于两个敌对社会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得失的争论文章，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辩论也是频繁的和很激烈的。

这些辩论中最著称的是保罗·格罗特考和约翰·莫斯特于1884年5月24日在芝加哥进行的一次辩论。这是旗鼓相当的论战，两个对手对辩论的问题同样都有很深的研究，并且都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和应答如流的辩论家。这次辩论是非常彻底的，几乎涉及到问题的一切方面。用速记作了报道，并以书籍形式出版^①，行销很广。

亚历山大·约纳斯、索伊伯特、瓦尔特和赖默约在同一时候所作的演讲旅行对该党也是相当有益的。旅行是党的执行委员会安排的，演讲者的特殊使命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演说者访问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既向社会革命同志会的一些集会也向公众集会发表了讲话，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弱点，并且劝告党员参加新的活动。与这口头宣传的同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持出版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散发了好几千份，大力进行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运动。

但这个时期党的活动决不是只限于对无政府主义的斗

^① 《保罗·格罗特考和约翰·莫斯特关于“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问题的辩论》，1884年芝加哥出版。

爭。进行了有系统的教育运动，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小册子和短篇这样的手段，1884和1885年至少卖了十六万份。

这种重新开始的活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稳步发展。1884年3月，党约有三十个支部；在以后两年中，增加了一倍。先后创办了三种英文的党报——纽约的《人民呼声》、纽黑文的《电讯晚报》和旧金山的《旧金山真理报》，但是经过短时间的试办后全都被迫停刊。党的德文报中，《纽约人民新闻》和《费城日报》是仅有的幸存者，党创办的正式机关刊物德文周刊《社会主义者》由约瑟夫·迪茨根负责编辑。1885年10月5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辛辛那提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四十二个支部的三十三名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规定党的行动和加强它的组织。

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时已经从无政府主义的突袭下恢复了一点元气，但它决没有击败这个敌人。恰恰相反，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在过去两年里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加增强了很多。1885年，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约有八十一个有组织的小组，登记的会员共有七千人，它的报刊有七种德文的、两种英文的和两种捷克文的。

（三）芝加哥戏剧性事件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力在芝加哥，“情报局”设在这里，不仅帕森斯主编的英文刊物《警钟》，而且《工人报》、《先驱》和《火炬》都在这里出版。1885年年底，在芝加哥和近郊至少有二十个小组，成员约三千人。

当时造成特别有利于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基础的，是1884

年左右开始而持续到 1886 年的新的工业危机。象 1877 年一样，这个国家的大工业城市再次充满了大批贫穷和忿懑的失业工人，他们成为暴力宣传家热心的和感激的听众。

在这一点上芝加哥又居于领先地位。该城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分子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他们安排了 1884 年感恩节的大规模街头示威游行，《自由》、《警钟》和其他无政府主义报刊劝导它们的信徒武装起来，甚至发表了关于准备和使用炸药的详细指示。莫斯特当时写的题为《革命战争学》这本小册子中也有类似的指示，好几家无政府主义报纸都转载了并且流传很广。可是，这个鼓动到 1886 年才达到高潮。

1884 年，美国职工会联合会年会决定重新掀起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后来规定 1886 年 5 月 1 日为这个新制度开始实行的日子。当这个不祥的日子临近时，运动果断地阔步前进。全国各工会的会员增加了一两倍，纷纷成立了八小时工作制同盟，公众集会和劳工报刊热烈宣传这个问题。

在芝加哥，群情激昂达于极点。1885 年，乔治·希林和其他一些人发起创立了“芝加哥八小时工作制联合会”，芝加哥有组织劳工的主要中心组织职工大会立刻组成，无政府主义势力控制的一个较小组织中央劳工联合会继之诞生，于是运动不久就广泛扩展起来。

芝加哥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分子起初对运动极不关心，甚至大加反对，说它是和资本家的妥协，是毫无希望的和无益的战斗。但是当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发展到较大规模并成为劳工界人人注意的题目时，无政府主义者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而终于加以支持。帕森斯、斯皮斯、菲尔登、施瓦布和其他无

政府主义演说家成了八小时工作制集会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无政府主义者不但在他们的报刊上而且在这样的集会上往往乘机劝告工人在5月1日携带武器。首先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厂的正在罢工的工人当中发生严重纠纷。这些罢工者是2月被工厂“解雇的”，雇主和雇工展开了非常剧烈的战斗，这个战斗由于麦考密克工厂雇佣了至少三百名武装侦探保护受雇的罢工破坏者而更加激烈起来。5月3日，推木工人工会——麦考密克工厂多数被解雇的工人都是它的会员——在工厂附近举行群众大会，讨论了要向雇主提出的和解建议的条件。正如在斯皮斯的自传中所说的，当麦考密克工厂敲钟并看到工贼离开工厂时，他正在“异常沉着和温和地”向大会讲话。一群约一百五十个慷慨激昂的人退出大会，向工贼走过去。接着发生巷战，双方互相大扔石子。给警察局打电话告急，载满警察的囚车立刻疾驶到出事的街头。几分钟后，约有七十五个警察继囚车徒步来到，在他们后面还有三、四辆囚车。警察遭到石子的袭击，他们接着向群众放枪，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男女和儿童射击，打死了六人，打伤了更多的人。斯皮斯对这个暴行怒不可遏，赶回《工人报》报社，起草告芝加哥工人书，这个文件从此成为著名的《复仇通告》。

告工人书的标题是“复仇”，它号召工人武装起来为他们同志被“野蛮屠杀”而复仇。印了五千份英德两种文字的告工人书，在街头散发。号召次日晚在秣市举行群众大会，“纪念我们工人同志遇难”。约二千名工人响应了号召，斯皮斯、帕森斯和菲尔登讲了话。芝加哥市长卡特·哈里森害怕出事，出席了大会，后来他用下面的话叙述了发生的事情：

“斯皮斯先生演说的前部分有一段大概讲了一分钟，我担心它会引起我解散大会，但除此以外，那个演说还可以，所以我对邦菲尔德上尉说它是温和的。帕森斯先生演说的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关于资本给予劳工的报酬额的统计数字，如果我现在记得不错的话，这个数字说明资本得到的是百分之八十五，而劳工得到的是百分之十五。这种演说我是会说它是大声疾呼反对资本的激烈政治演说的。我回到警察局向邦菲尔德说：我想演说快结束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大概不会发生需要进行干涉的事情了，我认为他最好命令他留在其他警察局的后援部队回原地去。”

哈里森市长十时左右离开，大会当时实际上已经结束。由于阴云密布，预告暴风雨即将来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听众已经散去。菲尔登向留下的几百个群众讲了话。当一百七十六名警察突然奔来逼近这一小批群众时，他已讲了约十分钟话。小队长沃德上尉下令散会，菲尔登反驳说大会是平安无事的集会。这时从附近小巷里扔来一颗炸弹；它落在警察第一、二连之间，轰的一声爆炸了，炸死一个警察，另外炸伤许多人。双方立刻乱开枪，连续不断地约有两分钟之久；事情过后发现有七个警察被打死，约六十个警察被打伤，而工人方面有四人被打死，约五十人受伤。

谁扔了这颗引起暴行的炸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一般认为这个不幸事件是迈克尔·施瓦布的姻兄弟、一个名叫鲁道夫·施瑙贝耳特的人干的，但是秣市惨案发生后不久施瑙贝耳特逃跑了，他通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两次三番地否认和这个举动有任何牵连。也往往有人认为，

扔炸弹是遇难者的一个亲友对上一天警察暴行给以个人报复的行为，甚至也有人认为，这个怯懦举动是“秘密诱捕者”奉警察或资本家命令为了破坏正在那时达到颇为强大程度的八小时工作制宣传鼓动而干出来的。

虽然这样说，秣市事件的责任却转嫁给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大众对他们和他们的鼓动表示无限的愤慨。日报大声疾呼要求给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处以绞刑，所有工人集会都遭到破坏，《工人报》受到警察首脑的检查。秣市大会的讲演者以及《工人报》整个编辑部和排字工人立刻被逮捕。帕森斯没有被警察找到，他是自动投案的。5月17日，大陪审委员团开庭，对奥古斯特·斯皮斯、迈克尔·施瓦布、塞缪尔·菲尔登、艾伯特·帕森斯、阿道夫·费希尔、乔治·恩格尔、路易斯·林格、奥斯卡·尼比、鲁道夫·施瑞贝耳特和威廉·塞利格起诉，控告他们杀害死于致命的炸弹之下的警察德甘。这些被告中，施瑞贝耳特已经逃跑，塞利格供出同案人的罪证而被赦免，其余八人受审。

这样被挑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是当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而且也是八小时工作制宣传鼓动运动中最杰出和最有影响的领袖，是芝加哥工人运动中极孚众望的人物。

奥古斯特·斯皮斯那时才三十一岁。他生于德国，1872年旅居美国。1877年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当过商业经理，然后任芝加哥《工人报》总编辑，一直到被捕之日为止。在“社会革命”同志会出现时，他加入了这个运动，后来成为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可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是属于相当温和和哲学的类型的。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讲英语和德语同写这两

种文字一样流畅，是被告中最有修养和聪明的人物。

艾伯特·帕森斯于1844年生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他十五岁学排字手艺。他在南北战争中站在南部联邦一边进行战斗，但在1868年他创办了一种保护黑人权利的报纸，因此引起他的亲戚的仇恨。1875年，他加入社会民主党，一年后他组织了劳动骑士芝加哥职工大会。他是最早加入1880年“社会革命”运动的人之一，1884年以后他主编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警钟》刊物。他是一位有口才、有魅力的演说家和有才干的组织家，据说从1875到1886年他至少曾在一千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过讲话，并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后来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的组织者周游十六个州。

迈克尔·施瓦布的才干不及斯皮斯或帕森斯。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他被捕的时候三十三岁，已在美国呆了八年。他和斯皮斯在《工人报》编辑部同事，是一个善辩的演说家和头脑清醒但并无什么创见的作家。他在工人运动之所以有影响，主要是由于他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巨大热情和无限忠诚。

乔治·恩格尔在被告中年纪最大。他于1836年生于德国卡塞尔。贫穷艰苦的生活使他早年就养成了反抗精神。他对现实社会的仇恨与其说是受了任何社会哲学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他在美国刚出现无政府主义迹象时就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它历来最极端最热心的信奉者之一。

路易斯·林格不过二十二岁。他是无政府事业激昂慷慨的热忱的狂热者和不倦的战士。

塞缪尔·菲尔登于1847年生于英国。他先后当过纺织工人、监理会传教师、司机。他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多半是从报纸文章和公开辩论得来的。他讲话直截了当、有点生硬、慷慨激昂和滔滔不绝，他颇受群众的爱戴。

阿道夫·费希尔只比林格大两岁。他生在德国，但在十五岁便迁居美国。他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他的父母传授的。他在被捕前几年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是该运动的最不知疲倦的战士之一。

奥斯卡·尼比于1849年生于纽约。他在1866年定居芝加哥，从那时以后几乎参加了工人运动的各个方面。他是驻全国劳工同盟的代表，后来他先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又加入国际劳动人民协会。他从来就不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很著名的人物，然而始终积极地参加了工会运动，并在1886年八小时工作制宣传鼓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这八人于1886年6月21日开始受审。审判由法官约瑟夫·加里主持，进行了四十九天。没有控告被告个人参与杀害德甘。起诉的理论是：他们用演说和印刷品怂恿各界广大人民进行谋杀，由于这种怂恿，有个不知名的人投了炸弹，致使德甘身亡。

与无政府主义运动毫无关系的许多公平观察家常常把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审判称做滑稽剧；凡是读了这个案件记录的人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个美国法院历来对司法所作的最粗暴的歪曲。陪审团不是以通常的方式组织的，而是法官加里指定一个叫亨利·赖斯的人作为特别法警出去传唤他挑选的陪审员的。约一千人的陪审员名单中只有五名

是工人，而且这些人立刻被当局撤开了。其余的人都是劳工的雇主或依附于雇主的人。其中多数人声明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怀有偏见，对被告的犯罪有先入之见，然而他们一说他们相信有力的无罪证据可以克服自己的偏见，法官就立即确定他们有资格担任陪审员。在当局看来，最重要的证人是得了赦免的许愿而出卖同志的塞利格，以及一些侦探和新闻记者，其中许多人在审判时自相矛盾到这样的地步，使得他们提出的证据毫无用处。尽管有那样一些情况，起诉却没有能够确立他们理论中的最重要的论点——即扔炸弹的人是直接或间接地遵照任何一个被告的怂恿行事的，或者在哪一方面是受他们学说的影响的。既然不知道直接的犯人究竟是谁，当然就不能把他的行动和被告联系起来。

但是，审判最引起反感的特点是法官所持的不公平的态度：他不但对一切有争论的问题作了有利于起诉的裁决，而且当着陪审团的面一再发表的暗示性讲话，带有必然会影响陪审团而于被告不利的性质。斯皮斯和菲尔登徒然否认和惨案有任何关系；帕森斯徒然说明他没有预料到大会上会发生任何暴行，因为他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他参加同一个大会；费希尔和恩格尔徒然说明，当秣市大会举行时，他们正安静地在家玩着纸牌；施瓦布、林格和尼比徒然证明，他们没有参加秣市大会，连大会的准备工作都不知道；他们的律师布莱克上尉徒然证明，法院的控诉是建立在伪证基础上的。秣市事件不过是一个借口。被告受审判的真正原因不是谋杀德甘，而是他们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们必然要被宣告有罪，并且他们确实被定了罪。8月20日，陪审团宣判了如下裁决：

“本陪审团判定被告奥古斯特·斯皮斯、塞缪尔·菲尔登、迈克尔·施瓦布、艾伯特·帕森斯、阿道夫·费希尔、乔治·恩格尔和路易斯·林格犯了起诉书控告的谋杀罪，判处死刑。我们判定被告奥斯卡·尼比犯了起诉书控告的谋杀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向州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维持原判，再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的上诉被驳回，理由是该法院对这个案件没有审判权。剩下的唯一指望是请求州长作行政宽大处理。有些被判罪的人采取了这个途径，结果是施瓦布和菲尔登的判决减为无期徒刑。林格在囚室饮弹自杀。斯皮斯、帕森斯、费希尔和恩格尔于1887年11月11日被执行绞刑。他们死得很英勇。斯皮斯在被处绞刑时宣称，“我们在坟墓里的默不作声将比我们的讲话更为雄辩的时候必将来临。”帕森斯临死时说，“请听人民的呼声！”费希尔踏着轻快的步子容光焕发地走上断头台，在就义时说：“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六年后，那时当选伊利诺斯州长不久的约翰·阿耳特吉耳德完全赦免了塞缪尔·菲尔登、奥斯卡·尼比和迈克尔·施瓦布，在赦免的同时当着法官加里对那次审判作了全面的分析，严厉批评了法官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方法。

(四) 重建时期

芝加哥事件实际上是我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结尾的章节。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对投掷致命的炸弹这一具体行动负责，但无可否认，这个行动同他们所主张的暴力手段是一致的。秣市惨案及其悲惨的后果就是无政府主义化为实践的具

体例证,产生了促使它的信徒和同情者清醒过来的效果。

在此以前有组织的工人给予运动的一点支持迅速地撤回了,无政府主义此后便局限于没有什么力量或影响的东部少数几个无关重要的“小组”。

再一次给社会主义的宣传提供了大好时机,社会主义者立刻利用了这个有利形势。

重振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作认真地开始了,标志着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特点的伟大的工业和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和力量增加了。党创办了新的报纸,组织了新的“支部”,安排了广泛的演说旅行。后者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威廉·李卜克内西,以及卡尔·马克思的能言善辩的和才气横溢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她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博士的演说旅行。这个旅行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86年秋季安排的。演讲者在合众国所有主要城市的约五十个集会上讲了话,李卜克内西用德语讲话,艾威林夫妇用英语讲话。他们的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887年9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布法罗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三十二个支部的三十七名代表,但据说党的全部支部约有七十一个。

代表大会最有趣的特点是讨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工人协会拟议中的统一问题。

国际工人协会(不应同1883年在匹兹堡创立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相混淆)是1881年下半年成立的。它的成员主要是

美国工人和农民，它的主力在太平洋海岸。该组织的社会观点和原则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点奇怪的混合物。

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这些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排斥投票选举。他们声明，“我们相信，如果普选权曾经能够把劳动人民从有闲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它以前早就会被人从他们那里夺走了，我们不相信投票选举是纠正人民大众呻吟于其下的弊病的手段。”^①

但是，只要他们反对暴力手段，更强调教育和宣传，他们就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

他们所陈述的宗旨和目的是：“印刷、出版和传播劳工文献；举行群众大会；组织宣传鼓动；设立工人图书馆、工人会堂和讨论社会科学的文化团体；维持工人报刊；保护会员和一切生产者免受损害；援助一切劳工组织，等等。”协会建立在“小组”体系的基础之上。它的主要机关报是《真理报》，在旧金山出版，编辑部由伯内特·哈斯克尔领导。它在1882年创办时为周刊；1884年初改为月刊，同年年底因缺乏订户而停刊。继《真理报》的是《劳工问讯者》，在丹佛出版。

1887年，国际工人协会声称拥有登记会员约六千人，分布下列各地：华盛顿准州地区和俄勒冈州约二千人；加利福尼亚州，一千八百人；科罗拉多州、犹他州、蒙大拿州、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约二千人；散布在南部和东部的会员约二百人。

代表协会出面磋商的哈斯克尔先生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一些要求，作为两个组织联合的先决条件，其中最重要的

^① 理查德·伊科：《美国工人运动》。

是：该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同盟”或“社会主义协会”；它声明反对政治行动；它把较少的资金用于支持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把较多的资金用于国内的宣传；它接纳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入党，并继续出版《劳工问讯者》。

代表大会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当详细的讨论之后通过如下决议：

“鉴于：收到丹佛社会主义同盟关于和我党联合的友好建议；

“决议：我们本着友爱精神回答这个建议，并对伸出的手表示欢迎；

“鉴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和原则被承认是完备和全面的，并使国际工人协会和与之有关的社会主义同盟的兄弟感到满意；

“决议：该纲领作为联合的基础；

“鉴于：芝加哥和中西部各州其他地方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组织都信仰我们的纲领和原则，虽然它们现在还是分离的；

“决议：我们和社会主义同盟的同志一起欢迎它们根据我们党章的规定正式接受我们的纲领而加入我们的党，以便使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更加有效，并使我们的共同事业最后获得胜利。”

并未因此达成正式的联合，国际工人协会不久便解散了。

除了联合问题以外，政治行动问题占据了代表大会的大部分讨论。代表们在关于和当时参加运动的各劳工政党继续合作、独立进入政治活动舞台或根本不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

上发生意见分歧。

由于通过了一项决议，向党员们介绍“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一个或几个劳工政党参加运动以支持最进步的本党”，而终于达成暂时的妥协。

但是，这个决议的通过根本没有使这个争执得到解决，社会主义者在以后选举中对一些“进步的”或“激进的”劳工政党的失望的经验加剧了意见分歧。纽约《人民报》及其支持者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政治活动的时机到目前为止尚未成熟，劝告党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会运动方面，而党的正式机关报《工人拥护者》和《社会主义者》则热烈主张社会主义者独立进行政治活动，有点低估社会主义者在工会中活动的重要性。

这两派的对立在此后两年内越来越明显，终于发展成为公开的敌对。党的负责人指责《人民报》不忠诚，而该报则反驳说全国执行委员会是一个无能的集团。在这个争执中，曾经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有权罢免他们的“纽约支部”的大部分党员站在《人民报》一边。1889年9月，这个支部对党的全国负责人的无能提出指责，并且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进行调查。会议罢免了全国书记罗森堡和全国委员会委员欣策、骚特尔、格里克，并选举舍维奇、奥托·赖默、易卜生和普拉斯特填补他们的位置。这个即决的行动在党组织内部造成危机。被罢免的领导人承认他们被解除职务的程序有效。他们继续维护他们作为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权利，并召集定于同月底在芝加哥市举行一次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新的全国委员会开始履行它的职务。

“支部”分成旗鼓相当的营垒效忠两个委员会；在以后的

混乱局面中，总部设在费城的党的监察委员会进行干涉，停止两个对立的委员会执行职务，并暂时接管党的事务。

监察委员会将代表大会举行的日期延至10月12日，党的《人民报》派接受这个日期，而罗森堡派则坚持被罢免的委员会原定的日期。因此党的两派分别举行代表大会，各自宣称代表正式组织而污蔑对方是伪团体。

罗森堡派的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寥寥无几，多数代表都是“委任代表”。这个组织又苟延残喘了几年。反复作出努力要把两派再团结起来，但是没有达成联合，罗森堡派即以后几年自称的“社会民主联盟”渐渐消亡。

在这同时，《人民报》派于1889年10月在芝加哥举行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三十三支部的二十七名代表。尽管党内最近发生分裂，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却显著地表现出信任和满怀希望的精神。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卢西恩·萨尼亚尔起草的新纲领。虽然党从前的一切纲领都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作了简明而冷静的解说，1889年的纲领却更加具有一个选举运动文件的性质，并且由于它把论点建立在独立宣言的基础上，就具有全国性的色彩。这个文件在以后每次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都加以无关紧要的修改而重新通过，现在仍然有效。（参看附录II）

党的下届代表大会于1893年7月在芝加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四十二名代表。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人发言要求废除美国总统职位。

这时党平安地稳步地发展了几年。据报告，1889年“支部”的数目达到七十一个。以后四年创立了一百一十三个新的支

部；其中四十三个是德国人支部，三十九个美国人的，十四个犹太人的，其余的是由波兰人、波希米亚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别国国籍的人组成的。这些支部分布在二十一个州。新建立的支部中的许多支部解散了，但其他支部又创立起来并代替了它们，就整个来说，支部的数目是增加了。1896年全国书记报告有二百多个支部分布在二十五个州里。同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市举行。它于7月4日开始工作，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出席大会的有十二个州的七十五个支部的九十四名代表。

代表大会的进程是非常生气蓬勃的，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广。代表们最有重要意义和决定性的举动是他们对工会运动所采取的态度。这一问题是由于要通过一个决议，承认当时刚由党的一些杰出领袖为了反对美国劳动联合会和劳动骑士团而成立的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才提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占据了代表大会连续几次的会议，有时变得非常激烈。最后以七十一票对六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现有的工会组织腐败得不可救药，称赞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创立。

社会主义工人党就这样在其生存的历史上第一次对现有的有组织劳工的全国组织宣了战。

这是该党对工会运动既定政策的根本背离。以下几节将说明这个新的政策对该组织是多么重要。

以后三年，支部增至三百五十多个，党的活动扩展到三十个州，党报又接受了几家有名的报纸，并且销路增加了。

1899年社会主义工人党达到了全盛时代。

三、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政治活动

(一) 独立的政治活动

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美国工人党，正象它存在的第一年所命名的那样，主要只是为了宣传而创立的。关于党对参加政治活动的态度问题，费城统一代表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必须服从的伟大目的；

“鉴于工人党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它的斗争；

“鉴于只有经济斗争才能使工人党的战士得到锻炼；

“鉴于我国投票箱已长期不复表达人民大众的意志，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职业政客手中扰乱人心的工具；

“鉴于有组织的工人到目前为止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铲除这种腐败现象；

“鉴于这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制造了许多中产阶级改良家和骗子，一场政治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分子容易钻进党内；

“鉴于投票箱的营私舞弊和改良欺骗在总统选举年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工人党在这些年份的危险是最为严重的；

“因此，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在 1876 年 7 月 22 日在费城举行会议，决议：

“恳切要求本党各支部和全体工人暂不参加一切政治运动，并弃绝投票箱。

“工人从而将免除许多失望，他们可以把时间和精力更有

益地用于工人的组织，而工人的组织常因过早行动而受到损害和破坏。

“让我们等待机会吧！机会必将到来！”

从决议的措辞不难看出，党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是必然的策略，而不是自由选择的问题，其所以采取这个态度的理由可以很容易地从党的状况和当时的政局方面找到。1876年，工人党总共约有登记党员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德国人。党刚由一些不大单纯的分子的结合而创立起来，它的组织松懈，资金微不足道，影响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独立的全国竞选运动当然是谈不到的。和任何现有的改良政党合并的前景决不更有吸引力：能在1876年选举中要求那个权利的唯一政党是“绿背纸币党”，这是非常无足轻重的，并且它提出的论点不具有投合劳工利益的性质。因此，不参加政治活动是这个新党的唯一途径。

但是次年，党的状况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上一章叙述的工业萧条和铁路大罢工已使社会问题表面化。党的队伍扩大了，许多新党员是美国工人。普遍的情绪赞成激进的和改良的政策，社会主义工人党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一个有利时机。

从1877到1879年，劳工的激昂情绪继续高涨，党在州和地方选举中进行了多次剧烈的竞选运动，在有些据点还获得相当大的胜利。在芝加哥城，1877年秋季约有七千人投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票，次年春季它的一个党员斯特劳伯特当选市议员。1878年秋季，芝加哥社会主义者选出了三名州众议员——埃尔哈特、迈耶和利奥·迈尔贝克，一名州参议员西尔威

斯特·阿特莱。他们在议会中提出一些规定现金工资及限制女工童工工时的法案、雇主责任法案以及若干类似法案，然而所有这些法案立刻被击败。可是，他们毕竟能够说动议会设立劳动统计局。1878年春季，四个社会主义者——阿耳特彼得、洛伦茨、迈耶和斯特劳伯特——当选市参议员。在这些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候选人名单是以市长候选人厄恩斯特·施米特博士居首的。施米特博士是一位有名气和有影响的德国医师、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工人运动坚定的赞助者。他得了一万二千多张选票。

在辛辛那提，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877年秋季选举中得了九千张选票，在克利夫兰得了三千张。同时在圣路易，党得了七千张选票，五人当选校务委员会委员，二人当选市参议员。

在纽约，1879年秋季提出了州候选人名单，凯莱布·平克为州长候选人，奥斯本·沃德为副州长候选人。候选人名单得到党的纽约、布鲁克林、奥尔巴尼、特洛伊、尤蒂卡、锡拉丘兹和布法罗的支部的支持，但就整个来说，党的州组织是极端软弱的，总票数没有达到一万张。

党在底特律、波士顿、新奥尔良和丹佛也提出了候选人。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衣阿华、印第安纳、堪萨斯和肯塔基州的党组织没有参加这个时期的竞选运动，在圣路易和其他一些地方，社会主义者间或和绿背纸币党党人合作。

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组织的工人在雄辩的宣传鼓动家丹尼斯·卡尼领导下，为了政治行动而组织了“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提自己的候选人，“认为分散工人运

动的力量是愚蠢的和轻率的。”^①

就整个来说，党没有参加任何全国选举，因此它在我们现在所叙述的时期总的投票人数基本上是一个推测：据各种估计在五万和十万之间。

就这个年青的组织必须对付的特殊困难而言，这肯定是一个有希望的开端，美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热情高涨了。

① 卡尼宣传鼓动运动构成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最生动的篇章之一。1877年，加利福尼亚州呈现了最危险的经济和政治形势。1873年袭击东部的工业大萧条的浪潮抵达太平洋海岸要晚得多，它的影响在1877年仍然很深刻。加利福尼亚几乎所有社会阶层在前几年从事的疯狂的股票投机，使这个危机更加剧烈化。商业实际上停顿了。矿山、工厂和商店倒闭，那里无论什么小的工作主要都是中国人做的，他们始终情愿拿通常工资的一半而继续工作。

居民的贫穷和苦难是严重的。州的众所周知的贪污无能的官吏表明不能或不愿计划任何有效的救济措施。加利福尼亚州、特别是旧金山城的失业工人队伍大大增加。他们对现状的不满愈来愈猛烈，并且终于表现在“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的成立上。党的领导人为丹尼斯·卡尼，他读书不多，推理能力不强，但口才出众，并有不倦的精力。在卡尼的领导下，党很快成为地方政治活动中的一支力量。它在旧金山“沙滩区”举行的露天大会参加的有几千热情的听众，它的宣传鼓动成为报纸讨论的中心题目，它的支持者一天天增加，当旧金山市选举来到时，党获得了多数职位。也正是加利福尼亚工人党通过它的投票决定制订新的州宪法，当制宪会议于1879年举行时，党在这个文件的制订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宪法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目的在于涤除州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的腐败现象，抑制公司资本的权力，废除中国劳工。这个文件在有产阶级中间一度引起很大的不安，然而以后的事件证明这种不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卡尼运动不过是一种模糊的和无知的不满的表现。它不是建立在任何明确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它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措施；它的口号是：“打倒富人！”它的纲领是：“中国人必须离去！”这个运动持续的时间和工业危机一样长久，当恢复繁荣的初步迹象刚显露出来，它就分崩离析，即使留下一点形迹也是极少。加利福尼亚工人党解散了，作为其主要成就的新的州宪法遭到后来立法议会的诬陷，被法院加以“解释”和“整理”，以致变得非常无足轻重。

但是下一年的情况并未证明这些热烈的期望是有根据的。我国繁荣的恢复使刚开始在美国工人中间立足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失去了凭借。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和力量迅速下降，当1880年总统选举临近时，党的状况并不比它在前次1876年选举时好得多。范·帕顿在其向党的阿勒格尼代表大会（1879年^①12月26日至1880年1月1日）所作的正式报告中说：“真可惜，由于我们自己的组织缺乏为控制大量愿被组织起来的不满工人所需要的经验和信心，我党错过了过去两年出现的然而未能及时抓住的宝贵机会。特别可惜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北部州议会的选举中没有拿到至少一打议席，因为获选了许多议员的党被认为还算是悠久的，而没有获选议员的党则被公众看作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

该报告建议参加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而这个建议是代表大会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

除极少数以外，代表们一致认为参加竞选是适当的，但是争论的焦点在于独立参加竞选运动还是和其他改良的政党联合参加竞选运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建议，党可以同加利福尼亚工人党、绿背纸币党和自由党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自由党是自由同盟新近成立的，1879年9月在辛辛那提举行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半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建议得到一些代表——其中有帕森斯和麦圭尔——的赞成，但其他代表则拼命反对。在付表决时，这个关于同其他改良政党联合提名候选人的动议被微弱多数击败，因此代表大会决定独立提出总统和副总统

^① 原文为“1876”年，推测系排印错误，译为“1879年”。——译者

的候选人。

被提名的有纽约的凯莱布·平克、伊利诺斯的毕晓普和纽约的奥斯本·沃德。在出席会议的二十四三个代表中，九人弃权投票，十人投票赞成平克，四人投票赞成毕晓普，一人投票赞成沃德。因此宣布凯莱布·平克为代表大会所推举的人选。

可是，到了会议进程的后一阶段，重新考虑了平克据以被提名的表决，通过的一项决议说，所有三个候选人都将提交全体党员投票，得票最多的人将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得票次多的将为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决议改变了整个形势。关于独立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提议被党完全否决，因此在1880年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绿背纸币党候选人。

（二）绿背纸币党

绿背纸币运动是1873年财政危机的直接产物。它是群众普遍反对金融资本进攻的第一个相当粗犷的表现，并且以币制改革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据称，这个国家的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已经策划了这样的阴谋：使战时发行的绿背纸币丧失其作为关税和支付国债的法币性质而贬值；然后以这种贬值的绿背纸币购买美国公债；最后诱导政府用黄金赎回该公债。鼓动反对这个所谓阴谋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这个运动终于引起了绿背纸币党的创立。

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74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大会通过一个纲领，要求进行一些币制改革，其中主要的是：

一、收回国家纸币。

二、唯一的货币应为纸币，这种货币可以兑换美国带息的债券。

三、硬币只用于偿付明白规定要用硬币偿付的债券^①。

这些要求主要是投合农民和小商人的心意，他们有抵押和其他债务要偿付，因此这个运动长时期局限于那些阶级的范围。产业工人对它几乎没有兴趣。

1876年，该党提名著名的纽约慈善家彼得·库柏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塞缪尔·科里为副总统候选人。他们只得到八万多张选票。

当1877年大罢工和劳工骚动给这个运动注入新的生命并使它发生新的转变时，它几乎濒于瓦解的地步了。财政问题退居幕后，工人的要求取它们的位置而代之。1878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俄亥俄州托莱多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若干劳工领袖，党改名“绿背纸币劳工党”。这个运动在东部产业工人中间声誉增高，在以后的国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约一百万张选票，有十四人当选国会议员。在1880年总统选举中，绿背纸币劳工党提名衣阿华州詹姆斯·韦弗尔和得克萨斯州钱伯斯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但是群众的激情已经消退，绿背纸币党获得的选票减少到三十万张。从此该党日益衰落。它最后一次提出全国候选人名单是在1884年，那时本杰明·巴特勒将军——前国会议员和前马萨诸塞州州长，曾相继加入过民主党、共和党，也做过劳工政治活动家——被确定

^① 参看《社会改革百科全书》载威廉·布利斯：《绿背纸币党》一文，1898年纽约出版。

为它的总统候选人。巴特勒还得到垄断资本反对者的支持，因而得了约十七万五千张选票。这次选举后，绿背纸币党人渐渐卷入旧政党的队伍，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因素而存在。

只要绿背纸币党把它的宣传鼓动局限于货币改革的范围，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拼命反对和它缔结一切政治联盟，但是从1878年以后，当它和工人运动发生较密切的接触时，社会主义工人党便对它采取比较友好的态度。如同前节所说的，该党的一些支部在1878年和1879年选举中支持了绿背纸币党人，但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正式给予这种支持，只是容许而不加鼓励。到了1880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本身才正式决定支持绿背纸币党。这个决定刚作出，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向它的所有支部和同情它的所有工会发出号召，要它们派代表出席定于1880年8月8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会议。绿背纸币劳工党全国提名代表大会定于8月9日也在该城举行，不用说，8月8日会议实际上将是预料会出席绿背纸币劳工党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分子的干部会议。约九十名代表响应了号召。其中半数以上是芝加哥本地人，他们受权作为各小支部的委任代表，有三十八人是各支部派出的直接代表。在三十八人中有党书记菲利普·范·帕顿，多威博士、麦圭尔、帕森斯、帕森斯夫人，摩根，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他著名成员。

社会主义者干部会议决定申请作为一个组织参加绿背纸币劳工党代表大会，作为一个单位对一切问题投票。此外还决议，党坚持要求接纳它当中的二十至五十名代表，在纲领委员会中任命七名社会主义者。

作为干部会议发言人的多威博士“以社会主义工人党所代表的十万选民的名义”向代表大会提出了这些要求。

这些要求大体上获得承认；给予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在纲领委员会的代表资格，并承认他们在代表大会讨论问题时有四十四票表决权。可是在大会进程的后一阶段，作出裁决规定以州为单位进行投票，社会主义者拒绝服从这个裁决，在代表大会其余的时间内表决时一概弃权。

社会主义者在代表大会上的主要工作与草拟纲领有关。他们努力使文件中所表达的观点尽量接近他们对社会进化和阶级斗争的看法。但是他们的工作是极端困难的。出席绿背纸币劳工党代表大会的人员是许多五花八门的改良分子，许多社会观点极不一致；币制改革者、土地改革者、垄断资本反对者、排华鼓吹者和单纯的工会主义者都有代表。他们各自要求在纲领中承认他们的特殊的得意见解，这些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同意而几乎没有照顾到整个文件的调和与一致。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纲领开始的句子中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出来，这些句子如下：

“民政府应保障一切劳动者享有其劳动果实的神圣权利，从而使财富创造者能够取得享受舒适生活的物质资料以及为发展精神、社会和道德修养所需要的便利；我们谴责那种强使财富创造者永久从事辛苦劳动而仅仅换来牛马一样生活的野蛮制度，认为那是同我们的文明极不相容的。

“尽管生产力有了巨大增长，普遍采用了节省劳力的机器，发现了新的增加财富的手段，但是工人的劳苦没有减轻，劳动时数缩减极少，几乎没有有什么生产者能够摆脱贫困而取

得舒适生活和经济独立地位。”

也是根据社会主义者摩根的动议，代表大会在长时间讨论后通过了一条要求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纲领。

可是，就整个来说，社会主义者对绿背纸币党的这个纲领和处理事情的方法很不满意，因此半心半意地参加了它的总统竞选运动。

竞选运动刚过去，和绿背纸币党人的联盟便告瓦解，除了少数单独的事例而外，再没有恢复联盟。

社会主义者没有参加 1881 年选举。纽约《人民报》论证说：“我国社会主义者的竞选运动是毫无用处的，除非它能得到美国人的选票。但是象党的目前这种组织形式，它只能得到德籍工人的支持。”因此，《人民报》劝告该党党员集中力量创办一种英文的社会主义日报。

此后几年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状态，它对无政府主义的全力斗争，使该党不可能进行有系统的竞选运动，只有作为例外情况偶尔提名地方候选人。这样，党总是提出一名候选人竞选纽约第十议会区议员，该区近几年一直投社会主义者候选人七百至一千张选票。

在 1884 年总统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提候选人，也没有支持其他政党的候选人。连续不参加选举以及美国政治似乎处于毫无希望的状况，使该党对投票箱的功效表示怀疑，苏黎世《社会民主主义者》1884 年 11 月 4 日发表的下面通信^①也许是社会主义者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正确说明：

^① 转载瓦特豪森：《现代社会主义》，第 268 页。

“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没有参加选举，而是声明弃权投票。两大政党即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资本主义的政党。反对贿赂舞弊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者肯定会参加的政党口号，但是首先发出这个口号的人们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以致不可救药的怀疑论者对他们有无能力甚至是否愿意清除积秽，表示怀疑。我们的党也不会支持由绿背纸币党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以巴特勒将军为首的第三党，因为这个团体是相当乱七八糟的一个团体，巴特勒将军是一个有手腕的蛊惑家，而决不是一个可靠的家伙。要独立参加竞选运动，我们的党是力不胜任的，而更重要的是，党认为当前的总统选举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决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只是在1886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才从它的政治昏睡状态中觉醒过来。长期工业萧条和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斗争所产生的这一年剧烈的劳工激昂情绪，在许多重要的地方都以政治运动形式表现出来。

在芝加哥，在中央劳工联合会倡议下成立了一个“统一工党”。该党是由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骑士、各种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它在1886年秋季投了它的县候选人二万多张选票，在次年春季选举中，它为它的市长候选人获得了不下二万八千张选票。

在威斯康星州，劳动骑士和绿背纸币党残余党员共同创立了“联合工党”。这个运动得到当地社会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在密尔沃基城取得了一些实际成绩。

在缅因、新罕布什尔、康涅狄格、新泽西、纽约、马里兰、俄亥俄、明尼苏达、密执安、衣阿华、密苏里和科罗拉多等州，也

组织了类似的政党。这些政党主要是由工会主义者、劳动骑士和绿背纸币党人组成的；在纽约、新泽西、密苏里和俄亥俄州，社会主义者也支持这个运动。这些政党在各地称做“统一工党”、“联合工党”、“产业工党”、“劳工改革党”或简称“工党”。它们在1886年秋季选举中达到全盛时代，当时它们有些地方候选人获选了；次年，运动迅速衰落，到了1888年它们只有极少数还存在。这个时期有组织的劳工所进行的最重要的竞选运动要算是纽约市的竞选运动。

这里的中央劳工联合会在1886年初夏开创了争取工人独立政治行动的运动。这年7月5日，一些劳工组织的代表为了发起这个运动在克拉伦顿堂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百多名代表，在进行表决时，其中二百八十六名代表郑重声明赞成工人单独提候选人参加以后的市长竞选运动，只有四十名代表反对这个计划。又举行了几次会议，运动的力量和热情一星期比一星期增长。通过了一个市纲领，并成立了一个常设党组织叫做纽约“统一工党”。1886年9月2日，市党代表大会在克拉伦顿堂举行，在雷动般的掌声中和热烈的欢呼声中，代表大会提名亨利·乔治作为它的市长候选人和这个年轻的运动的旗手。

(三) 亨利·乔治运动

亨利·乔治于1839年生于费城。他十三岁结束学校教育，做了短期的侍役，然后当水手，游历了世界许多地方。十六岁回到费城，学排字手艺，但他念念不忘对旅行的爱好，他不久又当水手，前往加尔各答，并从那里到旧金山，最后在这

里定居下来。

在旧金山，他先后当排字工人和采访记者，1871年他成了旧金山《晚邮报》创办人和共有人之一。就在这时候乔治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发生了兴趣。1871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我们的土地和土地政策》，该书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八年后他出版的第二部著作《进步与贫困》则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

就象相当醒目的书名那样，该书专门探究在财富增加情况下人民群众终生贫穷的原因。乔治论证说，我们当前的时代特征是财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本应期望：一般财富和物质安乐的增加将会使全体人类受益；贫穷将会消灭；贫穷所产生的一切罪恶将会绝迹，普遍社会幸福和满足的状态将会接踵而至。但是情况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只有相当少数的人享受增加了的文明的幸福，而大多数的居民仍旧陷于贫穷，并且穷奢极欲的地方也正是贫穷最严重的地方。著者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在我们的财富生产和分配制度中有某种因素，把贫穷和我们文明的进步联在一起。这个因素是什么呢？亨利·乔治发现它是土地私有制，即土地、矿山、路权——不包括和它们有关的改善设施——之类的一切“天然机会”。他说，不可以有土地财产权。人有占有其劳动成果的权利。衣服的缝工、房屋的建筑者或机器的制造工人有占有这些东西的绝对权利。然而谁创造了大地？什么样的人能要求让与或出售土地的权利？土地的价值同生产费用或同花在土地上的劳动没有关系。花在土地上的劳动的价值是改善的价值，而土地本身的价值则取决于肥沃之类的自然原因，或象大量人口集聚在某一地区之类的社会原因。因此，正义认为土地及

其价值的增加应该由全国人民共同继承。但情况相反，它正在被一小撮的地主阶级所垄断，他们侵占了它的一切利益，对它的使用和占有课以高额地租。这个制度使一些人可以为了投机占有大量土地，从而使之不能供实际应用。因为归根结底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它的任何部分不加使用都会造成国家财富生产的减少。

而且，只要土地向全体开放，人人都能靠小规模农业或工业生活下去，但是只要土地变成私有财产，就只有资本家付得起高额地租，能办任何工业，而穷人则被迫出卖他的劳动以换取所能获得的最大报酬。

最后，地租是对生产任意征课的税，它既抽取资本家的利润又抽取工人的工资，造成两者的贫穷，引起工业危机，产生不公平的财富分配，而这种分配把巨大财产汇集到少数人的手里，人民群众则相对地越来越穷。

乔治得出结论说，“如不使土地变为共同财产，则贫穷永远不能消灭。”

可是，著者希望用增加对土地价值课税的方法来渐渐达到这个目的。这样，这种捐税终将同土地的全部地租价值相等，结果土地所有权名义上虽仍属个人，但土地的全部收入将归于国家。

乔治建议废止除去地价税以外的一切捐税，因此他的理论叫“单一税”论。

要了解这本著作的巨大影响，那就必须记住它是在社会问题和土地改革理论被热烈地提出来的时候出版的。该书的引人入胜的文笔、著者在宣告其新奇的和大胆的结论时所表

现的自信语气和真诚信念，是它成功的基本原因。它是象颇孚众望的领袖那样恰在体现模糊的公众情绪时出现并给这种情绪以声色和方向的名著之一。

该书风行一时，出了许多版，译成许多种文字，成为劳工界和科学刊物普遍讨论的题目。这位西部的名不见经传的记者突然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在美国全国家喻户晓。他不但在欧洲大陆而且在我国得到成千上万的热情信徒，为了宣传他的理论创立了许多“土地和劳工”俱乐部。乔治是一位擅长口才而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他被约请在美国主要城市以及爱尔兰和英格兰进行的广泛演说旅行更增加了他的声望。

纽约劳动人民在 1886 年市选举运动中选为领袖的就是这样的人物。

乔治并不是没有附带颇不寻常的条件就接受候选人的提名的。他要求他的选民要得到至少三万纽约市市民和居民在一项他们愿提名他做候选人并将投他的票的声明上签名。他解释说，这将会达到两个目的：它将证明群众普遍要求他做候选人，并将向抱冷淡态度的人表明他大有当选的希望，这样他们就会投他的票而不担心“浪费”他们的选票。这个特殊的条件决没有损害运动的热情。恰恰相反，它更加鼓励了工人的积极性。在很短时间内获得了超过所需要的签名，竞选运动蓬勃发展。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广泛散发了竞选运动印刷品，当 9 月底安排了街道示威游行时，不下三万五千人列队游行，在同情的旁观群众雷动般的掌声中，热情呼喊亨利·乔治的名字。

10月，统一工党创办了《导报》，这是为了亨利·乔治竞选运动而出版的日报。它一共四版，每份一分钱，不久就销行十万份。

运动的浩大声势使老的政党吓得目瞪口呆，它们试图以提名实力最强的有当选希望的候选人列在候选人名单首位的办法来抵销乔治的名望。民主党人提名著名慈善家、彼得·库柏的女婿艾布拉姆·休伊特，共和党人则提名美国现任总统，当时年青有为的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

选举的那天是纽约市非常振奋的日子之一，当选票最后计算出来时，乔治得了六万八千多张票，休伊特得了约九万张票，罗斯福得了六万张票。^①就这样结束了纽约工人历来最难忘的一次竞选运动。

社会主义者从来不赞成作为新社会信条提倡者的亨利·乔治。他们同意他对现行财富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批评，但是他们在对弊病根源的分析和提出的纠正办法同他有很大的意见分歧。

这位单一税论者认为土地所有制是我们工业生活中最根本的因素之一；社会主义者则认为现代工厂生产是现今文明的主要特点。这位单一税论者承认只有一种经济剥削形式——地租，即使用土地所付的报酬；社会主义则断言，“剩余价值”即工人的劳动未得到报酬的部分是一切剥削的泉源，不仅

^① 亨利·乔治的支持者争论说，乔治实际上已被民选为市长，但因在“开票时剔除了一部分票数致使他落选”。这个看法必然有力地刺激了乔治和他的信徒，促使他们随后倡导在纽约州沿用澳大利亚秘密投票制，这是一项不但在该州而且在全美国在各方面都获得成功的改革。

利息和利润而且地租都来自这种“剩余价值”。这位单一税论者因而始终认为土地私有制是我们文明的一切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他所用的土地私有制一词包括在使用土地方面的一切特许和特权——而社会主义者则不但反对以上所说的土地私有制，而且反对一切生产资料、机器等的私有制。

这位单一税论者想消灭地主和“土地价值”垄断者，而让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继续存在；社会主义者则力求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实行完全的经济平等。单一税论自称是可以同样适用于一切时代和状况的绝对的和科学的真理；而社会主义则自称是从现代经济条件下成长出来的理论，预料它会从不断增长的工业集中和社会化中求得实现。最后，这位单一税论者是工业竞争制度的热情支持者，而社会主义者则是热心的集体主义者。

因此，这两种社会学说在观点、目的和方法方面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区别。

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从未想要调和或缩小这个区别。他们支持亨利·乔治运动，只是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劳工反对资本的运动，正如《人民报》所说的，他们赞成亨利·乔治做候选人，“不是由于他的单一税论，而是完全不加考虑”。

亨利·乔治和他最出色的支持者也没有对社会主义者抱更友好的态度。象原来起草的那样，统一工党的纲领大体上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谓的“直接要求”，并以《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声明“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①而结束；但是乔治刚接受提名，这个纲领就被一个旨趣完全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7 页。

同的文件所代替，后者基本上以亨利·乔治的土地论为基础，要求实行土地、币制和赋税的各种改革，以及制订某种工厂和劳工法。

在竞选运动中，两个阵营的这种对立被双方审慎地压制下去了，但选举刚一过去，它马上就爆发成公开的敌对。

这场斗争最初在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报纸对单一税论本身进行论战，而乔治则在其《旗帜报》上同样用批评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来反驳。

但是当1887年选举运动日益临近时，争论渐渐呈现出更加实际的局面，终于在组织内部变成公开的冲突。冲突的直接托词是关于统一工党党章第二节第一条的解释，这条要求该党党员断绝他们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纽约县执行委员会前次曾决定该节条文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从公认的含义来说，后者不是一个政党；但是当县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887年8月4日举行时，这一点再次被提出，并且从前的决定被推翻了，因此实际上等于是开除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这个决定引起组织内部的普遍骚动。一些区部会议对这个裁决提出抗议并要求取消，其他区部会议则同意这个裁决，在有些区部，这个问题在组织内部造成分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工党州代表大会于8月17日在锡腊丘兹举行。预料代表大会要讨论社会主义者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因而双方摆开阵势参加大会。在提出证书的一百六十九名代表中，有二十六人是公开自认的社会主义者，其他还有许多人对他们表示同情。纽约第八、第十和第十四区部会议各有两个对立的代表团参加大会，一个是组织内部的社会

主义分子选举的，另一个是反社会主义者选举的，于是就在决定对立代表团中哪个是合法代表团的问题上引起了辩论。在随后的讨论中，允许提出的问题较广，辩论涉及到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

舍维奇、沃尔特·弗鲁曼、劳伦斯·格朗伦德、雨果·伏格特、欣顿上校和其他一些人热烈地保卫社会主义，而亨利·乔治在麦格林、麦克马金等人有力的支持下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运动。辩论进行了约十八个小时，当最后付表决时，社会主义者被大多数票排除出代表大会。

因此，代表大会提出了以竞选州国务卿^①的亨利·乔治为首的州候选人名单，通过了一个纲领，然后闭会。

把社会主义者开除出统一工党，使该组织的力量大为削弱。社会主义者曾是运动中的朝气蓬勃的和忠心耿耿的战士，1886年竞选运动的胜利大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活动。

此外，1886年劳工的激昂情绪大大地被压低了，八小时工作制的宣传鼓动放松了它的强度，工人对他们的政治组织渐渐失去了兴趣。

统一工党逐渐衰落，领导人之间的倾轧加速了它的瓦解。在乔治和麦格林争夺组织内的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后者占了上风。乔治退出了统一工党，与民主党共命运。

在麦格林的领导下，统一工党又进行了一次竞选运动即1888年竞选运动，但由于成绩不佳，认为竞选无望而中途放弃，没有努力使运动重新振作起来以参加下一次的竞选。

^① 当时美国各州设有与国务卿同一名称的官职，其主要职务为保管档案。
——译者

(四) 又一次的独立政治活动

参加统一工党锡腊丘兹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代表的命运只有助于增加他们事业的声誉。根据浅薄的理由把社会主义者开除出组织的举动使亨利·乔治的许多信徒感到愤慨，造成了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感情的急剧变化。

当被击败的代表回到纽约时，他们受到真正热烈的欢迎。有好几千工人在库柏讲习所大厅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听了他们的报告和评论，就在当时当场决定召开一次邀请一切激进的劳工组织都参加的会议，以考虑是否应当组织一个同统一工党对立的政党。

会议的第一次大会于1887年9月4日在纽约市韦伯斯特堂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八十七个组织，其中有五十六个是工会，三十一个是政治组织，它们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分支机构。

会议组成了一个名为进步工党的政党，通过了一个实际上和统一工党原先通过而后来抛弃的纲领相同的纲领，并号召举行州代表大会以提名候选人。

代表大会于9月28日在纽约市举行。约翰·斯温顿被提名州国务卿候选人来对抗亨利·乔治，但他因健康不良加以谢绝，于是由爱德华·霍尔^①替补他的位置。

进步工党的竞选运动实际上限于纽约市范围。它很短促，并且相当沉闷。它的候选人总共得了五千多张票。

^① 1851年生于长岛格伦-科夫。他是机器工人，在地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中同样很出色。他因肺病于1889年逝世。

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其他政党联合进行的最后一次竞选运动。

1886年运动的热情曾把社会主义者从他们的政治昏睡状态中唤醒过来，而1887年的失望则向他们表明联合政治活动是徒劳的。从此，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政治行动的政策。纽约的社会主义者在1888年掀起运动，提出参加竞选的全部候选人名单。在纽约市，州长、市长、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碰巧都在这年举行。爱德华·霍尔被提名为州长候选人，亚历山大·约纳斯为市长候选人，并提出其他州、地方和国会议员全部候选人名单参加竞选。但在总统候选人提名方面引起了相当为难的问题。总统候选人须有全国竞选运动为先决条件，但是该党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只限于纽约市。此外，社会主义工人党那时的政纲载有要求废除美国总统职位的纲领，这看来和提名候选人来竞选该党所反对的现行职位是相矛盾的。这个困难最后被一个相当巧妙的策略所克服：该党提出全部总统选举人的候选人名单，指示他们在选举人团中投赞成“废除总统”的票。

在这个竞选运动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候选人在全纽约州得了不到三千张票。其中约二千五百张票属于纽约市，二百三十二张票属于奥尔巴尼，四十九张票属于锡腊丘兹，三十二张票属于尤蒂卡。在纽约州之外，社会主义者只在密尔沃基和纽黑文两地提名了候选人。他们在前者得了五百八十六张票，在后者得了八十二张票。

结果是这样令人沮丧，以致纽约《人民报》以及党的某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再次劝告不要参加政治活动。

但是，党内群众中间主张独立政治行动的人并没有因初次失败而灰心丧气，力主实行继续参加一切选举而不问其结果如何的政策。

1889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下一次党全国代表大会拥护后一政策，我们看到纽约的社会主义者于1890年又积极进行政治活动。这年，纽约市一些激进的改良主义分子在“国家主义者”的带头下组织了“国民党”，并且首先试图用它来促成他们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协议。但是，就在这两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在目的和观点方面显然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因此放弃了政治合作的想法。国民党没有能够获得为它的州候选人所需要的签名，因此仅限于纽约市的地方提名，在那里它得了不到七百张票。社会主义工人党提了以著名的布鲁克林医师、作为上诉法院法官候选人的弗朗茨·格劳为首的全部州候选人名单，并在该州得票一万三千七百零四张。

对候选人的获得比较可观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的，是纽约州采用的澳大利亚秘密投票制。由于这个制度，该州所有六十一县的决定候选人的选举中都有该党候选人的名字，使社会主义者自己大为惊讶的是，各县(除去特拉华一县)都投了候选人一些票。

次年，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州竞选州长的候选人丹尼尔·德·利昂得票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一张，比过去有所增加。同时马萨诸塞和新泽西两州的社会主义者初次参加政治活动，前者投了一千四百二十九张票，后者投了四百七十二张票。

1892年，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提出美国总统候选人。这个步骤是于9月在纽约市党的总部举行的党“全国”会议上决定

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的八名代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照相器材制造商西蒙·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电气技师查尔斯·马切特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该党在六个州都有候选人，总共得票二万一千五百十二张。从那时起，年年有新的州被引进社会主义者政治活动的范围，社会主义者的选票增加虽慢，然而却是稳步上升的，如下列数字所示：

1893 年……25,666 张票；

1894 年……30,120 张票；

1895 年……34,869 张票。

在 1896 年总统选举时，社会主义者提名查尔斯·马切特为总统候选人，马修·马圭尔为副总统候选人，在合众国二十个州总共得票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张。

然而次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选票增加到五万五千五百五十张，1898 年达到八万二千二百零四张^①；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本身历来所获得的最多选票。

四、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会

（一）地方组织

社会主义工人党为获得工会的赞助所作的努力在前面的章节中已叙述过。就整个来说，这些努力虽然不是很有成绩，但在某些情况下仍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若干地方工会公开同情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该党的影响在这些地方工会所创立的某些中央组织中特别显著。后一类

^① 这个数字引自卢西恩·萨尼亚尔：《社会主义年鉴》。

组织中最重要的是纽约中央劳工联合会，下面是关于该组织的简要历史叙述：

1882年初，当爱尔兰土地问题在我国引起热烈议论时，一些劳工组织毅然安排在库柏讲习所大厅举行群众大会，声援爱尔兰佃农。有若干工会会员的代表参加大会，并在当时当场建议成立一个所有纽约市工会的常设中央委员会。这个建议立刻实行，1882年1月30日，纽约市中央劳工联合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个组织的代表，德国分子占优势。中央劳工联合会通过了一个包括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要求在内的纲领。

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菲利普·范·帕顿向代表讲了话，另一位社会主义者马修·马圭尔当选该组织的书记。在以后六个月內，中央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组织的数目增加到四十五个，在很短时间内该组织成为纽约工人运动中最重要因素。中央劳工联合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友好关系继续了好几年。

1882年和第二次在1883年，中央劳工联合会作为一个独立组织投入纽约市市政竞选运动，每次都获得一万多张选票，1886年它发动了著名的亨利·乔治竞选运动。

有组织的劳工在后一竞选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力量引起职业政客的注意，这些职业政客这时互相争夺当驻中央劳工联合会代表的荣誉。只要乔治运动所产生的热情持续一天，这些努力就都失败了，但是运动一瓦解，政治锐气挫折的时期便宣告开始，许多劳工领袖就愿意倾听老的政党领袖的诺言。中央劳工联合会內盛传“贿赂”和“舞弊”的谣言，组织了派别，

终于造成了公开分裂。1889年2月，即在会上任意互相指责有关酿酒工人集体抵制运动的贿赂问题的那次大会以后，约有六十个代表集体退出会议厅，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央劳工联盟的新的组织。在分别存在了几个月以后，两个组织开始谈判重新联合。举行了几次会议，某些持异议的分子被开除出中央劳工联合会作为对中央劳工联盟的让步，于是两个组织在1889年12月正式和解。

但是这个联合没有持久下去。对立分子间的敌对重新爆发，该组织的会议都浪费在激烈的辩论和互相指责上面，1890年6月又发生分裂，中央劳工联盟又恢复起来。

中央劳工联盟原来包含三十个工会，但很快就增加到七十二个。其中有一些是最强大最进步的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派了代表参加这个组织，并且长时期对它的一切审议发挥了起支配作用的影响。1900年，两个组织再度合并，名为中央联合工会。

中央劳工联合会和中央劳工联盟决不是美国这类组织中仅有的组织。同名称或不同名称的类似组织在北美合众国所有工业城市纷纷成立，其中某些——特别是布鲁克林和赫德森县的中央劳工联盟，罗彻斯特、布法罗、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的中央劳工联合会，纽黑文的地方工会代表会议，芝加哥的职工大会——是站在社会主义运动一边的。

可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得到纽约市一些德国人工会的最大支持，这些工会于1885年创立了一个单独的中央组织叫做纽约市德国人联合工会。这个组织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支持劳工报刊。它在存在的四年期间对纽约《人民报》作了有价值的

贡献，使它扩大了销路，增加了广告，并为它征集了出版的基金。也是在德国人联合工会的倡议下，于1886年创办了亨利·乔治竞选运动的英文机关报《导报》，当该报后来移交到社会主义者的手中时，德国人联合工会在财政和其他方面还给予援助，直到它那短短的经历结束为止。

德国人联合工会是由约十二个工会的代表创立的，但是不久参加的工会的数目就增加到四倍。

布鲁克林、费拉德尔菲亚、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布法罗和其他一些地方群起仿效纽约，它们全都成立了德国人工会的中央组织。1887年纽约的组织计划要成立德国人工会的全国同盟。但这个计划从未实现，德国人联合工会本身不久就开始露出衰落的迹象。只要这些组织坚持它们创立时的原来目的，即支持劳工报刊，它们就在工人运动中起了有益的作用，并且兴旺起来，但是到1888年它们开始忙于抓一般的工会问题，这时它们就和现有的较老较强大的中央劳工组织发生矛盾，往往在地方运动中造成很大的混乱。许多工会不同意这个新的政策，撤回了它们的代表，因此德国人联合工会便渐渐瓦解。

在范围和性质方面同德国人联合工会相似的组织是靠近1888年在纽约市创立的希伯来人联合工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从俄国移入我国的犹太人很多。每周都有几千这样的移民在纽约港口登陆，他们当中的多数定居在该市下东区。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在缝纫业的各店铺做裁缝，在几年之内他们实际上垄断了这个行业。在纽约市他们定居的地区变成了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在那里，开设了几百家成衣

铺。这些店铺通称“血汗工厂”，一般都是由经纪人或“承包人”经营的，往往和缝工的居室相连。它们总是被烟熏得漆黑，肮脏不堪，通风不良，许多男女和儿童混杂地挤在一起，有时一连劳动十五小时或十五小时以上，而工资却低得惊人。

曾经一再作了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在1888年春季以前只获得微不足道的成功。可是到了1888年春季，犹太裁缝工人的工资减少到很微薄的数额，他们的劳动条件弄得很恶劣，连他们这种要求不高的人也起来反抗了。

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罢工。短裤成衣工人首先发难，紧跟着的是长裤成衣工人、斗篷成衣工人、衬衫成衣工人和外套成衣工人，不到几个星期就有不下一万五千犹太缝工的一支大军实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

罢工者没有组织，也没有纪律，他们没有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是否会获得实际的成就是值得怀疑的。后者事实上完全肩负起了处理这个局势的重担。他们把罢工者组成工会，为他们征集罢工基金，指导他们战斗，引导他们走向胜利。此后不久，也是在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倡议下，组织了希伯来人联合工会。所以，犹太人工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始终存在着牢固的同情情谊，那是很自然的：犹太人工会的多数组织者、领导人和发言人来自社会主义工人党队伍，反过来，有组织的犹太工人在该党所办的一切事业中和它衷心地合作了若干年，并且毫不犹豫地响应了它的一切呼吁。

仿效这个纽约组织的榜样，纽瓦克和费城（我相信还有一个地方）也创立了希伯来人联合工会。

这样，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在若干重要的地方劳工组织中

获得了很大影响，但是它争取在全国大的工会联合会中的立足点的斗争，象以下各节所表明的，却更为艰巨，收效更少。

(二) 劳动骑士团

一度强大的劳动骑士团起初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费城裁衣工人创立了本行业的工会。这个工会立刻引起雇主们的不快，它的会员常常被迫在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工作之间作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公开组织，1869年12月，该工会以斯蒂芬斯和詹姆斯·赖特为首的七个会员创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劳动骑士团。

常设负责人的第一次选举于1870年1月举行，选出了下列负责人：大哲人、老团长詹姆斯·赖特；总干事斯蒂芬斯；荣誉领班罗伯特·基恩；荣誉视察员威廉·库克；无名骑士约瑟夫·肯尼迪。

骑士团原来完全是由裁衣工人组成的，它在其存在的第一年年终时只有六十九个会员。可是在1871年，决定把骑士团的活动扩展到其他行业，于是开始了协会的发展时期。次年，在劳动骑士团的赞助下单在费拉德尔菲亚就成立了至少十九个新的工会，名为“地方会议”，别的城市和州接着很快也创立了类似的组织。

1873年，费拉德尔菲亚的地方机构成立了骑士团的第一个“区会议”。这个组织的计划被别的地方会议所采用，1877年在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康涅狄格、俄亥俄和别的州有十五个以上的区会议。费拉德尔菲亚的第一区会议被

默认为该组织的首领。

直到 1878 年，骑士团还是一个极秘密的组织，甚至它的名称对未入团者也不宣布。在一切正式通讯和称呼时，该组织叫做“北美 * * * * N. 和 H. O.”，这五个星号代表“劳动骑士团”。

由于该组织的成员人数和力量的增加，蒙在它脸上的那一层秘密的面纱引起了最荒唐无稽的传说。造谣惑众的报纸刊载了可怕的消息，说在神秘的星号后面隐藏着广泛的共产主义和煽动的阴谋。牧师们猛烈指责这项“罪恶的共谋”，这个不知名的、无所不在的和危险的组织严重地骚乱了善良公民的安宁。在这种情况下，骑士团的总干事斯蒂芬斯发出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来考虑公开骑士团名称的得失，目的是为了保护它免受报纸、牧师和公司资本对它的猛烈攻击和诽谤”。会议于 1878 年 6 月在费拉德尔菲亚举行，公布了骑士团的名称、目的和原则宣言。

同年，劳动骑士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里丁举行，成立了名叫“总会议”的中央执行组织。

从这时以后，骑士团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在总会议于 1879 年 9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据报告说已成立了七百多个地方会议，可是报到的只有一百零二个。1883 年，劳动骑士团团员达到五万二千多人；1884 年增加到七万一千人；1885 年增加到十一万一千人。1886 年，劳动骑士团达到鼎盛时代。这年的罢工热狂和劳资纠纷造成了新会员大批加入骑士团的热潮；成立了几百个新的会议；每天接纳各行各业的数以千计的新会员，据各种估计劳动骑士团这年的会

员总数为五十万到八十万。

紧接着劳动骑士团的不寻常的发展时期而来的，是反动时期。骑士团在 1886 年罢工中的多次失败造成了不满情绪，当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这时前后创立时，大量会员脱离骑士团而加入这个新的组织。据说，1891 年劳动骑士团团员总数不到二十万人，并且日益减少，目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很少几千人就是骑士团剩下的全部人马。

骑士团创始人斯蒂芬斯担任总干事直到 1879 年，这年特伦斯·波德利当选继任，后者连续担任该职到 1893 年，被索夫林接替。

劳动骑士团在 1878 年通过了第一个原则宣言。它在实质上是乔治·麦克尼尔为 1874 年罗彻斯特劳工大会准备的纲领^①。

宣言的序言部分开头这样写道：

“大资本家和大公司的惊人发展和进攻，如不加以制止，必将造成劳苦大众的极端贫困化和绝望的屈辱。

“如果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全部幸福，就必须制止不公平的积累和集成财富的为非作歹的势力。”

^① 《社会主义者报》第四卷第十期发表了执笔人以笔名“洛马”写的原文件的文笔更加豪迈的不同文本。作者是社会主义者，曾是杰出的“骑士”，他说，1881 年有一次他向老斯蒂芬斯询问这个问题，得到如下的回答：“在我约三十年前游历全欧洲时，我结识了名叫埃卡留斯的一个伦敦成衣工人。后来，当我组织费拉德尔菲亚裁衣工人工会时，我常常收到这位成衣工人的许多宣传鼓动小册子，其中有这个‘宣言’。我以前没有看过这本小册子，但我发觉它差不多包含了所有我曾想到的东西，因此在我起草本团原则宣言时，我曾大量利用这些材料。”斯蒂芬斯提到的埃卡留斯是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并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他寄的小册子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劳动骑士团还声明它的目的之一是：“确保工人完全享有他们创造的财富，”此外还向国家提出下面的要求：

“（四）公共土地即人民的遗产应保留给真实的移民；不再给铁路或投机者一亩土地；现在为投机目的而占有的一切土地应课以达到其全部价值的赋税。”

“（十八）政府应根据土地征用权通过购买以占有一切电报、电话和铁路；今后不发给任何公司修筑或经营任何运送消息、旅客或货物的工具的特许状或许可证。”

宣称骑士团当前的任务之一是设立合作工厂，“这种工厂通过采用合作工业制度将逐渐代替雇佣劳动制度。”

这个原则宣言在实质上从没有作任何特别的变更或修改。这个文件的激进语气，尤其是上面援引的几段，往往使人认为劳动骑士团是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但事实上它并非如此。毫无疑问，骑士团的创始人是对社会问题抱激进观点的，就象斯蒂芬斯和他早年的同事的公开言论所显示的那样。显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这个原则宣言多半表达了他们的真实观点，但后来几年，特别是从特伦斯·波德利握权以后，它就成了空文，社会主义者试图在骑士团中取得立足点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早在 1881 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些领导，其中包括党全国书记菲利普·范·帕顿，参加了骑士团，党的正式机关报反复表示同情劳动骑士团的目的和宗旨。但是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纯粹是精神上的，只在九十年代初期骑士团已经趋于衰落时，社会主义者才在该组织内获得一点真实的势力。在纽约市，一个叫做“不断向上俱乐部”的地方会议几乎

完全是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其他许多地方组织也都同情社会主义。189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控制了纽约区会议，即劳动骑士团从前著名的第四十九区会议，并成功地使它的某些党员当选为参加总会议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击败波德利在这年的再次当选，他们在骑士团中的影响很大，以致新当选的总干事索夫林答应任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名党员担任骑士团正式机关报《劳动骑士日报》的编辑。这个诺言没有履行，因而引起索夫林为一方同骑士团中社会主义者的领袖、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机关报《人民报》编辑丹尼尔·德·莱昂为另一方之间的激烈争论。由于这场争论，协会于18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拒绝接受德·莱昂作为第四十九区会议的代表出席大会。该区的大部分成员退出骑士团，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劳动骑士团之间的一切关系遂告断绝。

(三) 美国劳工联合会

劳动骑士团的最后目的是把美国全体工人联合成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不是行业的，而是地区的；它严格实行中央集权，总会议是骑士团内一切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不容许在它当中存在全国工会。这种组织形式、在骑士团的秘密面纱揭去后仍然存在的一切复杂的仪节，以及它的负责人的专断作风，大大损害了该组织进行实际劳工斗争的效力。对骑士团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881年一些全国劳工组织的代表为了成立自治劳工组织的联盟以互相支持和促进劳工的共同利益，号召举行“国际的和全国的工会、职工委员会和地方工会”

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于 1881 年 11 月 15 日在匹兹堡举行，创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和工会联合会”。该联合会在这个时期没有被看作劳动骑士团的劲敌，在协助成立这个新组织的一百零七名代表中至少有四十八人是代表劳动骑士团地方机构参加大会的。

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882 年 11 月在克利夫兰举行，参加会议的只有十七名代表。劳动骑士团没有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了一项规定联合会宗旨的决议，这就第一次吹起了两个组织间敌对的调子。决议包括旨在反对劳动骑士团的下面一段话：

“联合会力求达到工人的工业上的团结，其办法不是制定一个固定不变的、划一的、不顾他们的经验或需要、适用于全体的组织计划，也不是使现有的组织对立或企图破坏现有的组织，而是维持现有组织中的一切必要的部分并扩大它们的范围，这样，各组织可以在不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情况下，在和自己有关的一切问题上同其他组织共同行动。”

第三次代表大会于 1883 年 8 月在纽约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二个组织的二十七名代表，其中有一名妇女，代表全国劳动妇女同盟。对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来说，意味深长的是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共和党和民主党公布它们下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表明它们对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法律、各全国工会合并和成立全国劳工局等问题的态度。

联合会第四次年会于 1884 年 10 月在芝加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二十五名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雇佣童工的决议。

大会也谴责了纽约高等法院，因为它曾经宣布，禁止在普通公寓内制造雪茄的法律是违宪的。但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和影响最深远的举动是通过一项决议，这个决议说，“自 1886 年 5 月 1 日起，八小时应成为法定工作日，一切劳工组织应准备这样做。”

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885 年 12 月在华盛顿举行，参加会议的只有十八名代表。作了为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进一步准备，但在其他方面，会议记录是没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联合会发动的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鼓动宣传以及工业繁荣，已经鼓励工人普遍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现有工会的队伍迅速扩大，新的组织纷纷成立。

在这同时，劳动骑士团和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和工会联合会之间的对立发展为公开敌对。联合会作了一些使各部分力量和解并统一起来的努力，但是它的提议始终遭到骑士团的拒绝，后者坚持他们狭隘的和寡头的组织形式。结果，有一些对两个组织的效能表示疑惑的守中立的工会号召在 1886 年 12 月 8 日在俄亥俄州哥伦布举行劳工组织的独立代表大会。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和工会联合会号召于 12 月 7 日在同一地方召开它的代表大会，从而显示了它的外交的敏锐性。在这里，附属的和非附属的、代表着三十一万六千四百六十九名会员的二十五个全国组织的代表为了共同目的举行了会议。

老联合会解散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建立起来，代替了前者。

代表大会彻底修改了老联合会的原则宣言和组织章程，任命由五人负责的执行委员会，规定较大的收入，并选举塞缪尔·冈珀斯为首任主席。

联合会在改组之后大踏步前进。它于1887年举行年会，据正式报告，参加会议的有代表着六十一万八千名会员的五十八名代表。

在圣路易举行的1888年代表大会规定1900年5月1日为重新开始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总运动日。一年后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社会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①通过了类似的决议，从此5月1日成为国际劳动节。

联合会的决议执行了一部分。1900年，被遴选领导运动的木匠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举行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兄弟会在一百三十七个城市获得胜利，使四万六千多个同业工人得到利益。雪茄制造工人和德国排字工人约在两年前就已获得了相似的工时缩减。

联合会第十次年会于1890年12月在底特律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八十三个组织的一百零三名代表。主席报告说，前一年颁发了二百八十二张凭照，并且一些全国组织在同一时期成立了九百多个分会；自从1889年代表大会以后，曾举行一千一百六十三次罢工，其中九百八十九次获得胜利，九十八次折衷解决，只有七十六次失败。

联合会获得舆论拥护，彻底击溃了劳动骑士团。从1887年以后，它的会员总数为六十万人左右，但从1891年以后，年年都有新的增加。

^① 指第二国际成立大会。——译者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原则和宗旨宣言在语气上比劳动骑士团的保守得多，但是前一组织肯定仍是两者中比较激进的一个。

劳动骑士团是用保密的借口和一套复杂的仪式把自己同未入会者隔绝开来的贵族组织。另一方面，联合会始终是一个民主的组织，常常自由地公开地讨论引起其注意的、触及到全国劳工利益的一切劳工问题，并且一贯和资本家进行公开的斗争。

主要由于这些理由，联合会从一开始就成为社会主义者看中的活动领域。在 1881 年协助创立该组织的一百零七名代表中，有六人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者；甚至联合会主席、后来成了它最坚决的反对者的塞缪尔·冈珀斯那时对社会主义也很有好感。有些报刊甚至把他划入社会主义者一类。

联合会历次代表大会都或多或少有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他们尽力抓住机会宣传自己的理论。

在 1885 年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提出了主张工人阶级采取独立政治行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被击败，但在下次年会上，联合会以大多数通过，决定号召会员“热诚支持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运动”。

在联合会以后的每次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者都设法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他们的理论让全体讨论，特别是在 1890 年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得到了极彻底的处理。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前的夏季，纽约中央劳工联盟向美国劳工联合会申请凭照。这个申请遭到拒绝，理由是该组织所属组织名单中有社会主义工人党“美国人支部”的名字。冈珀斯先生声明，这

是直接违背联合会组织章程第五章第四条禁止加入政党的规定的。

中央劳工联盟请求把这个决定提交代表大会讨论，并派了“美国人支部”的代表卢西恩·萨尼亚尔参加大会为这个请求提出论证。

辩论进行了很长时间，颇为激烈。社会主义者论证说，从一般的意义来说，他们的组织不是一个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专门致力于劳工利益的一个组织；它参加政治活动不过是它为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斗争时一件附带的事情。

另一方面，冈珀斯及其追随者则论证说，一个政党就是一个政党，不管它的最终目的如何。这个争点决不是直接从赞成社会主义这一点推断出来的。一些代表明确声明，他们不反对社会主义或独立的政治行动，但是他们将投票反对接纳萨尼亚尔，理由是他们反对把政治活动引进联合会。可是就整个来说，关于接纳中央劳工联盟的最后投票——五百三十五票赞成，一千六百九十九票反对^①——大概是当时联合会中社会主义力量的很好的考验。

在联合会 1893 年芝加哥代表大会上，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向联合会提出了社会主义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托马斯·摩根提出下面的决议案：

“鉴于英国工会主义者根据经验和发展的逻辑，采取了劳工进行独立政治活动作为他们经济行动的辅助手段的原则；

“鉴于这种行动已经产生了极其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 联合会代表大会的投票是比例代表制，每个代表对所代表的每一百名选民可投一票。

“鉴于这种劳工独立政治活动是以下列纲领为基础，即：

“（一）义务教育；

“（二）直接立法；

“（三）法定八小时工作制；

“（四）工厂、矿山和休息所的卫生检查；

“（五）雇主对伤害健康、身体或生命的责任；

“（六）废除一切公用事业中的合同制度；

“（七）废除血汗制；

“（八）市内电车以及向公众提供光、热和动力的煤气厂和发电厂收归市有；

“（九）电报、电话、铁路和矿山收归国有；

“（十）一切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归人民集体所有；

“（十一）一切立法由公民投票决定的原则；为此，

“决议：本代表大会兹赞成我们英国同志的这个政治行动；

“决议：本劳工政治运动的纲领和基础因而应提交美国劳工组织考虑，并请它们派遣代表携带关于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指示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下次年会。”

双方都很认真地和熟练地讨论了这个决议，但社会主义者在辩论中显然占了优势：这年工业危机带给工人的普遍贫穷使代表们更易于接受激进的社会观点，并且，这个决议要求就它的最后通过举行全体会员投票这一点，使它的反对者处于尴尬的境地，不能让他们的选举人考虑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决议被相当的多数所通过，次年，联合会所属的许多劳工组织的会员对它进行了讨论和投票。社会主义者始终自称这

整个决议是经这次群众投票以压倒多数通过的；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敌手却否认这种说法。双方的论点都没有充分的证据，因为联合会于1894年12月召开的下次代表大会上，当这个决议案再次由代表们根据他们所奉的指示进行表决时，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士终于用巧妙的手法避开了这个争执。当就纲领第十条——要求一切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归集体所有——这一决议案实质问题举行投票时，突然提出了一个替代的决议案，后者要求把公共土地只授予真正的土地耕种者。经过一些辩论，这个替代的决议案被通过，而原来的提议因此被它所代替。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以某种决议案的形式被提到美国劳工联合会以后接连三次的年会上讨论，这种决议案平均约有四分之一代表投票赞成。

最后，1898年在联合会召开的堪萨斯城代表大会上，在击败了克利夫兰的马克斯·海斯提出的一个社会主义决议案后，用下面的话明确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我们相信，组织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的美国工会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声明反对在各自工会的会议上讨论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们受托反对赞成或实行党派政治、宗教歧视或种族偏见。我们认为研究和讨论与其工业自由或政治自由有关的一切问题是工会会员的责任。”

（四）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自从1890年以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个别党员没有得到党的正式领导机关的准许或同意，曾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大

会上屡次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战斗。党的公认的领袖们和正式的党报从底特律代表大会萨尼亚尔事件以后就撤回了他们对联合会的支持和同情，而许多著名的党员如芝加哥的托马斯·摩根、克利夫兰的马克斯·海斯和费拉德尔菲亚的马伦·巴恩斯则在联合会中继续努力灌输社会主义原则，以丹尼尔·德·莱昂为首的党负责人发起了夺取劳动骑士团的运动，其结果前面已经提到。

当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劳动骑士团在 1895 年 11 月终于分裂时，前者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发现自己和两个现有的全国性工会组织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

《人民报》编辑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骑士团中短暂的但颇不平静的生活经验，已使他们非常沮丧。他们放弃了一直要把这些“腐败的”组织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一切希望，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敌对的组织——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当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最初提出计划要控制劳动骑士团时，他们劝诱基本上是由德国工人和犹太工人组成的纽约市一些抱友好态度的工会加入骑士团。即使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骑士团最后破裂之后，这些工会仍然忠于该党；1895 年 12 月当德·莱昂公开断绝同骑士团的关系并要求这些工会退出该团时，其中绝大多数听从了这个要求。

劳动骑士团的这些退团者形成了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核心，而同情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他工会也起而效法。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其存在的头两三年内，颁发给各劳工组织二百多张凭照，这些劳工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拥有二十

七个工会的纽约中央劳工联盟，拥有二十五个工会的纽约希伯来人联合工会，拥有十二个工会的布鲁克林社会主义劳工联合会，拥有七个工会的纽瓦克社会主义劳工联合会，以及由八个工会组成的一个芝加哥中央组织。

此外，联盟在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罗得岛、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斯和其他州有若干地方组织，据说它在全盛时代的会员超过二万人。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是一个工会组织，但原来是要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种辅助组织的。

同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骑士团的见解正相反，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更加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而不十分注意他们的经济斗争；它邀请社会党各“支部”派代表参加它的地方工会代表会议；它请该党派代表出席它的代表大会，坚决要求每一地方和全国负责人保证“他决不加入任何资本主义政党，也不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外的任何政治行动”。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的组织形式同劳动骑士团几乎如出一辙。单独的组织叫地方联盟，一个城市的一些地方支部组成一个区联盟，组织的最高权力赋予总执行委员会。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它那矛盾的和相当含糊的宗旨，它那高度中央集权的和陈旧的体制，使它无力进行实际的劳工斗争，它那领袖们的独裁政策使该组织为所属的许多最重要的组织所厌弃。最先退出联盟的组织是布鲁克林和纽瓦克的酿酒工人工会，因为总执行委员会曾要求它们同它们的全国组织断绝关系。别的工会很快效法酿酒工人工会。在联盟于1895年12月至1898年7月4日发给凭

照的二百二十八个组织中，只有一百一十四个在它第三次年会于 1898 年 7 月在布法罗举行时仍然存在，而这一百一十四个中又只有五十四个向联盟缴纳会费^①。布法罗代表大会之后不久，联盟的最强大的组织纽约中央联合工会分离出去，于是前者只剩下一小批会员。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它在我国工会运动中不起作用。

^① 斯通：《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1900 年纽约出版。

第四章 今日社会主义

一、形成今日社会主义的力量

十九世纪最后十年这个国家的工业和政治生活中的许多事件，为在我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工业集中的倾向从没有这样显著。劳埃德在 1894 年报道说^①，“煤炭联营的资本不下五亿美元，石油联营即使不是整二亿美元，也与此相近，其成员都是领袖人物的其他联营的资本也共有好几亿美元。在西北部铁路和起卸机企业中有几亿美元组成一体，同小麦种植者相对抗。在家畜和肉类方面，资本不下一亿美元；在威士忌酒方面资本达三千五百万美元，在啤酒方面资本比威士忌酒超出很多；在糖业方面资本达七千五百万美元；在皮革方面资本在一亿美元以上；在煤气方面，达数亿美元……大约有一百亿美元向美国铁路要求红利和利息。它们一年年地越来越实行密切的联营。”

这些巨大的资本结合产生了把劳动大军组织到上述每个工业部门中去的结果。大托拉斯产生了强大的工会。阶级界限越来越明显，阶级斗争愈来愈剧烈，规模愈来愈大。几乎年年都有几起劳资大纠纷。

这个惊人的十年的初期特别充满了这种纷争，我们不想对它们作充分的叙述，只提一下这个时期一些最著名的罢工。

^① 亨利·劳埃德：《财富对联邦》。

这一系列罢工中引起普遍注意的第一起是1892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卡内基公司钢铁厂爆发的罢工。

霍姆斯特德是由安德鲁·卡内基和他的伙伴建立的约有一万二千居民的城镇，它的人口主要是钢铁厂的职工。他们被组织在钢铁工人混合联合会中，他们的习惯一直是通过他们同雇主的定期协议来确定工资。这些协议中的最后一个于1892年6月30日满期。当期限快到时，厂主宣布削减工资，要求这个新的标准在1月而不是在6月满期。职工拒绝了这些建议中的条件，主要理由是他们不能在隆冬停止工作，并且，如果在协议期满时削减工资，他们就不能抵制工资再度削减。接着闭厂，于是进行了战斗。

雇主对斗争决不是没有准备的。几个星期前，这个公司的现任经理弗里克先生用三英里长、十五英尺高的篱笆把工厂围起来，还在篱笆上面罩上一层倒刺铁丝网。职工们把这种防御工事叫做“弗里克堡”。

雇主的下一步骤是运来三百名武装到牙齿的雇佣警探，他们于7月6日清晨由水路抵达。这些打手的来到造成了我国工人斗争史上几乎前所未有的骚动和流血事件。罢工纠察员刚看见装运雇佣警探的船只，就发出警报。罢工者从梦中惊醒，几分钟内河边挤满了没有穿上衣和没有戴帽子的、带着手枪和步枪的人群，下狠心要阻止雇佣警探登岸。可是后者似乎并没有看出局势的严重性。他们试图采取威胁态度和用他们闪闪发光的左轮枪对准罢工者来吓唬他们。接着是一刹那的紧张期待，于是船上突然放了一枪，有一个罢工者受了重伤倒在地上。罢工者队伍报以怒吼和枪弹，因而双方大放排

枪。罢工领袖们试图平息群众的怒火和制止残杀，但是没有收效——无法控制罢工者。战斗进行了好几小时，之后，雇佣警探从河岸撤回船舱。他们密不通风地呆在那里，忍受酷热的七月的骄阳，岸上愤怒的群众继续对他们射击，直到他们最后缴械投降。他们被罢工者囚禁在溜冰场，晚间他们被火车送出该镇。双方死了十二人，重伤二十多人。这件惨案之后，霍姆斯特德实行戒严，州的军队驻扎在该镇好几个星期，大显威凛。这场斗争以罢工者失败而告终。

当霍姆斯特德的罢工仍在进行的时候，遥远的西北部爱达荷州克达伦区爆发了几乎同样激烈的斗争。该区蕴藏丰富的银矿和铅矿，长期以来一直由矿工自己个体或小集体开采经营。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些矿山吸引了企业资本家的注意。它们被收买并被组成辛迪加，从前独立的矿工沦为雇佣劳动者，而且他们的工资不断下降。矿工组织起来，他们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遭到拒绝，因此他们举行罢工。他们的位置很快被人填补，接着罢工者和工贼便发生武装战斗，结果双方死伤若干人。罢工者继续控制局势，把工贼逐出矿山。他们有一千二百多人，武装齐备，而全部州民兵队名义上只有一百九十六人。在这个危急关头，州长请求调派联邦军队，后者立刻大批地前往。罢工遭到镇压，领导人被捕下狱。官方起诉说矿工工会是一个非法的组织，要求把它解散。

在上述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内，在我国两个相距很远的地方——布法罗和田纳西——同时爆发了两起新的大规模劳工斗争。

布法罗罢工。——1892年，纽约州议会制定了限定铁路

员工十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人们拼命游说要使这个法律获得通过，认为它不但是对旅客的安全措施，而且是对过劳职工的救助措施。但是，当它最后被制定时，它载有一条“附加条款”，规定容许公司强制职工加班加点而给以额外报酬。这个条款起了使整个法律无效的作用。公司削减职工的工资足够支付加班加点的额外报酬而绰绰有余，结果铁路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一些，而他们的工时则依然如故。

遭受这种情况损害最大的职工是扳道工人，除去进餐的时间外，他们往往连续工作三十六小时。在布法罗，几条铁路雇佣的扳道工人共有四百多，1892年8月13日，这些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公司想另雇工人代替罢工者的企图未能得逞，罢工范围扩大，布法罗四周的铁路交通被断绝。居民同情扳道工人，斗争初期征召的地方民兵队似乎不想干预他们的“纠察员”。当铁路官更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强迫不大情愿的警察局长请求州长调遣军队时，罢工者的前途看来很光明。在四十八小时内，几乎全州的民兵——约八千人，而罢工者只有四百人——出现在斗争现场，形势立刻改变。在民兵保护下，公司得到了代替罢工者的人手。罢工者通常使用的纠察和其他战斗方法没有被容许利用，斗争的主要力量被破坏，因此于8月24日宣布罢工结束。

约在同一时期，本质上有所不同的情况引起田纳西州煤矿区的劳工斗争。在那里，发生了矿山雇佣犯罪劳工的纠纷。根据该州监狱制度，当局若干年来惯常按照每年订立的契约把罪犯——主要是有色人种的犯人——出租给矿主，并且同一矿山往往既雇佣犯罪劳工又雇佣自由劳工。这种竞争和令

人感到耻辱的伙伴关系是矿工经常不满的根源，身强力壮的田纳西人不止一次地反对，并用武力把罪犯赶出矿山。

除了行动的规模更大之外，1892年的纠纷不过是同样事件的重演。第一场小冲突在特拉西城发生，那里的自由矿工抓了约三百名徒刑工人，把他们全部释放，但烧了他们的棚子。两天后在英曼铁矿，8月17日在奥利佛泉煤矿，18日在科尔溪，重演了同样的行动。

州长派出的几队民兵在途中被俘，被解除武装后放回；电报线被切断，路轨被拆毁。矿工完全控制了矿场，最后全州民兵都集中到了矿区。于是罢工者被击败，并遭到无情的惩处。发出了逮捕运动的所有领导人的逮捕状。几天之内逮捕了不下五百人，教堂和学校被改成牢狱，提出许多有关杀害、暴动、阴谋等诉状。暴动被镇压下去，田纳西恢复了安宁。

但是，这个时期罢工中影响最深远和最轰动一时的乃是1894年普尔曼罢工即芝加哥罢工。

普尔曼是1880年著名的花车制造商乔治·普尔曼在芝加哥附近建立的。它是一个工厂城镇，有“模范”公寓、学校、教堂、商店和一个图书馆，它们全为普尔曼花车公司所有，出租给该公司的职工。它不是象欧文著名的新兰那克那样的慈善性质的实验，而是纯粹的实业，一种颇为有利可图的实业。公司不仅高价供给房客房间，而且高价供给房客煤气、水以及其他一切必需品和生活舒适品。同时，职工工资非常微薄，全镇始终欠公司许多债。1894年春季，职工单单欠公司房租一项就达八万美元，他们往往在从工资中扣除房租后便无钱支付其他的生活费用。

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普尔曼花车公司又宣布削减工资，平均至少约百分之二十五。职工不同意削减，因而被解雇。工人代表作了多次努力想劝导普尔曼公司把争执提交仲裁，然而这一切建议所碰到的，只是公司方面固执而不变的声明：“我们没有什么要仲裁的。”

这个局面延续了好几个星期，于是美国铁路工会过问了这件事情。

由于尤金·德布斯的不倦努力，美国铁路工会 1893 年 6 月在芝加哥创立。它是各铁路职工组织的结合，据说 1894 年会员至少有十五万人。普尔曼公司的职工组织参加了该工会，并且当后者于 1894 年 6 月在芝加哥举行年会时，它又任命一个委员会要求普尔曼公司把他们职工的不满提交仲裁。公司没有理睬这个委员会的要求，因此代表大会在热烈掌声中决定抵制普尔曼式车辆，并拒绝在挂有这种车辆的任何列车上工作。

这时斗争日益扩大。在职工方面，罢工是由很有才干和胆识的尤金·德布斯领导的，而各铁路公司的运动是总经理协会指挥的。罢工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与时俱增。几天之内，所有芝加哥、辛辛那提、克里夫兰、俄马哈、旧金山和中西部各州的其他许多重要地方的铁路交通都告瘫痪。肉类和农产品的运输大大减少，全国许多工业陷于瘫痪。当美国一些法院进行干涉，发出禁令禁止罢工者对普尔曼式车辆实行抵制时，美国铁路工会似乎已经胜利在握。芝加哥法官伍德和格罗斯卡普首先颁发禁令，其他一些州的法官起而仿效。

当美国总统由于州长阿耳特吉耳德的坚决主张，派遣联

邦军队进入伊利诺斯州时，当接着他向芝加哥城、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华盛顿州、科罗拉多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新墨西哥和犹他两个准州地区的善良公民发出布告，要求他们维持治安和退回他们的住宅时，形势变得更加严重起来。这些布告、联邦军队和州民兵队的来到实际上把全国广大地区置于戒严之下。但是，尽管采取这些强硬措施，或者说也许是因为这些措施，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和暴力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芝加哥地方检察官在美国司法部长奥耳尼的指示下召集了特别大陪审委员会，后者找到了一个阴谋陷害德布斯和其他罢工领袖的诉讼事由。这些人立刻被捕，缴了重金才获保释。刚被释放，他们便因蔑视法院罪重新被捕。这次德布斯和他的同志拒缴保释金，因此被送往库克县监狱听候审讯。罢工被破坏。德布斯后来向奉命调查这场著名劳工斗争的美国罢工委员会作证说，“打败我们的，不是铁路，也不是军队，而是美国法院的势力。”

在这次罢工中，打死十二人，被州警察局逮捕的五百十五人，被美国法院逮捕的一百九十人。布雷兹特里特估计这次罢工给全国造成的损失约为八千万美元。

同年9月，德布斯因蔑视法院罪受审，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关在伍德斯托克监狱。

这样简短地叙述的罢工，决没有详尽地论述了作为十九世纪末年特色的劳资间一系列剧烈的斗争。类似的罢工不时在全国各地发生，其中大多数实质上表现了同样的特点。它们的规模浩大，往往震撼了国家的整个工业基础。就大部分来

说，它们的时间虽短，性质却颇为激烈，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由于地方警察、州民兵队或联邦军队的驰援而被镇压了下去。首先在芝加哥罢工中显出巨大效力的禁令被视为解决劳资争议的手段而迅速流行起来，成为随着一切重大罢工而来的正常手段。在晚近政治史上起了这样突出作用的“凭借禁令的政府”一语即起源于这个事实。

除了极少数例外，罢工都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

这些事件造成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对现制度的相当不满，因而使他们更易于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对社会的不满也不完全限于城市工人。我国农村居民也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农民经济状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铁路线的发展和运输设备的惊人进步为我国农产品开辟了一个全国市场，农民象城市制造商一样被有效地吸引到工业竞争中去。使这个竞争对普通美国农民造成更悲惨后果的是西部应用最新农具致获巨利的大农场的出现。建立在它们的业主往往以虚假的理由从政府获得的大片土地上的这些农场，用精良的机器大规模地耕作，储存丰富，能够比它们较小的竞争者毫不费力地出售价廉的农产品。农产品价格不断跌落，而农具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价钱越来越昂贵。

于是，农民发觉一年年地越来越难以收支相抵，放债的人应运而生。抵押田地的做法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1890年我国田地抵押债务的总额至少达十亿零八千五百九十九万五千九百六十美元，这项债务的利率在百分之七以上。据编纂的调查报告书统计，这年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农民拥有未抵押的田地。其余百分之五十三中的百分之三十四的农民在别

人的农场做工，剩下百分之十九的农民都已抵押了他们的田地。地租和利息使农民的少得可怜的收入减少到最低额，凭确实根据编制的这个报告书说，美国农民平均净收入每年为二百美元，甚或更少。^①

在这些工业运动的同时，并且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这些运动的结果，一个新的激进的倾向正在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迅速发展着。这个倾向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它极其显著地表现在国家主义运动和平民党运动方面。

国家主义运动是贝拉米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顾》出版的直接结果。

爱德华·贝拉米于1850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契科皮瀑布地方，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他研究法律，但不久就放弃该业而从事更称心的新闻记者职业，写了几本小说，只获得有限的成功。1887年他出版了《回顾》一书。据说，该书的原意并没有打算论述当前的社会问题或工业问题。著者只想写一本关于普遍和谐与幸福的滑稽的神话。但是随着写作的发展，他的主题便带有比较现实的倾向和直接的应用。这位小说家渐渐变为改革家，而这本小说则变成一本社会和政治论著。

当贝拉米写这本书时，他是不熟悉现代社会主义哲学的。他的见解和理论是他自己的观察和推论的结果，象其他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制定了一项主要以一个既定的主张为枢纽的完整的社会计划。就贝拉米来说，这个主张就是“为维持社会而需要一支产业大军，正象把保护的责任托付给一支军队一样”。他问道：“有什么推论可能比这更加明显、更加

^① 西蒙斯：《美国农民》，1902年芝加哥出版。

沒有疑問呢？为了破坏的目的而证明是那样行之有效的计划，一旦用于目前处在极端混乱状态的生产活动方面，也可能发生良好的作用，这难道说不值得我们研究么？”

在现代社会主义哲学中占有那样重要地位的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理论，在贝拉米的体系中是找不到的。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个适当和方便的问题；他不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阐明者，而是一个社会发明家。

这种特点在一本科学著作中本来会是缺点的根源，但它决没有减损这本小说的成功。《回顾》的文笔是轻松愉快的；它具有独出心裁的魅力，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该书立刻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名著。几年之内它单单在我国就销售了五十多万册，并被译成几乎所有现代的文字。

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在波士顿创立了一个“贝拉米俱乐部”，1888年该俱乐部改名为“国家主义俱乐部”。这是国家主义运动的开端。模仿波士顿俱乐部的其他俱乐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据报道1891年至少有一百六十二个国家主义俱乐部。“国家主义”一词的起源，由贝拉米作如下的解释：

“……这叫做国家主义，因为它是通过工业国有化（包括同一原则的较小规模的应用）、地方事业的市有化和州控制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含有工业社会化的意思。这可以建立或可以不建立在全国结构的基础上，可以含有或可以不含经济平等的意义。同社会主义相比，国家主义是一个解说，它并不意味着反对或排斥社会主义，而是使社会主义精确起来，其所以必要，是由于历史上在社会主义一词上面形成了一片含糊的和有争论的含义。”

国家主义俱乐部主要是宣传组织。在政治斗争中，它们活动不多，偶尔提出一些独立的候选人，然而更经常的是和平民党人合作。

平民党运动创始在堪萨斯州，为了成立一个新的政党，1890年4月在那里发出了召开一切激进分子代表大会的号召。代表大会于同年6月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农民联盟、劳动骑士团、单一税俱乐部和其他改革组织的九十名代表。成立了“堪萨斯州人民党”，它在以后的州选举中胜利地获得了州议会下院的多数议席。运动迅速蔓延到所有西部、中部各州及南部一些州。全国代表大会于1891年在辛辛那提举行。参加大会的至少有一千四百十八名代表，可是他们主要来自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密苏里州和内布拉斯加州。

1892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俄马哈举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更有全国代表性。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会议提名了独立的总统候选人，并且通过了党纲。

人民党主要是小农的组织 and 为小农利益服务的组织，多半是在从事农业的西部和中西部发展起来的。但是，固然运动的领袖和提倡者承认他们党的这一性质，并在他们的所有纲领和公开宣言中特别强调农业人口的利益，他们却知道，如果没有东部产业工人的支援，党就不能希望在全国政治活动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们始终努力争取后者的支持。

俄马哈纲领宣称：“财富属于创造财富的人，取自工业而没有付以等价物的每一元都是掠夺……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

在 1892 年总统选举中，人民党为它的总统候选人韦弗将军总共争取到一百多万张选票，1894 年它的选票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万四千三百十八张。但在 1896 年，当民主党凭借赞成自由铸造银币的纲领提名布赖恩为候选人时，平民党人没有提名竞争的候选人，而是支持了布赖恩先生的提名。这实际上是人民党的寿终正寝，而运动往后的历史是迅速瓦解的历史。在 1896 年联合后，平民党大部分党员实际上仍然是民主党的附属品，同时比较激进的分子即所谓中间路线平民党人从母组织分离出来，成立他们自己的政党。在 1900 年选举中，他们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巴克先生所获得的选票稍稍超过五万张。

和上述改良运动相联系，还必须提一下基督教社会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学派。两派于现在所述的这个时期在美国出现，它们虽然在程度上并没有同国家主义或平民主义一样对社会和政治观点发生影响，却仍然对我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形成作出了某种程度的贡献。

在欧洲国家，基督教社会主义学派存在了半个多世纪，表现了不同的形式和特点。在美国，这个运动最早是在 1889 年明确地出现的，当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协会在波士顿成立；不久就在主要是东部的其他几个城市成立了分会。

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学说可用下面录自该协会原则宣言中的声明加以概括：

“一、我们认为，上帝是人类一切进步的泉源和指导者，并且我们相信，一切社会、政治和工业的关系应本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和按照他的教义，建立在上帝的父慈和人的手足之谊

的基础上。

“二、我们认为，现在的工业和商业制度不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等等。

声明该协会的宗旨是：

“（一）表明社会主义的目的高于基督教的目的之中。

“（二）使基督教徒了解，耶稣基督的教义直接导致社会主义的某种特定的形式或一些形式；因此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责任，必须老老实实服从基督，致力于基督教社会原则的实现。”

该协会从没有获得很大的影响，它经过几年的生存挣扎以后终于解散了。

我国这个运动的最杰出的人物有威廉·布利斯牧师、乔治·赫伦教授和理查德·伊利教授。布利斯先生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协会的组织和最积极的工作者之一。他办了《黎明》月刊好几年，在该刊物上提倡社会主义纲领的通常的政治策略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相结合。赫伦教授在衣阿华学院担任应用基督教讲座，并在许多书籍和小册子中、公开讲演和讲座中阐述他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抨击现行制度，但始终不提积极的行动纲领。他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政治性质的，还不如说是伦理性质的。后来几年，赫伦教授无保留地声明赞成革命的社会主义，他现在是社会党的一个积极的党员。

1894年夏季，伊利教授和赫伦教授在纽约州乔陶夸地方创立了美国基督教社会学学会，它的目的是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在各教堂和大学里散发书籍和进行宣传。伊利教授担

任会长，赫伦教授主持教导，康芒斯教授为秘书。该学会有很大影响和许多书籍，但由于牧师和各大学讲师对赫伦教授所教导的激进主义提出抗议而终于失败了。埃德温·惠洛克创立的芝加哥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地方影响。赫伦教授辞去衣阿华学院的教职，实际上结束了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这一段历史。

美国的费边主义运动只能被认为是想模仿英国费边社的活动而没有成功的一次尝试。后者是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特别为了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教育方面于1883年在伦敦创立的。它的会员向一些俱乐部和团体发表了许多讲演，出版并散发了许多小册子和论文集，其中有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论丛》，并且促成了伦敦和联合王国其他城市若干重大的市政改革方案的实施。

美国费边社于1895年创立。它在纽约、波士顿、费城、旧金山和其他一些地方设有分社。该社发行了一些小册子，有一段时期办了一种名为《美国费边主义者》的月刊。运动的领导人是布利斯牧师和劳伦斯·格朗伦德。

所有这些运动和当时其他改良运动不过昙花一现就消逝了，但是它们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痕迹。

由于这些运动的兴起和鼓动，合众国各地成千成万的美国公民养成了研究社会问题的风气。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见解并断绝他们和旧政党的关系，当改良运动一个接一个地瓦解时，它们从前的信徒中许多人就转向社会主义。

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瓦解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作为学究式的思想而非作为群众运动时创立的。社会主义者人数不多，他们多半是过去在欧洲国家、主要是在德国形成他们的社会见解和哲学的人。他们和美国人民只有很少的接触，几乎完全局限在他们自己狭小的圈子内活动。运动的这个性质反映在他们的组织上面：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管理方式和议事方法与其说是群众的政党的，还不如说是研究者和学者的团体的。

可是，这个组织对于大约二十年的时期来说是完全足够的了。运动在那个时期在本地人民中间没有什么进展，党成长得很慢，它所吸收的无论什么新党员都逐渐被同化了。

但是，前一章叙述的事件引起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性质的巨大变化。运动是从它到那时为止所局限的狭窄范围内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很快就变得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它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组织形式并不适合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传统，它教条式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原则和严格执行党纪的做法不适于吸引刚改变信仰的社会主义者群众。如果该党想要保持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就需要有一番彻底的改变。不过，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它的领袖们并不了解这种形势。在他们自己的循环不已的错误思想支配下的长期活动，已使他们成为鼠目寸光的人。他们总把自己的党看做是少数精选的人的特权，很不愿意向群众开放。他们怀着恶意的猜疑看待所有的新党员，丝毫不肯放松党的严厉要求。

他们对我国工会运动的态度也同样是毫不调和的。当社会主义职工联盟最初创立并使 1896 年的代表大会大吃一惊时，有些代表对这一改变怀有很大的疑虑，担心这个组织只会引起现有工会的反对而自己则不会有什么成就，担心它会终于造成党和我国工人运动其余部分之间的疏远。

但是这些疑虑被联盟发言人的反复保证消除了。他们保证联盟无意干涉现有的组织，并将使它的活动限于把无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作范围。

可是，代表大会刚刚闭会，这些诺言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在组织无组织的工人的工作方面简直毫无成就，而且不管它曾获得的怎样一点力量都是来自现有的工会的。此外，联盟并不常常对它的组织手段和方法抱很慎重的态度，它甚至被指责在某些罢工过程中把工贼都网罗进去。这个行径自然激起有组织的劳工对联盟的敌视，并且这种敌视扩展到针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因为后者被认为实际上是和它二位一体的。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关在几年之内终于使党处于同有组织的劳工以及党组织之外的一切社会主义分子和半社会主义分子对立的地位。

党负责人的这个政策并不总是得到党员赞成的，偶尔还听到抗议的呼声。但这种反对只是更加强了党领导人的顽固不化的态度。对党内外没有严格依照他们的正统社会主义原则和策略概念办理的一切事情展开了无情的斗争。丹尼尔·德·利昂编辑的党的机关报《人民报》和雨果·伏格特编辑的《前进报》各版每星期都满载着猛烈的攻击文章，谴责“腐败透顶的工会”以及它们的“无知和阴险的领袖们”，抨击平民党

的、国家主义的和其他改良主义的“骗子手”。

与进行讨伐党外“骗子手”运动的同时，开始了“清洗”党员的运动。如果说党的负责人以前是厉行严格纪律的人，那么他们现在就变成了偏狭的狂热者。对他们政策的任何批评都被他们愤怒地斥为叛逆的行径，凡和他们不同的意见都被污蔑是异端行为，而犯这类错误的人则都遭到无情的打击。不服从的党员成批地被开除，顽抗的“支部”被粗暴地勒令停止活动。这个正如卢西恩·萨尼亚耳后来描述该制度的特点时所说的“滑稽的恐怖时代”，继续了好几年，在1899年它达到了党员终于起来反抗它这样严重的地步。

首先发表公开反叛论调的是同党的机关报刊进行论战的《纽约人民新闻》。争论的直接原因是《人民新闻》责备该党对工会的态度；但是随着论战的继续，该党领导机关的全部政策和方法都被扯了进去。报刊每出一期，辩论就愈加激烈。党员或者站在论战者的这一方，或者站在论战者的那一方，党的总部所在地、《人民报》和《人民新闻》的出版地纽约市的社会主义者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领导机关派”和“反对派”。

在这种情况下，1899年7月来到了，同时也到了选举新代表参加“纽约支部”总委员会的时候。这次选举对对立的两派来说具有超过地方的重要意义。1896年代表大会曾授与纽约市选举和罢免全国书记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权力，而后者又接着选举了党机关报的编辑。因此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掌握了左右整个形势的关键，选举势必表现出两派力量的对比。

这个争论一直是一场激烈的争论，人们带着强烈的兴趣

等待它的结果。新的总委员会于7月8日举行会议，立刻表明反对派处于多数地位。委员会在它的工作方面没有进行多久。关于临时主席的提名造成了敌对阵营间剧烈的冲突，会议在一片混乱声中散会。

同日夜间，反对派代表发出召开委员会特别会议的号召。会议于7月10日举行，参加的只有反对派的代表，它以断然的手段处置了党的领导机关。宣布全国书记、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人民报》编辑的职位出缺，当场选举了他们的继任者。非常积极参加推翻旧领导机关的亨利·斯洛博丁当选全国书记，他在今后时期中以巧妙手腕和慎重态度指导了党的困难重重的航道。

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斗争现在正认真地进行着。被免职的党负责人声明总委员会的行动无效，并继续执行职务。由总委员会选出的党负责人坚持他们的当选是合法的，并着手履行他们的职责。两方都各自称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每一方有它自己的全国委员会、自己的书记和总部，并且各自出版叫做《人民报》的报纸。

除了目前这场斗争更加坚定和激烈外，形势和恰好十年前由于免除罗森堡和他的同事所造成的形势多少有点相似。

起初，党领导机关在争论中明显地占了上风。反叛者实际上只限于纽约市，而全国的支部很少知道争论的是非曲直，其中许多支部根据一般的原则忠于旧的党负责人。可是，后者并不具有始终抓住他们的有利条件的必要手腕。他们对自己的追随者的独裁口吻以及对反对者的辱骂政策，使一些支部在它们究竟忠于哪个委员会方面犹豫不决，这些支部终于

一个个地转到反对派那边去了。

这是 1899 年大选临近时的情况。两派都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每一方都声称只有它的候选人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的提名。在纽约州，这个争论告到法院，法院作了有利于以旧的党负责人为首的一派的判决。

这是对反对派的一个严重打击。毫无疑问，这派当时得到党员大多数的支持，其中有些是最著名的党员，并且它已经几乎把全部党报都争取到它一边。这个组织稳步地建立起来，不久就在工人运动的某些地区重新获得了党过去由于它的前负责人实行错误的工会政策而失去的同情。虽然有这一切，但它的合法存在和身分过去一直被笼罩在重重怀疑之中，现在既然法院驳回了它要求沿用该党名称的申请，这派便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状态。为了结束这种混乱状态，全国委员会发出召开支持它的领导机关的各支部特别代表大会的号召。代表大会在罗彻斯特城举行，会议的性质和它完成工作的效率超过了它的发起人最乐观的期望。参加代表大会的有五十九名代表，会议连续举行了五天。有关原则、组织和政策的问题都受到极其彻底的研究和讨论。修订了党的方法和策略，在更接近地符合运动的现代要求的基础上改组了党。

差不多可以算作罗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第一个行动的，是谴责社会主义职工联盟，并宣布它同情不分隶属何种全国性组织的一切工会的斗争。

代表大会还通过一个新的纲领，这个纲领只作了极小的修改就成了现在社会党的纲领，并且制订了党务的一套新的管理细则。

但是，罗彻斯特代表大会远为重要的行动是为该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铺平道路的下列决议的通过(参看下节)：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在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之际向美国社会民主党致以兄弟般的祝贺。

“鉴于过去几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已经消除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一切原则和观点的分歧，并且两党现在在它们的纲领、策略和方法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

“鉴于全体美国社会主义分子的和谐一致的行动有利于顺利地战胜资本主义的联合力量；

“决议：本代表大会感到，社会主义利益将通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迅速合并成为一个强大、和谐与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途径而获得最大的帮助；

“决议：我们号召我国两党队伍中真诚而明智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伟大目标面前抛弃一切无聊的野心和个人偏见，进行两党统一的谈判——不是两个敌对阵营意义上的政党，各怀获得最大私利的目的进行和平谈判，而是平等意义上的政党，前此各自为共同事业进行工作，现在则真诚地力求为有利于这个事业的光荣而持久的联合提供适当的基础；

“决议：为达到两党在上述基础上的联合，本代表大会任命一个九人委员会作为社会主义联盟常设委员会，直到这个问题获得明确的解决；

“决议：授权该委员会派遣一名或若干名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党下届全国代表大会，以便将本决议通知该党并请该党任命一个同样的委员会；

“决议：联盟联合委员会制定的任何联合条约，包括党的名称、纲领和组织章程的问题，提交两党进行总投票。”

这个决议以五十五票对一票通过，根据决议规定立刻选出了九人委员会。

闭会之前，代表大会处理了参加下届总统竞选运动的候选人提名。加利福尼亚州的乔布·哈里曼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和不倦的工作者，由于在太平洋海岸从事宣传鼓动而在党内颇负盛名，他被提名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中同样有声望的俄亥俄州的马克斯·海斯，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但是，鉴于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尚在谈判之中，不能认为这些提名已属最后确定，因此授权合并委员会，在形势需要时得变更候选人名单。

三、社会党

前节所叙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狭隘政策产生了两重影响：使运动的许多老工作者感到不平而大批退党，使该组织在刚改变信仰的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丧失威信。

因此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后，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从社会主义工人党队伍中兴起。它散布于全国，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它被团结在韦兰德的《未来的国家》和后来的《向理性呼吁》两家周刊这种事业的周围，这两个周刊的销路达到我国任何社会主义刊物不能相比的数量；它表现在诸如田纳西州腊斯金合作移民区这类社会主义移民区的建立，以及若干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协会的

成立方面。

可是，运动缺乏鲜明性和结合力，非常需要一位得力的孚众望的领袖来集合分散的分子并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组织中去。一个名叫尤金·德布斯的人终于证明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

德布斯过去一直是对社会问题持激进见解的人，芝加哥大罢工给他的经验适足以加强这种激进主义。他利用伍德斯托克监狱中强迫的空闲时间研究社会问题和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结果出狱时他就有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

在 1896 年竞选运动中，他仍然支持布赖恩先生为候选人，但到了 1897 年 1 月他便公开声明他改信社会主义。

美国铁路工会这时除了仍旧忠于德布斯的少数人外，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曾经是强大组织的这个残存部分按照政治路线加以改组，并决定同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组织“合作共和国兄弟会”实行联合，而后者是不久前由《未来的国家》组织成立的。

两个组织的联合代表大会于 1897 年 6 月 18 日在芝加哥城举行，结果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党。

该党的目的和见解最初有点不成熟和不明确。它的原则宣言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的主要活动特点是促进相当冒险的移民计划。该党发起的这个新计划是在某一西部州移民，夺取州政府并在州范围内采用社会主义制度。指定了由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城的欣顿上校、密执安的博兰和马萨诸塞州的威拉德组成的移民委员会。征集了购买土地的基金，1898 年 5 月委员会宣布它已完成安排，根据这些安排党

将用二十万美元在科罗拉多州克里普耳溪地区获得约五百六十英亩土地，并且只须付五千美元现款。

社会民主主义党的移民计划向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者打开了党的大门，甚至有一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希望利用它来宣传他们的理论。

但是，与这个运动同时发展的，是党内确实的社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和力量渐渐增长起来。社党主义工人党的许多从前的党员和好些整个支部加入了这个新的组织，这些党员和支部与以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维克托·柏格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某些著名领袖共同发起，用普通的社会主义宣传和政治活动代替党的移民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898年6月7日在芝加哥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有七十名代表，代表着党的九十四各个分支组织，并且立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与移民问题相对立的政治活动问题上势必发生一场对阵战。

辩论是在讨论纲领委员会的报告时展开的。当时提出了两份报告，多数派的报告赞成放弃移民计划，采取通常的社会主义宣传方法，而少数派的报告则鼓吹移民是党活动的最显著的特点。辩论持续到早晨两点三十分，这时举行投票，结果五十三票赞成少数派的报告，三十七票赞成多数派的报告。投票刚举行，被击败的少数就照预定计划全体退出代表大会会堂，于是移民派完全控制了会议。后者通过了它的纲领，选举了它的负责人，然后闭会。这个组织以后在华盛顿州建立了两个无关重要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然后悄悄地消亡。

在这同时，三十七名反对派的代表举行会议，成立一个名为“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新党。在沒有讨厌的移民鼓吹者参加的情况下，新党着手从它的纲领中排除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它按照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路线组织起来，并选举了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由尤金·德布斯、维克托·柏格、杰西·柯克斯、西摩尔·斯特德曼和弗雷德里克·希思组成。

此后两年，这个年轻的党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在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纽约州、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伊利诺斯州、威斯康星州、密苏里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提名州候选人或地方候选人。在1899年秋季选举中，它初次把社会主义议员詹姆斯·凯里和刘易斯·斯凯茨选入马萨诸塞州议会，同年12月，马萨诸塞州哈佛里尔的社会民主党人选举约翰·蔡斯为该市市长，而库耳特则也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当选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市长。该党还在马萨诸塞州和威斯康星州一些城镇胜利地获选了若干市参议员、镇议会议员和校务委员。当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00年3月6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时，它声称约有登记党员五千人。

党所计划的代表制对政治性代表大会来说是一种相当新奇的代表制。每个党员都有在他自己选择的代表或代理代表的证书上签名的权利，而每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所得的票数和他证书上的签名数一样多。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六十七名代表，在他们证书上个人签名的总数有二千一百三十六人。

代表大会上最引人注意的论题是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罗彻斯特派合并的问题。会议第二天，后者由俄亥俄州的马克斯·

海斯、加利福尼亚州的乔布·哈里曼和纽约州的摩里斯·希尔奎特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正式进行谈判。他们真诚地要求社会主义力量统一起来的主张和他们对整个运动将从统一获得的利益的热情描述，一回又一回地为掌声所打断。大多数代表是带着对这问题的坚定决心参加代表大会的。不需要对他们论证或劝导；他们热烈赞成统一，竭力主张立刻采取措施以达到这个目的。

可是，无保留地或无条件地热烈要求统一的愿望只限于广大的代表。党的领袖们对这问题比较慎重。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名称他们是听不入耳的；他们对新的盟友的动机和诚意有点害怕，因此他们打算尽可能围绕着统一谈判设置重重防线。他们同意指派一个九人委员会同社会主义工人党相应的委员会举行会谈，制定象罗彻斯特决议所要求的那种统一计划；但他们建议把联合委员会的讨论结果提交两党分别复决，因此，只要二者之一不赞成这整个计划，它就可以拒绝，从而挫败建议中的统一。他们还坚决主张新的组织沿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

这些建议是长时间激烈辩论的题目，结果以一千三百六十六票对七百七十票被否决。于是选举了一个九人委员会，被授与全权同罗彻斯特派相应的委员会安排统一的条件。为了确保和平条约，提名社会民主党的尤金·德布斯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乔布·哈里曼为他的竞选副手，条件是这些提名将代替罗彻斯特代表大会的提名。

两党委员会联席会议于1900年3月25日在纽约市举行，两个组织合并的实际工作这时才认真开始。

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为约翰·蔡斯、詹姆斯·凯里、玛格丽特·黑耳、弗雷德里克·希思、霍恩、西摩尔·斯特德曼、威廉·布彻尔和洛内甘。维克托·柏格也是委员会委员，但没有参加会议。

社会主义工人党派的代表是马克斯·海斯、乔布·哈里曼、摩里斯·希尔奎特、西弗曼、马伦·巴恩斯、贝纳姆、芬纳、怀特和斯通。

会议举行了整整两天，非常认真地讨论了党的名称、组织章程、候选人和纲领等问题。最后两个问题实际上不经辩论就解决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代表大会的提名获得批准，罗彻斯特纲领再次被通过作为新党的原则宣言，而社会民主党制定的“要求”则作为这个文件的附录。

但是，党的名称和总部这两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并且有时是激烈的争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以感情和便利为理由坚持保留他们党的名称，而其他代表则竭力说明统一社会党这个名称更能表现新组织的性质。最后达成折衷办法，决定把两个名称提交两党党员共同表决。

党的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从两党党员中各遴选五人组成全国临时十人委员会。就整个来说，委员会的工作是和谐的，当联席会议闭会时，除了要把讨论的结果提交党员进行总表决加以批准这个手续之外，两党的统一实际上已告完成。但是出于意外的事情即将再次发生。在联合委员会委员结束他们的使有关各方显然都感到满意的辛勤工作以后，刚刚过了一个星期，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发表一个宣言，指责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背信，并号召他们的党员拒

绝联合条约。

这个文件激起两党队伍内部的抗议风暴，并引起全国执行委员会支持者和统一支持者之间的长期剧烈的不和。当最后检点关于宣言的投票票数时，社会民主党负责人宣布，统一问题已为他们的党员以一千二百十三票对九百三十九票所否决，因此该党将继续单独存在。

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解决争端。社会民主党队伍内部的统一支持者，他们当中的党的统一委员会的多数，否认执行委员会所采取的程序的合法性，并不再承认它有代表党的权力。他们接着对联合统一委员会建议的条约举行投票，并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罗彻斯特派和社会民主党拥护统一派批准这个条约之后，他们就开始实行它的规定。

不管它是想解除反统一分子的武装还是由于任何其他理由，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被总投票通过了，投赞成票的不但有社会民主党拥护统一的党员，而且有社会主义工人党绝大多数的党员，因此新党采用了这个名称。这样一来，我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混乱状态达到了顶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分裂为二。后者维持了它在纽约的总部；前者在芝加哥和斯普林菲尔德各有一个总部，这些党和派别各有一班全国负责人马，彼此进行论战。仿佛是要格外突出这种情况的不合理似的，总统选举临近了，而各式各样社会主义者的提名还处于无法形容的混乱状态。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机关派提出了它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约瑟夫·马隆尼和副总统候选人宾夕法尼亚州的雷默耳。

党的罗彻斯特派原先提名哈里曼和海斯为它的候选人，

但是如同前面所说的，后来改为德布斯和哈里曼。可是，后一候选人名单是在这样的假定下提出的，即罗彻斯特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完全统一是确实可靠的了。但是这时，当统一谈判已经失败的时候，反对统一派即芝加哥派发现敌对组织的一个成员乔布·哈里曼在它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上，而拥护统一派即斯普林菲尔德派则发现对方的尤金·德布斯在它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上。社会民主党的敌对两派决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方针——保留联合候选人名单并在竞选运动期间维持带有默契的休战。虽然存在着这种不幸的局面，社会民主党的两派还是进行了蓬蓬勃勃的和热烈的竞选运动，它们的候选人在这第一次全国竞选运动中获得了九万七千七百三十票，超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其全盛时代团结一致为候选人竞选时所获得的票数。

社会民主党两派在很短的竞选运动期间为联合候选人名单所做的协调工作，比过去一切旷日持久的谈判更有助于实现它们之间的真正统一。党员已经懂得要更加仔细地互相了解，他们互不信任的模糊情绪消除了。在这次选举运动之后，两派再没有理由或借口要继续单独存在，为了成立一个统一的党，芝加哥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召开一切社会主义组织联合代表大会的号召。除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纽约派外，斯普林菲尔德派、一些独立的地方和州组织以及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组织都响应了这个号召。当代表大会于1901年7月29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时，发现参加大会的各组织所代表的登记党员不下一万人。代表制和前次印第安纳波利斯代表大会所采用的是一样的。一百二十四名代表有六千六百八十三名

党员签名的证书。其中，斯普林菲尔德派有六十八名代表，持有四千七百九十八名党员签名的证书；芝加哥派有四十八名代表，持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名党员签名的证书；而三个独立的州组织共有成员三百五十二人，派了八名代表。

代表大会注意到从前联合统一委员会辛勤劳动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决定不再作任何尝试，而是当时当地完成一切安排，以便参加大会的组织最后合并起来。

为此，通过了新的纲领（参看附录 I）和组织章程。总部从从前发生纠纷的地址迁到圣路易，在从前争论中没有大露头角并为一切有关方面满意的利昂·格林鲍姆当选全国书记。

这次代表大会是我国社会主义者历来所召开的最大的和最有代表性的全国会议。代表当中有在社会主义运动各个时期一直很活跃的人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不久以前参加运动的著名人士。波多黎各的社会主义组织派了它们自己的一名代表，而决不是代表中最不聪明和最不热心的三名黑人的出席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社会主义也已经开始在有色人种中间生根。

代表大会的成分也足以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百二十四名代表中只有二十五人即约占百分之二十的代表是外国出生的；所有其他的代表都是美国本国人。社会主义已不复是输入我国的舶来品。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是若干独立的和多少有点独立的组织的一次会议；它闭会时则是一个团结的和和谐的党。

这样创立的党所采用的名称叫社会党。

四、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状况

现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两个政党做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党，而社会党在某些州（特别是在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政治上又通称社会民主党，这是由于这些州的选举法的特别要求。

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从 1899 年分裂的影响下恢复过来。虽然“领导机关派”在使用该党名称权利的诉讼中获得对“反对派”的法律胜利，但是它的胜利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实际利益。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大多数失去对党领导的信任，转而同情和支持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后的行动和政策也决没有希望恢复已失去的信任。

已经引起自己队伍内部公开分裂的它对工会的敌对态度和它那极端僵硬的纪律，这时变成了它单独存在的唯一借口，并且被加剧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1900 年 6 月，党在纽约市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整整开了一个星期。代表大会的记录所表现的特点，是对党的分离者和一切“单纯的”工会近乎幼稚的谩骂，对后者仇恨的顶点表现在实际上全体一致投票通过的下列决议中：

“如果任何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接受单纯的职业组织或劳工组织的职务，他将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怀有敌意，应予开除。如果单纯的职业组织或劳工组织的任何负责人申请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应予拒绝。”

在 1900 年总统选举中，党获得的选票从它在 1898 年大选中获得的八万二千二百零四票减少到三万四千一百九十一

票。同时，党内不断加紧地继续进行“清洗”；州组织、“支部”和个别党员同样地因种种异端行为被开除出党，由于新党员增加得太慢，党的队伍不断削弱。

关于目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报道很不充分，但从宽估计约有三千人。

党在纽约市出版英文日报《人民报》和几种外文周报。

由于没有工人运动的支持，由于自己队伍内部存在着不断倾轧的状态，社会主义工人党显然正在衰落，它从政界最后消失看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与此同时，自从1901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代表大会以来，社会党一直大踏步飞速迈进。

本书付印时，党全国书记威廉·梅利先生告诉我：党在至少三十四州有完备的州组织，在合众国的所有别的州和准州地区有地方组织。估计加入党的地方组织约为一千二百个，它的登记党员总数超过二万人。

但是，社会党的登记党员和正式组织不能说是衡量它的实际力量的公平尺度。要对这一点形成适当的概念，我们还必须考虑它的政治立场、它对我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和它的报刊。

如同前节所述，该党在1900年初次参加全国政治活动时，德布斯和哈里曼获得选票约十万张。这个票数在次年春秋两季选举中大大增加，但由于这些选举是地方性的，选票没有完全报道或计算。

可是，在1902年国会选举中，出于大家的意外，社会党获得的选票将近二十五万张之多。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同一选举中获得的选票略超过五万张。

当然，这个意外胜利，一部分必须归于这年夏秋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影响深远的长期罢工所产生的群情激昂的结果。但是，如果认为社会党人获得大量选票全是这件事情的偶然产物，那就错了。社会党人在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没有受到煤矿工人罢工影响的地方所获得的选票，与在最近的巨大劳工斗争地区获得的选票几乎是一样引人注目的。

况且，当1903年春季地方选举来到和罢工热情已完全消失时，人们发现社会党人获得的选票并未减少，恰恰相反，而是大大增加了。

如果把现在社会党人获得的选票同过去转瞬即逝的各种改良政党获得的选票相比拟，那也是很不稳妥的。

在若干主要之点上，社会党人获得的选票和其他改良政党获得的选票有所不同。第一，它不限于我国的任何一个具体地域。例如，平民党的主要力量是在西部，绿背纸币党的主要力量是在中西部，而统一工党则从东部获得主要支持。然而，社会党人获得的选票正象当然可以从运动的性质预料到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分布于全国，其重点均匀地分布于各工业地区。

改良政党的选票通常只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增加到巨大的数目，并且同样飞快地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数目；但是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加得比较缓慢，然而正常的和逐步的。没有疑问，正是这种平均的分布说明了这样的情况，即社会党虽然获得二十五万张选票，却至今没有能够使它的候选人当选任何

重要的全国职位或州职位。

1848年，自由土地党获得约三十万张选票，若干人当选国会议员，其中有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1880年，绿背纸币党获得同等的选票，有八人当选国会众院议员。社会党获得的选票超过特拉华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罗得岛州、佛蒙特州和怀俄明州的总票数，但没有一人当选国会众院议员，只有八人当选州议会议员——马萨诸塞州三名和蒙大拿州五名。

可是，该党在地方政治活动中一向是比较成功的。去年它的候选人当选马萨诸塞州两个制鞋业城市布罗克顿和哈佛里耳的市长，此外还当选威斯康星州希博伊甘市长和蒙大拿州阿纳康达市长。它还约有五十名候选人当选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斯州、密执安州、威斯康星州、堪萨斯州、衣阿华州、印第安纳州、蒙大拿州和科罗拉多州若干城镇的市参议员或镇会议员，以及上述各州其他二、三十个市的官员，并且很可能将看到社会主义在我国初次实际运用于市政改革方面。

该党在工会运动中获得的成就几乎同它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一样大。近几年来，工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对社会党表现了日益增长的同情，但是它们没有一次象在我国有组织劳工的两个最大组织的上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得那样明显。

在1902年6月，落矶山诸州和淮州地区大多数工会的联合会、共有会员约十五万人的西部工会在丹佛举行年会。在同时同地，参加上述工会的最强大组织当中的两个组织西部矿工联合会和旅馆饭店职工联合会也举行了它们的年会。所

有三个代表大会所讨论的主要题目都是它们所代表的组织和社会党的关系，它们讨论的结果是：所有三者都声明赞成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同意社会党作为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的代表，并通过该党的纲领。

西部工会同时拒绝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关于两个组织合并的建议，因为后者持有保守的观点。它把自己的名称改为“美国工会”，从而表示了它想把它的活动扩大到西部范围以外的意图。该组织差不多同样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它的正式机关报《美国工会日报》也同样是两个运动的拥护者。

同年 11 月，美国劳工联合会年会在新奥尔良举行。社会党代表象他们过去在该联合会历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提出了赞成社会主义的议案。这次的议案如下：

“决议：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十二次年会劝告工人组织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来取得自己劳动的全部等价值和推翻雇佣制度。”

该议案引起了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终于以三千七百四十四票对三千三百四十四票被否决。

该议案的目的不在于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因此无论它被接受还是被拒绝，对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实际重要意义的。但是，它是对美国劳工联合会队伍中社会主义情绪的力量的一种测验，代表大会全部投票中的差不多整整半数赞成所提出的决议这个事实是社会主义在该组织内部迅速发展的确证。

党报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情绪普及的另一有力证据。在过

去年代里，社会主义工人党觉得很难，有时甚至无法维持仅仅一种英文周报。现在，代表社会党的报刊有四种月刊，即《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威尔什尔杂志》、《同志》和《南方社会主义者》，以及二十种英文周报。后者分布如下：加利福尼亚州计有《加利福尼亚社会主义者》、《洛杉矶社会主义者》和《人民报》；科罗拉多州有《落矶山联盟》；伊利诺斯州有《芝加哥社会主义者》；爱达荷州有《爱达荷社会主义者》；印第安纳州有《劳动者》；衣阿华州有《衣阿华社会主义者》；堪萨斯州有《向理性呼吁》；肯塔基州有《纽波特社会主义者》；明尼苏达州有《公民投票》；密苏里州有《未来的国家》和《圣路易劳工报》；纽约州有《工人报》；俄克拉何马州有《俄克拉何马社会主义者》；俄亥俄州有《俄亥俄社会主义者》；宾夕法尼亚州有《伊利人民》；华盛顿州有《社会主义者》和《新时代》；威斯康星州有《社会民主先驱》。

在这些报刊中，据认为只有《向理性呼吁》的销数超过二十五万份。

该党的德文报刊中有三种日报，即《纽约人民新闻》、《费城日报》和《辛辛那提工人新闻》，以及七种周刊。

代表该党的还有如下文字的各一种报纸：宾夕法尼亚州沙勒尔瓦的法文报《工人联盟》，芝加哥的波兰文报《劳动者》，芝加哥的捷克文报《正义》，佛蒙特州巴里的意大利文报《石匠》，纽约的瑞典文报《工人》，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匈牙利文报《公民投票》，以及纽约的希伯来文报《前进》。

社会党内部正在认真讨论在美国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创办英文日报的计划，不久将在纽约开始，党现正在那里着手筹集

创办基金。

除去上面列举的纯属党的刊物外，还有许多工会报刊以及各种激进报纸和杂志，它们多少公开地同情社会主义，并在政治运动中支持社会党的候选人。

1900年社会主义运动手册^①列举了三十多种这样的刊物，毫无疑问，今天这种刊物的数目是更大了。

因此，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过去几年在范围和影响方面已大大发展起来了。它已深入广大的美国工人群众中间，它正在其他阶级的居民中获得支持者，并正迅速地传播于全国。很明显，运动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它充分发展的程度。现在报道不断地传来，成员和支持者有新的增加，报纸销数有新的增加，选举获得新的胜利，如果这一切迹象不是骗人的话，在今后很短几年内社会主义将是我国强劲有力的因素。

^① 芝加哥克尔图书公司出版。

附录 I 社会党纲领

美国社会党值此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重申坚持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并宣布它的目的是把工人阶级和同情它的阶级组成一个政党，以期夺取政府的各项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来把现在的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改变为全体人民的集体所有制。

从前，生产工具简单，为个体工人占有。现今，机器则是改进了的和更加发达了的生产工具，为资本家占有而不是为工人占有。这种所有制使资本家能支配产品并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

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是工人阶级生活日益不稳、贫穷和苦难的原因，它把社会分成两个敌对的阶级——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曾经有势力的中产阶级正在互相竞争中迅速消失。现今，斗争在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着。生活资料的占有使资本家得以控制政府、报刊、圣职和学校，并使他们能把工人在智力上、体格上和社会上降低到劣等地位，在政治上降低到卑屈地位，在实际上降低到被奴役的地位。

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工人阶级的生命轻如鸿毛地为利润而遭受牺牲，国家之间酿成战争，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受到鼓励，并准许毁灭整个种族，以便资本家扩大他们在国外的商业统治权和加强他们在国内

的霸权。

但是，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同样的经济原因正导致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将消灭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造成这种新的和较高的社会秩序的积极力量是工人阶级。所有其他阶级，尽管它们表面上或实际上存在着矛盾，对维护财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却同样抱有兴趣。民主党、共和党、资产阶级主张公有制的政党和不主张完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其他一切政党，同样都是资本家阶级的政治代表。

工人能通过自己组成一个政党的途径在其反对资本主义集体力量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阶级最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这个工人的政党是不同于并且反对有产阶级组成的一切政党的。

当前的要求

一方面我们宣称经济条件的发展有助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和方式也要视无产阶级所达到的发展程度而定。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促进达到这个目的，支持工人阶级改善其状况和选举社会主义者担任政治公职的一切积极努力，对社会党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所以我们主张采取这样的手段：

一、不但垄断公司、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控制的一切工业要实行公有，而且一切运输交通工具和其他一切公用事业也要实行公有。这样一些工业的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来削减资本家阶级的财产税，而是要全部用于增加职工的工资和缩短工时，用于改善服务事业和减少消费者的捐税。

二、为了减少劳动产品中资本家的份额和增加工人的份

額，要逐漸縮減工時和增加工資。

三、州或國家對勞動人民實行保險，以防不測事件、失業、疾病和老年生活困難；用於這方面的基金征自資本家階級的收入，並由工人階級監督管理。

四、為了使工人獲得他們的全部勞動產品，創立公有工業制，並為此而使用國家貸款。

五、州和市教育機關供給全部書籍和衣食。

六、男女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七、實行創制權、復決權和比例代表制，給予選民以罷免其代表的權利。

但是，在主張採用這些手段作為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合作共和國的辦法時，我們告誡工人階級提防資本家為了更可靠地剝削其他工業而不是為了改善工人階級狀況，企圖利用所謂公有制運動來獲得政府對公用事業的控制。

附录 II 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值此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重申一切人对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让与的权利。

我们和美利坚共和国的创立者抱有同样的意见，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保证一切公民享有这种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社会状况来看，我们还认为，在本质上是破坏生活、自由和幸福的经济不平等制度下不可能行使这种权利。

我们和本共和国的创立者抱有同样的意见，认为真正的政治理论是政府机器必须为全民所有并为全民所控制；但是，从我们工业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还认为，真正的经济理论是生产机器同样必须属于全体人民。

显而易见，特权阶级的存在，该阶级统治下政治的腐败，公共财产、公共特权和公共职能之归该阶级所独占，以及各个最强大的民族卑微地依赖于该阶级的状况，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我们的经济专制制度是和我们的政治民主制度直接对立的。

而且，由于民主政治堕落成为财阀统治的一部分，劳工被夺去纯由他们生产的财富，被剥夺自我劳动的手段，并且由于雇佣奴隶制的强迫怠惰，劳工甚至被夺去生活必需品。

财阀为了实行统治就这样糟蹋人力和自然力。

为了把人民置于被奴役的地位，就使愚昧和苦难以及随

之而来的一切罪恶永久存在。

他们使科学和发明从用于人道的方面转而用于对妇女和儿童的奴役。

社会主义工人党再一次声明反对这种制度。它再一次重申它的原则声明：生产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工具两者的私有制是一切经济奴役和政治从属关系的明显的根源。

这样的时候快要来到了：在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中，这个制度一方面由于它的失败和危机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托拉斯和其他资本主义联合企业的建设倾向，将自取灭亡。

因此，我们号召美国雇佣劳动者和其他一切诚实的公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旗帜下组成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团体，这个团体知道它的权利并决心用取得公共权力的方法来获得这些权利；所以只要在当前阶级斗争最困难的状况下以不屈不挠的团结一致的精神联合起来，我们就能消灭阶级，把土地、一切生产资料、运输工具和分配手段交还给作为集体的人民，并以合作共和国代替目前的无计划生产、工业战争和社会混乱的状态，从而迅速结束这个残忍的斗争；一切工人将在其中自由发挥才能并充分享受其才能的利益的一个共和国，势必由于一切现代文明的因素而繁殖起来。

译名对照表

一、人名

三 画

马尔香 Marchand
马切特, 查尔斯 Matchett, Charles H.
马圭尔, 马修 Maguire, Matthew
马提斯, 科格内蒂·代 Martis, Cognetti de
马隆尼, 约瑟夫 Malloney, Joseph F.

四 画

韦兰德 Wayland, J. A.
韦弗尔, 詹姆斯 Weaver, James B.
戈德温, 帕克 Godwin, Parke
瓦尔特 Walther, H.
瓦尔特, 奥托 Walther, Otto
瓦尔特斯豪森, 萨尔托里乌斯 WALTERSHAUSEN, Sartorius
瓦特豪森 Waterhausen
冈珀斯, 塞缪尔 Gompers, Samuel
贝尔丁, 累谬埃尔 Belding, Lemuel C.
贝尔特兰德 Bertrand
贝纳姆 Benham, G. B.
贝拉米 Bellamy
比梅勒, 莱维 Bimeler, Levy

比斯利 Beesly
巴扎尔的 Bazard
巴克曼 Bachmann, M.
巴枯宁, 米哈伊尔 Bakounin, Michael
巴洛, 弗朗西斯·钱宁 Barlow, Francis Channing
巴恩斯, 马伦 Barnes, J. Mahlon
巴特勒, 本杰明 Butler, Benjamin

五 画

汉森 Hansen
平克, 凯莱布 Pink, Caleb
艾伦, 约翰 Allen, John
艾伦, 威廉 Allen, William
艾伦伯格 Eilenberg, E.
艾克霍夫, 安东 Eickhoff, Anton
艾威林, 爱德华 Aveling, Edward
艾威林, 爱琳娜·马克思 Aveling, Eleanor Marx
本杰明, 帕克 Benjamin, Parke
左尔格 Sorge, F. A.
布里斯班, 艾伯特 Brisbane, Albert
布利斯, 威廉 Bliss, William D. P.
布彻尔, 威廉 Butcher, William
布朗, 查尔斯 Braun, Charles
布莱克 Black

布赖恩 Bryan
卡内基, 安德鲁 Carnegie, Andrew
卡贝, 埃田 Cabet, Étienne
卡尔 Carl, C.
卡尼, 丹尼斯 Kearney, Denis
卡姆普 Kamp, A.
卡梅伦 Cameron, A. C.
卡累尔, 埃米尔 Kaler, Emill
史迪威, 赛拉斯 Stilwell, Silas
史密斯, 约瑟夫 Smith, Joseph
皮博迪, 伊丽莎白 Peabody, Elizabeth P.
尼夫 Neef
尼比, 奥斯卡 Neebe, Oscar W.
圣西门, 查理 Saint Simon, Charles
边沁, 杰里米 Bentham, Jeremy
加布里埃尔 Gabriel, A.
加里, 约瑟夫 Gary, Joseph E.
加里波的 Garibaldi
弗里克 Frick, H. C.
弗里切 Fritsche
弗鲁曼, 沃尔特 Vrooman, Walter

六 画

米查姆, 约瑟夫 Meacham, Joseph
西弗曼 Sieverman, F. J.
西耳维斯, 威廉 Sylvis, William H.
西蒙斯 Simons, A. M.
托伦, 亨利 Tolain, Henri L.
托娄, 亨利 Thoreau, Henry D.
迈尔贝克, 利奥 Meilbeck, Leo
迈耶 Meier, C.
达纳, 查尔斯 Dana, Charles A.
伊万斯, 乔治·亨利 Evans, George Henry
伊利, 理查德 Ely, Richard T.
伍德 Wood

伍德赫尔, 维多利亚 Woodhull, Victoria
伏格特, 雨果 Vogt, Hugo
休伊特, 艾布拉姆 Hewitt, Abram S.
多威, 阿道夫 Douai, Adolph
约纳斯, 亚历山大 Jonas, Alexander
毕晓普 Bishop, O. A.

七 画

沃德, 奥斯本 Ward, Osborne
库克, 威廉 Cook, William
库耳特 Coulter, C. H.
库柏, 彼得 Cooper, Peter
怀特 White, W. E.
玛志尼 Mazzini
麦圭尔 McGuire, P. J.
麦克马金 McMackin
麦克卢尔, 威廉 Maclure, William
麦克尼尔, 乔治 McNeil, George E.
麦克唐纳 McDonald
麦克唐奈 McDonnell, J. P.
麦格林 McGlynn
麦格雷戈 McGregor
克利夫兰 Cleveland
克拉夫林, 田纳西 Claflin, Tennessee
克朗伯格 Kronberg, D.
克腊林格尔 Krahlinger, F.
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李, 安 Lee, Ann
芬纳 Fenner, C. E.
劳埃德, 亨利 Lloyd, Henry D.
杜瑟, 霍默 Doucet, J. Homer
杨格, 布里格姆 Young, Brigham
里克曼 Ryckman
里普利, 乔治 Ripley, George

里普利, 索菲娅 Ripley, Sophia
 肖, 艾伯特 Shaw, Albert
 里昂, 德 Leon, de
 伯里尔, 詹姆斯 Burrill, James
 希尔奎特, 摩里斯 Hillquit Morris
 希林 Schilling, G. A.
 希思, 弗雷德里克 Heath, Frederic
 阿耳特古耳德, 约翰 Altgeld, John
 P.
 阿克赖特, 理查德 Arkright, Richard
 阿特莱, 西尔威斯特 Artley, Sylve-
 ster

八 画

波林 Pawling
 波特利, 特伦斯 Powderly, Terence
 V.
 杰塞普, 威廉 Jessup, William
 拉普 Rapp
 拉萨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
 nand
 拉斐德 Lafayette
 林格, 路易斯 Lingg, Louis
 奈德哈特 Neidhart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戴尔 Owen, Robert
 Dale
 肯尼迪, 约瑟夫 Kennedy, Joseph S.
 肯特, 亚历山大 Kent, Alexander
 易卜生 Ibsen, C.
 罗斯福, 西奥多 Roosevelt, Theo-
 dore
 罗森堡 Rosenberg, W. L.
 罗萨, 罗贝尔特 Rosa, Robert
 罗萨, 奥多诺范 Rosa, O'Donovan
 昂芳坦 Enfantin
 帕克, 西奥多 Parker, Theodore

帕顿, 菲利普·范 Patlen, Phillip van
 帕森斯, 艾伯特 Parsons, Albert R.
 凯尔 Keil
 凯里, 詹姆斯 Carey, James F.
 凯洛格 Kellog
 迪茨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ph
 佩特尔森 Petersen, C. A.
 欣顿 Hinton, R. J.
 欣策 Hinze
 舍维奇 Schewitsch, S. E.

九 画

洛内甘 Lonergan, W. P.
 洛伦茨 Lorenz
 洛克伍德, 乔治·布朗宁 Lockwood,
 George Browning
 施瓦布, 贾斯特斯 Schwab, Justus
 施瓦布, 迈克尔 Schwab, Michael
 施米特, 厄恩斯特 Schmidt, Ernst
 施瑞贝耳特, 鲁道夫 Schnaubelt,
 Rudolph
 施累格尔, 爱德华 Schlegel, Edward
 查尔斯 Charles
 柯克斯, 杰西 Cox, Jesse
 柯蒂斯 Curtis
 柏格, 维克托 Berger, Victor L.
 威尔斯, 乔治·邓肯 Wells, George
 Duncan
 威利赫, 奥古斯特 Willich, August
 威拉德 Willard, C. F.
 威廉, 乔治 William, George
 威廉斯, 伊齐基尔 Williams, Ezekiel
 哈里曼, 约布 Harriman, Job
 哈里森, 卡特 Harrison, Carter H.
 哈斯科尔, 伯内特 Haskell, Bur-
 nette G.
 哈塞耳曼, 威廉 Hasselmann, Wil-

liam

科里,塞缪尔 Cory, Samuel F.
科德曼,约翰·托马斯 Codman,
John Thomas
费希尔,阿道夫 Fischer, Adolph

十 画

海因兹 Hinds
海恩曼,巴巴拉 Heynemann, Bar-
bara
海斯 Hayes
海斯,马克斯 Hayes, Max S.
朗利,艾尔坎德 Longley, Alcxander
诺伊斯 Noyes
诺德霍夫 Nordhoff
泰勒 Taylor
莱布 Leib
莱昂,丹尼尔·德 Leon, Daniel de
莱斯纽尔,查尔斯 Lesneur, Charles
莫尔 More
莫耳肯布尔 Molkenbuhr, H.
莫斯特,约翰 Most, John
格里克 Gericke
格里利,霍勒斯 Greeley, Horace
格劳,弗朗茨 Geran, Franz
格罗斯卡普 Grosscup
格罗特考,保罗 Grottkau, Paul
格林鲍姆,利昂 Greenbaum, Leon
格朗伦德,劳伦斯 Gronlund, Law-
rence
索夫林 Sovereign, J. R.
索瓦 Sauva, A.
索伊伯特 Seubert, F.
埃本-埃策尔 Eben-Ezer
埃卡留斯 Eccarius
埃尔哈特 Ehrhardt, C.
埃利斯 Ellis

埃姆里奇,亨利 Emrich, Henry
埃默森,拉尔夫·沃尔多 Emerson,
Ralph Waldo
恩格尔,乔治 Engel, George
特鲁斯特,杰勒德 Troost, Gerard
钱宁,威廉·埃勒里 Channing, Wil-
liam Ellery
钱宁,威廉·亨利 Channing, Wil-
liam Henry
钱伯斯 Chambers, B. J.
桑巴特 Sombart

十一 画

康芒斯 Commons, J. R.
康泽特 Conzett, C.
勒尔,乔治 Lehr, George
基恩,罗伯特 Keen, Robert W.
菲尔登,塞缪尔 Fielden, Samuel
菲利普斯,温德尔 Phillips, Wen-
dell
萨瓦里 Savary
萨尼亚尔,卢西恩 Sanial, Lucien
萨克斯-魏玛 Saxe-Weimar
萨金特 Sargent
萨姆纳,查尔斯 Sumner, Charles
梅茨,克里斯提安 Metz, Christian
梅利,威廉 Mailly, William
维雷克,路易斯 Viereck, Louis

十二 画

温,西蒙 Wing, Simon
富勒,玛格丽特 Fuller, Margaret
谢特利 Schetterly
普尔曼,乔治 Pullman, George M.
普拉斯特 Praast, R.
博兰 Borland, W. P.
博伊斯特 Beust

博伊梅勒尔 Bäumeler
塔克, 吉迪恩 Tucker, Gideon
雅科比, 弗里茨 Jacobi, Fritz
斯皮斯, 奥古斯特 Spies, August
斯坦顿, 埃德温 Stanton, Edwin M.
斯洛博丁, 亨利 Slobodin, Henry L.
斯莫耳尼卡尔 Smolnikar, A. B.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斯通 Stone, N. I.
斯蒂芬斯 Stephens, U. S.
斯派尔 Speyer, C.
斯派尔 Speyer, J. G.
斯温顿, 约翰 Swinton, John
斯维夫特, 林赛 Swift, Lindsay
斯特拉塞 Strasser, A.
斯特劳伯特 Straubert, F.
斯特德曼, 西摩尔 Stedman, Seymour
斯鲁夫, 古斯塔夫 Srue, Gustav
惠洛克, 埃德温 Wheelock, Edwin D.
惠特克, 詹姆斯 Whitaker, James
惠特利, 托马斯 Whitley, Thomas W.
提耳巴赫, 阿洛伊斯 Tillbach, Alois
黑耳, 玛格丽特 Haile, Margaret
黑塞 Hesse
腓力普, 路易 Philippe, Louis
奥耳尼 Olney
奥托-瓦耳斯特尔 Otto-Walster, A.
奥哲尔 Odger
奥维斯 Orvis
傅立叶, 沙利 Fourier, Charles
骚特尔 Sauter

十三画

塞, 托马斯 Say, Thomas

塞利格, 威廉 Seliger, William
雷蒙德, 亨利 Raymond, Henry J.
雷默耳 Remmel
蒲鲁东, 比埃尔 Proudhon, Pierre J.
赖克特 Reichert, F.
赖特, 弗朗西斯 Wright, Frances
赖特, 露西 Wright, Lucy
赖特, 詹姆斯 Wright, James L.
赖斯, 亨利 Ryse, Henry L.
赖默 Reimer, O.

十四画

豪厄尔 Howell
赫伦, 乔治 Herron, George D.
赫茨卡 Hertzka
蔡斯, 约翰 Chase, John C.
蔡斯, 沃伦 Chase, Warren
蔡斯, 萨蒙 Chase, Salmon P.
裴斯塔洛济 Pestalozzi

十五画

康莱里 Morelly
摩根 Morgan, T. J.
德甘 Degan, M. J.
德布斯, 尤金 Debs, Eugene V.
德怀特, 约翰 Dwight, John S.
德林克沃特 Drinkwater

十六画

霍尔 Hoar, E. R.
霍尔, 爱德华 Hall, J. Edward
霍恩 Hoehn, G. A.
霍索恩, 纳撒尼尔 Hawthorne, Nathaniel

十七画

戴尔, 戴维 Dale, David

戴维斯, 约翰 Davis, John

十八画

魏特林, 威廉 Weitting, Wilhelm

魏德迈耶, 约瑟夫 Weydemeyer, Joseph

魏德迈耶, 奥托 Weydemeyer, Otto

二、专门名词

[外文名词后面注有德、法、意、匈、波、捷、瑞等字样的, 分别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波兰文、捷克文、瑞典文。]

一 画

一千年至福会 Millennial Church

二 画

《人民报》 The People

《人民报》 The People's Paper

三 画

《工人》 Arbetarn (瑞)

《工人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Working Men

工人同盟 Working Men's League

《工人报》 The Worker

《工人报票》 Working-Men's Ballot

《工人拥护者》 Working Man's Advocate

《工人呼声》 Die Arbeiterstimme (德)

工人总同盟 General Working-Men's League

《工人联盟》 L'union des Travailleurs (法)

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Central Committee of United Trades

上帝民兵队 Militia of God

夕法尼亚协作社 Sylvania Association

四 画

《火炬》 Die Fackel (德)

木工联合会 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木匠和细木工统一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

不断向上俱乐部 Excelsion Club

区会议 District Assembly

区联盟 District Alliance

日耳曼尼亚 Germania

中央劳工联合会 Central Labor-Union

中央劳工联盟 Central Labor Federation

中央联合工会 Central Federated Union

中间路线平民党人 Middle-of-the-Road Populists

贝拉米俱乐部 Bellamy Club

公平劳动交换银行 Equitable Banks of Labor Exchange

《公民投票》 The Referendum

《公民投票》 Nepszava (匈)

五 画

- 《正义》 Spravednost (捷)
《石匠》 Lo Scalpellino (意)
《未来的国家》 The Coming Nation
左雅尔公社 Community of Zoar
左雅尔分离主义者公社 Society of Separatists of Zoar
布卢姆菲尔德协作社 Bloomfield Association
布鲁克农庄 Brook Farm
布鲁克农庄法郎吉 Brook Farm Phalanx
布鲁克农业和教育农庄协会 Brook Farm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
布鲁克林社会主义劳工联合会 Socialist Labor Federation of Brooklyn
北美 * * * * * N. 和 H. O. N. and H. O. of the * * * * * of North American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North America
北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Men's of North America
北美体育协会 North American Gymnastic Union
北美体育协会联合会 United Gymnastic Unions of North America
北美法郎吉 North American Phalanx
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圣路易劳工报》 St. Louis Labor
加利福尼亚工人党 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

- 《加利福尼亚社会主义者》 The California Socialist
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独立党人”运动 “Locofoco” movement
民主社会主义国际同盟 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emocratie Socialiste (法)

六 画

- 安大略联合会 Ontario Union
产业工党 Industrial Labor Party
《衣阿华社会主义者》 The Iowa Socialist
农民和工匠保护联合会 Farmers' and Mechanics' Protective Association
农民联盟 Farmers' Alliance
《西部人民呼声报》 Die Volksstimme des Westens (德)
西部矿工联合会 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
亚琛君主会议 Congress of Sovereigns at Aachen
至上宗规天国 heaven of last dispensation
地方工会代表会议 Trade Council
地方会议 Local Assembly
地方联盟 Local Alliance
芝加哥八小时工作制联合会 Eight-Hour Association of Chicago
《芝加哥人民报》 Die Chicago Volkzeitung (德)
《芝加哥工人新闻》 Die Chicago Arbeiter-Zeitung (德)
《芝加哥社会主义者》 The Chicago

Socialist
 «芝加哥社会主义者» Der Chicago
 Sozialist (德)
 芝加哥基督教社会主义同盟 Christian
 Socialist League of Chicago
 机工和铁匠联合会 Machinists' and
 Blacksmiths' Union
 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Communist
 Club
 考克斯萨基公社 Cossakie Com-
 munity
 «回声» The Echo
 «同志» The Comrade
 «先驱» Der Vorbote (德)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 London Com-
 munist League
 «向理性呼吁» The Appeal to
 Reason
 自由土地党 Free-Soil Party
 自由共和党 Liberal Republican
 Party
 «自由探究者» Free Enquirer
 «自由旗帜» Freiheitsbanner (德)
 伊加利亚公社 The Icarian Com-
 munity
 伊加利亚运动 Icarian movement
 «伊加利亚游记» Voyage en Icarie
 (法)
 «伊利人民» The Erie People
 伊利诺斯劳工党 The Labor Party
 of Illinois
 全国劳工同盟 National Labor-
 Union
 全国协作社联合会 National Con-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全国劳动妇女同盟 National League
 of Working Women

全国铸工联合会 Iron Molders'
 National Union
 合作共和国兄弟会 Brotherhood of
 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各阶级和各民族联合会 Association
 of All Classes and Nations
 «导报» The Leader

七 四

«辛辛那提工人新闻» Die Cincin-
 natier Arbeiter-Zeitung (德)
 辛辛那提社会政治劳工联合会
 Socio-Political Labor-Union of
 Cincinnati
 辛辛那提斯拉夫人社会政治劳工同盟
 Slavonian Socio-Political Labor-
 Union of Cincinnati
 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Labor
 Party
 社会主义同盟 Socialist League
 社会主义协会 Socialist Association
 社会主义体育协会 Socialistic Gym-
 nastic Union
 «社会主义者» The Socialist
 社会主义职工联盟 Socialist Trade
 and Labor Alliance
 社会主义联盟 Socialist Union
 «社会民主主义者» The Social
 Democrat
 «社会民主先驱» The Social Demo-
 cratic Herald
 社会民主联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社会共和国» The Social Republic
 社会改革社团 Social Reform Unity
 «社会命运» The Social Destiny
 社会党 Socialist Party

麦克卢里亚 Macluria
 进步工党 Progressive Labor Party
 克拉芒特法郎吉 Clermont Phalanx
 克拉克森法郎吉 Clarksan Phalanx
 劳工协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Trade and Labor Unions
 劳工改革党 Labor Reform Party
 劳动交换银行 Labor-Exchange
 Bank
 《劳动者》 The Toiler
 《劳动者》 Robotnik (波)
 《劳动骑士日报》 The Journal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劳动骑士团 Noble Order of
 Knights of Labor
 劳动骑士芝加哥职工大会 Chicago
 Trade Assembly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时代》 The Times
 希伯来人联合工会 United Hebrew
 Trades
 纳肖巴公社 Nashoba Community
 纽瓦克社会主义劳工联合会 Social-
 ist Labor Federation of Newark
 纽约及附近地区社会党 Social Party
 of New York and Vicinity
 纽约市德国人联合工会 United Ger-
 man Trades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纽约第一支部 Section 1 of New
 York
 纽约第五劳工同盟 Labor-Union
 No. 5 of New York
 《纽波特社会主义者》 The Newport
 Socialist
 阿马纳公社 Amana Community
 阿耳法德尔菲亚法郎吉 Alphadel-

phia Phalanx

八 画

《法郎吉》 The Phalanx
 宗教公社 Religious Community
 《青年伊加利亚》 La Jeune Icarie
 (法)
 拉普派公社 Rappist Community
 国民党 Commonwealth Party
 国际工人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
 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 North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 The Interna-
 tional Review
 国际劳动人民协会 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
 国际同志联欢节 Festival of In-
 ternational Brotherhood
 国家主义俱乐部 Nationalist Club
 《明星报》 The Star
 肯达尔公社 Kendal Community
 和平联合移民区 Peace Union Set-
 tlement

九 画

《洛杉矶社会主义者》 The Los
 Angeles Socialist
 美国工人党 Working-Men's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工业联合会 American In-
 dustrial Union
 美国工会 American Labor-Union
 《美国工会日报》 The American
 Labor-Union Journal

美国与加拿大有组织行业和工会联合会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Un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党 Social Democracy of America
美国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America
美国劳工联合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费边主义者》 The American Fabian
美国费边社 American Fabian Society
美国罢工委员会 United States Strike Commission
美国铁路工会 American Railway Union
美国基督教社会学学会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ristian Sociology
《前进报》 Vorwaerts (德)
《前进》 Forward
《前哨日报》 Daily Sentinel
总体法郎吉 Integral Phalanx
总经理协会 General Managers' Association
契耳坦哈姆公社 Cheltenham Community
《南方社会主义者》 The Southern Socialist
《威尔什尔杂志》 Wilshire's Magazine
威斯康星法郎吉 Wisconsin Phalanx
革命同志会 Revolutionary Club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Labor Party
战慄教徒 Shaking Quakers

信徒联合会 United Society of Believers
《俄亥俄人民报》 Ohio Volkszeitung (德)
《俄亥俄工人》 Arbeiter von Ohio (德)
《俄亥俄社会主义者》 The Ohio Socialist
俄亥俄法郎吉 Ohio Phalanx
《俄克拉何马社会主义者》 The Oklahoma Socialist
钢铁工人混合联合会 Amalgamated Association of Iron and Steel Workers
统一工党 United Labor Party
统一社会党 United Socialist Party
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会主义 Fabian Socialism
费拉德尔菲亚裁衣工人工会 Clothing-Cutters' Union of Philadelphia
费拉德尔菲亚铸工联合会 Iron Molders' Union of Philadelphia
《费城日报》 Das Philadelphia Tageblatt (德)
费城自由德国人公团 Free German Community of Philadelphia

十 四

哥伦比亚法郎吉 Columbian Phalanx
真神托公会 The True Inspiration
起义委员会 Insurrection Committee
索达斯湾法郎吉 Sodus Bay Phalanx
《爱达荷社会主义者》 The Idaho

Socialist
特朗布耳法郎吉 Trumbull Phalanx
预备社会公社 Preliminary Social Community

十一画

密尔沃基劳工联合会 Labor-Union of Milwaukee
康缪尼亚 Communia
谐和会社 Harmony Society
理性教堂 Church of Reason
职工大会 Trade and Labor Assembly
教育和防卫协会 Educational and Defensive Societies
黄泉公社 Yellow Springs Community
菲尼安同志会 Fenian
基督教社会主义 Christian Socialism
基督教社会主义协会 Society of Christian Socialists
勒雷斯维尔法郎吉 Leraysville Phalanx
推木工人工会 Lumber Shovers' Union
第一国际联合会委员会 Fed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绿背纸币党 Greenback Party

十二画

谢利叶 Series
联合工党 Union Labor Party
超绝俱乐部 Transcendental Club
斯威敦堡教会 Swedenborgian Church

《落矶山联盟》 The Alliance of the Rockies
《晚邮报》 The Evening Post
腊斯金合作移民区 Ruskin Cooperative Colony
奥奈达公社 Oneida Community
奥奈达公社有限公司 Oneida Community Limited
《奥奈达通报》 The Oneida Circular
《犁头和剪枝铁》 The Plowshare and Pruning-Hook

十三画

塞雷斯科法郎吉 Ceresco Phalanx
《新兴美国》 Young America
新伊加利亚公社 New Icarian Community
《新时代》 The New Times
《新时代》 Den Nye Tid (瑞)
《新时代》 Die Neue Zeit (德)
《新的工业世界》 New Industrial World
新耶路撒冷教 New Jerusalem
新谐和公社 New Harmony
《新谐和公报》 New Harmony Gazette
《解放者》 The Emancipator

十四画

《旗帜报》 The Standard

十五画

震教徒会社 Society of the Shakers
黎巴嫩山公社 Mount Lebanon Community
《黎明》 The Dawn

德国工人协会 German Working-
Men's Society

德国社会民主党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德籍工人总协会 General German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十九回

《警钟》 The Alarm